自序

這是抗戰前夕出版的一本書，它的原名叫做「近代經濟學說史」；本來是由民國廿五年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教書時所編經濟思想史講義修訂而成的。因爲在平大時，經濟思想史講授到那裏，講義也只編到那裏；由于時局緊張，書店催稿（係先與書店訂好約寫的），我這本書當時也只好寫到那裏就算數，匆匆地付梓了。出版後一共祇發行了兩年餘；從民國廿六年到廿八年，前後印過兩版，其後就因種種困難而無形宣告停版。民國廿九年以來，此書坊間可說已經完全絕跡，只有舊書攤上偶爾還能找到一本兩本。

這是一部純粹學術的作品，雖說它不過是「述而不作」並無創見可言的東西；但它對於理論經濟學，特別對於經濟思想之史的發展，較之向來國內同類的譯著，或者有一些不同的貢獻。它對於各大學或獨立學院底政經學系，或者還不失爲一本值得參考或做課本的書籍。它和其他類似作品的不同貢獻，卽在向來國內出版的一些經濟學說史或經濟思想史，有的是依据舊的經濟學方法論來寫的，或者說是依据十九世紀及以前的各重要學派（特別是正統學派，英美學派，心理學派等）底觀點來寫的；有的則「無所爲」地把各派經濟學說作毫無是非的並列介紹（自然，這樣的客觀介紹性的作品，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還是値得重視的），而缺乏一種批判的精神。本書底特點——假如可以稱它爲特點的話——就在第一用新經濟學方法論去揭發每一經濟學說底歷史背景，從社會經濟發展底特定的歷史階段，去說明這一經濟學說底根源及其發展動向；第二用歷史主義的觀點，去對

每一學派作一適當的評價；第三則用現代最新的經濟科學底觀點，對過去各派經濟學說逐一作嚴正的批判性的介紹。

因為舊版原係編成倉猝付印的結果，其中須待修訂與補充之處甚多。修訂之處一部分是屬於技術的修正，一部分則係內容的改訂。但大致說來，除章節底次序上有較大的更動外，並無很多的修訂。補充之處則將「社會主義經濟學說」一章中，增加了「科學社會主義學派」一分章。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經濟學說史中，則增加了歷史學派，奧國學派和英美學派三章。這樣總算完成了現在這部「近代經濟學說史大綱」一書。就「近代」底範圍而言，可以說把所有重要的學派都介紹進去了。至於二十世紀的經濟學說，那應當屬於「現代」的範圍，這裏當然不暇涉及了。

不過作者自己知道，增訂後的這部書，仍舊有着許多的缺點，這是在所難免的。然而這有待日後作更精密的修訂了。

這部書是在祝公健兄底鼓勵之下完成增訂的工作，又在他的臂助之下才獲得出版的機會的。交稿之後，我又因事離開了重慶，不及親自校閱清樣；這一校閱的責任，於是也落到了公健兄底肩膀上。這裏我得向公健兄致深厚的謝意。

一九四四年八月於成都。

導論

凡屬一種經濟學說，總有一定的社會經濟關係做它的背景的。任何一派經濟學說，總是某種經濟關係底產物，代表着社會中某一部分人底要求。它跟其他意識形態不同的地方，只是它更直接更顯明地反映着一定的經濟關係，代表着某一部分社會底要求。例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商業資本統治時代的那些經濟關係底產物，它彰明昭著地代表着商人底要求。古典學派（Classic School）顯明地反映着青春時期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經濟關係，因而同時就代表工業資本底要求。

由此可知，經濟學說既有社會經濟關係做它背景，它就必然隨着這些關係底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社會經濟關係不斷地隨着生產力底發展而發展，以這種關係爲基礎的經濟學說，也就變動不居地向前進展，產生了許多歷史上的經濟學派。所以經濟思想史跟社會經濟發展史實有十分密切的連繫。但是由於意識對於現實的反作用律，不但社會經濟底發展引起經濟思想底變動，而經濟思想或經濟學說本身反過來也能促進經濟關係底發展的。例如重商主義這一經濟思潮，原是十六、七世紀時代封建的土地關係開始崩潰，商業資本勃然興起的那種社會經濟條件底　物，可是重商主義思潮本身底盛行，反過來又給當時商業資本底發展以强有力的推動。這是再明顯沒有的事實。

從原始時代經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封建制度底初期（即物物交換時期），人類的經濟生活異常簡單，社會經濟關係，尙未成爲經濟學研究底對象，而且當時的人類也沒有把它當作研究對象的需要。因爲即在交換經濟底最初期（即單純商品價值形態成爲唯一的商品交換形式的時

期），農村公社間的剩餘生產品交換，是範圍極小的偶然現象；那時候社會分工是不存在的，經濟的生產關係簡而易見，根本不需要成立一門科學來研究它。卽在中古時代（卽西歐封建制度底全盛時期）經濟學也沒有成爲獨立的科學；祇是在政治學，法律學，倫理學以及宗教教義中附帶着一些關於經濟生活的思想能了。直到十六世紀時，隨着商品經濟底蓬勃發展，國際貿易底加速擴張，經濟關係底日益複雜，商業資本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了統治的地位，那時才有獨立的經濟學說出現。這種學說，最初便是重商主義，其次是代表法國農業家利益的重農學說。

從古典學派底鼻祖亞丹·斯密氏（Adam Smith）起，經濟才當作一門完整的獨立的科學而被建立起來了。當時英國的封建制度業已加速崩潰，進步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在日益發展。產業革命底開展，機器工廠制度底建立，使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日益鞏固而擴大。亞丹·斯密底經濟學說，就適應着這種生產關係而產生的。古典學派鑒於舊的封建的生產制度——工業底行會制和土地經濟底壟斷制——底束縛和封建專制政治底壓迫，使着資本主義的工業不能盡量發展起來，因此他們就主張生產經營底自由放任，而反對一切干涉。他們是自由競爭底首倡者。無疑的，這種理論在當時給了社會生產力發展一個強大的刺激，它代表着當時進步的英國新興工業資本底要求，因而它是歷史地進步的經濟學說。當時英國的資產者不但對內要求自由放任，卽對外——在國際貿易上——也一樣地要求自由競爭。因爲從十八世紀起，英國在國際市場上擊敗了資本主義關係最先發展的尼德蘭（Netherland——卽今荷蘭），一躍而爲海上霸王，事實上壟斷了世界的市場。英國之所以達到這樣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固然是英國產業革命所促成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底膨脹，使英國成爲「世界底工廠，」但是鼓吹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反對封建束縛和宣揚資本主義爲唯一合理之生產制度

的古典學派經濟思潮，確實也大大地助長了英國經濟勢力底擴張和鞏固。這是無可遮掩的事實。這裏也就明白地顯示了經濟底相互關係。

十九世紀初葉，由於產業革命底完成，社會生產力猛飛突躍地增進，資本主義的經濟就一日千里地發展。這便是西歐資本主義全盛時代底開始。可是隨着資本主義生產力底發展，隨着國家社會財富底增進（即資本底積累），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包藏的矛盾，也不斷地發展起來了。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勞資對立日益尖銳化了。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之下，就開始了（差不多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古典學派底崩潰。

大概從前世紀三十年代起，上層市民羣的經濟學者如賽依（J.B.Say）西尼歐（N.W.Senior）之流，都竭力否認亞丹・斯密和李嘉圖底勞動價值論。為要證明利潤不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底一部分，他們便杜撰出一種新的利潤來源說來。賽依說，利潤是資本家所有的生產手段底生產力創造出來的（即「資本生產力」論）。西尼歐則認為利潤是資本家節欲底報償。當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完全變成強辯的和俗流的「理論」一時，反對這種經濟學的經濟思潮，也就開始抬起頭來了。

在這些資本主義經濟學底反對者中間，有代表土地貴族要求的理論家（如馬爾薩斯 Malthus）有手工業勞動者和農民大衆底保護者（如西斯蒙蒂 Sismondi），有初期的勞工要求底保護者（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和最後有成熟的科學社會主義者。

綜合上述一切，我們可以堅信不疑地說，任何一種經濟思潮都有它一定的社會經濟的背景，它們都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底產物。但同時它們反過來又能積極地影響着社會經濟關係底發展或變遷。所以經濟學說底發展史是跟經濟發展史交融並進的，經濟思想底發展隨時隨地反映着社會經濟

目次

第三章　古典學派（正統學派）……五三

第十章　英美學派……二九一

第一章　重商主義學說

第一節　重商主義之社會經濟背景

誰都知道，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底思想體系，不過它不是一般的商業資本底思想體系，而是一定的歷史時期底商業資本——直接在工業資本以前的商業資本——底思想體系。所以在研究重商主義本身之前，先把它所代表的，爲工業資本之前身的商業資本底性質，作一番估量，是絕對必要的。

商業資本（或稱商人資本）是資本還未組織生產以前早就存在的一種歷史的資本形式。它的生存和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時，它就成爲資本主義方式之必需的歷史前提。這種前提可分兩方面來說：第一，商業資本是貨幣資財集中底先決條件；第二，因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乃以商業的生產爲前提的，換句話說，以大量的批銷而不以個別的零星購買爲前提的。所以工業資本底誕生必然以商人集團底存在爲必要條件，這一集團的人並不爲自己個人底需要而購買，在他每一次購買底行爲中事實上集中着許許多多人底購買行爲。同時，商人資本不斷地發展，使生產日益以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爲目的，日益使勞動生產品轉變爲商品。

商業資本自身之前提爲商品流通，可是從另一方面講，商品流通又受商業資本之極大的積極影響：商業資本促使商品流通底範圍愈趨愈大，日益擴大交換範圍，把一個區域底生產品輸供到別個區域去。但是商業資本之更重大的作用乃在它發展了貨幣資財這一種財富底形式。具有使用價值的

自然品財富是以榨取者集團底需要爲界限的；貨幣財富底效用却毫無限度。再則，商人把一個區域底物品供給於別個區域，同時就擴大了需求：商人底供給產生了需求。這種需求首先就是對貨幣的需求，而貨幣需求底加強就引起佔有剩餘生產品底貪慾，因爲商人有了更多的剩餘生產品，就可以變成更多的貨幣。

在中世紀末期，西歐各國底輸入品大半都是奢侈品，後者是由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輸出來的，而這些國家本身則輸入原料品。不過這些輸入物品也多半是貴重的金屬品。這樣看來，國外貿易是眞實的貨幣資財底重要來源了（註）。

所以當時的商人就是貨幣資財底代表，商人集團便是擁有貨幣資財的社會羣。假如說以前財富產生於土地底佔有，土地是財富底主要來源，隨着商業資本底發展，貨幣形式底財富就跟消費形式（意卽物品形式）底財富對立起來了。所謂消費形式底財富，就是封主們所佔有的物品財富。

商業資本底歷史可以劃分爲兩個時期。產生於商品交換的商業資本，本身又促進商品交換加速發展。在商品流通還限於地方性的時候，小商品生產者往往親自把自己大部分生產品帶到地方市場上去出賣。這是行會統治底時期，是城市和區域底閉塞時期。第二時期之特徵爲廣大市場底形成，世界市場底產生，小生產受商業資本底支配以及工場制度底出現。商業資本在這時已經發達到了頂點。

這個時代是巨大的貿易公司出現，豐厚的商業利潤和大規模的殖民地掠奪底時代。這時工業資本尙處於從屬的地位：工場主假如同時不是大商人的話，他就只是一種次要的人物。

（註）所謂「眞實的」貨幣資財，乃指直接可以作爲鑄造貨幣之用的那些貴重金屬品而言。

然而我們却也不能過分估大了商業資本底意義，以爲它是一種自身能創造一切的力量。商業資本底發展，一就它本身言，不足以促成一種生產方式之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並予此過渡以解釋。商業和商業資本底發展，到處都促使生產按照以下的趨勢發展：即生產底目的日益成爲交換價值，生產底規模日益擴大，生產品底種類日益複雜，使貨幣發展成爲世界貨幣。因此商業資本底發展對於以使用價值爲主要目的的那些生產組織，到處給予或多或少的分解影響（破壞作用）。然而他對於舊的生產方式的分解作用底程度如何，這首先却當視這種生產方式本身底內部結構及其鞏固性爲斷。而這種分解過程底結果如何，即由何種新生產方式來代替舊的，這也不決定於商業而須視舊生產方式本身底性質爲斷。例如在古代社會內，由於商業和商人資本發展底影響，結果產生了奴隸主的經濟；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業資本發展，却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此可以明白，這些結果本身，除商業資本外，還得由其他條件來決定的。

商業資本給予手工業的行會組織以分解的影響，並將小商品生產者羣置於自己的從屬關係之下：小商品生產由於它自身內部的本性，必然趨於潰解，因爲它發展到某一階段時，就要碰到一種爲它自身所不易解決的矛盾（商業資本便是這種矛盾運動形式）——分散的生產與集中的銷售間的矛盾。當小商品生產發展起來的時候，它一方面創造着主觀因素（富有的商品生產者），另一方面又創造着客觀的因素（如貨幣底積累，市場底擴大等）；這些都是商品生產發展所必需的條件。

同時，商業資本又予封建采邑經濟和封建諸關係以潰解的影響，然而這種經濟和社會關係之所以潰解，還是因爲它們自身已經發展到這一潰解地步的緣故。大量的封建地產底集中，廣大的采邑底形成，與爲封建制度之基石的自然性經濟發生了矛盾。廣大的賦役經濟所出的大批生產品，那些

封主們，王公們，僧院底主持者們（這些都是賦役經濟底所有者）都無法脫售，於是他們的奢侈生活就無以滿足（因爲沒有大量的共同交換符號——貨幣），甚至要把所收的全部穀物都磨成粉，烤成麵包以給養王公們屬下成千成萬的食客僕役亦有所不能。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商人就出來「幫忙」了：商人不但担負起了替封主們銷售賦役經濟底剩餘生產物的任務，而且還供給封主們以必需的物品，特別是封主貴族們所需求的奢侈品。到後來，隨着商品經濟（因而亦即貨幣經濟）底發展，他們的消費更形浩大，生活更形奢華，對於貨幣的慾求亦與日俱增，於是他們就日漸深深陷入對商人階級的債務關係中去了。這便是商人資本瓦解封建經濟的過程。

再則，由於商品交換和貨幣經濟底發展，結果自然貢賦（即封建時代農民繳納於封主的農產物，亦即封建時代的物品地租）就被貨幣貢賦所替代。因此「剩餘生產物」就留在封土制下的農民們手上了。農民爲要繳納貢賦，不得不求助於商人脫售這些「剩餘農產物」，藉此獲得貨幣。由於類似的過程，農民大衆也都被商人高利貸資本底鐵鍊子緊緊地鎖住了。

同樣的，國家的中央政府，也由於商品交換和貨幣經濟底加速發展，對於貨幣需求日益增加，於是它所徵收的賦稅也不得不改爲貨幣形式。同時，因爲給養軍隊，從事戰爭，維持巨大的國家機構，無事不需要大宗資款。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的中央政權也因商人底「幫忙」而逐漸落到他們底影響之下去了。

這樣看來，在封建社會末期（即十五到十七世紀），各種形式底經濟和舊制度下的一切社會層，都無一能躲避商業資本底影響，且這種影響是隨着歷史的前進而日益擴大和強化的。代表商業資本利益的重商主義，就在這種社會經濟的條件之下產生和發展起來了。

第二節　重商主義之經濟政策

有些人把重商主義解作特殊的經濟政策之體系，有些人則解釋重商主義為特殊的經濟思想之體系，特殊的經濟學說。但實際上重商主義是兩者兼而有之。現在我們先把重商主義當作特殊的經濟政策底體系來大略解釋一下。事實上，重商主義底實踐倒是先於重商主義底理論。那種重商主義底實踐是商業資本時代經濟發展底全部進程所促成的。先有了重商政策底實踐，然後才有重商主義底學說。

自然，我們也不能說，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理論）從來不曾先於經濟政策（經濟的實踐）而存在。理論家可以根據經濟發展底客觀趨勢而創造一種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過了一個時期才轉變為事實。但是我們這裏所講的只是關於重商主義，而就重商主義言，確是經濟政策先於政治經濟學而發生。

那末重商主義的實踐究竟是什麼呢？

重商主義可分為兩個階段：早期的和成熟的（發展了的）重商主義。兩者均確定貨幣有決定的意義；但兩者意見亦有紛歧之處：第一，在取得和保存貨幣底方法上；第二，成熟的重商主義對於貨幣的態度已經不像早期重商主義那麼直捷而原始。一個業已走上商品流通發展之路的國家，是應該有貴重金屬的，這種貴重金屬底數量應當隨商品流通之發展而增加。當初信貸尚極不發達，一切賣買差不多都是現錢交易。在這種情形之下，吸收貴金屬到國內來和保持此種貴金屬於國內，這些問題就變成為國家政府之迫切的要政了。

已經走上了商品經濟發展道路的國家，在最初的時候，單靠經濟手段一種是吸收不到必需的金

銀量的。於是就需要用行政手段來補助了。在早期重商主義時代的英國，這類行政手段可以歸納爲：（一）政府對英國商人的統制，和（二）英政府對外國商人的統制。在國外經商的英國商人，只許在一定的「棧積地帶」做買賣。楊儲爾（Yanjoul）在其「英國之自由貿易」一書中寫道：「英國的商人把自己平常的商品——羊毛、皮、鉛、錫、魚等物——供給這些棧積處所，而從那面換取必需的物品——大部分是製造品……。國家爲想從這種貿易中吸取若干利益幷統制之，就成立了特殊的機關，後者之職務有二：（一）監督羊毛輸出應繳關稅之徵收；（二）對於輸入英國之貨物，務須注意其所繳之關稅，一部分應用外國鑄幣或貴金屬充之……」（註一）這樣就執行了吸收貴金屬到本國來的任務。

對於在英國經商的外國商人的統制，情形要複雜得多。「帶了金錢到英國去做生意的外國商人，必須取最短途徑先到皇家貨庫或專司貨幣兌換的御吏處，去把自己所帶的外國鑄幣換成英國貨幣，而換得之數量則任御吏規定。假如兌換之後，仍發見該商人尚留有外國貨幣時，這些貨幣即須沒收歸皇室國庫所有，而該外商本人且須受嚴厲懲罰」（註二）。英國皇朝採取這種政策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從外國商人方面所收進的是滿價的金屬貨幣，而皇室貨庫所償還他們的却是損壞的，低成分的鑄幣。就算外國商人所攜來兌換的也是低成份的（虛價的）話，那也無甚關係，因爲外國貨幣底收受是按照實在的分量計算的，而外國人兌換所得的英國貨幣底數量却任御吏規定。這樣一來，英國皇朝就得到了一大筆現貨的進款。

（註一）楊儲爾著「英國之自由貿易」一書，頁六。
（註二）見前書，頁九。

但是除強迫外國商人交出外貨來兌換外，皇朝還得採取必要的政策來阻止外國商人將出售商品所得貨幣攜帶出英國國界的行爲。爲了這事，皇朝曾頒佈了二條法律：一條是關於強迫消費的法律，另一條卽是所謂監察法。根據第一條法律，外國商人在英國銷售商品所得之貨幣，必須全部消費在英國，購買英國商品。根據第二條法律，則有指定的監察人監察外國商人是否依法遵行。此種監察人之職務往往由外商所寄居之「寓主」執行。按當時之英國法律，外人去英經商者，均被視爲「國客」，而此等「國客」到英以後必須依法寄居於一定的「寓主」，而「寓主」則須負監察「國客」行動之責，須令「國客」詳細登記，並注意其貨幣之運出國外。

這便是英國商業資本早期底情形。跟這一時期相適應的經濟政策是早期的重商主義。成熟的（發達的）重商主義是表示更高階段的經濟政策，後者是更高階段的經濟發展所決定的。

在晚期（卽發達時期）重商主義時代，商業資本已經高度發展，工場制（亦稱作坊制）已產生，信貸亦已開始發展。這就是所謂「原始資本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時期底開始。商業資本和高利貸這兩位「嫡親兄弟」，大規模地執行它們自己的歷史使命：飛快地發展商品貨幣經濟，大規模地擴張國內外市場，日益加緊對殖民地土人的商業掠奪，努力加速國內手藝小生產大衆底破產，同時亦卽不斷地實行貨幣資財底巨量積累。這時國家要用老法子去統制和調節它們，已爲勢所不能，亦且沒有必要。這時追求金銀的欲求比以前增高得多，可是人們對於金銀的態度卻改變了。貨幣之爲資本之職能，業已充分地表現出來；但是貨幣之成爲資本，只有在運動中纔能夠，所以貨幣底運動就不當受過分的限制。過去的口號——多賣少買——已經不適應於這時的新條件了。

應當指出，早期重商主義時期底特徵僅僅是「貨——錢——貨」，都是商人純粹處於中間人底地位，他們的活動只限於買進和賣出，從中取得一點利潤。可是到了成熟的重商主義時期，主要的特徵就是表現在「錢——貨……生……貨——錢」，這一公式上了。這意思是表示商人階級此時已在執行組織生產底職能，商品底生產已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地被忽視了。然而即在這一期，生產仍未居於首要地位，它仍被視為商品流通發展之必要的條件，因為當時大家心目中仍視商品流通為國民財富之真實的來源。

假如把重商主義作一簡單的總評估，那末可以說：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底經濟政策，它的歷史使命在於替工業資本掃清道路並為它未來的「霸權」造成基礎。當商業資本底使命完成的時候，重商主義就從促進經濟發展底因素轉變為它的桎梏了。這時在政策上和理論上就開始反重商主義的潮流。

第三節　重商主義之理論體系

一部分研究者以為重商主義祇是經濟政策而忽視了它的理論方面。例如翁肯就明白肯定地說：「這是經濟政策底體系而不是理論的政治經濟學，甚至那些討論國民經濟問題的重商文獻，也不能視為經濟理論底嘗試……。」（註一）俄國的經濟學者馬斯洛夫（Maslov）在其「國民經濟史教程」中亦發揮類似的見解，他說：「貿易保護制，人工促進為輸出而生產的那些工業部門底發展和人工維持貿易出超底局面——這種制度稱為重商主義。」（註二）

這部分作者只把重商主義看作經濟政策而把它完全排拒到政治經濟學範圍以外去。但同時也有另一部分經濟思想史研究者——而且是大多數研究者——則完全抹煞了重商主義底理論方面和實踐方面底區別。這種見解也是不正確的。實際上，重商主義是國家所實施的實際政策底體系，同時又是理論底體系，重商主義確是一種經濟的理論，但是它還不配稱爲眞實的現代經濟科學。經濟思想之成爲科學，只是到揭發現象之本質這任務被提出來和實現出來的時候纔開始。就經濟現象講，要揭發現象底本質而只限於流通底研究是不可能的。而重商主義者底研究對象恰正是現象底表面。

重商主義者底研究對象是流通；他們的方法是現象底描寫和部分地現象底分類。他們所認定的任務是狹窄地實際主義的；他們研究底結果是各種經驗法則底確定。重商體系只是政治經濟學底「前史」形態(Pre-historic f rm)，正如商業資本時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史」一樣。爲商業資本之理論家的重商主義，首先是以這一資本底運動——「貨——商——貨」——爲出發點的。他們把資本流通過程看成僅僅由兩個流通階段「貨——商」和「商——貨」組合而成的貨幣循環。因此他們就認流通爲利潤底泉源和一般財富底泉源。由此又產生以貨幣「積儲」，爲財富的觀念。實際上，在商人眼界中確是如此的，商品底買賣才是增加貨幣資本底手段——由「貨」轉變爲「貨」。商人把較少的貨幣投入流通中去，便從那面取回較多的貨幣來。

可是漸漸地商業資本底勢力開始侵入生產中去了。首先商人開始控制那些在他權力之下的小生產者——手藝工人。同時，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也出現了。政治經濟學就不能再忽視生產過程。於

(註一)翁肯著：「斯密以前的政治經濟學史」頁一三二。
(註二)馬斯洛夫著：「國民經濟史教程」頁一三二。

是晚期的重商主義就代早期重商主義而起。僅僅採取「貨——商——貨」形式的資本循環，此時已不適應現實。商人底活動亦不復以現存商品底買賣爲限：他也要買原料去供給在他控制下的那些小商品生產者，他並且又常常用勞動工具去供給他們。於是他的資本環循就開始採取「貨——商……件……商——貨」底形式了。晚期重商主義事實上確是從這一資本運動底形式出發的。

雖然資本循環已經發展到不以流通爲限的階段，可是生產却尚處於從屬的地位。全部資本循環仍完全採取貨幣資本循環底形式，以貨幣始而以貨幣終，全部資本底運動表現着貨幣自增底過程。重商主義者所注意的僅僅是資本循環底一方面，即貨幣資本底循環。這是當時（商業資本統制時代）的現實所決定的。只是到了商業資本底統治地位被工業資本所替代時，經濟研究者注意重心才由貨幣資本轉移到生產資本底循環上來。

講到工業資本之循環，吾人即不能以貨幣資本運動底考察爲限，因爲工業資本底循環實際上是三種資本循環形式底統一——貨幣的、生產的和商品的資本循環形式底統一。這是同一工業資本之三種不同的形式，它們互相對立，同時又互相依賴。從貨幣資本底循環出發去觀察，則全部過程似乎只是貨幣自動（貨幣自行增殖）底過程，生產只是這一過程之必要條件而已。反過來講，把生產資本底循環當作主體來考察時，貨幣就變成簡單的流通工具或支付工具，即變成幫助生產之永常更新的必需條件了。這時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又是一種偏面的情形：彷彿資本主義生產底全部事業是生產而不是價値增殖——剩餘價値底佔有。假如把注意中心放到商品資本底循環上去的話，結果亦復如是。在商品形式底資本循環中，貨幣底運動和生產不斷的更新，僅僅表現爲商品運動中的必要條件，必要的輔助因素了。

然而，在商業資本底統治時代，貨幣資本循環可說是資本運動底唯一形式。因爲那時工業生產（小手工業）尙居於商業資本附庸地位。可是即在那時，貨幣資本底循環已極顯著地（縱然是偏面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底特徵。這種資本循環形式最明白地揭露出下面兩點事實：第一，資本主義生產底動機——佔取利潤；第二，貨幣不單是流通工具。這也是重商主義所預示的（縱然預示得極粗陋而淺薄）兩點，而這種預示 是使重商主義體系成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第一次理論的檢討」的根源。

重商主義底發生與開展，佔着兩個世紀光景，它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民族領域內開展着的。根據這一點，就有人（如翁肯）以爲曾經有過幾種不同的重商學說。這類人不知道重商主義始終是商業資產集團利益底表述，換言之，它有一個統一的社會基礎。除此以外，重商主義還有一個統一的方法論基礎：即以貨幣資本循環爲唯一研究對象。在重商主義者底觀念中，「貨——商——貨，」甚至「貨——商……生……商——貨」，這個圖式是表示：（一）貨幣就是資本，資本就是貨幣，貨幣不祇是什麼資本底貨幣形式；（二）流通凌駕於生產之上，而不是相反；（三）利潤只是商品賣買底結果；（三）利潤只表現爲貨幣餘額底形態。由於這些觀點，所以重商主義者把貨幣跟資本和財富等同起來，換言之，即把形式跟內容，流通過程跟生產過程等同起來了。這樣，在重商主義者底心眼中，貨幣便是一切。這可說是「貨幣拜物主義」之極端的表現。

在重商主義者看來，生產商品就是生產貨幣；爲要不使貨幣成爲一瞬即逝的東西，不使它成爲只是流通工具，就必須實行「少買多賣」的原則。這樣，早期重商主義者底思想就發展到了貨幣均衡（Monetary Balarce）底理論；晚期重商主義者底思想則發展到貿易均衡(Trade Balance)底理

論、即狹義的重商學說。

貨幣均衡論和貿易差額論是重商主義發展中的兩個階段，後者本身又反映着商業和商業政策發展底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上，重商主義者主張禁止貨幣輸出，他們認爲這是保持貨幣的手段。在第二個階段上，他們主張發展對外貿易，以爲對外貿易底發展可以吸收大量的貨幣到國內來：使對外貿易所吸收的貨幣量多於它所吐出的。在第一個階段上，實施重商政策的國家對於自己的經濟力量尙缺乏信任，所以完全藉國家行政手段來達到上述的目的——增加貨幣。在第二階段上，對於本國的經濟力量已開始信任。但是晚期重商主義者——成熟的重商主義底代表們——距離完全商業自由底觀念，經濟能力完全解放底觀念，還遠得很呢。

商業資本底歷史使命，——創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之必要條件，——若無國家政權底積極促成，若無一定的政策，商業方面和工業方面的一定政策底幫助，那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在重商主義者底心眼中，國家政權底幫助，甚至它的控制經濟生活，就被視爲顯著的眞理了。早期和晚期重商主義者底區別僅僅在於對這種國家干預底具體方式之不同的理解，在於如何使此種干預收到最大效果之問題而已。

現在我們要把重商主義底兩個主要代表底代表作品，約略地說個大概，作爲這一節書底結論。這兩位代表底代表作，可以說一個是早期重商主義底結晶，第二個是晚期重商底作品。現在先說第一位代表威廉·斯塔福得（William stafford）底著作吧。

斯塔福得底「對邦人怨語之評述」一著，一五八一年出現於倫敦。該書用對話體裁寫成，參加對話者有各個等級和階層的人：爵士、商人、手藝工人、農夫和神學家等。後者是對話中的中心人

物，也就是表達作者本人眞意的人物。

斯塔福得底作品出現的時候，正是一方面英國土地革命達到頂點，另一方面大批貴重金屬品從新發見的國家（特別是美洲各國）流入歐洲的當兒。土地革命底開展，乃由於英國農民大衆失去了土地，由於把植棉場改成了牧羊地。而這回事底直接原因是羊毛貿易底發展和羊毛價格底提高。同時又因貴金屬底流入和國皇大規模的貶劣鑄幣（註），結果使一切商品底價格都飛漲起來，於是就造成了一般的生活昂貴的局面。一切商品價格既然高漲，勞動力自然也要漲價了，這便是名義工資提高底來由。

斯塔福得底著作中所假定的各階層、各等級的人底對話，是在互相責備，把造成社會痛苦的責任諉諸對方，各人都從自己的階層利益出發講話。只有神學家彷彿是一位「超階層」（亦作「超社會」）的人物，他宣佈着「超階層的眞理」，這種眞理便是早期重商主義底見解。他（實際上就是斯塔福得自己）底中心意念是主張保存貨幣於國內而勿使外流。他所最感不安者即貨幣外溢一事。他的觀念還沒有發展到貿易差額論底地步。由於這個緣故，所以他竭力反對用虛值鑄幣（即分量不足或品質惡劣之鑄幣），因爲後者把實值鑄幣排拒於流通界之外，結果便往國外流出去。這樣，斯塔福得已經了解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之聯繫，他看出物價騰貴底原因在於虛值鑄幣底流通和國皇劣化鑄幣底舉動。鑄幣底貶劣產生了兩種結果：（一）生活昂貴和（二）實值鑄幣底流往國外。

斯塔福得底全部書中都貫澈着說明自國外輸入商品之害的思想，因爲商品底輸入便是貨幣底輸

（註）意即國皇使鑄幣底品質惡劣化，用劣質底金屬來鑄成貨幣，因而幣值就跌落了。國皇之所以出此，是因爲皇室底費浩大，國家機關底開支更大，國庫貧乏，不足應付之故。

出，而貨幣底輸出國外，斯氏認爲國家社會之大善。斯氏特別反對羊毛自英輸出而自外國輸入由此羊毛所製成的毛織品，他主張在英國國內自行製成毛織品。他的提出這種主張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本國毛織工業發展可以使一大部分人民獲得工作做。不過他的基本動機却是另一個：在輸出羊毛和輸入毛織品的情形之下，外國商人因出賣毛織品而自英國輸出去的貨幣多於他們在英購買羊毛時所輸入的貨幣。

另一著名的重商主義者湯麥斯・孟（Thomas Mun1571—1641），是成熟的重商主義底代表。一六六四年，湯麥斯・孟底「英國在對外貿易中的財富或對外貿易底差額」一書出現於世。湯麥斯・孟是一個大商人，東印度公司底董事之一，亦卽貿易差額論底首創人。

湯麥斯・孟並不反對貨幣底輸出，他反而主張取消貨幣輸出底禁令。他主張出超的對外貿易，主張使對外貿易之輸出超過輸入。孟氏在書中寫道：「增進吾國財富之經常的手段爲對外貿易，在這種貿易中吾人應永遠堅持一種原則，卽每年賣給外國人的商品底價值，必須大於吾人消費他們的商品。」接着他又說：「因此，假定吾帝國有多餘的織物、鉛、錫、鐵和其他本地土產而每年將此種多餘物品輸出國外，其總額達二百二十萬鎊；再假定我國每年從海外購回吾人所消費的外國貨計二百萬鎊，則吾帝國在一年間可以增加財富二十萬鎊，而這二十萬鎊必須取貨幣形式回到我國來。」（註）

這裏孟氏也把財富跟貨幣等同起來了。孟氏之重視對外貿易底出超，主要地是因爲藉此「吾帝國在一年間可以增加財富二十萬鎊，而這二十萬鎊必須取貨幣底形式回到我國來」。但是較之斯塔

（註）轉錄楊儒爾著「英國的自由貿易」卷一，頁七六。

福得，孟氏已具有比較遠大的眼光，他不盲目地反對商品輸入和貨幣流出，他的觀點是受大商業資本底利益，尤其是受東印度公司利益之支配的。該公司對當時英國商業之發展曾起了極大的作用。東印度公司底任務是在運出大量貨幣到印度去，然後又從印度輸入更大量的貨幣到英國來。當時英人從轉賣印度貨物中所獲得的利益，極為豐厚。英人往往把印度收買來的廉價商品（因為英人之在印度，不僅是商人而且是殖民者，故購價特廉），抬高價格轉賣到別的國家去，藉此獲得極大利潤。

這樣看來，孟氏了解貨幣底意義不在乎保存它們，而在乎把它們投入生產它們的流通界中去。他寫道：「貨幣創造商業，而商業又增加貨幣。因此，投入流通界中去的貨幣愈多愈好。」（註）湯麥斯．孟是阻止輸出商業的一切政策底反對者；他甚至主張減低出口貨底關稅。假使說，早期重商主義者是主張高價政策的，那末孟氏却完全相反，他擁護低價政策，認為藉此可以刺激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孟氏也反對鑄幣劣化，因為他認為「人們所重視的，不是鎊，先令，辨士等名稱，而是鑄幣內部的價值」。關於這一點，孟氏跟斯塔福得底見解完全相同：貨幣價值底降低引起商品價格底高漲。

然而孟氏底作品已比斯氏前進了一步。二人都是重商主義者，但他們却處於商業資本控制下的英國經濟發展底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所以他們是重商主義發展底兩個時期底代表。假使說斯氏竭力肯定保存貨幣於國內的必要性，那末孟氏却竭力主張貨幣自國內輸出底必要性，特別主張以發展轉售商業為目的的貨幣輸出底必要性。為着更多的貨幣輸入而作大量的貨幣輸出——這便這湯麥斯

（註）見同書，頁二八。

•孟底基本信念。

第四節　近代經濟學之先驅——威廉、彼梯（重商主義之崩潰）

一　近代經濟學之客觀基礎

以上所講是關於早期重商主義和重商主義底興盛時期，現在要講到重商主義底崩潰，同時亦即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即近代經濟學）底萌芽了。

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商業資本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必要的前提，而且在最初的時候，資本主義生產也是在商業資本控制和庇護之下發展着的。經過了好些階段之後，只在流通範圍內活動的純商人，才走上工業資本主義底道路。在商業資本統治下，流通之脫離生產而獨立，表現在下面的兩種情形上：第一，流通尚未控制生產，前者只把後者當作自己的先行條件；第二，生產過程尚未將流通包括在自身之內而把它當作自己的成素之一。相反的，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則上面兩種情形都已完成。但是在上面兩種情形均已完成之後，商業資本就失去了它的統治地位，而重商學說和政策也失去了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基礎。

「資本論」關於由商業資本到資本主義大生產的轉變，曾作以下的寫述：

「由此看來，這種轉變是經過三種方式來完成的。第一，商人直接變成工業資本家；這是指那些以商業為基礎的工業部門底場合，特別是指生產奢侈品的那些部門底場合而言，那種奢侈品是跟原料和工人同時被商人從國外輸進來的，正像十五世紀意大利從君士坦丁堡輸入的情形一樣。第二，商人小手藝匠變成他自己的中間人（Middlemen）或者直接從獨立生產者那裏

購買商品；名義上他仍讓他保持獨立性，亦不改變他的生產方式。第三，工業家變成了商人，而且直接從事大量生產，以供給商業。」（卷三，第二十章）

對於商業資本統治底消滅具有決定意義的，是上述第三種場合。在這些場合之下，流通已變成生產底成素（卽構成生產過程之要素，亦卽整個生產過程中的環節），於是重商主義也就從各方面開始被修改起來了。首先重商的貨幣觀，重商的流通觀——以流通爲財富之來源的觀點，——就有重新加以估定之必要；這時主要地是開始內部的經濟規律性底探索，換句話說，卽開始從事物底外表形象後面去探索它們的本質。流通既變成了生產底成素，它就不復爲一獨立自足之現象。於是要理解流通中所發現的諸現象，就得開始從生產中去尋求「鑰匙」。

這種客觀的局面迫着威廉・彼梯（William Petty, 1623—1687）從勞動中去找尋市場價格底基礎。正因爲這一點，所以彼梯成爲近代政治經濟學底先驅，特別是勞動價值論底先驅或奠基者。

商業資本剝削勞動，剝削獨立的小生產者底勞動，但它并不組織勞動；它對於生產中所消費的勞動，可說沒有直接關係。它只知道買價和賣價間的差額。而事實上這兩種價格也往往不跟價值相符合。工業資本底情形就不同了：它也剝削勞動，但是它所剝削的是在它直接組織和指揮之下的工錢勞動者底勞動，勞動既是它所直接組織的，它就不能完全拋棄勞動不管。固然，在工業資本家看來，利潤是他全部資本底產物，可是他究竟不能把勞動完全撇開，因爲在他的生產成本中，大部分是消費在勞動上的。這樣，隨着工業資本之發展，經濟學者就開始從勞動中去找尋價格構成底基礎了。威廉・彼梯便是從勞動中發見價值源泉的第一人。

二　威廉・彼梯底方法和理論

威廉．彼梯確是英國近代史中一個博學的大天才。經濟學史家翁肯曾對彼梯作如下的估量：「這樣一個多方面都能的人確實難以遇到。他所受的教育是醫生，他同時又是澈底的數學家，音樂家，土地測量家，造船家等等。（註一）就他的世界觀（die Weltanschauung ）言，彼梯還是一個重商主義者，他對於一切問題，連宗教問題在內，都根據商業和獲得貨幣底觀點去處理的。但是假如把他的方法和理論拿來分析一下，我們就知道彼梯確是『現代政治經濟學底奠基人』。（註二）

彼梯雖尙不失爲一重商主義者，但是這位重商主義者底研究工作，不但促成了重商主義底崩潰（他予同時代的經濟研究者以極大的影響），而且還奠定了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基礎。在他的一般的世界觀中，貫澈着重商主義底思想，因此他的勞動價值論也是重商的勞動價值論。譬如他說水手（乃指對外貿易的商艦水手而言）勞動底生產性要比農作者勞動底生產性大三倍。然而對於重商主義者有決定意義的一個問題，貨幣問題，彼梯底見解卻跟「正統的」重商主義者大相左右。他自問自答道：『要太多的鑄幣有什麼用處呢？我們應當把分量較重的鑄幣重行溶化，改造成爲各種奢侈的器皿或金銀盤碟之類；不然的話，可以把它們當作商品輸出到需要這類事物的地方去；再不然還可以把它們貸出去生利息，要是利息高的話。』（註）

彼梯底重商主義觀點和反重商主義觀點，其根源均在於他所處的那個轉變時代。在十七世紀的英國，一方面舊式的商人和高利貸者尙未離開歷史舞台，另一方面新式的商人和工業家却已出現，

（註一）翁肯著：「國民經濟學史（Geschichte der Nationalokonomie）。

（註二）卡爾：「剩餘價值論」（Die Theorie des mehrcert）卷一，俄文版頁十七。

（註）轉錄「資本論」卷一，第三章末之註足。

他們的財富就是大工場和大地產。在這樣一個時代，以貨幣爲唯一財富形式的觀念跟以貨幣只爲流通工具和財富的觀念交織起來，這是絲毫不足爲奇的。以下讓我們把彼梯底方法和理論約略地介紹和分析一下吧。

彼梯底對抗重商主義底理論，首先就表現在他的方法上。彼梯自己也申明過，他的方法不是傳統的。重商主義者底傳統方法是描寫的：採取許多事實而說明它們中間的經驗性的聯繫。彼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採取的方法卻是各門自然科學中所應用的方法，他廣泛地應用科學的演繹法來解釋他所考察的諸現象，卽揭露他們的本質。不過彼梯所用的方法，是取數學的形式的。由於這一點，所以許多研究者往往不了解彼梯底方法底眞實本性，而把彼梯看成單純的經驗派，劈歸彼梯只知用統計方法對現象作精確的考察，再用統計方法來描寫（敘述）它們。實際上這樣了解彼梯顯然是不正確的。

這樣，彼梯底方法是跟「正統」重商主義者不同的，他已知道用自然科學中的方法去探求經濟現象底本質。譬如在着手研究地租時，彼梯聲明道：『在討論到地租以前，我們首先應當嘗試說明被稱爲利息的貨幣地租和產生於土地和房屋的地租之祕密的本性。』（註）這裏很明顯地表現出來：彼梯底眼光注射於現象底基礎，而不限於現象本身。而要揭發現象底基礎（卽彼梯所說的「祕密的本性」），要探究現象底本質，則非用抽象的方法（Method of abstraction）不可。

在嘗試揭發現象之基礎（亦卽根源）時，彼梯又了解：『在這種基礎上發展着的上層建築……是種類很多很複雜的』（註同前）。這樣，彼梯明瞭：（一）現象底本質和現象本身不是同一的，

（註）轉錄「剩餘價值論」卷一，俄文版頁十七。

而經驗論者却把兩者看成同一；（二）科學的研究不限於現象本質之揭露，而應說明後者如何表現出來。然而我們必須着重指出，彼梯底應用這種新的科學方法，還祇是初步的嘗試，這種方法到以後重農學派和英國古典學派，特別是到李嘉圖底學說中，才大大地發展起來。

威廉·彼梯首先把他的新方法應用於價格底分析，他試圖探求出價格底基礎來。這裏要附帶地提一句，假如彼梯果真祇是一個統計學者（像翁肯所設想者），那末他的工作必定只限於平均價格（用統計的方法）底確定了。可是彼梯並不以此爲限，他進一步地在探求平均價格底基礎。他在研究這樣一個問題：市場價格所環繞着變動的那個平均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對於這個問題，彼梯回答道：『假如有人把祕魯底地層中所採掘的一兩銀子運到倫敦來，而他用採掘這兩銀子所消費的這點時間也能生產出一蒲式耳（Bushel）的麵粉，那末前者（指一兩銀子——沈註）就是後者（一蒲式耳麵粉——沈註）底自然價格；可是假如他到一處新的，蘊藏較富的銀礦中去工作，他能在原先採掘一兩銀子的時間內掘出二兩來的話，那末麵粉底價格現在每蒲式耳十先令就等於原先的每蒲式耳五先令了。』（註一）

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一）彼梯已能認定商品——一蒲式耳麵粉——底自然價格是商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量所決定的，（二）這種價格與採掘銀子所消費的勞動底生產率成正比例，假使由於採掘底輕易而銀子增加了一倍，那末麵粉底自然價格也要增加一倍。

這裏很明白地指示我們，彼梯一開始所確定的不是商品底價值，而是它的相對價值。（Relative Value）。其次，他所認定的相對價值又一開始就取貨幣的形式，而沒有研究一種商品底價值在

（註一）轉錄「剩餘價值論」卷一，頁十七。

任何別種商品上的表現（卽任何兩件商品之交換關係），他只知道在貨幣上（在彼梯底時代，銀子是鑄幣的材料，卽貨幣）研究商品價值底表現。彼梯不但不從交換價值中抽出價值來，他甚至還不從價格中——價值底貨幣表現——抽出價值來。在彼梯底眼界中，交換價值只是商品交換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那個形態，卽貨幣形態，而貨幣本身，他認定是現存的商品，金和銀。

這裏就表現着彼梯底重商主義觀點。在他看來，商品底價值不外乎爲獲得這商品所需要的平均的貨幣量。可是彼梯已注意到爲什麽某一商品可以換得到那麽多的貨幣量這個問題，這是他跟其他重商主義者不同的地方。

彼梯底重商主義不但表現在他的價值論底弱的方面，而且也表現在它的強的方面。使彼梯對商品價值不採取自然主義的觀點，不把價值看成單純的人類肉體勞動，看成生理的或心理的自然過程，這也就由於他的重商主義的觀念。我們知道，重商主義是肯定流通對於生產，形式對於內容的主導意義的，唯其如此，所以它不容許自然主義的和機械主義的簡化價值爲勞動，因爲這樣的簡化恰正忽略了流通和形式，特別不能容許的是忽略了價值底貨幣形式。但是這裏彼梯碰着了一個似乎無法解決的難題。一方面因爲他是個重商主義者，他不能把價值（卽所謂「自然價格」）看成勞動；但是，依照他的新方法，他也不能從市場價格底擺動中得出價值來，因爲新方法要求抽去市場價格的。彼梯在這一難關之前，天才地找出了一條解決的途徑：他認定不是一切勞動都能創造交換價值，創造價值的祇是消費在銀子生產上的勞動，卽貨幣生產上的消費的勞動。別種勞動之創造價值，僅就其生產品可交換一定量的銀子這點意思而言的。

這樣，關於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底兩重性，彼梯尙無所知。從全部社會勞動中，他只認定了一

種實在的勞動形態，把它跟其他一切實在勞動形態對立起來。彼梯認定只有前一種勞動形態直接生產交換價值，其他一切勞動形態都不直接生產，而是經過與前一種勞動底生產品（指銀子）之交換才獲得交換價值的。

彼梯既不了解創造價值的勞動之本性，當然也就不會了解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底區別。依照他的見解，一切勞動生產品都應劃分為二大類：（一）一切形式底勞動生產品，（二）金和銀。前者在交換中變成了交換價值，後者一生產出來就是交換價值。照這樣說來，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底區別乃發生於生產金銀的勞動和其他形式的勞動間的區別。

但是參加金銀生產的，不祇是勞動條件，除勞動外還有自然。因此，彼梯得出結論道：「勞動爲財富之父，自然乃財富之母」。同時，在彼梯底觀念中，可以說價值底尺度（Measure of Value）有兩個了：勞動和自然。彼梯說：「我要說的是：對於一切事物的估價，都可以歸結到二種自然的標誌——土地和勞動——譬如說，一艘船或一件衣服底價值等於若干量土地底價值和若干量勞動底價值，因為這兩種東西——船和衣服——都是土地和勞動所生產的……。」（註）

還要指出一點，就是彼梯底觀念中不僅有兩個價值底尺度，而且他跟一般布爾喬亞勞動價值論者一樣，隨着研究或分析底複雜化，他變由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轉變為由勞動力（labour Power）底價值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彼梯寫道：「平常的價值尺度總是一個成年人平均一日的生活資料，而不是他一日的勞動；這一尺度似乎跟純銀底價值一樣正確和固定的…………所以我用多少日口糧底數目來決定愛爾蘭茅舍底價值，這許多口糧便是這所茅舍建造時建築工人們所消費的。」

（註）轉錄「剩餘價值論」卷一，頁二二一。

（同前書頁一七——一八）

這樣看來，「在他的意念中，價值表現爲互相混織着的三種形態了：（甲）價值底大小，決定於相等的勞動時數；同時勞動被視爲價值底泉源。（乙）價值爲社會勞動之形式，因此貨幣被他視爲眞實的價值形式，雖在另一處所彼梯排斥貨幣制度底一切幻想。（丙）爲交換價值之泉源的勞動與爲使用價值之泉源的勞動底混合。」（註同前）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實際上彼梯把二種價值尺度歸結於一種——勞動。因爲講到土地價格問題時，他把土地價格解作資本化的地租（Capitalized rent），而地租則又被他解釋爲剩餘價值了。

其次，彼梯在工資底理論中，也表現爲一個非平常的經濟思想家。他在說明規定工資最高限度之必要性時，表現着他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深刻的認識。彼梯寫道：「法律應當只保證工人以生活資料，因爲假使讓工人多得一倍的話，那就等於他的工作比他所能做的工作（註）少了一半，而這對於社會就等於損失了這麼多的勞動量。」（註同前）這段話底意思是這樣的：「假使工人做了六小時工而取得六小時勞動底價值，那就等於他比現在所得的多一倍（即做工十二小時，而得六小時底價值）。這樣一來，勞動價值就決定於必需的生活資料了。但是工人之所以成爲剩餘價值底生產者，或剩餘勞動底供給者，是因爲他被現行資本制度強迫去使用他的全部勞動力，而他所獲得的，却祇是生活所必需的。

自然彼梯還不能自覺地劃分勞動時間爲必需的和剩餘的二部份，然而事實上他已把勞動時間劃分爲這二部分了。照彼梯底意見，假使工人們不在剩餘勞動時間中工作的話，那末「對於「社會」

（註）這意思就是說：在工人所得不增加的條件之下他所能做的工作時數。

就等於損失了這麼多的勞動量」。這便是他事實上作此劃分的證據。彼梯認爲國家底調節工資，規定它的最高限度，這不是隨心所欲的調節，而是根據着一定的實在基礎的調節，這種實在基礎便是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惟其如此，所以他反對工資減低到法律規定的水準以下。在他的意念中，規定的工資底最高限度，同時就是它的最低限度。講到工資與貨幣價値底相互關係時，彼梯寫道：「假若規定工人底工資，縱然在貨幣價値降落的條件之下，也絲毫不應增加的話，那末這樣的辦法簡直等於課工人以重稅，強迫他們損失一年的工資；這種辦法不但不公道，亦且不可能，因爲他們只靠一年工資怎麽能夠維持生活呢？……法律應當規定確實爲生活所必需的那麽多的工資。」（前書頁二二）由此看來，彼梯確堪稱爲工資「鐵則」論（The "iron law" of wage）底首倡人了。

關於地租問題，彼梯認爲有自然形態，亦有貨幣形態。對於自然形態的地租，他做了下面的解釋：「假定有一個人能夠用他自己的手來耕作，耡田，播秧，施肥，收割，打禾等等，再假定他自己還有充分的種子儲存來播種土地。假使他從收穫中劃出那部分爲播種用的穀子，同樣又劃出他所消費的和爲交換衣服及滿足其他需要所必需的一切穀物的話，那末餘下來的那部分穀物，就成爲這一年底自然的和眞實的地租了。」（頁一八）這便是彼梯底地租觀。不過以上所說的是自然地租，至於貨幣形態的地租，那就是體現剩餘部分穀物之自然價格的那些貨幣量。換句話說，彼梯是根據他的自然價格論來確定貨幣地租之界說的。他又寫道：「要多少英國貨幣才能在價値上等於這部分剩餘穀物呢？我回答道：另有一個以生產貨幣爲業的人，在一樣的時間內（按卽在前人耕種，收割，打禾等勞作底全部時間內——沈）所獲得的——扣除自己的生產成本……那些貨幣量。……假定在一樣的時間內，生產貨幣（銀子）者獲得了二十兩銀子，而生產穀物者獲得二十公担穀子，那末

一兩銀子便是一担穀子底價格。」（頁一九）。

在彼梯底喻例中，我們根本看不見雇用勞動底影跡。從以上兩個喻例中可以看出，彼梯底意見以為在不使用雇用勞動的土地經濟中也存在着地租的。但是實質上，彼梯底地租論是剩餘價值論；因為彼梯所研究的地租，事實上是資本主義農業中的地租。而在這種農業中，彼梯以為自然地租就是除去一切生產成本以後所得的剩餘穀物，貨幣地租則是這些剩餘穀物底自然價格。

然而彼梯之簡化地租為剩餘生產品（或剩餘價值），這種見解還是表示着一種進步。因為被他這麼一講，就無異替未來的剩餘價值論奠定了頭一塊基石。但這還不算數，彼梯底地租論無疑地建立在他的工資論之上；在他看來，地租便是生產成本（Cost of production 或稱生產的消費）以上的那部分剩餘品。那末生產成品是什麼呢？照彼梯底意見，生產成本是由種子和農作者底生計二者所組成的。把這點意見應用到資本主義的農業上去，就等於說，生產成本底一部分是工資。假若工資底大小不一定，那末地租底大小也不一定，因為生產成本若不一定，則生產成本之上的剩餘量也變成不一定了。所以我們說彼梯底地租論建立在他的工資論之上。不過依照他的工資論，工資底大小是一定的：等於最底限度的生活資料。

在彼梯底觀念中，根本沒有利潤（Profit）這一獨立的範疇：在他看來，地租便是剩餘價值之最普遍的形式。在彼梯底意念中，剩餘價值祇存在於兩種形式中——土地的租金和貨幣的租金（即利息）。他根據地租來解釋「幣租」。他的解釋方法如下：每一個貨幣所有者都可以用他的貨幣購買土地，因而獲得地租，所以貨幣也跟土地一樣，應當生產進益。這樣彼梯找着了利息底自然基礎，把它跟地租等衡起來，因而他反對法律的調節（節制）利息，後者應當依貨幣之供給與需求而確

第二章 重農主義學說

第一節 重農主義之歷史背景

現在我們要來探討法國——重農主義底故鄉——底經濟思想了。但是這並不是說重農主義是一種民族的現象或法蘭西人底「民族精神」底產物。應當認定：重農主義是一般經濟學說史發展中的一派重要的思想；它是隨着資本主義關係底發展，社會經濟底支配權由商業資本轉移到工業資本手上去的時代底一種經濟思想。

假使說十七世紀的英國是一個走向議會政治的革命時期底國家，那末法國底情形就完全相反：皇帝底政權日益鞏固而變成爲專制主義。路易十四底朝代，便是法國專制主義底最高峯。由於法國經濟發展落後，貴族分子沒有能夠像英國那樣地資產者化，而工商業家集團也沒有能夠生長成爲一個獨立的力量。在路易十四底時代，大貴族們完完全全變成了朝廷的權貴，皇帝賜予他們掠奪百姓之特權，然而在政治上則完全服從君主。高級的權貴，在朝廷中佔據着最尊貴和俸給最高的職位。皇帝之下又有集中的龐大的官僚機關（乃由中等貴族和甚至第三等級的人組成的），皇帝就藉此種官僚機體來統治全國。這樣的政權組織體系自然需要大宗的經費來支持；這便是迫使帝朝加強發展工商業的重大原因之一。這種政策把工商業家集團吸引到政府方面去了。那時的工商業家集團雖尚未發展到在國家中演獨立政治作用的地步，可是它却已成爲一種強大的經濟力量。所以專制政權要

拉住這一力量在自己這方面；這是專制政權存在底必要條件。以最大的堅決精神直接式地實行這種經濟政策的，便是路易十四朝代底財政總長珂爾貝(Colbert,1619-1683)，因此法國的重商主義就有珂爾貝主義底稱號。

珂爾貝主義底重要特點之一，就是輕視農村經濟。不論貴族，僧侶或朝廷御庫，都無不靠榨取農村經濟爲活，然而對於農村經濟，却誰也不去關心它。差不多一切賦稅都貨幣化了，可是農產品底價格却人工地被抑制到很低很低。原料和麥品底出口是被禁止的，可是它們的輸入却極自由。其所以然者，一則因爲製造出口物的工業需要廉價的勞動力和廉價的原料，一則因爲要保證不很安穩的巴黎和皇城(凡爾賽)以必要的糧食。

雖然路易十四宣稱「朕卽國家」(L'etat c'est moi)，但是爲使要法國和它的各等級變爲他個人底附庸，他就得爭取對外的勝利，藉以收服人心。所以當時法國專制政府底政綱，第一是要組織一百戰百勝的軍隊，第二要創辦一模範的出口工業。在起初時，兩項政綱都進行得相當順利，可是同時它却又暴露出了各種的內部矛盾。出口工業底發展把商業金融資產集團推上了首要的地位，他們當然决不肯把他們從國外貿易中獲得的利潤不加監督地去供官僚機關無限浪費。這是一點。可是在另一方面，那時所組織的空前的大軍，則需要大宗經費纔能維持其存在。此外，在路易十四朝代，法國又發生過四次勞民喪財的大戰，這種戰爭當然也是需要大量經費的。

於是工商業家集團和高級貴族與僧侶中間的矛盾就日趨尖銳了。前者是貨幣資財底社會代表，後者則是貨幣資財底消費者；前者貪於資財底儲積，後者則生活奢侈盡量消費。當矛盾開始暴露之時，專制政府尙力圖使資產集團與權貴集團雙方都得到滿足：對於前者，政府設法爲國外貿易創造

各種有利的條件；對於後者，則替他們建造富麗華貴的凡爾賽宮。這兩件事底進行，都是靠犧牲毫無民權的被壓迫大衆——特別是農奴大衆——底血汗來實現的。其結果，農村經濟就全部陷於衰頹狀態。賦稅和貢品之外，還要加上繁重的封建賦役，農民實在是無力担負了。於是他們就成千成萬地脫離了他們的故鄉往外逃亡；他們天天在飢寒和奴役威脅之下，不得已而出此。

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們所創立的制度，是沒有鞏固基礎的。恰恰相反，這種制度反而促使法國底社會經濟基礎愈趨動搖。路易和珂爾貝底繼承人雖圖繼續他們前人底政策，可是結果都一無成就。因此法國的專制政權就加速地急趨崩潰。十七世紀後半在商業政策上和十八世紀前半在爭取國外市場的政策上所達到的一些成績，這時都已化爲烏有。帝制的法蘭西已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過去的一切勝利品都已喪失殆盡，所有的殖民地已被它的勁敵——英國——奪去。過去對外政策上一個重大的憑藉——軍力，這時也大大地削弱了。在封建制度底狹隘中，資本主義已再無發展底可能；特別是工業，除非形成了國內市場之後，才有繼續發展底希望。但是當時國內市場偏偏沒有。

專制政權和封建制度底崩潰，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也就是表示重商主義底崩潰。於是經濟思想又在找尋新的出路了。在那時的經濟學者底意識中，農村經濟是跟商業和工業對立的。因爲工商業在當時是靠犧牲農村經濟底利益而發展起來的。經濟學者既察覺過去的政策已行不通，於是就想換一個方向走路——企圖把農村經濟抬高到第一位，宣佈農村經濟底意義超於商業與工業之上。

但是經濟學者已不再相信政府處置經濟底創造能力，所以他們雖指出農業意義之超過商工業，可是却不能用新的土地保護政策去代替舊的工商業保護政策。他們的思想在開始找尋新的道路。不過這種道路實際上已爲現實本身，生活本身開闢出來了。農民底貧乏和破產過程，同時也就是他們

的分化過程：數量不大的富有分子，農村的殷實之戶，逐漸形成起來了。法國農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開始在封建制度祖護之下發展起來。而且它又進一步地改造封建制度使之適應於自己的利益；換句話說，它把封建的土地所有權轉變爲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這種情勢，迫使經濟學者去尋找農村經濟所當循着發展的新道路，亦即以農村經濟之發展爲基礎的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就是藉農村經濟底發展以發展資本主義。

從封建社會脫胎出資本主義社會來的歷史過程在法國有着好些個特點，這些特點在法國經濟思想底發展上亦有其痕跡。重農主義就是上述世界歷史過程之法國式的反映。這一歷史過程預先決定了重農學派底理論工作，幷賦予它以國際的性質。它並不要排斥某種形式底重商主義，而是一般地排斥重商主義本身，排斥重商主義底原則而拿一種新的原則去對抗它。那時法國的經濟思想家（重農主義者）由於重視農村經濟（因爲法國當時是個農業國家）的緣故，他們的思想就從流通過程轉移到生產過程中去了。他們不主張從流通中而主張從生產中找出財富底泉源來，——這種立場使得他們把研究底注意集中到農村經濟上去。

第二節　重農學派底代表及其學說

一　弗朗梭亞・奎奈

弗朗梭亞・奎奈（Francais Quesnay,1694-1774）是一個著名的醫生，後被皇帝（路易十五）召入宮中任爲御醫（一七四九年）；數年後又封他爲貴族。奎奈之研究經濟問題，已在晚年時期（主要的是一七五三——一七五六那三年間）。那時社會輿論都集中於經濟問題。假使在過去確實

造類問題的往往只是少數的個人，這時却有廣大的社會羣來注意和探討這類問題了。這種社會的空氣，是直接推動奎奈去研究經濟的力量。

在重農學派底建立史中，奎奈跟侯爵米拉波（Marquis Mirabeau,1715-1789)底會見有着決定的作用(註一)。重農學者們自己也承認這一會見是該學派建立底起點。老米拉波本來是持重商主義見解的。他的結論跟奎奈底結論極端地相反。米拉波底重商主義的論綱是：人口是國家底財富。他說人口底增長是在財富之前。奎奈底論綱却完全相反：財富創造或促進人口底增長。可是奎奈跟米拉波底會見，解決了這一爭論：米拉波被奎奈所說服，從此他就變成顯明的重農主義者了。封建制度之將近崩潰，卽特權等級中人亦能感覺得到；他們有許多人巳公然走到第三等級方面去了。但是米拉波這個「老怪物」却不能決定走這一步。他至少還需要用「幻覺的外貌」來敷衍一下面子，他需要創造這種一種幻想：彷彿代封建制度而起的資本主義，只是前者之歷史的新的「再版」而巳。他在重農主義中找到了這種「幻覺的外貌」，於是他拚命地抓住它不放手。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採取的這種「幻覺的外貌」，也就是奎奈學說底特徵。不論他的學問如何淵博，他的眼光如何遠大，他畢竟也需要這一對建的外貌。他替資產者罩上了一件封建的外衣，這是他自己所需要的外衣。受皇恩之賜而榮居於貴族之列的奎奈，他的意識形態只能如是而巳。

在政治見解方面，奎奈是個開明的帝制派。他主張用自上而下的改良去阻止革命，卽主張用開明的君主制所應實行的改良辦法以防止革命底發生。起初他希望路易十五採行這類改良政策，後來他發覺路易絕對不是他理想中的「開明君主」了，於是又把自己的希望付託於路易十五底繼承人。

（註一　米拉波是法國大革命初期底著名活動人物小米拉波底父親。

但是事實上他這種幻想的希望從未實現過。

二　奎奈底方法

奎奈底經濟學所採取的方法，是自然科學的方法。他以為「自然秩序」對於物理世界和社會是有一樣作用的：兩者都被「自然秩序」所統治。奎奈既是個醫生，所以他把社會看成生物的有機體；他以為社會底生存有兩種狀態：康健的、常態的和疾病的，非常態的。因此他認為衛生學和治療學一樣地可以適用於社會；前者適用於康健時期或均衡時期的社會，後者則適用於疾病時期，即失去均衡時期的社會。

然而「自然秩序」底觀念也有它的積極方面的意義。奎奈根據這一觀念去理解經濟生活，他把社會經濟的過程看作具有一定的內部規律性的自然過程。這也就是奎奈底重大功績。但同時他的超歷史的（實質上是反歷史的）觀點迫使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自然的（非社會的，非歷史的）生產方式。他只看見生產過程底自然方面，而完全忽略了它的社會方面。他認為生產過程也只是一種自然的過程，使用價值底生產過程。

同一方法（即自然秩序觀的方法）迫使奎奈把研究底重心從流通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中去。因為當時流通領域狀況極不穩固，常常處於市場底自發性（即盲目性或無政府性）控制之下，要考察它的自然秩序非常困難；而奎奈所研究的生產領域，是諸生產領域中跟市場關係最少的一種——農業的生產領域。把研究底重心轉移到生產領域中去，這是奎奈底另一個重大的科學功績。其後整個古典學派在這一點上都是遵照奎奈底方向走的。但是把生產只解作農業的生產，這是法國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反映在方法論上，就表現於奎奈底濃厚的自然主義。在奎奈看來，生產就是

物質底生長，即農村經濟中的物質底生長。

自然秩序在奎奈底「經濟表式」（"Tableau economique"）中表現得極爲明顯，而這一表示底方法論上的意義，也就在此。奎奈常用「明顯性」一詞相標榜，而這種「明顯性」只有藉那個「經濟表式」纔能獲得。「經濟表式」使下列各點成爲「明顯」：（一）農業生產品分配於社會全體，（二）這種分配底發生是自然的和自由的，（三）一切經濟部門和一切人民集團互相聯繫而形成一個整體，（四）農業是一切基礎（這是重農主義最重要的一點），因爲只有它是生產所謂「純生產品」的。

這一「經濟表式」縱然只隨作者底意願證實了一些他所要證實的事實，可是它的方法論的意義却是很大，因爲這一「表式」是把社會全部生產和流通看作整體的第一次嘗試。奎奈對於個別的交換行爲不從它們本身上去觀察。不從它們的現象表面上去觀察（從表面上看，它們是零散的，混亂的），而從社會再生產底觀點去觀察它們。因此，奎奈所注意的不是農業家們或工業家們所做的買賣，而是把農業和工業互相維繫起來的那些交換行爲，因爲只有這樣，農業和工業領域內的再生產才會實現。

其次，奎奈等重農主義者還指出了再生產跟一定的社會組織的關係，這當然也對的。他們對於社會組織（結構）雖無正確的認識，但是他們把再生產跟一定的社會羣關係聯繫起來，這在方法論上講是正確的。在再生產底分析中，他們把土地所有者和別的階層間的流通（變換）關係底分析也包括在內。因此，再生產底分析就具有資本主義再生產分析之性質。從外表上看，重農學說彷彿帶着封建的色彩，但是這不會改變事情底本質的。

重農主義者所說的「自然」的（"natural"）這一概念，具有兩種的意義：（一）它跟那受人底意志和願欲支配的「主觀」的（"Subjective"）相對抗；（二）它同時又被當作某種永遠如此的事物去跟「歷史」的（"Historical"）相對抗。前一點是對的：因爲經濟的範疇和經濟的法則都是客觀的，物質的。後一點卻是錯誤的：因爲經濟的範疇和經濟的法則同時也是歷史的範疇和歷史的法則。它們被生產方式所規定，又隨着生產方式之消滅而消滅。但是重農主義者未曾達到這一步理解，事實上他們也不可能理解到這一步。不過他們卻建立了一點功績：他們從政治經濟學中驅除了主觀主義，驅除了彷彿以爲經濟發展決定於人底意志，意識或「理性」的那種觀點。

三　奎奈底經濟學說

講過了奎奈底方法觀點之後，我們就要討論到奎奈底經濟學說本身了。奎奈學說底中心點是他的「純生產品」論。財富底問題——財富如何生產被誰生產與何處生產的問題——在奎奈底這個理論中有着解答。他根據這個理論，試圖對資本，剩餘價值（事實上的），生產的和不生產的勞動，社會中每一人羣底作用等等，一一給予分析。

首先奎奈劃分以下兩種現象底區別：（一）財富底倍增（Multiplication），它的增長：（二）財富底總和（Addition）。他認爲前者發生於農業，後者則發生於其他的生產部門。在農業中增長着物質本身，用經濟學上的名詞來說，即發生使用價值增長底現象。在其餘的經濟部門中則只發現已存物質諸元素之總和，而幾種不同的使用價值總合起來就形成新的使用價值；不過它們的體積不但不見增加，反而往往縮小或減少（如原料之改製爲工業品或半工業品）。農業和其他經濟部門間的區別就由於自然本身在農業中工作着，因而表現出創造力來；但在其餘的經濟部門中，在全部

製造業中，自然都不參加工作的；至於在商業中，那是更不用說了。

超出已消費的生產品之上的那部分新創造的生產品，就是純生產品（Product net）。但是怎樣計算這「純生產品」呢？這實在是一件再難沒有的事。固然收穫的麥子要比播種的麥子多些，但是種子以外還有別項消費怎麽計算呢？不錯，可以把其他各項消費都用一定量的麥子來計算，事實上人們的確常常這樣在計算的。然而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因為要把其他各項消費等於一定量的麥子，那末必須把這些消費首先化為跟麥子可以等同的共同物。這個共同物是什麽呢？奎奈不但沒有解答這個問題，而且連提也不曾提出來。

但在奎奈看來，困難是一點也沒有的，因為他認為物品底交換價值是和它們的使用價值一樣地自然的。因此，在他的觀念中，生產品和商品是等同的。新生產的生產品和它的生產上的消費從最初起就採取價值表現底方式；而純生產品也從最初起（意即當它以自然物出現時）取價值表現底方式。

這樣，所謂「純生產品」變成新創造的商品價值超過生產成本的那部分餘額了。這裏就存在着奎奈底一點功績：他把價值和盈餘價值從流通的範疇（重商主義者是這樣看法的）轉變為生產的範疇。然而他既未將價值化為勞動，亦未將盈餘價值化為剩餘勞動。奎奈底價值論實際上只是生產成本論。不過他所說的「純生產品」（自始就採取價值的形式），他認定是從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這也就是說，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奎奈雖然持着一種錯誤的見解，以為自然創造新的事物，勞動僅僅結合和改變已創造出的事物底形式；可是這更足以證明奎奈所認為跟使用價值不可分離的價值，只是生產底產物。他雖未將價值化為勞動，但在他的解釋中，明明指出價值與生產

相聯繫，價值產生於生產中。同時剩餘價值也跟生產相關連，亦即產生於生產中，不過他沒有明白地說出「剩餘價值」這個概念罷了。

但是仔細考察之下，我們知道重農主義者所說的「純生產品」，實際上不是別的，而只是生產品價值超過生產品成本以上之餘額而已。所以假使生產成本是一定的量，那末純生產品也當然是一定的量。但是在農業中，生產成本主要地乃由種子與工作者底生活資料組合而成。因此純生產品要看「工具」底大小來決定：前者之一定的高度須視後者之一定的高度為定。奎奈視工資為一定的量——將它看成工作者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

這樣說來，純生產品並不是自然底「純」生產品，而是依靠着工資的：工資提高，純生產品就減少；反之，工資減少則純生產品就增加。奎奈尚未具有李嘉圖式的利潤與工資對立底見解。在他的觀念中，純生產品和工資都是發生於自然過程的。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奎奈明確地指出純生產品只發生於所謂大農業（"Grande Culture"）而不發生於小農業（"Petite Culture"）；換句話說，它祇發生於有雇用勞動的農業經營中。

這樣看來，說「重農學者替資本主義生產底分析奠定基礎」這句話實在是沒有錯的。

現在讓我們來說一說奎奈對於資本的看法吧。奎奈由純生產品底分析而分析到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底分析又促使他去劃分資本底各個組成部分。他劃分資本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常年的支出」，另一部分則為「基源的支出」（即創始時一次支出而能支持多年者）。奎奈說：「常年的支出乃每年消費在耕作的勞動上的費用。這種費用應與「基源支出」相區別，後者乃由土地經濟組織基金所構成。」（註）每年的支出一次即全部歸入生產底消費；基源支出則局部地變為生產底消費。

重農學者觀念中還缺乏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這兩個概念；在重農學者底資本劃分上，也反映着他們的狹窄的生產觀。因為所了解的生產祇是農業生產，而農業生產是一年一度的（法國和大多數國家的情形如此），所以一年迴轉一次的資本——流動資本——就常常是每年的支出了。跟這部分資本對立的另一部分資本，要在很多年時期中才完成它的全部迴轉，那就是所謂基源的支出（亦即吾人所說的固定資本）。

再則，在奎奈看來，貨幣既非流動資本又非固定資本。這也是對的。因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這兩個範疇都是屬於生產資本的。在這一點上，亞丹・斯密倒反不如奎奈：斯密氏把流動資本跟流通資本混為一談了。不過奎奈雖正確地把貨幣排除於流動與固定資本兩個範疇之外，他却完全不了解貨幣可以成為資本底形式——資本底貨幣形式。這是由兩種原因來促成的。第一，在奎奈底觀念中，資本祇是事物，物質：流動資本乃由種子，耕作者底食料和其他生活必需資料所構成；固定資本則由勞動工具所構成。這樣的了解資本及其組成部分，貨幣當然不能成為資本形式了。因為依照這樣的了解，資本只有事物的形式，也只有事物的內容。第二——這也是第一原因底基礎，——奎奈既視交換價值為自然的，跟使用價值分不開的東西，那末他就一般地不能了解貨幣底本性。他不能不一方面視貨幣為流通工具，另一方面又把貨幣當作為商品流轉所必需的符號品看。

奎奈把「商—貨—商」解釋成「商—商」，所以他的論綱說：「一切出賣同時都是購買」。當然，在化「商—貨—商」為「商—商」，亦即在不了解貨幣作用的情形之下（貨幣使一個商品底出賣跟另一商品底購買相分離），一切出賣實際上也就是購買。

（註）轉錄「資本論」卷二。

事實上奎奈把資本只了解爲生產資本，就是說，只了解爲資本底形式之一。然而重農主義的錯誤的資本觀却比重商主義的錯誤的資本觀有意義些。重商主義者也把資本跟它的形式之一等同起來，認定只有貨幣形式的資本是資本。然而資本底貨幣形式是資本底生產形式底產物。貨幣只有在資本循環中才被利用作爲資本，可是在資本循環中，有決定意義的階段仍是生產。由此看來，奎奈之只視生產資本爲資本，實抓住了資本之決定的基本形式，而重商主義者所抓住的却只是被決定的枝葉的形式。

奎奈既將資本簡化爲生產資本，他當然不能了解，並且事實上也沒有了解商業資本。在他的觀念中，商業資本是無果實的東西，而商業利潤僅僅是壟斷底結果。他認爲兩者都是表現自然秩序底破壞。奎奈底根本觀點旣是只有農業生產是眞實的生產，那末他就應該得出結論說：工業資本也是一「無果實的」資本，因而工業利潤也只是產業家勞動之報酬了。其次，他所說的資本——常年支出和基源支出，——也只指農業而言。這裏充分地表現着奎奈底「純生產品」論底重農傾向。

最後，我們要講一講表明奎奈底經濟學說的那個「經濟表式」。經濟表式之方法論的意義，前面已經說過，此處無需再述。現在要解釋的是奎奈如何在他的「經濟表式」上闡述他的學說。「資本論」裏說：『無數個別的流通行爲，自始卽被視爲特種的社會的羣衆運動——具有各異的經濟職能的諸大社會階層間的流通。』（"The innumerable individual acts of circulation are at once viewed in their charateristic social mass movement—the circulation between great social classes distinguished by their economic functions"）（註一）這是說，許許多多個人之間所發生

（註一）「資本論」卷二，第十九頁。

的無數次的賣買行爲，在奎奈底「經濟表式」中被視爲諸階層間社會生產品底流通。這裏就存在着這一表式之重大的理論意義：（一）個別的交換行爲被視爲「特種的社會的羣衆運動」；（二）許多多的個人被視爲「有各異的經濟職能的社會階層」。這樣，「經濟表式」指示吾人以全部社會資本底再生產和流通，它是整個社會資本總循環底第一次設想。

「經濟表式」有以下三個前提：（一）價格不變（因「經濟表式」所設想的是「自然秩序」，是常常相等的交換）；（二）單純再生產；（三）抽去國外市場，所有這三個前提，都是奎奈極大的科學思維上的貢獻。在我們對現代經濟作理論的檢討時，我們必須把市場價格脫離自然價格（註二）的一切特殊情形抽去不管，因爲這些特殊情形不能改變事情底本質，它只能使事情（因而亦即使我們的研究）複雜化。其次，奎奈集中注意於單純再生產，這也是對的，因爲問題底重心正是在單純再生產上面。固然，依照他的見解，他不能給一擴大再生產底分析，因爲他所說的全部「純生產品」均爲土地所有者所收取了。然而奎奈以單純再生產爲前提來解決社會總資本之再生產與流通底問題，——這點意義並未因他的不能分析擴大再生產而減少。

奎奈在其「經濟表式」中認爲循環底開始就是收割底終了，收穫底完竟；這就是說，他把商品資本底循環（圖——圖）當作社會資本循環底基礎。下面就是奎奈底例證。

一年的農產品之價值等於五十億利佛爾（重農時代法國底貨幣單位），其中四十億爲糧食，十億爲原料。這一大堆商品是靠二十億利佛爾（現錢）之助而得流通。這二十億利佛爾的貨幣也是農

（註二）固然奎奈並沒有正確的價值論，因而也就是沒有正確的自然價格論，然而他卻具有價值這一概念本身。

業家所有的。可是每年收穫的農產品底價值，乃由以下三部分所構成：（一）二十億的流動資本（「常年支出」）底價值；（二）十億是固定資本（「基源支出」）底消耗部分底價值；（三）二十億爲剩餘生產品（「純生產品」）之價值。但是除此以外，「不生產的」部門中還有值二十億利佛爾的製造品。

在流通開始以前，土地所有者手中已握有二十億利佛爾的貨幣，這些貨幣是土地所有者從農作者那裏收來的地租。流通本身，由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二者所構成的流通本身，可劃分爲五次行爲：（一）土地所有者從農作者（或農業家）那裏購買糧食十億利佛爾，這樣就完成了貨幣之由地主到農業家的運動及商品之由農業家到地主的運動；（二）地主（卽土地所有者）從工業家那裏購買值十億利佛爾的製造品，這樣貨幣就由地主跳到工業家手上，而商品則由工業家轉移到地主手上；（三）工業家以其售貨所得之十億向農作者購進糧食，這樣上次由地主跳到工業家手上的十億，現在又由工業家跳到農作者那裏去了；同時商品則由農作家轉移到工業家；（四）農作者又從工業家那裏購買值十億利佛爾的工業品——農具和其他勞動工具；這樣貨幣就由農作者又囘到工業家手裏，商品則由工業家轉入農作者之手；（五）工業家又用這十億向農作者購買原料，於是貨幣又由工業家流囘農作者，商品乃由農作者流入工業家之手。

以上五次交換行爲底結果是：（一）土地私有者獲得了他所「應得」的剩餘生產品；雖然這些剩餘生產品底一部分是工業品，可是它們是用農作者底貨幣來購買的；而這些農作者則因出賣他們的糧食而從工業家那裏取囘了那些貨幣；因此，地主所得到的一部分取工業品形式的剩餘生產品，乃然等於農業中所生產的糧食品底等量；（二）工業家用他自己的製造品來交換糧食和原料，這樣

他才能重新開始他的生產；這就是說，流通保證了生產底連續；（三）農作者得到了他們所需要的勞動工具，而值二十億利佛爾的糧食仍留在他們手上，它們并未參加於流通中；他們能夠更新再生產過程；除此以外，他們又取回了二十億利佛爾的貨幣，後者又得付給地主作為地租，——這樣，一切就又要重新開始了。

四　杜邦・尼摩

重農學派底第二位著名的人物是杜邦（Dupont de Nemours, 1739—1817）。他是該學派之重要的政論家和新聞記者：他出版過重農學派底許多重要的作品和文件。杜氏曾主編政府所創辦（一七六五年所創辦）的「農商金融雜誌」。參加雜誌工作的，雖有非正統重農學派的人（如古爾奈（Gournay）這一派人），可是編輯底主導權却操在奎奈派手裏。杜邦曾撰文於該雜誌，對奎奈底「經濟表式」作詳盡的闡述；那篇文章曾引起了熱烈的辯論。工商業資產者底代言人竭力反對「經濟表式」確定工商業者為「沒出息的」（或「不生產的」）階層，——「無果實的階層」（"Classe Sterile"）。雖經奎奈本人出來申辯，說「沒出息」或「無果實」這個字眼絕無絲毫侮蔑工商業者之用意，這個術語僅僅表明一點事實：商業和工業是不會生產「純生產品」的；可是工商業資產集團底社會本能却不能被幾句安慰的言語所消彌，他們十分明瞭：關於工商業「不生產果實」這一個論綱，明明是在向他們進攻。問題底重要性不在於侮蔑不侮蔑，而在於這種新學說追求着一種新的方針，祖護農村資產者利益的新方針。這顯然是不利於工商業家的。

由於雜誌上的辯論愈來愈烈，後來連政府中人也被牽涉在內，結果杜邦終於被迫辭去主編之職，這是一七六六年的事情。但翌年重農學派自己創辦了一個雜誌，定名為「蜉蝣」（Ephemerides

），仍由杜邦主編。在這個雜誌中，他們大事宣傳本派的學說和主張，並根據自己的觀點來討論各種實際的政治問題。這種宣傳方式，大大地推廣了重農學派底影響，使它成為現實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力量了。同時以這個雜誌為中心，重農學派跟一切敵對派別做了不屈不撓的劇烈的鬥爭。在這種宣傳學說和進行思想論爭底工作中，杜邦底功勞是最大的。

五　邁爾西·利維埃

重農學派底第三位代表是邁爾西·利維埃（Mercier de la Riviere,1720—1793）。利維埃是奎奈底思想底整理者和通俗化者。他的「自然秩序與政治聯盟之本質」（"La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一書，於一六六七年問世。利維埃在這部書中，給奎奈底學說以充分完滿而有系統的說明。

在政治主張上，利維埃是專制政體底擁護者。照他的意見，人生來就得參加社會生活，因而他生來也就必須在專制主義之下過活。他認為專制主義（或專制政制）是「自然秩序」底產物，是順應自然法則的。由此亦可見重農學派保守性之一班了。

最後一位重要的重農主義者是勒特羅斯納（Le Trosne,1718—1780），他是奎奈信徒中一個最大的理論家。他因跟反重農派的思想家康帝拉克（Condillac,1715—1780）做激烈的論戰而聞名。康帝拉克本來也是重農學派研究班裏的聽講生，可是到一七七六年他突然刊印了一部大著，定名為「商業與政府之相互關係」（"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Consideres Relativement Luna Lautre"）；在那部大著中，他對重農主義底二大基本論綱給了周密的批判。這二大論綱是：（一）關於交換底相等性的論綱，（二）關於祇農業有生產性的論綱。康帝拉克拿他的主觀價值論

徵出發點，說交換永遠是不相等的。他的結論是這樣：「說商品底交換是相等的兩個價值互相交換，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相反的，兩件商品交換時，常常是一件商品以較少的價值去跟另一件價值較大的交換……但是實際明雙方都得到——至少是應當得到——利益。何以如此呢？因為事物底價值只是它們對於我人需要的關係而已。一件事物底價值往往對於這種人大些，而對於那種人則小些；另一事物底價值對於這種人小些，對於後一種人則大些。」（註）

關於第二點論綱底駁論，康氏底見解確實比重農派深入得多。他同意土地是財富底泉源，但他認為沒有勞動，這種財富即無從獲得。所以勞動也是生產的。而既然勞動在農業中有生產性，勞動是居於第一位的。

康帝拉克底主要論敵便是重農派的大理論家勒特羅斯納。他對康氏進行猛烈的反攻。康氏把發達的商品經濟看成只出賣多餘生產品（即生產者自己消費之後所餘下來的一部分生產品）的一種經濟。勒特羅斯納正確地指斥康氏之不了解商品經濟底本性：他說，「在完全發達的（意即在商品資本主義的）社會內，一般地沒有多餘生產品的」（註一）。[illegible]又在那裏駁斥康氏底另一重要論綱：工商業也有生產性的論綱。勒氏[illegible]「一個價值[illegible]。倘雙方都得到超過他們所給的同等餘額的話，那末他們所得與是一樣」（註二）。由此看來，利潤是沒有的，那末工商業當然是不生產的了。

（註）轉錄「資本論」卷一，第[illegible]，第[illegible]章。

（註一）同上。

（註二）同上。

關於價值和利潤的問題，當特羅斯納在某一點上是正確的：就是他確定兩者都不能發生於不同的使用價值底交換。然而他的正確點亦祇此而已。他跟他的先生（奎奈）一樣，始終不能給一個正確的價值論；而對於工商業利潤則一味予以否認，斥它為不合法的現象。這樣，重農派也就不能解釋農業中的勞動底作用：因為既然一切都只是自然底產物，只是自然底創造力和它增加物質的能力，那末農業中的勞動也變成不生產的了。因而農作者這個集團，也跟其他的社會階層一樣地是不生產的階層了。

六　都哥底經濟思想

都哥（Turgot,1727—1781）在基本觀點上固然是個重農主義者，但是我們却有把他單獨提出來介紹的必要。為什麼呢？第一，因為都哥并不是重農業學派（指他們的組織而言）裏面的人；他在基本見解上雖跟奎奈差不多，但他並非奎奈純正的信徒。他差不多完全沒有參加過重農學派團體底工作。都哥底思想和學說是自己獨創的。講到個人關係的話，他跟米拉波所領導的重農學派底反對者集團的友誼關係，反而比較接近些。第二，都哥比其他任何重農學派底人物，特別是比較那些貴族出身的重農派人物，都要少存些對於重農學說封建外貌的幻想。由於這個緣故，所以都哥底思想實比奎奈為進步；他改進了奎奈底學說，並將重農學說發展到較高的階段。這也就是我們所以把都哥單獨提出來介紹的根據。

都哥底學說，可算是重農學說之最發展的形態。無疑的，奎奈學說底真精神是封建貴族的重農派人物（如老米拉波等人）所不理解和不會理解的。他們只重視奎奈底學說體系之封建的外貌，而這一體系之實質，却從來沒有被他們領悟過。然而都哥却完全相反。都哥底功勞正在於他從這學說

底封建外表之下，大大地揭露和發揚（但尚未全部揭露）了它的資本主義的實質和精神。

都哥底出發點跟奎奈一樣，也是所謂「自然秩序」的觀點。但他的「自然秩序」觀卻亦有和奎奈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觀點比較少受神幻外表底影響。都哥底「自然秩序論」比較得更透澈些。唯其如此，所以他可能做出比奎奈更急進的結論來，並更澈底地在全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這一基本原則。都哥直接了當地、不加絲毫掩飾地把自然秩序解釋為建立在個人的自動性，個人的自利性和自由競爭之上的一種秩序。他極不猶豫地着重指明：一切跟這些原則相衝突的社會制度，都是誤入歧途的制度。在他研究個別的現象時，他所着眼的不是它們的歷史而是它們所遵循的法則，亦即所謂「自然的秩序」。

都哥並不像米拉波，奎奈等重農派貴族那樣，把資本主義關係硬解作封建制度底「新版」，以保全封建統治底面子；唯其如此，所以他對於資本制社會底社會結構，了解得更透澈些。假如奎奈把當時的社會劃分為三個等級，——農業家，封建貴族與僧侶和從事其他經濟部門的工作者（主要的是工商業者和勞動者），那末都哥卻看出除這三個等級外，還有資本家和工人二個階層。他並且把自由競爭底原則應用到工人和產業家中間的關係上去，因而他能給一個較好的工資法則底解釋。他不限於確定工資為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而且還要說明這一最低限度是如何確定下來的。都哥寫道：「在大批勞動者當中，產業家可以選定一些願意接受最低價格（指工錢）而工作的人來替他做工。於是勞動者們就要互相競爭，因而降低了他們的勞動代價。在這種種情形之下，在一切勞動部門中就應規定，而且實際上已經規定下了一種制度，即勞動者底工資只限於他們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註）這樣，都哥根據他的自由競爭底原則，把工資如何變成最低限度生活的過程，完全

揭露出來了。

其次，都哥關於「何謂僱用勞動者？」底問題，也給了一個確當的界說。他在同書中寫道：「一個單純的勞動者，他祇有自己的一雙手和他的手藝，假如他能達到出賣他自己的勞力的話，那末他所有的亦祇此而已。」在該書底另一處所，他又解釋到這些「祇有自己的一雙手和手藝」的人們從何而來這一點。他說：「許多人不能再保持他們的土地所有權，除了將自己的勞力供給別人去使用而做一個不生產的階層，藉以換取土地所有者底多餘生產品以外，("Re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便沒有別的出路。」(註)照這樣看來，雇用勞動發生底條件是生產者與土地——這個最重要的生產手段——相分離這一事實。但是都哥對於這一正確的立場，給了一個不正確的解釋；這還是他的重農主義的觀點使然的。照他的意見，土地並不是重要的生產手段而是唯一的財富泉源。因此，在都氏看來，真正的資本家只是領有這種財富泉源的人——土地所有者。別的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僅僅就他們得能從土地所有者手上掠取一部分「純生產品」那點意思來講的。

對於資本主義社會諸關係的分析，都哥很正確地從它們的發生上去開始研究。第一，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諸關係底發生，是跟一般的社會諸關係之發生同時的；換句話說，社會諸關係底發生，一開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諸關係。第二，他解釋造成這些關係的條件是：(一)不同的土地出產不同的生產品，因而亦即出產不同的純生產品；(二)整個地講，土地是有限制的，因為這樣，所

(註)都哥著：「論財富之創造與分配」

(註)都哥著：書同上。

以它只能被一部分人佔為私產。由於前一點，他得出了生產品與生產品相交換的結論；由於後一點，他又演繹出了生產品與勞動相交換的結論。

都哥描述此種過程如下：最初，人們散居在地面上，各人佔有土地一方；他們同時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土地耕作者。凡佔有土地而在土地上耕作者，得享受全部純生產品。然而因為前面已經確定，不同的土地上出產不同的生產品，所以生產品與生產品之間，就必須進行交換。這便是過程底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我們只看見生產品與生產品相交換的現象。

第二個階段乃開始於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之分工。這二部分人中間的交換乃是勞動與生產品底交換了：非農業者供給勞動，農業者則供給生產品：前者是靠後者底薪俸來過活的。換句話說，都哥把非農業人口看成被農業人口僱用着做工的人了。

過程底第三個階段是開始於土地佔有與土地使用底分離；由於這一分離，土地耕作者就不能不將自己的土地生產品底一部分，分給土地所有人了。可是現在連土地耕作者，（或農作者）所獲得的，也不比其他經濟部門中的工作者多得些，因為土地佔有者把必需生活資料以上的全部剩餘品都佔為己有了。

為什麼人口分為農業的和非農業的兩部分；為什麼農業人口又分為農作者和土地佔有者兩部分？這當中交換底發展是否盡了某種作用？對於這些問題，都哥雖然企圖予以解答，可是他始終沒有給一個確當而明白的答案。他舉出了許多的原因，其中有如一部分人節儉而勤奮，另一部分人是浪費而怠惰；同時又提到借貸關係，認為由於借貸的結果，土地乃由借款人讓渡給放款人了。

都哥關於土地耕作人和土地所有人底作用，有着明確的決定：前者將自己的勞動供給後者；後

者則享受法律所賦予的私有權。都哥顯然袒護這種權利，因爲他說現今的土地所有者底祖先們從前，自己也耕種過土地的；然而都哥却又鄭重地指出，純生產品之交付給土地所有者，是一部分人佔取另一部分人之勞動的行爲。這一點又是都哥見解底獨到之處，而爲奎奈與其他重農主義者所見不到的。

那末除土地所有者以外，別的資本家從何處來的呢？當然他們的存在都氏並不加以否認，不過他是依照「主要的資本家」（卽土地所有者）底發生過程來解釋其他「附屬的資本家」——工商業家和信貸資本家——底發生過程的。照都氏底解釋，土地所有者是把不動產（不可移動之財富）掌握在自己手裏，而非土地的私有者則掌握着可移動的財富，其中有決定意義的是生產手段，消費資料底積儲及貨幣。

但是照重農主義底基本觀點，一切非農業者都只得到與生活必需品價值相等的工資，他們都被都哥歸入「僱用勞動者」底範疇中去的；那末工商業家和信貸資本家（非農業者）底利潤從何而來的呢？按照都哥底理論路線，應當答復說：剩餘生產品（卽利潤底「原形」）是發生於凡是生產手段跟生產者分離的地方；換句話說，在工業部門內，工廠工人也在替工廠主創造剩餘生產品的。但是重農主義者的都哥却故意規避這一個答案。這在他當然是無可如何的，因爲不然的話，全部重農學說就根本站不住了。假如工業中也創造剩餘生產品的話，假使工業中的工人不但再生產他們的勞動代價——工資，而且還替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話，那末試問全部重農學說還有立脚的餘地嗎？

都哥始終是忠於重農主義立場的；所以他得用另一種說法來解釋工商業家底利潤。他事實上把利潤解作了利息，而把利息又解作跟地租同樣的東西。交換發展底結果是：（一）貨幣底發生及其

積聚；（二）土地亦被捲入商品流通圈子中去，土地變成了自由買賣底對象。因此都哥就把一定量的貨幣看成一定大小的土地；把一定大小的土地看成一定量的貨幣。唯其如此，所以一定量的貨幣也應該像一方土地（即用這些貨幣所能買得到的一方土地）一樣地產生進益，而且不少於土地上所產生的進益。都哥認爲利息應當高於地租，因爲放款者所冒的險要比土地所有人所冒的險大些。可是既已證實貨幣能產生進益，那末這一來也就證實了工商業也能產生進益的，因爲工商業中是投放着一定量的貨幣（資本）的啊。

照都哥底意見，這種進益應當等於所投資本底利息。加上產業家勞動底報酬——工資，再加上他冒險報償三者之總和。都哥跟他的前人們一樣，也只知道地租和利息，利潤這一個獨立的範疇，在他的觀念中是不存在的。在都氏看來，利潤只是利息加產業家底勞動報酬兩者之和而已。利息和它的變形，利潤（注意：照都哥底意見，利潤還是產生於利息的一個量），都是從純生產品中劃分出來的。資本之功用在於促進純生產品之增長，因而它也有瓜分一部分純生產品的權利。這樣，都哥不但是個禁止利息底反對者，而且還對於一切立法上節制利息的辦法表示反對。當作貨款之價格看的利息，應當在自由競爭底過程中確定下來，像任何商品底價格一樣；而且事實上也是這樣確定下來的。這裏很顯然地表明：都哥對於資本主義諸關係的認識確較奎奈更明確而深刻了。我們知道奎奈對於貨幣資本只是取勉強容忍而態度，因爲他既擁護土地這一種私有權底形式，他就沒有方法否認另一形式的私有權——貨幣的所有權。但是他心裏畢竟是討厭貨幣資本的，所以他認爲高利率（他以爲這是貨幣資本缺乏底標徵）究竟比爲貨幣資本過多之標徵的低利率強些。

都哥則不然，他對於利息的態度是主張維護低利率。貨幣資本底豐裕，在他看來是不足慮的；

相反的，他倒認爲這是國民經濟繁榮底表現。這種觀點雖然跟重農主義的立場不大調協，可是它卻是表示對資本主義現實之更確切的認識。

最後，關於都哥底價值論和貨幣論，還得約略地說一個大概。在價值論上，都哥受康帝拉克和加里亞尼底影響極大。他主張劃分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前者是表現出讓事物的人自己對該事物的估價。後者（客觀價值）才是客觀的價值，亦即他所說的市場上所確定的市場價格。關於這兩種價值，都哥作了以下的解釋：「既然交換的雙方，都是他們預備拿去交換的那個事物底主人，那末他們各人就應決定自己對於該事物的愛好程度……並跟自己要求獲得另一事物的願欲作一比較……」（註一）——這是解釋事物之主觀價值的。接着又說：「麵包和白酒底價值在這種場合（意即有很多購買者和出賣者的時候——沈）是決定於從事交換的兩個人底相互的需要和資金；它決定於全體麵包出賣人底需要和資金跟全體白酒出賣人底需要和資金之平均。」（註二）簡單地說，市場價格是依供求關係來決定的。

都哥底價值論不僅不發生他的重農主義體系，而且還是這一體系中的一個贅瘤。至少可以說，這是表示都哥想把不可調和的東西調和起來的一種嘗試，他想把重農主義的論綱（關於交換相等性的論綱）跟康帝拉克底交換不等性論調和起來。

在貨幣論方面，都哥把金子和銀子這兩種金屬貨幣當作具有眞實價值的商品看，他並且反對貨幣當做價值符號看的那種見解。他否認貨幣爲價值底符號，而指出貨幣自身是有價值的。所以都哥

（註一）都哥著：「論財富之食造與分配」，頁十七。

（註二）都哥著：書同上。

在貨幣論中是個「金屬論派」。可是他不但把貨幣解作商品，同時卻又把商品解作貨幣。在都哥底觀念中，一切商品也就是貨幣，因爲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在流通界中都可以像貨幣一樣地成爲別種有價值事物之度量的。這樣看來，都哥對於貨幣之爲特殊的商品之特殊性，是完全不了解的。

第三章　古典學派（正統學派）

第一節　亞丹．斯密

一、斯密底時代背景

亞丹．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國資本主義童年時代底經濟學家，具體地講，是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由手工工場制過渡到大機器生產制的時期底經濟學家。所以我們的研究應當從十八世紀後半英國資本主義底發展狀況底分析開始。

當斯密氏在學術界中初露頭角的時候，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相當地強固，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發達些。被英國人稱為「榮譽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一六八八年革命（註一）底結果，英國的政權遂為貴族（註二）和金融商業資本家集團所分掌。從這時起，英國的內外政策底任務，都是要造成對於英國資本主義發展之最優良的條件。過去貴族們用掠奪的手段來實現的「圈地」政策（即強力剝奪農民底土地，改麥田為牧場），現在開始用合法的手續——根據國會的法令——來實施了。從一七〇〇到一七六〇年，這樣的法令總共頒佈了二百零八道，被圈的土地共達三十一萬二千英畝。其後，圈地底速度更快了：從一七六〇到一八〇一年，總共頒佈了二

（註一）就是推翻橫暴的詹姆斯二世的那次不流血的革命。

（註二）是指斯都亞特皇朝底反對派貴族而言。

干道法令，三百萬以上英畝的農民土地被圈去（即被剝奪）了。農民大衆底失地過程跟大農經濟底形成過程（即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的過程）相並進行着。這樣，重農學派所日夜渴想其實現於法國的理想，在英國却被幾千道法令所實現了。

土地所有者變成了地租底收取者，並且用種種方法以提高土地上的進益。於是富裕的農業家集團日益長大起來了。當時首要的工業部門是毛織工業，它對於「圈地」政策起着強大的「刺激」作用，大大地加速了化麥田爲牧場（草原）的過程，這樣就不斷地擴大了毛織工業底原料基礎。同時，雷厲風行的圈地政策又造成了大批農村人口底過剩，因而亦即替工業創造了廉價勞動底來源。當時對於毛織工業底繁榮，除工業資本家外，土地所有者，農業家和商人們也都無不渴望的；而最吃虧的是廣大的農民羣衆。

另一重要的工業部門是棉織業。在最初，棉織業受到了一些障礙，因爲它被毛織業家嫉視爲競敵了。可是不久棉織業仍得很快地發展起來。毛織業所給它的障礙客觀上反倒促進了它的發展：因爲棉織業是「後進」的緣故，所以它特別要表現它的努力——它的巨大的創造力（Initiative）和進取性。唯其如此，所以工業革命史上第一批偉大的發明就出現在這一部門中。棉織業後來一躍而爲英國工業中的「佼佼者」，而一般人乃咸視此部門生產之發展爲擁護工商業自由競爭之不可推翻的論據。棉織工業之躍上霸權地位，適應着國內社會關係底一大轉變：工業市民羣擢升到首要的地位了。在亞丹．斯密時代，這一過程雖未完成，然已很快地在開展中了。

除了手工工場和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以外，當時各種小手工行業和家庭小手藝在英國還仍很普遍而有勢力，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制並沒有，而且不能把它們排擠掉去。

但是在那個時候英國却巳失去了它原來的農業性而大體上變成一個工業國家了。這可以從英國人口成份底變動上得到證明：城市和工業人口底增長與農村人口底縮減。根據湯貝（Townby）在「英國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一書中的統計材料，一六九六年倫敦有居民五十三萬人，其他城市和商業區域共有人口八十七萬，而鄉村居民則總計約四百一十萬人，這就是說，倫敦底居民佔全國人口約十分之一。而全部城市居民則佔三分之一。經過七年之後，據楊格（Arthur Young）底統計，倫敦底居民巳達全國人口六分之一，城市居民則佔全國人口之半。可是到亞丹．斯密出世的時代，英國城市人口底增長更加速了。湯貝告訴我們，從十七世紀末到斯密底時代，塞非爾德（Sheffield）底人口增加了七倍；利物浦（Liverpool）底人口增加了十倍；曼却斯德（Manchester）底人口增加了五倍；貝明漢（Birmingham）底人口增加了七倍。這些便是大工業城市人口激增的狀況。至於農村人口，在絕對數量上雖亦增加，但相對地却不斷地減少。

講到商業的話，英國在國內商業上雖巳大致解除了重商主義底束縛，而在對外貿易上，重商主義的政策却仍十分穩固而毫不動搖。克朗威爾（Crowmwell）底航業法令一方面給英國造船業和航業發展以強有力的推動，另一方面則給荷蘭底海上貿易以重大的打擊。同時該法令底實施又促進了英國海上霸權底發展。唯其有這樣大的功效，所以連十分嚴酷地排斥重商主義的斯密氏，也不得不認承航業法令底功效和益處。

對於與殖民地的貿易，英國當局予以特別的保護。這種貿易為英國幾個大公司所壟斷，這些公司對於殖民地既是商業機關又是統治機關。在斯密氏出世之時，英國巳經是一個龐大的殖民地帝國

。英國對於殖民地民族發展自國工商業的一切嘗試，一概加以壓制；它只許殖民地做宗主國底原料和糧食底供給地。這一政策激起了北美諸州（即今美國）反抗英人的暴動。美洲的產業市民擧决定自己起來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了。

所謂「原始資本積槊」底過程，在英國是最標本式的。農民底失地，生產者跟生產手段相分離，生產者（包括小手工業者和農民）之轉變爲勞動力底出賣者和生活資料底購買者。同時也就是工業跟農業的分離，家庭工業與農業底聯系底消滅。從前由小農經濟直接供給的原料，現在得從市場上去購買了。手工工場便是這種原料底大顧主。從前手藝工匠爲自己消費而織的布，現在變成工場的生產品了；而這種紡織品底發售市場恰正是農業區域。

此外，跟「原始積槊」有密切聯繫的，就是殖民地的掠奪。靠着對殖民地的統治權，英國商人（因而亦即英國的統治集團）從殖民地方面掠奪了無量數的貴金屬品；這種統治，使英國努力地發展了它的航業，大規模地擴張了殖民地商品底貿易，並且把奴隸買賣的貿易當做了致富底最大來源；此外，殖民地的統治又替正在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開闢了廣大的世界市場。

這樣，所謂「原始積槊」已經完成了它的事業，那末就輪到資本主義的資本積槊了。然而有許多障礙擺在面前，最重要的障礙就是生產基礎太狹窄——手工工場制底生產基礎。由於巨量資本積槊和狹窄的手工工場底生產基礎間的矛盾，產業革命底必要性就日益成熟起來。在另一方面，工場制本身，因勞動過程之分解爲許多單純的動作（Operations），勞動工具底專門化，分工合作的生產機體底形成，——這樣，就創造了產業革命之組織的和技術的前提。

同時在大資本發展底道路上，却還有別種障礙存在着。貿易保護政策之任務，因而在於發展本

國的工廠生產；可是執行了這個任務，保護政策却又在阻礙它自己所製造出來的製造家底活動，束縛他們的自動的創造性和奮鬥性（進取性）。

就國內的情形論，促進由行會制到工場制之轉變過程和小手藝與舊式商業資本所緊緊抱住的那種舊立法，已經深深地感覺得太陳舊了。就國外的情形論，貿易保護主義阻礙跟別的國家建立「健全的」，「正常的」商業關係。當時的英國，或是已經消滅了它的競敵（例如西班牙），或是把它的競敵排擠到後面去了（如荷蘭和法國），它在對外貿易上對於自由競爭已經毫無忌憚。可是對於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強大力量的英國資本主義而言，自由競爭却是跟發展較弱的競敵們競爭的最好工具，亦即促進它自身加速長大的最好利器。

同時，英國跟殖民地的關係也需要改變了；至少對於不同的殖民地應採取不同的辦法；對於印度和對於有英國和歐洲各國移民的其他殖民地不能施行同一方法。北美諸州底暴動（一七七六年）便是一個可怕的警告（註）。在過去，原始積累底方法是掠奪殖民地，把殖民地方面多年聚積起來的財富奪過來送到宗主國去；但是掠奪固然可以，終究不能單靠暴力去實現經濟的征服殖民地底目的。惟其如此，所以過去的前資本主義式的勝利是不穩固的。用前資本主義的方法去掠奪和克服殖民地（如印度），始終不能改變後者底原始的社會經濟機構（如印度的農村公社）。要破壞和消滅

（註）亞丹．斯密底國富論可說是這一暴動之思想上的「象徵」，它和北美的暴動恰巧同時出現，它是反重商主義的暴動之理論的旗幟。「國富論」底出世，正在北美諸州反抗英國野蠻的重商政策之戰爭爆發之初，不過美國人底行動當然比斯密氏更澈底些。他們不但掃除了英人底重商政策，而且完全消滅了英人在北美的統治。

殖民地底舊式經濟組織，除了採取新的經濟方法——產業革命和根本改變經濟政策的方法外，便無他道。

從上述種種方面看來，十八世紀後半的英國，確實絕對地有改變經濟政策和實行產業革命的必要了。當斯密氏開始其學術活動的時候，英國還沒有蒸汽機，也沒有眞實的貿易自由。然而蒸汽機和貿易完全自由底必要，已爲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底事實所決定；那時的英國資本主義業已成爲一個世界的強大的力量，並且已經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斯密氏底傑作（亦卽古典學派底代表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出世，尙在產業革命以前，但在斯密氏著作那部巨著的時候，產業革命底種種客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了。

二　「國富論」評價

要研究古典學派底政治經濟學，要研究亞丹．斯密底經濟理論體系，必須從「國富論」底評價開始，因爲「國富論」是亞丹．斯密全部經濟理論底結晶，同時又是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之完整的偉大的代表作。在這一節書中，我們所要做的工作，便是給「國富論」一個概括的估量，俾讀者對於斯密氏底理論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輪廓概念。

「國富論」是由五卷書集成的大著；第一、二兩卷所討論的就是平常吾人所稱的政治經濟學，亦卽所謂狹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科學。第一卷書底研究，開始於勞動分工底分析：說明分工對於國民財富的意義，分工發生底原因，並分析決定分工之諸因素。斯密氏從分工出發來解釋貨幣發生底原因，然後再說到根本問題，商品底交換價值底問題上來。解決了這個問題以後，他馬上就講到分配問題，研究社會三種主要的進益（收入）：工資，利潤和地租。這樣看來，

第一卷書中闡解底程序如下：「分工——貨幣——商品底交換價值」——後者劃分為三大社會集團底三種主要的收入。關於這一研究程序底意義，我們後面再說。這裏要指出的，只是斯密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底理解，已經比重農學者進了一大步。他解釋社會之劃分為諸階層，乃決定他們跟生產手段的關係和獲得進益的性質：土地所有者領有土地而獲得地租；資本家為資本底所有人而獲得利潤；兩者都沒有的工人則獲得工資。

「國富論」底第二卷是研究資本的。這裏研究底出發點是資財底積儲；從這一積儲中，斯密氏劃出一部分來，稱之為資本。在探討資本時，他把資本劃分為兩部分，固定資本（Fixea Capital）和流動資本（Circulating Capital）；他說明了資本底作用和資本積累底條件：指出了資本底各種形態，借貸資本跟工商資本的區別；最後又說到各種資本投放底形式，特別是工業中的資本和農業中的資本。在這一卷中，斯密氏又回復到貨幣問題上來，但是這裏所討論的方向不同了：這裏他所注意的是為資財積儲之一部的貨幣和當作資本看的貨幣。他又把資本底積累跟生產的和不生產的勞動問題聯繫起來。而在生產勞動和不生產勞動底解釋中，雖仍免不了有缺點，可是斯密氏却又較重農主義者底觀點進步得多。在斯密氏看來，一切勞動，不論它施於何處，施於農業或工業，只要它是生產商品或資本的，就都是生產的。

假如說斯密在前兩卷書裏所闡明的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那末第三卷書可以說是他的經濟史；斯密敘述這一歷史，係從羅馬帝國之覆亡開始的。在這卷書底開首，他寫了一章類似導言的東西，該章標題為論福利之自然發展。在這一章中，他又提到分工底問題，可是他提這個問題的方式又跟第一卷中的提法不同了。這裏他所論到的是城市與鄉村底分工。在第三卷書底後面各章中，他就根

據這種分工底觀點來敘述經濟發展史；他在這裏指出了前後接續的兩個過程來：起初是城市底衰落過程，然後是城市繁榮底過程。

第四卷中所敘述的是經濟學說史。其中大部分是講的重商主義，對於這一學說，斯密氏給了周密的，粉碎的批判。關於他所稱爲農業理論的重農學說，只有一章是討論它的；斯密氏對重農學說的批判較輕而較客氣。

在第五卷中，斯密氏探討了財政，賦稅的政策。該卷共分爲三篇：第一篇論國家底支出，第二篇論國庫收入，第三篇則論國家底債務。

現在我們要來考察，上述五卷書底內部聯系究竟如何。初初一看，這五卷書髣髴是一部經濟知識底百科全書，它們中間的聯系，只是在它們都是屬於經濟領域的知識這一點。然而仔細考察之下，我們却不難看出「國富論」五卷書中間的內部聯系，它把五卷書連結成爲一個整個的體系。這種一致性或整個性是在於：（一）研究底對象；（二）斯密氏貫徹於全五卷書的那個總概念。

全部著作底研究對象便是國民底財富。斯密氏認定研究底任務在於揭發那些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發展的諸原因和因素。他認爲促進勞動生產率之發展（因而亦即促進國民財富國民之增長）的首要的和決定的因素便是勞動底分工。可是照斯密氏見解，分工之成爲財富增長之因素，只有在進行分工的社會內存在着正常的交換，即按照「自然價格」的交換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此，爲財富增長之因素的勞動分工問題中，就包括着「自然價格」底問題。而「自然價格」問題本身則又有賴於進益分配問題，因爲照斯密底意見，商品底交換價值只在它的原始狀態中是被勞動決定的，以後它就得由進益（收入）來決定了。這樣看來，所有這三類問題，內部都是相互聯繫着的。這便是第

一卷裏所研究的問題。而它的核心却是勞動分工。

斯密氏認爲促使財富增長的第一條件是資本。斯密說：「有用的和生產的工人，其數目到處都要靠給他們工作做的事業上所消費的資本量及其特殊的使用方式來決定的。」這是第二卷裏所研究的問題。

在第三卷中，雖然研究底性質已有改變，而所採用的材料也完全不一樣（自經濟史中採取材料），可是研究底對象還是跟前兩卷中一樣。斯密所感興趣的，不是經濟史本身，他所注意的是另一回事：從羅馬覆亡到斯密底時代爲止這一歷史時期中，分工——城市與鄉村底分工形式——怎樣地發展起來；正確的政策如何促進這一過程（分工底發展過程），不正確的政策又如何阻礙這一過程。於此，斯密就提到了蕃發展國民財富之作用的第三個因素——政策。在斯密看來，認爲最好的政策是沒有政策，這就是說，政府不干預經濟生活便是最好的政策。

第四卷實爲第三卷之直接的繼續。像第三卷的情形一樣，斯密所感興趣的，也不是經濟學說史本身；他所要說明的，祇是：一種不正確的經濟政策，特別是統治了幾世紀的重商主義政策，如何阻礙着分工之自由發展（照斯密底見解，自由的發展便是最好的發展）這一點。假使在前兩卷中斯密氏研究了財富之積極因素，那末在第三和第四兩卷中他却研究了財富之消極因素。

第五卷之研究課題（對象）仍爲國民財富，因爲國家底歲入和歲出及債務等，斯密氏根本上也依據財富發展底觀點去觀察它們的。所以這一卷又跟前四卷有着內部邏輯的聯系：以國民財富爲研究對象底唯一重心。

國富論底另一個內在聯繫的原則，便是經濟自由底觀念，從第一卷到第五卷都貫徹着這一觀念

。可是這一觀念却並非亞丹・斯密發明的。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發展，人們底頭腦（意識）中就逐漸地成熟着這一發展底反映。但是斯密氏却有下列三大功績：（一）他替這一觀念奠定了理論基礎；（二）他以此觀念爲他以前諸經濟學說之研究與批判之基礎；（三）他在這一觀念上建築他的完整的經濟政策和所謂國家經濟底理論，即研討國家收入，支出和債務的經濟理論。

同時，斯密氏又把經濟自由底觀念建立在自然秩序底觀念上，——不過這也不是「國富論」著者所發明的。我們在前章中業經再三指出，自然秩序觀是重農學說底一塊基石（基本的方法論觀點），是整個十八世紀底方法觀點，可是這也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之反映而已。斯密氏底功績就在他澈底地解除了這一觀念底一切封建、宗教的成份，肅清了這一觀念底一切和它自身不相容的成份與色彩。

照斯密底解釋，自然秩序是建立在個人自動的創造性、建立在個人的興趣上、建立在自利主義上的一種秩序。「國富論」前兩卷中所發揮的經濟理論，就不外乎自然秩序在經濟範疇上的表現而已。分工，貨幣，自然價格，自然工資，利潤和地租，資本及其組織部分，資本積累及其不同的應用，——所有這些現象都是自然秩序底表現。第三、四兩卷中所說明的，是自然秩序跟人工秩序如何鬥爭，如何排除各種經濟政策體系所給它的種種障礙以開闢它的前程。在第五卷中則確定了國家經濟底界限，國家收入和支出底基礎，後者則仍發生於正確理解下的自然秩序。

亞丹・斯密能夠把他那時代底一切經濟知識都結合在一個研究對象周圍，並用一個統一的觀念去貫澈它；這便是他的「國富論」底巨大成功，亦即使此書成爲科學發展史中劃時代的作品之原因。然而斯密勞作之思想結構底緊密性和觀念統一性，却並非表示它的理論上和方法上的純一性。事

實是相反的，在斯密氏那個時代，差不多難以找得到像「國富論」那樣多的矛盾了。斯密氏對於同一經濟現象，往往給以不同的，甚至互不相容的解釋；前後應用不同的方法，建立了完全相反的理論。

在斯密氏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同的價值論，利潤論和地租論等等。可是作者建立了這些互相矛盾的理論，自己却覺察不到這些矛盾。關於這些矛盾，留在以後幾節中再來說明。不過這裏要指出，斯密氏底創造能力，他的天才，却並不因這些矛盾而稍減：他終究配稱為近代政治經濟學底始祖。就社會本質論，斯密氏的矛盾是當時社會經濟矛盾之理論上的反映，這些矛盾主要地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斯密時代資本主義底發展不充分性所產生的矛盾；另一類（比較更深刻的）則為資本主義經濟性質本身底諸矛盾。前一類矛盾隨着這一生產方式之向前發展而被資本主義經濟學者自己所克服（首先就是李嘉圖）；第二類矛盾則在資本主義制度和跟它相適應的形而上的方法論底界限以內，不但不會克服，而且也不能被資本主義經濟學者所理解的。

三　分工與交換論

在第二節中已經指出「國富論」底研究是從分工開始的。為什麼斯密拿分工做出發點呢？對於這個問題，原著人在其導言中寫道：「每一國民底一年勞動，就是供給他以一年中所要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的原始基金；這些生活必需品總常常或是由這一勞動底直接生產品所構成，或是由用這些生產品去跟別的國民交換所得的生產品所構成。」（註）

照斯密底意見，每年的勞動是供給任何國民以生活必需品的原始基金。這類必需品底數量，乃

（註）斯密著：「國富論」頁五。

決定於：（一）參加生產的勞動量和（二）勞動生產率。第二個條件具有決定的作用。斯密用下面一個事實來證明這一點。他說原始民族要比文明民族窮得多，可是在原始民族中，參加勞動的人在全體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要比文明民族中的勞動者大得多。文明民族所以比較富裕，因為他們的勞動生產率比較得大。而勞動生產率首先就當賴勞動者底技藝，熟練程度等等來決定，而技藝，熟練程度等則又由勞動底分工來決定。

所以斯密得出結論來說：國民底財富及其增殖，當賴分工底發展來決定。因而在國民財富底研究中，即在經濟的理論中，出發點也應當是分工。

初初看來，這樣的解說是沒有甚麼可以非難的。但是這裏却有一個重大的缺痕：斯密完全抽象地觀察國民財富和分工，他丟開了具體歷史的社會形式，丟開了產生財富和發生分工的那些具體歷史的社會條件去考察這種財富和分工。而事實上他研究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所以他從最初就把資本主義諸關係看成自然的關係，勞動財富底生產和分工，永遠只是在，而且必須在這些關係中發生似的。因此斯密並不離開交換去考察分工。當他說到「國民一年的勞動為一年的生活必需生產品」時，他一開始就認定這些生產品一部分是「這一勞動底直接生產品」，一部分則「由用這些生產品去跟別的國民交換所得的生產品所構成」。這裏，就很明白地顯示着：斯密所說的分工，是跟交換（因而即跟商品經濟）離不開的。

可是由此可以看出，在斯密底研究出發點中，就已經種下了矛盾，這一矛盾又註定了其餘許多矛盾。一方面他把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分工解作一般的分工，解作國民財富發展之超歷史的法則；另一方面這一法則事實上充實着具體的內容——取自一定的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

的具體內容。

這一矛盾又表現於斯密之混同社會分工與工場內部分工兩概念；他不看見，並且也不會看見兩種分工中的重大區別。他根據工場分工底觀點去觀察社會，於是把社會看成一個大工場了。這種觀點，把商品資本主義社會分工底自發性，無政府性完全抹煞了。

斯密既不了解各個不同的經濟形態（Economic formations）中的分工底殊異性，又不了解同一經濟形態內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各種分工形式底殊異性。他估計分工底意義，完全根據下面這兩點來估計的（一）將許多人聯合成為一個生產的集體，成為一個「大工場」；（二）提高社會勞動底生產率，而以國民財富之增長為其表現。依照這樣的觀點來說，「小規模工場」（意即真正的工場）是「大工場」（意即社會）底個別場合；這「大工場」是由許多經濟部門所組成的，它們共同參加社會生產，各自成為這「大工場」分工體系中的一員。

斯密氏研究底出發點是勞動底分工；可是他對於分工的理解，第一，不分出社會分工和工場分工之區別；第二，他把分工看成自然現象；第三，但同時他也不離開交換去理解分工。斯密本人却看不見這裏有甚麼矛盾。第一，因為他根本把交換也看成自然現象：他認為人類本性中天生有交換的心向；第二，交換的心向促成和產生分工。說得確實些，照斯密底意見，分工不外乎人類交換心向之表現形式而已。此外，分工這一事實本身，他也只把它看成交換——勞動與勞動之交換：甲替乙勞動，乙又替甲勞動，諸如此類等等。

復次，斯密把工場分工解作技術分工（Technical division of labour），這種觀點當然是非常模糊的。因為把工場分工解作技術分工，其弊病在於：第一，抹煞了工場分工底特質，抹煞了我們

前面所指明的那些特點。須知在技術分工底範圍之內，可以有各種形式底分工；手藝作坊內的分工，資本主義工場和工廠內的分工，以及像印度公社內的分工等。第二，這樣的見解又抹煞了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的分工底特殊性。第三，「分工」這一範疇，由社會歷史的範疇被解爲技術的範疇了。這樣一來，工場中或資本主義工廠中的分工底社會內容，就完全被斯密底分工觀所勾銷了。

斯密特別着重地指出交換和分工祇存在於生活於社會中的人類；動物界中既無交換，亦無分工。動物因爲缺乏交換和做買賣的能力或心向，所以牠們雖有各種能力和特性，却不能爲公共的目的所用，亦不能促進整個族類（例如犬類、鳥類、虫類等）底幸福。每一動物，只知顧到自己，各自單獨地謀自己的利益，所以各種動物所具備的各種不同的能力，不能夠互相集合而成爲一整個的，促進全體利益的能力。人類却不然；他們有各種不同的技能和貢獻；靠着他們的交換和做買賣的心向，他們各種不同的勞動生產品就集合成爲一個物品底總匯；從這個總匯中，每個人都可以購買他所需要的任何別人底生產品（註）

斯密底理論上的缺點，是在他把交換解釋得太廣泛，把分工也歸入交換之範疇中，他把生產與流通之一致，事實上解成兩者之等同；這樣就抹煞了流通底特殊性。這仍然由於他非歷史地了解交換和分工，把它們看成超歷史的範疇的緣故，這樣他就不能說明流通在商品經濟中的作用和跟流通相聯繫的諸現象之本性。同時他因此也不能給重商主義一個正確的批判。

然而這裏必須指出，在生產和流通底相互關係之理解中，斯密究竟比他的前人們進了一大步了。重商主義者把流通提到第一位，重農學派則以農業生產爲主體。斯密却把勞動，全體國民底勞動

（註）參閱「國富論」第一卷第二章。

，提到首要地位上來。不過他觀念中的勞動，是分配於生產者全體間的，因而就包括交換在內的勞動。縱然斯密對於分工和交換的解釋有缺點，可是他却憑揣本能地了解商品社會底財富不發生於流通，同時却也不在流通之外發生。所以被他當作研究底出發點的勞動，並不是簡單的勞動，而是包括交換在內的勞動，亦卽是許許多多商品生產者之綜合的勞動，它表現着生產和流通底一致。

固然斯密因不了解商品生產者底勞動底本性，所以也就不了解生產與流通之一致底本性，但事實上他的出發點却二者兼而有之。在他看來，勞動是在分工條件之下的財富底泉源，分工產生於交換的心向，而實在的交換規模（卽交換範圍與數量之大小）卽市場底規模——則決定着分工底界限：——這便是斯密在「國富論」前三章中的研究骨幹。

斯密關於市場規模限制分工這一情形的解釋，實頗饒興趣。「國富論」第三章全部討論這個問題，其中充滿着很多採自各個民族史的有價值的事實材料。這裏，斯密闡明了運輸在流通發展中的作用，因而亦卽在分工發展中的作用。市場愈廣大，分工就愈發展。而市場底廣大性則有賴於：（一）特定地域之人口密度，（二）連結各地爲一市場的交通路綫底發達程度。所有這些在目前是人人周知的事情；可是在當時這些道理却都是新的，固然也有好些是斯密從他前人手上接受下來的「遺產」。斯密接受了前人底「遺產」，加上了自己的新理論和從歷史中搜集來的各種新事實，——把所有這些用一個總的觀念貫澈起來，結果就形成了他的新的經濟學系統。

四　貨幣論

在未講斯密底貨幣論本身以前，我們得先把他的研究程序再提出來復述一遍：（一）交換的心向（心的傾向或要求），是產生分工的人類天性底特質；（二）由交換的心向所產生的分工，本身

又實現了這一心向，把交換的傾向轉變爲日常發生的交換過程；（三）由人口底密度和交通底設備所決定的交換規模，本身又反過來決定分工底界限。

可是旣有分工和交換，就當有交換底工具——貨幣。貨幣怎樣發生的呢？斯密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如下。

在尙未說明何謂商品，何謂價值這些問題以前，斯密就已提到貨幣問題了。他認爲貨幣像分工一樣，也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現象。吾人之任務在於：（一）揭發那些使貨幣成爲必需的自然原因，（二）描寫貨幣之發生與發展底過程。

交換的心向和實現此心向之分工，所造成的局面是這樣：「每個人都藉交換而生活，或變成某種程度內的商人，而社會本身則可說變成商業的集合體了」。（註一）但是這個過程是要遇到困難的。斯密描寫這種困難如下。

「假定一個人所有的特定物品底數量，大於他自己所需要的數量，而別人却感覺到此物品底缺乏；因此第一個人就很願意把他的一部分多餘品交出，而第二個人則很願意獲得這些物品。但是假如這時第二人恰巧沒有第一人所需要的東西，那末他們二人中間就不能發生任何的交換。屠夫底肉舖中有着多於他自己所能消費的肉，製啤酒者和烤麵包者很想購買這多餘的一部分肉，可是他們除了自己的本行物品以外再沒有別的物品可以拿去向屠夫交換了；然而這時屠夫手裏恰巧有着他在最近期內所需要的啤酒和麵包。在這樣的場合之下，他們中間就不能發生交換了」。（註二）

（註一）斯密著：「國富論」，原文版，頁二九。
（註二）及（註三）見前書，同頁。

斯密如何解決這個困難呢？他又寫道：

「為避免這種不方便的情形起見，每一個有理性的人，在分工發生以後，社會發展底任何一個階段上，自然而然地要力圖如此處理他的事業：即要使他除本行的各種物品外必須經常地有一些誰都在交換自己物品時不會拒絕接受的商品才行」。（註三）

這樣，照斯密看來，貨幣底發生是自發的，自然而然的。雖然斯密也提到理性（如說：「每一個有理性的人……」），但是他距離「貨幣為人類理性協同之結果」的思想，距離所謂「人類的集體理性」之結果的思想，還遠得很。相反的，他確定地指出，貨幣之發生乃各個人活動之結果，因為各個人都在努力於克服各種阻礙他們互相交換生產品的困難。每一個人都是單獨地活動着，誰都跟誰無關，貨幣就成為這一切單獨活動底結果，因為所有這一切單獨的活動，都以克服同一困難為歸趨的。這便是貨幣發生之自發性——自然性底意義。每一單獨的個人都不想創造，而且也不曾創造過貨幣；貨幣並不是某一天才底發明。斯密着重地指出促成貨幣產生之大衆活動底性質。照他的意見，單獨的個人只企圖獲得一些為任何人所不至於拒絕收受的商品，以便交換別人底生產品。可是因為人人都這樣活動着（即企圖獲得一些為任何人所願意收受的商品），久而久之，於是那個商品就被視為共同交換工具——貨幣了。

斯密所說「有理性的人」是指追求個人利益的人而言，他的一切活動，都跟那為這種個人利益所支配的各種要求相適合的。可是斯密底貨幣觀中，和他的別種觀念中一樣，却也包含着很大的理性成份。他不像別的貨幣論者那樣，把產生貨幣的原因歸之於所謂「集體的理性」，特別是歸之於國家；這當然對的。但是他認定促成貨幣發生之決定的作用是屬於許許多多個人活動底理知性。他

完全沒有注意到產生於生產底性質和予人類活動以一定的界限的那些經濟條件。他所指出的原因只是『每個人都企圖獲得一些爲任何人所願意收受的商品』。但是試問這是甚麼商品呢？爲甚麼人人願意收受它呢？斯密只告訴我們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物品當作此種商品：例如在古希臘，以牲畜（特別是牛）當作貨幣。但是爲什麼一定要牲畜當作貨幣呢？斯密對於這些重要的問題都迴避不談。

復次，這件人人願意拿自己的生產品跟它去交換的商品，因而亦即成爲人人企圖獲得的那個商品，從那裏發生的呢？斯密並沒有明白說出。但是這個商品既已從總的商品堆中被劃了出來，那末這就是說貨幣已經發生了。這樣看來，斯密事實上無異以貨幣爲產生貨幣的原因。而貨幣發生底根本原因，始終不曾被斯密注意到。斯密不能發見貨幣發生之眞實根源，主要的原因在於他沒有從商品底矛盾中去探求貨幣底根源，他不知道在跟偶然交換相適應的簡單價值形態中，已經潛在着貨幣底「胚胎」。斯密所看見的不是貨幣發生的過程而只是它的結果。斯密底研究，事實上開始於價值底共通形態（General form of value），這就是說，他的研究是從某一商品業已變成一般共通等量（General equivalent）而這一職能却尙未完全固定在此商品上的時候開始的；在那個時候，這一職能尙在那裏由一商品轉到另一商品，隨時發生變動，而不一定由某一特定的商品經常地担負這一職能，因而金屬品也就尙未成爲固定的共通等量。

使斯密不能理解貨幣產生之過程的，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他的理性主義：從交換發生之初，他就把它當作理性的行動看，可是事實上最初的交換却是帶着偶然性的。斯密底理性主義排除了偶然性，因此他的貨幣發生底自發觀並沒有貫澈到底，而且歸根結蒂還是以理性主義爲基礎的。可是事實上不論是交換本身或交換工具底確定，在最初都不是理性的行動，而是帶有偶然性的行動；到後

來某一特定的事物固定地成爲共通的等量，那還是生產條件和全部經濟組織所決定的。斯密氏所說「有理性的人底活動」實際上也決定於社會底生產條件。斯密底缺點，不在於他指出了這種理性活動，而在於他把這種活動當作出發點，當作基本原因看了。

斯密以「有理性的人」底活動爲產生貨幣之根源，這樣他從頭就限制了貨幣底意義：他只把它看作適當的交換工具。不知道而且也不會知道貨幣是那些隨交換和商品生產之發生和發展而發生發展的生產諸關係之表現形態。斯密只把貨幣當作「巨大的流通輪子，巨大的流通工具」（註）。同時，他也辨認不出金屬貨幣和紙幣底區別。他認爲紙幣比金幣好，因爲紙幣底消費省些。

假如貨幣果眞只是流通和商業底輪子，是以追求各自的利益爲目的的人類底理性活動之產物的話，那末第一，紙幣也能成爲這樣的輪子；第二，以紙幣代替金幣執行流通工具之職能，自然更爲合理，因爲紙幣比金幣便宜得多啊。在斯密那個時代，這種貨幣觀並不是新的或特創的。前幾章中已經提到，很多經濟思想者都把貨幣單單當作流通工具看的；不過斯密把這種貨幣觀連繫到他的一般觀念，連繫到他的分工觀，交換觀，尤其是他的經濟發展動力觀，經濟現象發生底自發性觀念上去了。

然而斯密跟他的前人們一樣，也竭力反對僞造鑄幣或劣質鑄幣。他主張只有國家有權鑄造，因爲只有它能嚴格地規定鑄幣底重量和成色。這一主張是跟他的貨幣論抵觸的，因爲既然貨幣祇是流通工具而且可以用紙符號來代替的，那末重量和成色足不足有什麼關係呢？但是斯密本人沒有覺察到這一矛盾，因爲他視貨幣爲流通工具，亦爲商品，說得確當些，他視貨幣爲執行流通工具之職能的商品。當作流通工具看時，貨幣固可用紙符號來代替；但當作商品看時，它却不應僞造，不應以

（註）前書卷二，頁二九五。

劣質冒充。

斯密在其關於貨幣發生之論述中，指示了貨幣卽商品這一點意思；而這個商品，由於它的特殊的自然性，使它成爲最適宜於做交換底工具，它本身還是從總的商品堆中被提劃出來的。但因他不了解商品、價值、價值形式之眞實的本性，他就不會了解：爲何這一商品從總商品堆中被提劃了出來之後，就具有一種新的質地？他不能了解這個商品跟一般的普通商品不同的本質——它是「一般的共通等量的商品」，是「價值底存在」（The Being of value）同時，他也不能了解流通工具底職能僅僅是被提劃出來的那個商品底新質地底表現形式之一。因爲不了解這些，所以斯密機械地（卽自外地）把流通工具底職能結合於諸種商品之一，他認爲這一職能也可以同樣機械地加到紙符號頭上去。

固然斯密也曾說到貨幣亦可當作價值尺度(Measure of Value)，又可當作支付工具(Means of Payment)，又可當作寶藏工具(Means of hoarding)，同時還可以當作世界貨幣(註)，但是因爲他不了解貨幣底本質，所以他不能了解這些貨幣底職能是這個本質底特殊的表現形式。而且實際上斯密還把上述諸種職能都看成流通工具這一職能底化身了。因此，凡是需要給貨幣以一個完整的估量時，斯密總常常依據貨幣爲交換工具，爲流通和商業底輪子這一界說作爲他的基本論點。

最後，必須指出，斯密實際上並沒有一個完整的，結構嚴密的貨幣論。他只是片斷地，無系統地分析到許多有關於貨幣問題的個別的原素。可是卽在分析這些原素，他也沒有從它們的內部聯繫上去考察它們。例如在第一卷中(第四章)，因爲考察分工和交換底發生，同時也就講到了貨幣底發生；而且這裏他把貨幣解作了普通的商品。在第二卷(第二章)中，則因考察資本周轉和分析資本底

各個部分而討論到貨幣問題；這裏所闡發的思想是說貨幣只是流通工具，紙幣是跟金幣完全一樣的貨幣。在第四卷中（第一章），當他批判到重商主義時，他重新又講到貨幣問題上來了；這裏重要的是在說明貨幣跟財富是不相同的。同時他又連帶地講到了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問題。

關於流通界內的貨幣數量問題，斯密底立場是跟休謨底「數量的貨幣論」相反的。斯密認定並非貨幣底數量決定商品價格，而是商品價格決定流通界所必需的貨幣量。他說商品流轉提出了對於貨幣的數量上一定的需求，而多餘的貨幣或是流往國外，或則變爲寶藏品，或則被溶化而製成各種的金屬品。所以，斯密雖猛力攻擊重商主義，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他却跟晚期重商主義者詹姆斯，斯都亞特持同一立場。

五　交換價值論

斯密從貨幣起源底研究轉到了商品交換價值底研究。他結束前一問題之研究時寫道：「這樣看來，在一切文明民族中，貨幣都變成公共的交易工具了；任何商品都靠它的幫助來賣買或互相交換。」（註一）

前面斯密所研究的是如何自然地發生分工、自然地發展交換和產生貨幣的問題，現在他要研究如何自然地發生交換，有那些法則決定着交換的問題了。斯密接着說：「現在我要來說明人們互相交換商品或以商品交換貨幣時所依據的那些法則。這些法則決定着所謂商品底相對價值或交換價值。」（註二）

（註一）見斯密著「國富論」頁三四。

（註二）同前。

在研究貨幣的時候，斯密並不注意到貨幣之爲價值底形式（價值底貨幣形式）這一事實；同樣的，研究商品底交換價值時，他也不注意到商品之爲勞動生產品底形式和交換價值（或價值）之爲商品底因素這兩點。他認爲它們只是自然現象；他只想說明決定諸商品互相交換，即決定它們的交換價值的那些法則（這些法則，他當然又認爲是自然的）。

照斯密底見解，甚麼是交換價值呢？

他回答道：「應當指明，價值這一個名辭具有兩種不同的意義：有時它解說爲某一事物底效用性，有時解說爲某事物之領有，即有獲得他種事物之可能性。前者可稱之爲使用價值 (usevalue)，後者則爲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註）。這樣，照斯密氏底意見，（一）商品底交換價值就是「獲得他種事物之可能性」，（二）此可能性產生於「某事物之領有」，這就是說，它產生於某種特權或權利，產生於一定事物之佔有。所以在斯密底理解中，交換價值不成爲商品底因素，同樣的，使用價值也不是商品底因素了。

斯密既不了解商品之爲勞動生產品之歷史的形式這一性質，他又不了解商品是對立底統一體，是互相排拒同時又互相維繫的兩個因素底統一體。他只指出了事物之直接的效用性和佔有此事物所給予的獲得他種事物之可能性中間的區別。這一區別他認爲就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區別。而且他又只見區別而看不見它們的統一性。

因爲他所留心的只是決定交換價值的一些法則，所以使用價值就完全被拋棄在他的注意範圍以外了，——它對於這些法則是不發生什麼影響的啊。他指示說：「具有極大使用價值的事物，往往

（註）「國富論」，頁三四。

只有很少的交換價值，或甚至完全沒有交換價值。反之，具有極大交換價值的事物，却往往只有很小的使用價值，或完全沒有使用價值。」(註)假如事物眞眞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話，試問那裏來的交換價值呢？這裏就由於斯密底唯理論（或理性主義）在作祟。斯密氏是用唯理論的觀點去解釋使用價值的：他認爲只有適合人類之自然要求的東西，才算是有用的；不適合的，便是無用的，亦即無使用價值的。他舉金鋼鑽爲例，認爲金鋼鑽是「幾乎沒有絲毫使用價值的」。他不知道人類底需求是產生於腸胃的也好，產生於好奇心或虛榮心的也好，其爲需要則一。金鋼鑽底需求雖產生於好奇心或虛榮心，它確是一樣地具有眞實的使用價值。

然而斯密所說，交換價值不依賴於使用價值這一論點，却是正確的。但因他只注意於交換價值，所以使用價值便被他棄置在道旁了。斯密底拋棄使用價值而注意交換價值，——這樣的分裂和隔絕這兩個構成商品的因素，是由於他不了解商品底本性：商品爲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對立體底統一和爲「資本制社會之經濟細胞底形式」。他不了解商品底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底統一中所包含的矛盾，是現代資本制社會一切矛盾底萌芽狀態。

現在讓我們回過來解釋斯密所說的「人們互相交換商品或以商品交換貨幣時所依據的那些法則」吧。斯密氏寫道：「爲說明決定商品之交換價值的諸基本法則起見，我想解答以下各點：第一，這種交換價值之眞實尺度是什麼，或一切商品之實在價格是什麼？第二，這種實在價格由那些部分所構成？第三，有時提高這種價格底某些部分或全部分在它的自然水平以上的，是那些原因；或那

(註)同前頁，三四——三五。

些原因有時阻止市場價格（即商品底實際價格）與自然價格之符合？」（註）

這樣，斯密底交換價值論底內容，可以分爲三部分：（一）決定商品之眞實價格；（二）這種眞實價格由那些部分所構成；（三）說明市場價格與眞實價格不符合之原因。我們來看，斯密氏怎樣解答這三個問題。

先從第一個問題說起。我們知道，在斯密以前（從威廉・彼梯起），就有人區別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而且認定自然價格是由勞動決定的。不過彼梯底重商主義立場不容許他從價格中抽出交換價值來，即從交換價值之貨幣的表現中抽出交換價值來。斯密才能從商品價格中抽出它們的交換價值，可是他的這一觀點是跟他一般的經濟思想，特別跟他的貨幣論（他一方面把貨幣只解作流通工具，另一方面則把它看成商品）聯結成一個系統的。根據他的貨幣論，不但有從價值抽取交換價值之必要，而且簡直就把價格看成交換價值了。假如照斯密底見解來說，貨幣是尋常的商品的話，那末「商——貨」和「貨——商」實際上祇是商品與商品底交換；這樣，賣買行爲和商品直接交換之間的差別就消失了。反之，把貨幣只解作流通工具，其所產生之結果亦如是。固然依據這一觀點，「商——貨」和「貨——商」隔離地觀察時，並不是商品與商品底交換行爲；因爲「商——貨」這一行爲只是表示用商品換得了流通工具（即獲得他種商品的手段），而在「貨——商」這一式子中則表示以已獲得的流通工具購買商品。然而在把貨幣只解作流通工具時，「商——貨」和「貨——商」這兩次動作底殊異性就消失了：在第一次動作中價值從商品的形式轉變爲貨幣的形式；在第二次動作中，則由貨幣的轉變爲商品的形式。全部的注意都祇集中在所獲得的結果上，——全部的轉

（註）斯密著：「國富論」一頁三四。

形(Metamorphose)結果仍歸結於「商——商」了。

這樣，斯密底貨幣論產生了：（一）每一賣買行為本身就是商品與商品底交換行為；或（二）全部轉形祇是商品與商品底交換。正因這樣，所以斯密有時稱交換價值為價格（自然價格），有時則相反，稱價格為交換價值。

假如彼梯因為被重商主義底觀念所支配而把交換價值只歸結於價格（以為商品底交換價格只是它的貨幣的等量，——一定的貨幣量），那末反對重商主義的斯密却相反，他把價格歸結於交換價値了（單把它看成普通的交換價值，而忽略了此價值之貨幣的表現底意義）。在彼梯底觀念中，假如交換價值不體現於金子或銀子的話，交換價值就根本不存在。斯密氏則完全忽視了這一體現形式底意義，以為商品價值之貨幣的表現（即價格），其意義也無非是商品與商品之直接交換而已。彼梯所探求的，是決定商品跟金或銀的關係的那些法則；而斯密則探求决定商品與商品之關係的諸法則。前者不了解，在貨幣上僅僅表現和實現着商品底價值；後者則不了解商品價值只能在貨幣上表現和實現出來。簡括地說，提到商品底交換價值時，彼梯把它了解為自然價格；斯密則提到商品底自然價格時，把它了解為交換價值了。

他二人均以勞動決定交換價值或自然價格，他們認為勞動便是決定數量關係的一個尺度：彼梯認為它是決定商品跟貨幣底數量關係的尺度，斯密則認是決定商品與商品之數量關係的尺度。這便是彼梯與斯密之間的繼承關係：勞動價值論底始基為彼梯所奠，斯密則繼續發揮之，把它跟他的別種理論聯繫起來，藉此企圖建設一個統一的體系。可是他雖繼續發展着勞動價值論，同時却又暴露着他的觀念模糊之處和他所無能解決的困難。

請看他在解說交換價值時所表現的模糊觀念吧。斯密先說，『每一個人底富或貧乃決定於他能支配的或他能購買的那些勞動量』；後又繼續說：『因此任何商品底價值，對於佔有此商品而不想利用它或自己消費它，而是準備拿去交換別種事物的那個人，等於他拿這商品所能購得的或所能獲得其支配權的那些勞動量。這樣看來，勞動便是一切商品底交換價值之眞實尺度了。』(註一)

在這段引文中，明白地指示着，斯密底意見以爲商品底交換價值乃由拿這商品所能買到的那個勞動量來決定。可是他接着又補充說：『任何物品底眞實價格，即每一物品對於願意得着它的那個人的眞實所值，便是爲獲得此物品所需要的勞動和精力。』(註二)這顯然是另一種意思了；即商品底交換價值乃由在獲得商品時所消費的勞動(和精力)來決定。這樣，斯密把拿商品去購得的勞動和在商品上消費的勞動混同起來了。

何以會發生這樣的模糊觀念，把所消費的勞動跟所購買的勞動混爲一談呢？

這是發生於斯密底全部觀念系統，首先就發生於他的分工論。照斯密底意見，社會是建立在分工上的集合體。在這個集合體中，各個成員都互相交換他們的勞動。他既不了解商品之爲勞動生產品之歷史地一定的社會形式這一性質，他因而把商品與商品底交換解作勞動與勞動底交換，這就是促成他的勞動價值論的根源：既然商品與商品底交換，其意義不外乎勞動與勞動底交換，那末這種交換當然跟所消費的勞動相適應了。但同時這又是促成他的以活的勞動與事物化的勞動(即勞動生產品)相混同的那種觀念的原因。在商品交換中，人與人底關係是在物與物底關係上表現出來，——這

(註一)斯密著：「國富論」頁三六。

(註二)同前

一點是斯密所完全不了解的。活的勞動跟事物化的勞動之混同爲一，使斯密不得不把所消費的勞動和所購買的勞動也混爲一談了。而這一混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又因勞動力(Labour-Power斯密亦稱之爲勞動)跟勞動生產品一樣地成爲商品這一事實而更形鞏固了。

現在我們要來考察斯密所提出的第二個任務(問題)，即解答商品底眞實價格由那些部分構成的問題。初看起來，這個問題底提出，似乎表示斯密已放棄了勞動價值論底立場。

實際上他並不曾放棄勞動價值論，不過因爲他混淆了不同的問題，致使他發揮出另一個不同的價值論來。這裏又暴露了斯密理論中的重大矛盾。他事實上混淆了商品底交換價值問題和分配問題，縱然表面上他始終在研究前一個問題。斯密底思想途徑如下：勞動(活的勞動)是跟勞動生產品一樣的商品。這一商品底特殊性，是斯密氏所不看見的。然而他畢竟還知道，僱用勞動底採取在被實現的商品交換價值底分配上引起了若干變化：這一價值已非全部留在商品生產者手裏，它應劃分爲若干部分了。而這幾部分商品價值，照斯密底意見，歸根結蒂就成爲各部分的社會收入(進益)。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商品交換價值已不表現在商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而表現着幾部分社會收入。

斯密把價值論問題跟分配問題混淆起來，歸根結蒂還是由於他不了解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力(或勞動力)。當他由商品交換底分析過渡到商品(資本)與勞動交換底分析時，他就開始碰着不可解決的矛盾了：假使商品底交換價值乃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所創造的話，那末他將如何解釋各個社會羣間之分配此價值呢？須知照斯密底見解，全部交換價值都應該爲工人所有的。這樣的分配，顯然是表示破壞勞動價值論了。於是斯密爲自圓其說計，不得不做出這樣一個結論來：價值律只支

配着「原始狀況」，即在資本和土地私有權尚未存在的那個時代。

這樣看來，我們知道斯密底總見解雖促使他主張勞動價值論，可是因爲他一般地不了解商品底性質，特別是不了解一種特殊商品——勞動力——底性質，同時又認定在一切交換中都是勞動和勞動底交換；這樣一來，他的價值論和分配論就衝突起來了。依照他的價值論來說，工人勞動底全部生產品（或全部交換價值）都應爲工人所有；可是依照他的分配論來說，工人却只應佔有他自己的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

照斯密底意見，分配律出現之後，價值律就被破壞了。自從資本和土地私有權出現（因而亦即分配律出現）以後，勞動時間即不復爲商品交換價值之內在的尺度，此時交換價值當由各部分收入來決定了。商品底交換價值決定於各部分的收入，這是一個新的理論，就是生產成本論(Theory of Cost of Production)。斯密本人也這樣稱呼它；他說明，在生產成本中包含着一切收入，資本上的利潤也在內(註)。與生產成本相適合的那個價格，他稱之爲自然價格，（即上述之「眞實價格」）而高於或低於此價格的價格，則稱爲市場價格或實際價格。這樣，斯密氏就解釋到他的價值論中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商品底自然價格市場價格底關係問題了。

由此可知，斯密底研究途徑如下：先由勞動到收入，然後再由收入到生產成本，在這條道路上，他的價值論根本改變了：從以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這一論點爲基礎的科學的價值論，一變而爲以生產成本決定價值的庸俗理論了。

六　國民收入分配論

（註）參閱「國富論」頁六二——頁六四。

前面已指出，照斯密底意見，商品底自然價格乃由諸種收入所組成的。斯密如何劃分這些收入呢？照他的意思，國民收入當劃分爲三大類：工資、利潤和地租。他稱這三種收入爲始源的或基本的，而其他的收入則是由此基本收入所產出的派生收入。上列三種基本收入便是形成商品價值的三大原素。換句話說，商品總是按照那保證這三種收入的自然價格而出賣的。

不言而喻的，在這樣的考察之下，就必然要發生一個問題：收入是什麼決定的呢？假使說收入是始源的（Primary），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基本原素，那末試問收入本身是什麼決定的呢？斯密把三種收入分別開來作單獨的研究。他首先研究工資，說明工資如何決定的問題。

甲　工資論

斯密氏有兩種工資論：一種是適用於原始社會的，另一種是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工資論。適用於原始社會的工資定義如下：「勞動生產品形成勞動底自然報償或它的工資」（註一）。自從資本和土地私有權發生以來，工資就祇佔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因爲其中須扣除一部分作爲利潤和地租了。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底情形，斯密說：「在工人和使用資本於產業的資本所有者是兩種不同的人的場合之下，吾人總以尋常的工資觀念去理解工資。」（註二）

在原始狀態的社會內，工資是完全不成爲問題的。因爲它就等於勞動生產品，所以它的大小便由後者底大小來決定。歸根結蒂地講，它還得賴勞動生產率來決定。一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工資立即成爲問題，因爲這時它祇是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了。問題是在：構成工資是那一部分勞動生產品？

（註一）同前，卷一，頁七二。

（註二）同前，頁七四。

它的大小如何？

可是斯密這兩種工資論中間却也有一個共同點：卽兩者均視工資爲勞動底報償，斯密在這個問題上的強點和弱點就都在這裏。強的方面在於他一開始就把工資跟別種收入劃分開來，指出它跟利潤，地租有區別，它是勞動底收入。斯密跟他的許多前人相反，他主張昂高的工資，因爲這是有利於大多數國民——勞動民衆的。斯密在工資問題上的弱點在於他不知道工資這一範疇底特殊性，不知道它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爲此生產方式之特徵。在考察交換價值時，斯密根本忽視了商品和價值底歷史性；同樣的，在這裏他又忽視了工資底歷史性。他把工資這一個歷史的範疇看成自然的範疇了。他只知道工資是工作者底勞動報償；這種報償採取什麼形式，——這他認爲是無關重要的。在他的觀念中所注意的只是量的方面：在資本和土地私有權發生以前，工資是勞動生產品底全部；以後，則僅僅是一部分。這樣，勞動報償之質的區別，他完全沒有覺察到。這便是他的工資論中的根本缺點。

斯密所將工資從歷史的範疇轉變爲自然的範疇，他這樣就把它從生產領域轉移到了分配領域之中。然而斯密所稱爲工資（或自然的勞動報償）的那個生產品，事實上確是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這又表明他的觀念與事實相背離。再則，僱用勞動者並不取回他自己的全部生產品。斯密對於這一點的解釋是說：從資本和土地私有權出現以後，工人底勞動生產品就必須經過特殊的分配，而這一分配底結果，工資只能等於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了。因此，吾人必須說明：工資是佔勞動生產品底那一部分？這是斯密氏工資論底一方面。

但是還有跟這方面並存的另一方面。工人和資本家中間的賣買，本來與商品底賣買相類似。而

照斯密底說法，則變成勞動是和一切其他商品一樣的商品。因此，勞動應該有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那末勞動底自然價格是什麽呢？斯密實際上却沒有解答這個問題。而「勞動底自然價格」或「勞動價值」這一概念，事實上却被他轉變爲勞力底價值了。

這樣，由於將工資與勞動生產品相等同，使斯密接觸到分配問題，但同時由於視勞動爲商品，又使他接觸到「勞動價值」底問題——與商品交換價値問題類同的問題。這兩條不同的思路，這兩個不同的出發點，使斯密底工資論成爲「二元」的、自相矛盾的理論。在「工資」這一名辭底使用上，也表現着這樣「二元性」：一方面他理解工資爲雇用工人底工錢，另一方面他却把工資解作一般勞動者底工作報償。當他講到各種職業中的工資不一樣的時候，他提到各種不同的勞動者來：短工，手藝匠，學徒，自由職業者（如律師、醫生者）甚至牧師。這樣看來，斯密觀念中的工資，實際上是指一般從事於體力或心力勞動和服務於任何職業的人底報償而言的。在考察各國工資水平之高低時，他也把工資了解爲一般勞動者底收入，——凡是不屬於利潤或地租的收入包括在內。

可是當他解釋爲何在富裕的國家中工資會增高這一點時，他却把工資了解爲雇用工人底收入，即眞正的工資了。斯密氏把國家分爲三大類：（一）富裕的，（二）貧乏的，和（三）處於停滯狀態中的。第一類國家底工資向上高漲；第二類的向下降跌；第三類則不動。這是由於國民財富運動中的變化引起了對雇用勞動的需求底變化。但是他不明白，國民財富底增長伴行着國民貧乏化底增長，更不明白這兩者是同一資本主義積累過程底兩方面。他只知道國富底增長引起工資底提高和大衆福祉底增進。這樣一來，他就顯明地變成資本主義制度底辯護人了。

復次，在斯密底工資論中，已經有了工資基金論底萌芽，他的論綱，工資隨國富之增長而增長

這個論綱，就是這一萌芽底表現；他認爲國富底增加就是工資基金底增加。他寫道：「很明顯的，對於勞工資生活的人底需求，只能按照那些被劃定作爲支付工資之用的基金底增加而有比例地增加起來……」（註）

依據同一論綱，又產生了斯密底人口論。他的人口論底基點是：國富增長引起工資和勞動大衆福祉底提高，而後者又引起勞動人口底繁殖。反之，國富衰落，則工資和民衆福祉降低，因而人口就減少下去。「因此，——斯密總結起來說，——高度的勞動報償既爲國富增長之結果，同時又是人口增長底原因。」（註一）人口底增長有賴於國富底增長，則後者當爲前者之界限。假使人口底增長超過了財富的增長，照斯密底解釋，就是超過了工資基金底增長，那時工人中間的競爭就促使工人收入底降低，因而又促成工人生殖底減少。斯密做出結論說：「這樣看來，對人的需求，和對一切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樣，必須支配着人底生產；當生產太慢的時候，它（對人的需求——沈）要加速它，生產太快的時候，便要阻止它。」（註二）

斯密底人口論跟他的別種理論一樣，但逃不掉一個根本缺陷：卽非歷史地解釋人口增減底法則；完全不了解資本主義之下的人口法則底特殊性。但他能將人口底生殖和對勞動的市場需求聯繫起來，這却也不能不算是他的一點功績。

乙 利潤論

（註）斯密著：「國富論」俄譯版，五七七。
（註一）同前書，頁八九
（註二）同前書，頁八八

斯密底工資論底「二元性」(或「兩重性」)連帶地造成了他的利潤論底「二元性」。以勞動生產品為自然的勞動報償——工資——的那個見解，使斯密走到了「利潤為自工人生產品中扣出的一部分」這個結論。斯密指出一切作坊和工場中的工人，大多數都需要一個東家；因為東家能供給他們工作底材料，預支給他們工資等等。東家既下了本，他就有權獲得他們的勞動生產品中的一份，這一份就是東家底利潤。斯密以工資為勞動底自然價格這一觀點，產生了他的自然利潤論。勞動底報償是自然的，資本底報償也一樣是自然的。

然在另一方面，斯密有時却把利潤看成生產成本底一部分。為了這一點，他提出了兩點理由來。第一，「假使投資者按照價格出賣商品而得不着在他的地方視為平常的利潤率的話，那末很明顯的，他就決不願做這樣的買賣了。事實上，他若把資本消費到別方面去，他就可穩得利潤的。」(註一)第二，「他的利潤，就是他的收入，他藉以獲得生活資料的那個真實基金。當他製造……商品的時候，他預支給工人以工資或工人底生活資料，同樣地他也對自己預支生活資料，後者尋常總適合着他在出賣商品時所能得到的那個利潤的。」(註二)這樣，他把利潤解釋成「預支給他自己的生活資料」，亦即生產成本之一部分了。

斯密把利潤解作勞動生產品之一份，事實上就等於把它解作剩餘價值；這一來，斯密比解剖資本主義社會之「生理」、揭露利潤之祕密這一工作上，確實做了一次極有意義的嘗試。在這點上，他比他的前人們也進了一大步。重農學派(和以前的彼梯)把地租看成剩餘勞動底產物；斯密則視

(註一)同前書，頁六二。

(註二)同前書，頁六二——六三。

利潤爲剩餘勞動，並以利潤爲剩餘價值底基本形態。這樣，他就大大地接近於資本主義現實之科學的理解了。固然，斯密還不知道從利潤中抽出地租來（地租亦爲利潤之一部分），他不知道地租是超額利潤底特殊形式。然而這並沒有減少他在建立科學的利潤論這工作中的意義。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指示出來的，就是斯密已知從利潤中抽出利息來，即把利息看成利潤底一部分，它是工商業資本家讓渡給放款資本家的一部分。因此斯密認定利率（rate of interest）底運動有賴於利潤率（rate of profit）底運動。

但是他的工資論告訴我們：勞動生產品爲自然的勞動報償——工資。這是他用理論的演繹法所得來的結論。而他的利潤論則確定利潤是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那末所謂自然的勞動報償事實上也只是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了。爲要說明這一點，他不得不採用描寫的歸納法（即所謂「常用法」exoteric method）——亦即擱開理論的分析而就現象底表面狀態來描寫了。於是他說工資是勞動底價格，利潤則是資本所產生的東西，是跟資本自然聯繫着的東西。

關於利潤率發展底傾向問題，斯密指出它是隨着工商業底發展而下降的。因爲工商業一發達（即國富增進），互相競爭的資本就多；資本既多，利潤率自然下降。而利潤率底下降立即要影響到利率底變動，使之隨着下降。因此，在斯密看來，利率或利潤率底下降是社會財富發達底徵象，同時又是工資和國民福祉提高底徵象。唯其如此，所以他讚揚低利率而反對利率底高漲。

此外，斯密還發揮了利潤平均化底見解。他認爲在勞動和資本能自由移動的條件之下，部門不同的資本必然產生相等的利潤率；在性質不同的諸種勞動間，同等勞動亦必然獲得同等報酬。他認定這種傾向是自然的。利潤率平均化和勞動報酬平均化底傾向底肯定，也是斯密理論上的貢獻之一。

斯密底地租論中的矛盾，比他的工資論和利潤論中的矛盾更大些。他的地租論也有兩個不同的出發點，因而有兩條不同的，自相矛盾的理論路線和兩個完全相反的結論。一條路線是以他的勞動價值論為出發點，另一條則以生產成本論為出發點。

關於從勞動價值論出發的那條路線，他寫道：「一旦土地變成了私有財產，土地所有者就要求從勞動者在這塊土地上所能生產的全部生產品中取得一份……。他的地租就是從耕種這塊土地時所消費的勞動的生產品中第一批被扣除的部分。」(註)這是斯密的第一種地租論；既斷定地租是剩餘生產品或剩餘勞動底特殊形態之一。這種理解當然是有科學價值的。

但是除這一種地租論以外，斯密還有一種以其生產成本論為根據的地租論。依照這種地租論，地租是利用土地之自然的報償，猶如利潤之為資本的自然報償，工資之為勞動的自然價格一樣。

這兩種地租論跟前面所述及的兩種工資論和利潤論完全相適應的：它們都是從兩種不同的觀念發生的。這兩種觀念可簡括地表達於以下二點：

(一)商品價值決定於它們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即是說，視勞動生產品為勞動之自然的報償，後者即是工資；利潤與地租俱為工人勞動生產品之一部分。

(二)商品價值決定於它們的生產成本：把生產成本劃分下列三種收入：工資、利潤、地租；把這些收入的每一種都看成自然的和尋常的(即習慣上的)。

第一種觀念是科學的，它是「解剖資本主義社會之生理」底一種嘗試。第二種觀念是庸俗的，

(註)同前書，頁七三。

它只限於社會表面現象底描寫。前者開拓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之路，後者則替以後的俗流經濟學說奠定了基礎。

復次，斯密的地租觀除上述兩種外，他還有一種新的見解。他看出農事中有好些個工業中所沒有的特點。首先，土地壟斷在一定的社會羣手裏，給予後者以一定的收入。收地租的地主完全不參加生產和流通。除此以外，他又和放款資本家不同，他不冒絲毫的險。照這些特點看來地租當然不能歸入生產成本費中去了。這樣就產生了第三種地租論，斯密寫道：「這樣說來，當作利用土地之報酬看的地租，自然而然地成為壟斷價格了。」(註一)他由此而得出一個完全合乎邏輯的結論來：「因此，地租之成為生產品價格底組成部分，其原因與工資和利潤不同。工資和資本利潤之高或低，乃生產品價格高或低之原因；但地租之大或小則為後者(即生產品價格之高或低——沈)之結果。」(註二)

這樣，根據斯密的第三種地租論，則地租為農產品壟斷價格之產物。這是跟前面兩種地租觀完全衝突的。假如地租是壟斷價格之產物的話，那末，第一，它發生於流通界中；第二，它是由農產品購買者所償付的。因此，它就非工人勞動生產品之一部或這種生產品的價值之一部(與第一種理論相衝突)，亦非商品自然價格之組成部分(與第二種觀點衝突)。

但是這還不算數。斯密還有第四種地租論呢。這第四種理論是帶着重農主義色彩的。斯密雖反對重農學說，自己却也逃避不掉一種幻想：以為在農業中，自然也參加生產的；或以為農業中的勞

(註一)同前書，頁一五九。

(註二)同前書，頁一六〇。

動比工業中更有生產性些（卽生產率更大些）。斯密寫道：「此外，在農村經濟中，自然條件也和人在共同工作的；雖然它底工作不需要任何消費，可是它底生產品却也和所值很貴的工人底生產品一樣地具有價值的。」（註一）斯密由此而做出以下一個結論：「可以把這種地租看成自然力量底產物，這種自然力量底利用權是地主拿出供給農作家的。地租之高低，有賴於此種力量之固有的大小，換句話說，有賴於固有的、自然的或人工創造的土地生產性（卽肥瘠程度——沈）。」（註二）

七　資本論

斯密對於資本的理解，正同他對利潤、地租等的理解一樣，完全不注意到它是一定的社會關係底物的表現。他不從資本中（正像他不從雇用勞動中一樣）去找尋資本主義關係底根源；他不了解在工資、利潤、地租等等上就表現着那些關係。他只把它們看作商品底交換價值之組成部分。

他觀念中的資本，不是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之物的表現，而祇是「國民財富」底決定要素——它賦予勞動以生產性而爲勞動之「發動機」。這裏，他把資本底意義列在勞動之前了，同時，他又把資本跟生產手段等同起來，以爲資本就是生產手段，生產手段就是資本。照他的意見，資本就是歸作繼續生產之用的積蓄起的勞動（Accumulated labour）。而積蓄起的勞動的具體形式，斯密認爲祇有生產手段，因爲這是過去的勞動底產物（註三）。所以他在資本問題上，確定自己的任務在於說明：（一）資本及其積蓄之作用，（二）資本之組成，（三）資本之各種形態及其不同的應用。

（註一）同前書，頁三七三。

（註二）同前書，頁三七八。

（註三）由於這樣的見解，所以他看不見貨幣之爲資本底貨幣形態，勞動力之爲生產底資本部分。

斯密底資本論，就適應着這三個任務而劃分爲以下的三個組成部分：（一）資本總論；（二）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論；（三）資本底各種形態及其不同的應用論。下面讓我們約略地分別闡述吧。

甲　資本總論

首先要指出，斯密底資本論實際上是積蓄論。他說在原始時代，人類直接從自然界取得食物，現取現吃，毫無積蓄可言。祇是隨着分工和交換底發達，才有積蓄出現。這時人們不單靠自己勞動底生產品，並且靠別人勞動底生產品來維持生產：用自己的勞動生產品去跟別人的勞動生產品相交換。因此，積蓄就成爲必要了。

斯密把積蓄分爲兩部分：一部分作爲直接消費之用，另一部分則爲繼續生產之用。後者能產生特殊的收入，它就是資本。這樣，斯密給資本下了兩重的定義：一方面資本是指定作爲繼續生產之用的那部分積蓄；另一方面資本是給予新收入或增加舊收入的一部分積蓄。

這裏要指出，作爲繼續生產之用的積蓄不一定能給予新收入的；反過來說，不作爲繼續生產之用的積蓄（如出租給人的房屋），有時反能夠給予新收入。這是一。其二，依據上列的定義——資本爲作爲繼續生產之用的財富積蓄，——則在這種積蓄爲直接生產者所有的時候，它們就已成爲資本了。可是根據「資本爲給予收入（利潤）之積蓄」這一定義，則財富積蓄之成爲資本，只有當它們爲非生產者所有並藉生產者以吸取進益的時候。

資本之是否爲直接生產者所有的積蓄，抑只是與直接生產者分離而爲非生產者所有的積蓄？——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可以決定資本之物質的組成。假如說，屬於直接生產者的積蓄就是資本，那末資本底物質成份只是由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勞動條件——簡言之，由生產手段——所構成的

那些財富積蓄。反之，假如資本只是與生產者分離而爲非生產者所有的積蓄，那末資本底物質成分除生產手段外還有雇用勞動者維持生活所必需的消費資料了。斯密雖亦承認雇用勞動者底消費是生產的，但他不知道這一承認就根本破壞了他自己的資本和積蓄論。因爲這裏斯密底劃分那作爲生產用的積蓄和作爲消費用的積蓄兩者之區別，已無存在的餘地；進一步說，資本和收入底區別也必歸消滅。於是斯密就不能不走到十分庸俗的結論上去：對於供給工人以消費資料的資本家，這些消費資料是資本，而對於工人則是收入！

斯密不知道劃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兩部分，這當然由於他缺乏剩餘價值論（他祇有化利潤爲剩餘勞動和剩餘價值的企圖）的緣故。因爲剩餘價值之變態形式的利潤，其所表現之現象爲全部資本之「產物」，利潤率就是利潤對全部資本之關係底表現。就現象上看，利潤是和資本底大小成正比例的。因此斯密很堅定地保持自己的立場說，資本底各部分都同程度地產生利潤。斯密所劃分的資本部分，祇是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兩部分；作爲工人消費資料的那部分資本，被斯密歸入流動資本中去了。

由於同樣的原因，斯密又不知道劃分、且不能劃分三種的資本形態：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因爲三種資本形態之區別在於它們各自在資本循環過程中（因而亦即在剩餘價值底再生產過程中）所演的作用：生產資本之作用爲生產剩餘價值，貨幣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生產的必要的物質前提，商品資本——實現已生產的剩餘價值；而斯密既無剩餘價值論，他自然沒有可能劃分諸資本形態之區別了。

最後，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就是斯密在資本底生產性問題底理解上，實比重農學派落後了一

大步。固然他反對重農學派之否認工業資本底生產性這一點是對的；但是他以爲商業資本也是生產利潤的資本，流通跟生產一樣的是利潤底泉源。這顯然表示斯密比重農學派落後的地方了。

乙　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

斯密確定資本之最主要的特徵是生產利潤。他並以此作爲劃分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根據。斯密給固定資本下定義道：「資本可使用於改良土地，購買有用的機器和工具或別種類似的事物，這些事物可以經過由一個所有者到別個所有者的讓渡，或不經過流通而產生收入或利潤的。這樣的資本，吾人就有權稱之爲固定資本。」（註一）流動資本是什麼呢？「它（資本——沈）可以用之於生產，用之於商品底改製或購買而以轉售與獲利爲目的，被人這樣去使用的資本，當它尙留在它的領主手裏或保持着它的固有形態的時候，它不給予其顧主以收入或利潤。……」（註二）

這樣看來，斯密認定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底區別僅僅在於它們產生收入（利潤）底方式上的區別：流動資本是藉流通，藉出一手過渡到另一手的運動而產生利潤；固定資本則無需參加流通而產生利潤。這裏顯然存在着一個極大的費解：既然固定資本不參加任何的流通，而利潤又說是從流通中吸取來的，那末試問它如何能給予利潤呢？斯密也彷彿自己感覺到自己的費解的模樣，於是他解釋道：「若不藉流動資本底幫助，任何固定資本都不能產生絲毫利潤。那怕最有用的機器和生產工具，要是沒有供給它們所改造的材料和使用它們的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那種流動資本的話，便

（註一）斯密著：「國富論」卷一，頁二八一。

（註二）同前書，頁二八〇——二八一。

什麼也生產不出來。」（註一）

所以在斯密看來，流動資本不但藉流通而「自行」產生利潤，而且還「幫助」固定資本產生利潤，因爲它既供給生產所需的原料，又供給工人生活所需的物品。

斯密將流動與固定兩種資本均分爲四部分積蓄。流動資本之四部分如下：（一）作爲流動資本一切部分之流通工具用的貨幣；（二）工商業家手中之糧食儲積；（三）原料和半製成品之儲積；（四）商店中、貨棧中所存之製成品儲積。固定資本亦分爲四部分如下：（一）機器及其他必需的勞動工具；（二）不作爲個人消費而以工商業之用途爲目的的房屋與其建築：店房，工場等等之建築；（三）以提高土地上之收入爲目的的一切土地改良，及除害，施肥，改良灌溉等等；（四）一切居民或社會成員之已獲得的和有用的能力。……

至於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底關係，那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一點（固定資本靠流動資本之助而產生利潤）外，還有以下的：「任何固定資本最初總發生於流動資本而且要求從這一泉源（指流動資本——沈）中得到經常的補充。一切有用的機器和生　工具，最初都發生於流動資本，後者供給它們所由製成的材料和製造它們的那些工人底生活資料。」（註二）

斯密因爲不了解資本爲社會關係之表現，不了解資本本身是一種運動，所以他不可能理解資本底結構，即一方面劃分資本爲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另一方面劃分爲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前一種劃分他完全沒有，後一種劃分則被解釋錯誤了。

（註一）同前書，頁二二五。

（註二）資本論　卷二，第十九章，第二節。

斯密認爲祇有流動資本在流通着（照斯密底解釋，資本流通就是它脫離它的主人之手的意思）：固定資本則永遠留在主人底所有權中。這樣的理解顯然是錯誤的。依照這樣的解釋，則資本底流通被簡化爲事物底運動，卽簡化爲一個技術的過程了。這是一。其二，它又被簡化爲所有權之由一主人之手讓渡到另一主人之手的法律上的讓渡行爲了。在這樣的了解之下，固定資本確實是不流通的了。然而我們知道，它底價值却是在流通着；斯密既不了解資本是一種運動，當然不會了解固定資本底流通了。它跟流動資本之不同點，僅僅在於它的價值是一部分地流通着（卽被轉移到新的生產品中去），而流動資本則經過一度生產之後，全部價值卽盡被轉移於新生產品中去。斯密既是用自然的和法律的觀點去理解流通，他當然看不見價值底運動，看不見價值形式底更替；這就是說，他不了解什麼是眞正的資本流通。

復次，斯密對於兩部分資本底構成原素的了解，也是很模糊的。首先要指出，他彷彿是根據這些原素底自然性而不根據它們在資本循環（Circulation or rotation of capital）中的職能來確定上述兩部分資本之含義似的；要不然他爲什麼斷言有用的機器、工具、房屋等常常是固定資本呢？實際上只有當這些東西處於生產階段時，卽它們作爲生產手段用時，它們才成爲固定資本——生產資本底一部分；處在流通階段上時，它們祇是商品資本。

其次，斯密沒有把勞動力本身歸入資本底範疇中去。這是自然的，因爲在他看來勞動力並不是「積蓄起來的積蓄」，它當然不能成爲資本。可以成爲資本的，祇是工人底積蓄起來的知識技巧。然而我們知道，實際上勞動力一與資本交換之後，就變成生產資本底一部分了。斯密固不認勞動力爲資本，所以他把工人底生活資料歸入流動資本之內。但是實際上工人底生活資料並不屬於生產資

本，因而它也就不是流動資本。因爲工人底生活資料並非由資本家買去給養工人，而是工人自己從資本家那裏去購買的。因此這些資料，當它們留在資本家手裏的時候，它們只是商品資本；在「商——流」，這個階段上它們乃轉變爲貨幣形態。

對於流動資本底其他諸原素，斯密底了解也同樣地不確當。例如他以爲凡是操在商人或工業家手裏的糧食，原料，半製造品以及儲藏在貨棧裏的商品，一概都是流動資本，這種觀念是十分糊塗的。同樣，把投於土地的流動資本，也是他不理解資本之形態之劃分的緣故。

丙　資本底應用

上面說過，斯密對於商業資本本質的了解，比重農學派還落後一步，因爲他認爲商業資本是跟工業資本一樣地產生利潤的。這裏我們就要把斯密所寫述的各種資本底應用（用途）提出來簡單地評述一下。

斯密寫道：「資本可由四種方式來消費：第一、消費於原料品底獲得，這種原料是社會每年所要消費的；第二、消費於這類原料的製造和改製，俾作爲直接利用和消費之用；第三、消費於原料品或製成品之由有多餘的地方輸送到缺少它們的地方去；第四、消費於各種生產品之分爲小件（按即包裝，分類等等上之費用——沈）以適應消費者之需要。依第一種方式消費的是一切從事土地改良或耕作的人，開礦或從事漁業的人底資本；依第二種方式消費的是一切產業家底資本——消費在工場裏的；依第三種方式的是一切批發商人底資本；依第四種方式的則是一切零售商人底資本。」（註一）

（註）斯密：「國富論」一卷，第二編，頁三六九。

這裏斯密把批發商和零售商都看成單獨的、跟他種企業並立的平等的資本底應用方式，這就表示他以爲商業是和工業一樣地有生產性的。雖然斯密十分激烈地批判了重商主義，可是由於他不了解生產和流通底一致（以生產爲基源的），他就不能完全克服重商主義：承認商業有生產性，仍脫不了重商主義的臭味。

講到農業中資本底應用時，斯密又發出了一些重農主義的臭味。由於不了解商品爲使用價值和價值之對立底統一體，斯密把農業底生產性估量太高了。他形式上雖區別使用價值和價值，事實上却把它們混淆起來了。他說：「沒有一種資本運用生產的勞動有像農業中的資本所運用的那樣多。因爲這裏不但農業雇工而且還有耕畜，都是生產的勞動者。此外，在農業中，自然條件也在與人共同工作；大自然底生產品亦具有一定的價值，正和價值昂貴的工人底生產品一樣。……因此參加農業生產的工人和工作的牲畜，不但再生產那個等於他們消費或等於資本價值的價值（包含資本家的利潤在內），……而且還生產了更大的價值。在農業家底資本和他的全部利潤以上，他們還經常地再生產土地所有者底地租。」（註）

這裏，除了重農主義的臭味外，還充分地表現着庸俗氣味；說什麼自然和工作的牲畜跟人一樣地生產價值！他的理論簡括起來說是：因爲農業中生產的勞動量（注意：包括自然和牲畜底勞力在內！）比任何部門大得多，所以農業中所生產的使用價值也比別的部門大得多，因而交換價值也大得多，其中一部分就作爲地租交給地主了。由此得出結論來：投於農業中的資本，其生產性爲最大；「這是現存一切資本應用方式中最有利於社會的一種」。

（註）同前書，頁三六九。

第二節　達徵・李嘉圖

一　李嘉圖底時代背景

亞丹・斯密之直接的繼承人達徵・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是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發展底最高峯；也可以說，是這派政治經濟學底完成者。在討論李嘉圖學說本身以前，照例先得把李氏底時代條件——經濟、政治、社會諸條件——提出來作一番概略的考察。

李嘉圖底時代，包括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這是一個極顯赫的歷史時代。在這時代內，發生過許多決定歷史發展的重大事件：如美國的工業革命，法蘭西大革命，以後拿破崙的反甲可賓戰爭，英國底大陸封鎖以及由這些大事變所派生的許多別的事件。

假使亞丹・斯密底時代還是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制過渡到機器生產制的時代，那末李嘉圖底時代，便是這一過程底完成時代，而完成這一過程（過渡的過程）的，不是別的，正是英國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完成之日，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勝之時。

講到工業革命本身，它最初發生於紡紗工業，就是一七六四年詹姆斯・哈格里斯所發明的多軸紡紗機（Jenny）。紡紗技術底革新很快地引起了織布機底改革。紡織工業革命底完成，其他重工業部門和運輸事業底技術也都隨之而很快地革新。至一七八一年瓦特（Watt）底革新的蒸汽發動機（瓦特最初發明的蒸汽機是抽水機，在一七六九年），徹底地改變了一切工業部門底發動力技術。這樣，生產工作底動力，乃由人和動物底力量（甚至還有自然底力量——如風和水）過渡到蒸汽底力量了。其所以發生這個轉變，當然還是由於勞動工具之由手工的過渡到自動的（Automatic）

緣故。再則，新的發動力底出現又有可能把個別的工作機轉變爲整個機器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原素。一個發動機能同時轉動許多的工作機。發動機不斷地發展，它所能同時轉動的工作機數量，卻隨之而增加，而同時傳達機也就跟着發展成爲一個複雜的機體了。

這樣，從技術方面講，工業革命底實質就是發明自動機以代替人工，但同時這種自動機又須受人底管理和操縱。可見技術是跟經濟分不開的；技術底內容、它的運動法則是決定於經濟的。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機器只是「剩餘價値底生產手段」而已。所以工業的技術革命底完成，就經濟的意義言，便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完全勝利。

隨着技術革命底發展，新的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就逐漸地建立和普及起來。資本主義工廠制底特點在於這裏生產的勞動者變成客體，而生產工具——機器倒變成主體：前者爲後者所支配了。

同時，工人底成份也改變了。機器的生產，使大量地採用女工和童工這回事，在技術上成爲可能，而在經濟上成爲必然。採用婦女和兒童勞動之技術的可能性，發生於新式自動機底設置，使勞動者底工作的動作大大地簡單化，而他們的熟練的技巧幾乎變成不重要的了。而且，在機器生產底條件之下，一切繁重的工作大都由機器來担任，於是工人體力底需要也大大地減少了。因此，體力薄弱而無甚熟練程度的婦女和兒童，也可充當工廠工人了。至於採用女工和童工之經濟的必然性，則由於工業革命大大地惡化了勞動大衆底境況，以致工人家庭中家長一人所得的工資不足以維持全家底生活。這就迫使他們的妻子兒女也不得不來從事生產工作。

從另一方面講，女工和童工底採用，反過來又更加惡化工人羣底生活：勞動底報酬不斷地降低下去。由於勞動市場上競爭底激化，工資逐漸降到勞動力價値以下去了。

不但這樣，勞工羣生活境況底惡化，又因工業革命所引起的勞動強度和長度底增進而更甚。機器底改進不讓工人在全部工作時間內有片刻休止或鬆懈的機會。資本家就藉此種靈敏的機器底幫助以增加剩餘價值底生產。不但如此，資本家爲了這個目的，還要把勞動日延長到最大限度以上，以增加所謂絕對的剩餘價值。這種延長勞動日的榨取方法，在李嘉圖底時代是比較很流行的。此外，工人大衆境況底惡化，由資本主義的機器生產所促成的，還有龐大的產業後備軍底形成和擴大。

但這對於資本家，却有極大的利益：在工廠制度之下，資本家底財富積蓄隨着人民大衆底貧乏化而不斷地，加速地增長起來。資本主義運動法則底特點就在於資本底積蓄是藉大衆底貧乏化，而不能不藉大衆底貧乏化以實現的。所以工業革命造成了這樣的局面：在一個極端上是財富底激增；在另一極端上則爲貧乏底擴大。這種貧富懸殊的形勢在工業革命底過程中就已暴露出來。

此外還有一點要指出，卽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工業在世界市場上已經佔有統治的地位。工業革命把英國轉變爲「世界底工廠」了。

工業革命底完成和資本主義底勝利的發展，不能不引起社會結構底重大變動。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三個社會羣，當然在工業革命以前已經存在的。可是工業革命却把這三個社會羣底特點都表現得很明顯了。

英國的社會已接近於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了：由勞工羣、資本家和地主三大社會羣所組成的社會。中間階層被逐漸淘汰了；它們的經濟基礎被摧毀了。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說過，斯密對於僱用工人和小商品生產者底區別，還沒有明確的理解：他往往把二者歸人「勞動者」這一集團中去。可是李嘉圖對於僱用工人這一特定的社會羣已經有了明確的理解：在他的觀念中，「勞動者」這一廣

泛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事實上確實如此：在工業革命以後，僱用勞動者、資本家和地主確已明白地成爲英國社會底三種基本人物型了。

英國的工業資產者羣已經充分成長和強大，他們不但不再懼怕自由競爭，而且認定自由競爭爲奪取和擴大世界市場的唯一手段了。爲着在外國市場上可以自由出賣本國的商品，他們不得不讓外國商人有自由走入英國市場去的機會。並讓外國的英貨購買者能有所出賣，能擴張他們的生產。因此當時英國的資產者就力主糧食（麵麥）底自由輸入，並竭力抨擊麵麥底入口稅。一八二二年，孟却斯特商會在其向國會的呈請書中寫道：「若不廢除麵麥底入口稅，工廠企業底崩潰是不可避免的；惟有廣大地實施自由貿易底原則，英國工業底繼續發展和國家底安寧，才能得到保障。」（註）倫敦商人也提過類似的呈請書，他們不單要求麵麥貿易底自由，而是要求全盤的貿易自由。很明顯地，這全是因爲英國這時經濟上已有充分的力量，自由貿易對於它是比壟斷更有利益的。

在統治者營壘中，政治鬥爭底「題目」是爲了改變憲法、主要的是改變選舉權。舊憲法在當時已不適應於英國的經濟。就選舉法言，一些「破爛的地區」可以派兩個代表到國會裏去，而很多新興的工業中心却一個代表不能派到那邊去。僅就這一端說，已可明瞭舊憲法之如何不適應新興資產者羣底利益了。除了憲法問題外，統治羣內部政爭底主題，還有如麵麥法問題和自由貿易問題等。

當時關於這些問題的紛爭，是在自由主義，甚至急進主義底旗幟之下進行的。資產者羣提拔出了好些個思想家和理論家——李嘉圖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們把資本家底要求理論化起來，並創造出一些普遍的原則來，作爲資產者實踐底理論基礎。在急進的知識分子中，負有特殊盛名的哲學

（註）參閱羅森貝格著：「政治經濟學史」上冊，頁二三五。

又[illegible]當時流行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哲學底創導人邊沁（Bentham,1748—1832），照邊沁底哲學，[illegible]各個人[illegible]總和；各個人各自追求着自己的利益，他們各個人利益之總和便形成公衆的幸福[illegible]，並且解釋爲最大多數人底最大幸運。在政治方面，他就以此原則爲根據，主張自由，平等和博愛；在經濟方面則主張無限制的自由競爭。他並主張應把後者應用到勞動[illegible]市場上，應當有自由競爭底原則。

二 勞動價值論

丁 勞動時間決定價值

李嘉圖完全接受了斯密對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表面的劃分。但他開首批判斯密底混合所消費的勞動與所購買的勞動這一見地。關於這一點，李氏寫道：

「亞丹，斯密雖說那樣正確地規定了交換價值底根本泉源，然而他是不徹底的。他沒有嚴格地堅持物品價值底增減有賴於它們當中所消費的勞動底增減這一原則，而另外又提出了一個單位——價值度量——來，說物品之值多或值少須視它們所交換的這個單位——度量——數量底大或小。有時他拿麵包底度量作爲這種單位，有時則拿勞動作爲這種單位，但不是某一物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量，而是用這一物品在市場上所能購買到的那許多勞動量；彷彿這是一件事情，彷彿當工人底勞動生產率增加一倍，因而它能生產多一倍的商品的時候，工人就必能獲得比以前多一倍的勞動報酬似的。」（註）

李嘉圖自己確實十嚴格地堅持物品價值底增減有賴於它們當中所消費的勞動底增減這一原則——

（註）李嘉圖著「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俄譯本，頁三。以下仿此。

。由此他得出結論道：『假如商品底交換價值決定於它們當中所包藏的勞動量的，那末這種量底任何增加，自必增加商品底價值；任何減少，亦必減低商品底價值。』（註一）換句話說，他確定了這樣一條價值律：商品底交換價值與商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量成正比例，而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例。

這一法則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有效的。而且李嘉圖還拋棄了所謂社會底原始狀態與現代社會之斯密式的劃分。但是他拋棄這種劃分所根據的論據，却是他的方法論所特具的。他寫道：『即使在斯密所說的那種社會底原始狀態中，獵人對於他自己的行業亦需要一點資本，固然後者是他自己所創造和積累起來的。沒有某種武器，就殺不了狸，也打不了鹿；因此這些野獸底價值不祇決定於打殺它們時所必需的時間和勞動，亦且決定於供給獵人所必需的資本——武器——所消費的時間和勞動……。』（註二）

將資本與生產手段相等同，李嘉圖已經達到所謂邏輯的終點了。雖然亞丹，斯密也將兩者等同起來，但是他畢竟還不曾把原始社會獵人用以打擊野獸的那塊石頭或木棍看做資本；而李嘉圖却竟這樣斷定了。斯密底現實感覺歸根究竟超過邏輯以上，他最後只得妥協了：照他的意見，資本只存在於現代社會中，在社會底原始狀態中並無資本。李嘉圖則將邏輯置於現實感覺以上，——既然資本與生產手段相同，那末凡是有生產手段的地方，就都有資本了。

現實底感覺迫使斯密斷言價值律在現代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不能跟在原始社會中一樣的；但接着

（註一）同前書，頁三。

（註二）同前書，頁九——十。

他又發揮道，從資本和私有財產權出現以來，價值已不復為勞動時間所決定，而為收入所決定了。李嘉圖只知一貫地遵照他的鐵的邏輯去推論，他得出結論道，價值律底作用從前和現在永遠是一樣的。這自然是錯誤的。可是他却有比斯密正確的地方：他肯定說，在現代社會中價值還是（而且祇是）由勞動決定的。此外，他在價值論中還加添了一個極重要的元素進去，這個元素就是：商品底價值不祇為直接消費在該商品生產上的勞動所決定，而且還有賴於生產手段上所消費的勞動。他並且把這一見解發揮起來。他認為勞動工具有主要的和次要的；主要的工具價值既大，效用亦經久；因此，這部分勞動工具把較大的價值轉移到新的生產品上去，另一部分價值小而效用期短的勞動工具，則只能轉移較小的價值到新生產品上去。

在李嘉圖批評斯密時，他說明商品價值之劃分為工資和利潤（當資本和勞動屬於不同的人的時候）仍不變更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這一法則。照李氏底意見，價值是基源因素，收入是派生因素；價值可劃分為各種收入，而並非價值由收入所形成的。

乙 價值與交換價值

李嘉圖不曾區別價值與交換價值：他平常往往把它們當作同一範疇去使用。但是他又常常用「相對價值」，「比較價值」這類術語。因而有些經濟學者以為李嘉圖只承認相對價值，而不知道有絕對價值。這是不對的。李嘉圖所說的「實在價值」便是指一定的勞動時間底表現而言。而他的「相對價值」才是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時間在別的商品底使用價值上的表現。所以李嘉圖並非不承認有所謂絕對價值(即由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本身)和相對價值（即交換價值——一商品價值之表現於另一商品者）。問題並不在他承認不承認，而在他不知道劃分兩者底區別，他把它們合併為一了。

其所以不作這樣的區別，原因是在他祇注意於價值底量的方面，而忽略了它的質的方面。

李嘉圖認定政治經濟學底研究任務只是量的分析而非質的。而根據量的分析底觀點，價值和交換價值底區別就失去其重要性了。相對價值底意思：第一、是表示價值底大小，這與一般地成為價值這一質（The Quality of being Value in general）不相同。因此後者也不是什麽絕對的東西了。第二、它表示在別種商品底使用價值上所表現的商品價值。這祇是商品價值底相對的表現，即對於表現它的那個商品而言的。一磅咖啡底價值祇是相對地表現於五磅茶葉；為要絕對地表現商品底價值，甚至取相對的形式，即不表現於勞動時間而表現於它對別種商品的關係，——它就得在跟一切其他商品作無窮次的比較中表現出來。

李嘉圖正確地了解，價值底大小（量）並不直接地表現於勞動時間，因而他不知道把為勞動時間之表現的商品價值和這價值在別的商品上的表現二者區別開來。由於李嘉圖只注意於量的分析，所以他始終看不出這種區別。

丙　價值與勞動

李嘉圖既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絕對化，視之為自然的和永久的生產方式，他便和他的前人們一樣，也不研究為何所消費的勞動要採取價值底形式這一問題，並且他也不能提出這個問題來。所以他雖然把一切勞動形態都簡化為量的表現——勞動時間，可是他沒有看出，而且也不能看出那「包含於商品中的勞動底兩重性，」這正與他看不見商品之為價值與交換價值之統一體是一樣的。

和亞丹，斯密一樣，李嘉圖也知道有單純勞動和複雜勞動；但是他認為這仍不改變按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這一法則。他寫道：「可是假使我認為勞動是一切價值底基礎，而它的相對數量差不多單

獨地決定着商品底相對價値的話，那末這還不能說我忽略了勞動之質的區別和一個工業部門的勞動時數或日數跟別個部門裏的同樣時間的勞動之比較底困難。質地不同的勞動底估計是在市場上很快地、對於一切實用的目的已夠充分精確地規定下來的，而大半還得依賴工人底比較技巧和他所担任的勞動底緊張性。」（註一）

李嘉圖也知道必要勞動這一概念。雖然對於這個問題他並未特別提出來加以說明，可是他認爲這是不言而喩，無須解釋的。這裏必須指明，李嘉圖雖有必要勞動底概念，但並無社會必要勞動底概念。依照他的純數量觀，這沒有原則性的意義的，也就是說，對於他的量的分析，他並不需要確定必要勞動就是社會的必要勞動。

然而，李嘉圖却持着另一個觀點。「一個一定的歷史的社會形態之社會生產關係體系底觀點」，是李嘉圖所缺少的。價値之爲具有歷史的規定性的範疇，其意義如何？——這是李嘉圖所不了解的。他祇曉得根據事實：價値底大小不決定於事實上所消費的勞動而決定於必要勞動。然則這事實背後所隱藏的是什麽呢？——這點他不研究。他的個人主義的、邊沁式的社會觀，——視社會爲許多個體底總和的那種社會觀，——也阻止他去研究這個問題。因此在他看來，社會勞動也不過是諸個人勞動之總和。然而實際上每一個人底勞動，並非綜合的社會勞動底一部分。

李嘉圖只知根據實際的情形，根據不按實際的而按必要的勞動消費計算商品底交換價値這種情形，這樣他實際上就犯了錯誤了：他按照在最壞的生產條件下的必要勞動去決定價値底大小了。依

（註一）李嘉圖著：政治經濟學之原理，頁八；這一段話差不多跟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論見，連字句上亦如出一轍。

照他的理論，商品價值底大小乃決定於在最劣的（而不是中等的）條件下生產某一商品所消費的勞動量。李氏底地租論亦即以此為根據。

丁　價值與生產價格

前面已提到過，李嘉圖認為價值和生產價格是直接相符合的二範疇。從價值到生產價格的中間圈環，李嘉圖沒有見到；他跳越了這些中間圈環（或階段）。市場價格，不論是原始狀態下的或現代社會中的，也在價值周圍擺動着；在他看來，價值就是生產價格。說得明確些，李氏雖使用生產價格這個名稱，事實上他並不了解這一範疇。

可是把價值和生產價格看成一體，他就替自己造成了自己所克服不了的困難。他不能解釋同等資本產生同等利潤這一情況。李嘉圖完全依據着他的勞動價值論而斷言道，工資底升和降引起利潤之相應的落和漲。但是在當作工資用的資本和投在生產手段上的資本之不同的比率，簡言之，在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s——李嘉圖不知道這個）之下和在不同資本之不同的流轉速度之下，為什麼工資之升或降不能引起利潤之相應的落或漲，——這一點李嘉圖就不能解釋了。因此，在工人多的部門裏，工資底增加理應比工人少的部門裏把利潤更降得低些。於是在商品平均按照價值出賣的原則之下，利潤率就不能一樣了。可是平均利潤率底存在却證明了商品並不按照價值出賣的。這裏李嘉圖就碰着了不可解決的困難，因為他一面斷定商品永遠按照價值出賣而同時又承認不同部門中的同等資本產生同等利潤的事實。雖然他宣佈平均價格（即生產價格）和價值底不符合是例外的場合（事實上這却是經常的場合），可是這仍不能解除上述的困難。

李嘉圖既將價值和生產價格等同起來，他不但不能解釋同等資本之利潤平均化的傾向，亦且不

能解釋平均利潤底形成。他既不明白價值轉變爲生產價格底過程，因而也就不了解剩餘價值轉變爲利潤和利潤轉變爲平均利潤底過程。他認定平均利潤是本來如此的：任何資本都產生平均利潤。他把商品價值分解爲平均利潤加工資，殊不知這裏所講的已非價值這範疇而是生產價格底範疇了。而且李氏把商品價值只分解爲V＋M，而丟掉了不變資本（C），這是重複了亞丹・斯密底錯誤。

將價值與生產價格看成一體，李嘉圖就沒有可能探究由利潤到平均利潤的轉變過程，而他既將平均利潤當作出發點而不當作結果看，這一來平均利潤就變成和勞動並列的獨立因素：而李嘉圖底勞動價值論，縱然比斯密的要進步而深刻些，而結果則仍不自免陷於破壞之悲局！

三　資本與利潤論

甲　關於資本的理解

對於資本的理解，李嘉圖跟斯密比較起來，沒有什麽很大的差別。所不同的祇是李嘉圖把資本解說得比斯密更絕對化了；他認爲原始漁獵時代的漁夫和獵人已經有了資本。他又和斯密一樣地只知道資本底一種劃分法：劃分爲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既不了解資本是一種運動，關於資本底形式他自然也不知道和不研究了。

雖然這樣，李嘉圖關於資本底作用，關於價值底形成過程的概念却比斯密明確得多。他肯定說，資本之參加商品生產，並不改變價值決定於勞動時間這一事實。價值仍由直接消費於某商品之生產的勞動，加上此商品生產時所消耗的那部分資本所包含的勞動來決定。這在勞動價值論底發展中，在對資本在價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的理解底發展中，是一個極大的進步；資本不創造新的價值，但是它的被消耗的一部分價值却被轉移到新生產品上去了。

但是這一正確的論點，——即資本不創造新價值而只是一部分價值被轉移到新生產品上去，——被李嘉圖不正確地利用了。因為他根據這一論點而斷定說原始社會和現代社會沒有任何的區別；這就是說，事實上他否認了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底生產區別。他忽略了下面這一點：「對於資本家，商品底所值是決定於資本底消耗；而商品底實際價值則由勞動底消耗所決定」（「資本論」卷三，第一章）。這一點既被他忽略了，所以他不能了解資本主義所生產的商品底價值要採取生產成本與利潤之和底形式，更不能了解它要採取生產價格（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底形式了。

這一個重要的關鍵，當李嘉圖把價值和生產價格等同起來的時候，就被他忽略過去了。因為他視資本為單祗轉移一部分價值於新生產品中去的事物（勞動工具），所以他不知道正是這一事物在遮蔽價值而強迫它採取另一種形式。這並不是幻覺而是一件為資本主義生產所規定的事實。

由於不了解資本底社會本質及其結構，就不會了解資本在形成價值表現形式中的作用，也不會了解勞動消耗為資本消耗所替代的過程。我們知道資本底消耗不祗遮蔽了勞動底消耗，而且它們還小於價值（由勞動消耗所決定的價值），「商品對於資本家的所值和商品生產本身底價值——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因為這樣，所以商品底出賣才有低於價值和高於生產成本的可能，亦即有低於價值出賣商品而獲得利潤的可能。

再進一步去分析資本時，我們發見：由於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由於不同的資本流轉速度，以及由於等量資本產生等量利潤，所以通常的情形總是一種商品常常高於價值出賣，另一種商品常常低於價值出賣；可是勞動價值律卻並不因此而遭破壞。李嘉圖沒有能夠分析到這一點，他於是陷於下列兩個絕端間而無以自解：（一）他的出發點是商品價值決定於直接消耗於此商品生產中的勞動

與被消耗的一部分資本中所包含的勞動之總和；（二）他的歸宿點却是將商品價值分解爲生產成本（而且他爲簡便計而把生產成本簡化爲工資了）和平均利潤（average profit）兩部分了。李嘉圖沒有能夠把這兩個極端聯繫起來，這正是他的經濟學說（特別是他的價值論）底一個最重大的缺點。

關於資本底劃分，他跟斯密一樣，也只知道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這兩部分。我們知道，斯密有兩個不同的資本定義：一個定義說資本是被劃定作爲繼續生產之用的一部分積蓄；另一定義說資本是產生利潤的那部分積蓄。李嘉圖更澈底地堅持着前一定義。依照他的見解，資本是在生產手段中所積蓄的勞動，因此，在給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下定義時，他不根據某部分資本怎樣產生利潤（像斯密那樣），而根據各部分資本底久長程度來確定它們的界說。李嘉圖總結他的意見道：『視資本之是否很快地消耗和經常地需要恢復，抑或很慢地消耗，就斷定它是流動資本或固定資本。』（註一）正因爲李嘉圖根據這種純相對性的標準去下定義，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要得出以下的結論來：『這種劃分（即劃分資本爲固定與流動兩部分）是不重要的，在這種劃分中，不能夠明確地劃分出界線來的。』（註二）

他祇將作爲給養工人用的那些費用（即工資）歸屬於流動資本。因此；事實上他把資本劃分爲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了。實在地說，依照他的價值論和利潤論，應當把資本作這樣的劃分。因爲他既然認爲在「現代社會」中，商品底價值也祇決定於勞動，而認定利潤祇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底一

（註一）李著：「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頁十五。

（註二）同前。

部分，那末他就自然而然地應當把資本劃分為償付勞動的一部分和作為購買生產手段之用的一部分。因為依照他的理論，只有前一部分資本在增長着，後一部分資本是不增長的，後者祇是局部地被轉移到新生產品上去。

然而李嘉圖却不曾作這樣的劃分，而祇在斯密底劃分之下添了一點他自己認為「不重要」的標誌。這位大經濟學家在這問題上持這樣奇特的觀點，除了他的眼光底狹窄性外，我們找不到旁的解釋了。李嘉圖只知道資本僅僅是靜止的事物（而不是運動，不是社會生產關係之物的表現），僅僅是勞動工具本身和作為給養工人之用的消費資料本身，因此他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這兩部分資本間之原則上的區別——當然不能把一種事物看作不變資本，而把另一種事物看作可變資本。因為當做事物看時，兩者底大小（量），不論在其物體本身上抑或在其價值上，都是不變的呀。但是我們知道，能自動增大其價值的，是以勞動力為體現的那部分資本（在資本家手裏，勞動力是生產資本底一部分，而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却不能成為這樣的資本）。然而李嘉圖却把與勞動交換的那部分資本看成工人們底消費資料本身，因而他當然不能把它看作可變的資本；因而他只能從它們生存底久長程度上去區別這兩部分資本了。

乙　盈餘價值與利潤

李嘉圖不曾給一個完全科學的利潤論和盈餘價值論，而且事實上他也不能做到這一步。可是他却把這個問題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他大大地發展了勞動價值論。

李嘉圖雖然沒有像斯密那樣明白地稱利潤為工人生產品中的一部分，然而他却認定利潤和工資是勞動所新創造的兩部分價值。因此他得出結論道，利潤或工資底變動可以不改變商品底價值，但

二者之一發生了變化，必然促使另一個發生相反的變化。所以李氏認爲工資底增加是利潤率下降底原因。可是李嘉圖却沒有給一個正確而完整的利潤論——即建立在價値律和盈餘價値律上的利潤論。他事實上把利潤看作了盈餘價値，雖然在理論上他並沒有提出將利潤歸化爲盈餘價値的任務來。他認爲決定利潤高度的原因是勞動生產率，並將利潤底增長直接歸因於勞動生產率底提高；這樣，李嘉圖事實上把利潤和盈餘價値等同起來了。

李嘉圖斷定工資底增或減是利潤率降或升底原因，——這一論斷就以利潤與盈餘價値之等同和利潤率與盈餘價値率之等同爲前提的。因爲這一論斷對於後者（盈餘價値率）是適用的，對於前者却不適用：工資一減少，盈餘價値率就提高，但是利潤率却不一定提高，假使同時增加了不變資本（因而亦即增加了全部資本）的話。實際上利潤率底高低有賴於兩個條件（兩個量）：一個是盈餘價値量（M），一個是資本底大小（K）；利潤率隨M之增而升，隨K之增而降。因此隨着資本主義之發展，利潤總有下降之傾向；那怕因加強榨取和縮減工資而M增加，可是由於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得更快，結果利潤率仍然下降了。李嘉圖以爲工資之增減與利潤率之大小成直接的反比例，——這種錯誤完全發生於他將利潤與盈餘價値等同之觀點。

可是在另一方面，李嘉圖又將利潤跟盈餘價値脫離開來。他只就利潤在表面上所呈現着的狀態去考察它，即只就與全部作用資本成定比的平均利潤去研究它。在李嘉圖底觀念中，平均利潤不是結果而是起點。他把它看作原來如此的東西，而只想說明它的變化法則。爲了要堅持勞動價値論底立場，李嘉圖不得不肯定利潤爲商品價値之一部分，是資本家不費分文而獲得的；這就是說，他將利潤歸化爲盈餘價値。而用盈餘價値律去解釋它。然而同時他却又不能抹煞一個事實：同等資本給

予同等利潤——平均利潤——的事實。

這樣，李嘉圖就碰到了他所不能解決的矛盾了。一方面利潤升降底原因在於勞動生產率，這就是說，利潤就是剩餘價值；可是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任何資本都產生平均利潤而與生產中使用多少勞動量無關。但在李嘉圖底觀念中，這個矛盾並不採取這麼一種形式存在着；他所感覺到的矛盾，在形式上還要模糊和繁複一點。他一方面確定工資高度底改變引起利潤相反的改變但可以不改變商品底價值；同時他又指出事實並不常常如此，在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之下，縱然在一切生產部門中工資均按同一百分數增減，亦必引起各部門生產品價值之不同的變化（注意：這裏李氏所說的生產品價值實際上是生產價格）。這麼一來，矛盾就比較前面我們所提出的模糊和繁複了。可是本質上却就是那個矛盾：由勞動量決定商品價值和按生產價格（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計算商品價值之矛盾。

四　分配論

甲　概述

李嘉圖全部學說之重心就是他的分配論。在分配論中，他研究到工資，利潤和地租間的關係。他跟斯密氏一樣，並不把這些範疇當作特殊的社會關係之形式看，這是他完全不注意的。他所注意的，一方面是它們的量的規定性，而另一方面（這對於他是特別重要的）則是它們中間的相互關係。

首先他確定工資是工人和他的家屬底生活資料（事實上即勞動力再生產底價值）；其次，他肯定利潤為商品價值超過工資之部分；而地租則因投資於優良的和中等的土地而獲得的超過工資與利潤之上的多餘部分。由此就得出以下幾點李嘉圖理論的結語來：（一）工資和利潤是互相對立的，

二者之一發生變化，就要引起另一個底相反的變化；（二）地租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內都不觸犯利潤和工資的（照李氏底見解，地租不是形成價格的因素）；（三）可是地租隨着社會底發展，隨着人口底增長而抬高起來，實際工資停滯着不變動，而利潤則隨之而下降。最後這一個論綱，既不直接產生於李嘉圖底價值論，亦不產生於他的利潤、工資和地租論，而是產生於一些跟他的基本理論相異的觀點的。茲特略述如下。

首先要指出，李嘉圖是馬爾薩斯底人口論和土地肥沃遞減律底擁護者；其次，他認為土地墾種之程序乃由優良的土地到劣質的土地；先種好土地，後種較劣的土地。他由此得出結論道，土地生產物底價值是永遠在增長着的，因為照李氏底意見，商品底價值乃決定於最惡劣的條件下所消費的勞動（就土地生產言，則決定於最劣的土地上所消費的農作勞動）；隨着人口底增加，耕種的土地愈擴大質愈劣，因之農產底價值就愈高漲。但是農產品底價值一高漲，工人底名義工資亦就隨之而高漲，然實際工資却無變化，因為李嘉圖認為工人底生活資料是永遠固定的。名義工資一增長，利潤就下跌了。

假使把馬爾薩斯底人口觀和他的土地肥沃遞減律底觀點丟開，同時又把他關於社會不斷地由好土地擴張到壞土地的那種觀念丟開，那末我們就發見李嘉圖底分配論中確有有價值的成分存在着。第一，他的分配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上的；第二，它揭露了勞動與資本底對立性；第三，他視地租（註）不僅為無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收入，而且簡直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收入。這幾點都是他的分配論中的科學要素，是對於以後政治經濟學底發展有着積極的意義。

（註）李嘉圖所談論的地租實際上祇是差額地租，他不承認絕對地租底存在。

然而他的分配論所根據的勞動價值論本身有着很多的缺點，因而它就不能成爲分配論底堅實基礎。而李氏價值論底所有缺點，正是在他的分配論上暴露得最爲顯著。同時，李嘉圖這裏又跳越了由價值到工資、利潤、地租的一些重要的環節。李氏事實上把工資等同於勞動力底價值了；而勞動力和勞動底區別他又劃分不出來，因此他就不知道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這商品底特殊性他自然也不會了解）底價值和使用價值之區別，也沒有而且不能對盈餘價值底生產加以分析。很明白的，在他的觀念中，工資也不是勞動力價值和價格之變形了。

李嘉圖極明確地判定了勞動與資本底對立，這當然是一點功績；可是他只把這一對立聯繫到分配上去，彷彿跟生產無關似的（而實際上這種對立底根源却存在於生產過程中），這就替以後那些將分配與生產脫離開來的俗流理論造成了某種「基礎」。

乙　利潤和利潤率

在李嘉圖底分配論中，他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底分配法則如下：隨着社會底發展，實際工資停滯不變，利潤下降，地租上漲。根據這一見地，他預斷社會（實際上祇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底發展是有一定限度的，因爲社會必須保證一定的利潤。很明顯的，這裏李氏又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社會一般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家，無意中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基本矛盾：社會生產與利潤率（私人佔有之尺度）之矛盾。李嘉圖所引爲不安的是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而他所得出來的結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必有一定的限度。然而實際上社會生產力底發展是無限度的，有限度的祇是資本主義社會底生產力。我們的結論是：正由於社會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利潤底佔有）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經濟形態才成爲歷史的，過渡性的。

前面已經說到，李嘉圖認定利潤率底下降乃由於土地生產品價值底增漲，而土地生產品價值底增漲，則由於人口底增加和耕種土地愈趨愈劣的必然性。李嘉圖甚至於不懷疑利潤率下降傾向底法則是決定於資本有機構成底提高；不變資本底增加和可變資本相對的減少必定要在利潤率下降上表現出來。

在李嘉圖看來，利潤率下降傾向底法則是一種自然的法則，因爲這一法則底前提是人口底增加和土地肥沃遞減律，李氏說：「這樣看來，利潤有下降底傾向，因爲隨着社會和財富底發展，所需要補充的食物量，祇有靠愈趨愈多的勞動消耗才能獲得。」李嘉圖始終不能理解利潤率下降傾向底法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特殊法則，它暴露了這一生產方式之歷史的過渡性。

李嘉圖因爲曲解了利潤率下降傾向底法則，所以他不能揭露這一法則之眞實本質：它是資本主義積累底總法則上所表現的那個事實底另一表現。這兩個法則上所表現的共同事實就是生產力底增長，亦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的勞動生產率底增進。一方面，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生產率底發展促成在一極端上財富大量的增長，在另一極端上大衆貧困底增長；另一方面，勞動生產率底發展則促成利潤率底下降（但絕非利潤量底下降）。前一場合，是表現資本主義積累底總法則，後一場合則表現利潤率下降傾向之法則。

李氏既不了解利潤率下降傾向律之本質，他當然就不能揭露這一法則底內部矛盾。他不能了解，那促成利潤率低落的原因本身，同時又引起了阻止利潤率下降的一些因素。勞動生產率底提高，加強了榨取，增加了絕對和相對的剩餘價值，——這些也就是阻止利潤率下降的諸因素。

李嘉圖底理論沒有能夠揭露出資本主義社會底基本盾矛來。固然他明確地指出了工資和利潤、

利潤和地租間的矛盾性（對立性），可是第一，他把這種對立性限制在分配領域以內；在發生一部分人佔有另一部分人底剩餘勞動的生產領域內，他却看不見這種對立性。第二，這是從第一點裏產生出來的，就是對於上述的對立性，他也未能徹底予以揭露。因爲工人與資本家這兩大社會羣底矛盾，決不能祇歸結於工資和利潤之對立。而且李嘉圖斷論道——隨着社會底發展，實際工資停滯無變動，而利潤則下降，——這麼說來，事實上已把上述的矛盾他爲烏有，而只有資本家是「可憐虫」了。固然，李嘉圖也承認實際工資跌落底事實，但是在他看來，這祇發生於名義工資底增漲尙未趕上生活資料價值增漲的時候，可是到最後工資底增漲終於要趕上生活資料之價値而與他相適應的。這樣說來，工資和利潤底對立是暫時的。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彷彿這種對立性不存在於支配工資和利潤的諸法則中，不存在於這些法則底實質中，而只存在於脫離這些法則的一些暫時的例外場合中。

同樣的，李氏對於利潤和地租底對立，亦作如是觀：彷彿這一對立性不存在於調節利潤和地租的那種法則中似的。固然地租底增加同時就跟着利潤底減少，但是前者却並不是後者底原因，實際上兩者都決定於一個原因，卽土地底耕種由較好的擴大到較壞的土地。我們還必須記住，差額地租（李嘉圖祇承認這一種地租）並非因土地私有權而發生的。李嘉圖底抹煞絕對地租及其作用，無異於替土地所有者羣遮蔽了他們促使物價騰貴和利潤下降的「罪孽」。李嘉圖說：「不是因爲要支付地租所以糧食昂貴，而是因爲糧食昂貴所以支付地租。因此，若說縱然地主放棄了全部地租，麵食價格也絲毫不會降跌的話，那是說得很公允的。」（註）在他看來，地主和工業資產者之矛盾，祇發生於經濟政策範圍內：卽當地主和土地經營者要求和實施對農產品的高度關稅，或擁護現存關稅

（註）見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頁三八。

而反對降低麵麥關稅或麵麥貿易自由的時候。這一說，地主與工業資產者底矛盾又不存在於經濟法則本身，而只存在於脫離這些法則的一些暫時的例外場合中了。

丙　工資律

李嘉圖底工資律，——他的分配論底組成部分之一，——把工人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改善自己境况的那種幻想，永遠剷除了。照李嘉圖底意見，爲提高工資而進行的運動，只能或者暫時提高一下，或者加速它的適應於已高漲的生活資料底價值。

可是照李嘉圖底工資論，他把工資看作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而認爲工資降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情形只是例外的場合；它保持着勞動力價值底水平，才是正當的場合。然而實際上我們知道不是那樣的；實際上工資是隨資本主義之發展而降低到這一水平之下的。

工資爲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的理論，在李嘉圖以前就有人發揮過：威廉，彼梯大體上就持這樣的觀點。斯密在這理論和供求論中間動搖着。李嘉圖則完全拋棄了一切動搖：他把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論跟他的全部思想聯繫起來，並徹底地打定了它的理論基礎。可是這一理論基礎底打定，就種下了他的最低限度生活資料論底根本病源。李嘉圖根據兩個腐朽的「定律」作爲出發點：一個是土地肥沃遞減律，又一個是馬爾薩斯底人口律。這便是上述理論底基礎（根據）。根據前一法則，他做出結論來說隨着社會底發展，農產品價值漲高了；根據後一法則，則謂實際工資不能提高到最低限度生活資料以上。假若果眞發生這樣的現象（卽工資超過最低限度生活資料以上），那末工人人口必因生活改善而增加，而人口增加底結果，自然而然地又促成工資底退落。

李嘉圖理論上的主要錯誤是在他忽略了工業勞動後備軍底存在，而這種勞動後備軍却是資本主

義發展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隨伴。勞動底供過於求不是因爲工人底生殖率超過了對工人的需要，而是因爲資本主義的積累日益擴大地製造着過剩的人口。工業勞動後備軍經常地打擊着工資，把它往下拉；甚至在市面繁榮和產業猛烈活躍的時候，這種後備軍雖然是減少了，可是它仍並未絕跡。當市場處於蕭條和沉悶狀態時（更不用說在經濟恐慌時期了），過剩的勞工人口就激烈地增加起來，同時加於工資的壓力也跟着增加起來。

這樣看來，工資底擺動不決定於勞工人口底自然增長；勞工人口是經常地過剩着，經常地存在着後備軍的，不過這種後備軍底狀況，則隨着工業發展底週期律而發生變動。假使由於某些原因而工資底增長「威脅」到資本積累時，試問資本家何必等待勞工人口之自然的增長和由此促成工資底低降呢？他們絕對不需要這樣等待，有一種實在的（而非幻想的）手段經常地在被他們使用：他們利用着技術的進步，或者採用新機器，或者改進舊工具。這一來就改變了資本底有機構成，即增加了不變資本，減少了可變資本；而同時對於勞動的需求也減少了。其結果是勞動底供給不但跟它的需求適合起來，而且還大大地超過需求了。

上述李嘉圖底理論，在方法論上是把工資律由一種歷史的法則轉變爲自然法則。他所以犯這樣的錯誤，第一是因爲他以爲社會在農產品底獲得中必須要消耗愈趨愈多的勞動；第二，他認爲人類固有着無限制繁殖的天性：他們的物質境況剛一改善，他們的人口又不可阻止地繁殖起來了。

李氏底見解以爲隨着資本積累而起的，不是勞工大衆境況底惡化而是它的改善，這一見解是跟他的另外兩種思想相關聯的。第一，他以爲全部追加資本都消費於工資，因而得出結論道：資本積累底增加引起勞動需求同等的增加。李嘉圖這一點見是承襲亞丹．斯密的，因爲後者認定一年生產

品底價值當只劃分為V＋M。第二，他確定說機器不排擠工人，確切一點說，它們縱然排擠工人，也只是暫時的。在一八二〇年以前，李嘉圖向來堅持着這樣的見解（他在國會裏發表演說時特別堅持這一見解），可是後來他自知錯誤，並且表現了他的公開承認錯誤的勇氣。在其「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第三十一章中（論機器的一章），李嘉圖寫道：「……我曾經持這樣的觀點，以為機器之應用於某一生產部門，因為它能節省勞動，所以對於一切人都是有利的，但是它伴行着這樣的困難；即在多數的場合內由資本與勞動之從一種行業流入另一種行業的移動所引起的那些困難。」（註）後來他察覺了這一觀點錯誤之後，他就做結論說：「勞工羣所持的意見，以為機器底使用往往使他們的利益蒙受極大的損失，這種意見並非基於偏見和謬誤，而是跟政治經濟學之正確的原則相適合的。」在他致麥克．庫羅赫的書函中，他表述這一結論的方式更為堅決而銳利。他寫道：「但是我曾說，握有流動資本的廠主能夠給更多的人以工作。假使拿同等價值的固定資本去代替這些流動資本在他是有利的話，那末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部分工人底被排除，因為固定資本不能給他所要代替的全部勞動以工作。我承認，這一眞理我覺得是跟任何幾何定理一樣正確的，而我這樣長久沒有察覺它，這我簡直頗為驚訝。」（註）

丁 地租論

李嘉圖底地租論（差額地租論）在當時是很聞名的。然而這一理論底眞正的首創人却是安德遜（Anderson）。李嘉圖底功勞只是在他最完滿地發揮了這一理論。他的地租論是他的勞動價值論底

（註）見李著：「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頁二九四（該書第一版中無此一章）。

（註）見「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頁三五三（附錄）。

完成。在土地經濟中，除工資和利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收入，——地租；這一事實，看起來彷彿把勞動價值論推翻了；可是李嘉圖却能很精敏地證明這事實不但不跟勞動價值論衝突，而且正應根據勞動價值論去解釋它。

李嘉圖底地租論包括下列四個論點：（一）不同的幾方土地，其肥沃程度互不一致，因而同等資本投入肥瘠不同的土地得到不同的結果；（二）土地生產品底價值是按照最劣等的土地上的生產品底價值來確定的；（三）其他任何一方比較好的土地，由於按照那塊最劣等的土地上的生產品價值所確定的普遍價值與較好的和最優等的土地上的生產品底個別價值間的差異，就能給與額外利潤；（四）這種利潤，由於農業家們互相競爭的結果，就全部落到土地所有人的荷包中去了。

上述四論點中，第一點只是指出了一件大衆知曉的事實：不同的土地上自然條件不相一致的事實。不過李嘉圖把這一事實跟與他的地租論完全不相干的一個錯誤觀點聯繫起來：彷彿社會在其歷史的發展中，是由較好的土地墾種到較劣的土地的。有了這一論見，他就予論敵們以攻擊他的地租論的機會。李氏底論敵們駁斥了他這一不正確的論見（社會必由好土地到壞土地而耕種），就造成人們這樣一種印象：彷彿他的地租論本身就此被推翻了。但是實際上社會怎樣由一塊土地耕種到另一塊的問題，對於李嘉圖底地租論是毫無關係的；重要的祇是因爲好土地不夠，於是不得不墾種其他的土地。

實際上這一點李嘉圖是很了解的，因爲他的地租論是用以反對重農學派和部分地反對亞丹·斯密的。那些人確定說地租是自然「富饒性」之產物——農業勞動之特殊的生產率。李嘉圖却提出了相反的論調來：地租是自然貧乏之結果——如土地不足之結果。但是他的基本缺點之一是他以社會由好土地墾種到壞土地這一論點當做社會發展底法則。

李嘉圖地租論中另一更重大的缺點是他把地租論跟土地肥沃遞減律聯繫起來：這一「法則」（卽土地肥沃遞減律）幾乎成爲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底「公理」了。那些經濟學者這樣解釋這一「法則」：假使同一土地上後幾次投資所獲得的結果跟前幾次投資底結果完全一樣的話，那末社會就沒有從較好的土地轉移到較劣的土地去墾種之必要。只要單單墾種優良的土地就夠，一切增長着的需求（不論由人口底增加所引起或由國民境況底改善所引起都無關），只要繼續不斷地投資於這些優良的土地就可以滿足了。由好土地底墾種轉移到壞土地，這就證明在好土地上的增補投資（卽以後幾次的投資）底功效不如壞土地上的頭幾次投資之大。這就是說，「土地肥沃遞減律」是存在的。假如沒有這一「法則」的話，土地生產品底社會價值就變成優良土地上的生產品價值了，因爲只要在這些土地上繼續多投幾次資，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獲得任何的生產量。這樣，「土地肥沃遞減律」就確定了劣等土地也須墾種的必然性，因而劣等土地上的生產成本就變成社會必需的生產成本了。

只要稍加思索卽知這種論調是無內容的抽象論調，它把最重要的東西拋棄了：技術底水平，生產力底發展狀況。就實質上說，所謂「增補的投資」和勞動，亦當以生產方法之改變，以技術條件之變化爲前提的。土地中投資大量的增加，必然要採用新的機器，實施新的農業制度，新的耕畜培養方法……等等。當然，比較少量的增補投資和勞動，也可以在現有的不變的技術水平之基礎上發生的：在這樣的場合，「土地肥沃遞減律」在某一限度內是適用的，卽是說，在不變的技術水平給予增補資本和勞動以極狹窄的限度這點涵意上是適用的。這樣，我們所見到的不是什麼萬般的（uni-versa）法則，而只是極其相對的法則（指土地肥沃遞減法則言）。

由此看來，「土地肥沃遞減律」並不適用於技術在進步、生產方法在改變的那些場合。它的適

用性是很相對的，很有條件的，卽只有在技術停滯着不變化的場合內是適用的。

最後我們要指出，「土地肥沃遞減律」是跟馬爾薩斯底人口「律」有密切聯繫的。說得更確實些，前者鞏固着後者，並且說明了後者：照馬爾薩斯底人口「律」說，食物底增加落後於人口底增加，因爲土地底肥沃程度在遞減着。這兩種「法則」底社會政治的意義是一樣的：卽將大衆貧乏化底責任諉諸自然，而不諉諸社會組織，不諉諸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第三節　約翰・密勒——古典學派之沒落

一、概論

約翰・斯都亞特・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古典學派沒落時代最後的一位代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原名全部爲：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1848 年版）便是結束古典學派的一部著作。約翰・密勒底全部學說，不論是哲學思想抑或經濟理論，都充滿着不可調解的矛盾。在這些矛盾上，反映着十九世紀中葉市民層本身立場底矛盾。

約翰・密勒在童年時代所受的經濟政治的自由主義思想，到十九世紀中葉已經陳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能爲全體社會謀福利的那種信條，已被資本主義經濟中日益劇烈的矛盾和社會內部的動盪所打破了。約翰・密勒親眼見到這些事實，並且熱烈地同情於愛爾蘭農民底處境，他又同情於勞工運動底成功。同時他很注意到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他拒絕了自己童年時代所走的市民層自由主義的思想道路。在晚年時代，他甚至漸漸傾向社會主義的思想。但是他的立場始終處於模稜兩可

的疑難中，滯留在從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半路上。

約翰・密勒不僅對亞丹、斯密底全民利益和諧論，甚至對李嘉圖底資本主義「能增加一切生產品總量，能擴展全民幸福」的說法，都不表示滿意。密勒指出資本主義雖能予生產力發展以強大的推動，但許多人不能從它當中獲得快樂。他說：「一切機械的發明能否減輕一人每日的勞動，至今還是一個疑問。機械給大多數人的，只是痛苦和生活自由底被剝奪，而為許多工廠主造福」。

受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之影響的約翰・密勒，就不怕提出「從根本上統盤籌劃」的問題，即以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之可能性的問題。密勒拋棄了以社會主義經濟為不可能的那種偏見。雖然，他却不曾堅決地主張社會主義；他只說最高的社會主義比之現狀下的私有財產制好些，而社會主義是否比經過深切的社會改良後的私有制好些？——這個問題他可就不能解答了。密勒自己坦白地承認：「較優良的私人經營與社會主義，究竟何者較優，何者最適宜於人類經濟發展之終極形式：這是我們完全不知道的」。他的主張是「在社會發展的現階段上，一切努力之主要目的，不在廢除私有制，而在改良私有制，使社會上每個分子都能享受他的利益」。他主張用社會改良的方法去改良下層大衆底生活境况：主張組織工人底生產組合及其他會社，限制財產承繼權，提高土地底錢糧。密勒又隨西斯蒙蒂之後，竭力擁護小農經濟，並主張把土地貴族所霸佔的土地，轉交給勞苦農民。他駁斥愛爾蘭底農民法律：反對英國在殖民地內的強暴行為；熱烈地袒護婦女底平權。密勒對於勞工運動之勝利，曾予以最大的同情。然而他同時却又害怕社會動盪之激化，且以「應憑理性做人」一語去告誡大衆。

這樣看來，在社會哲學領域內，密勒跟他父親（詹姆士密勒）底及其他自由主義者底觀念殊多

不同；前面已經指出，他站在由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半途中。密勒是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他曾提出了改造現代社會的問題，可是他的社會主義思想，跟一切初期社會主義的思想一樣，也是烏托邦的。他憑空想出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這制度內部是最完善的，所以應當努力實現之。約翰·密勒雖然接受了康德底人類社會之史的發展的觀念，可是他却不曾把社會主義理解為人類社會發展之必然的階段。在密勒看來，問題不在社會主義之是否必然，而在吾人之是否願意與是否能夠實現它。

二、密勒底生產與分配觀

站在這樣的立場，所以他反對古典學派之自然主義的經濟法則永久不變的觀點。因為假如遵照古典學派底見解，說經濟領域是受永久不變的自然法則所支配的話，那末社會主義制度底實現，根本的社會改革底實施，就成為完全不可能的事了。為貫澈他自己的主張計，他不得不拒絕古典學派底這種經濟法則觀。可是在這裏，他又半途而止了。他並且得出了這樣一個奇異的結論來：把經濟規律劃分為兩種——生產律和分配律，照密勒底意見，生產底條件和規律，頗接近於自然科學之真理，它完全不受我人意志之支配，而我們對它，亦不能有任何意志底表現。關於財富底分配，在密勒看來，情形却完全不同。分配是人為的事情；人類既有了一定的事物，他們就可以隨着自己的便利來處理這些事物。所以他的結論說：統治生產領域的，是永久不變的自然法；統治分配領域的，則為人類的意志。自由的人類意志，可以規定生產品分配底任何形式，在這個領域內，就可以實行社會改良。

這樣，約翰，密勒把生產科分配看成互相隔絕和完全對立的兩個領域；生產和分配之統一觀，是他所不曾想到的。但是實際上假如生產是自然現象的話，我們就沒有方法了解歷史上各個不同的

（甚至完全相衝突的）生產方式；原始公社內所實行的共勞共享的生產原則，跟資本主義社會以僱用勞動之榨取爲基礎的生產法則，我們能用同一法則去解釋嗎？再則，假如承認財富底分配係受社會法則（密勒用『人類意志』來代替社會法則）之支配的，那末試問生產手段底分配是不是算財富底分配呢？而生產手段底分配却是任何社會生產底必要前提，也可以說是生產底起點。在這種情形下，說生產是受自然法則之支配有可能嗎？反過來講，一定的分配關係是決定於一定的生產方式的，那末，假如說分配關係已是社會主義的（各人按照他底勞動從社會總生產品中取得平等的一份）而生產方式却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底私有和剩餘勞動之佔取），這樣說法有可能嗎？

密勒底觀點顯然是生產和分配底二元論觀點。一切的二元論都是表現思想底不徹底性，動搖性和「半途性」；密勒的亦然。他的分割生產和分配兩領域，不是偶然的：因爲他一方面感到現社會底矛盾而傾向於社會主義；但同時又沒有勇氣站到徹底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去，而企圖就現狀來改良。由於他的社會主義傾向，所以他拒絕古典學派底經濟法則底自然觀（永久不變觀）；由於他的改良觀，所以他還想局部地保存古典學派底那種經濟法則觀，——把後者限制在生產領域內。在密勒底矛盾思想上，把古典學派理論底根本矛盾揭露出來了。

三　密勒論商品與價值

在經濟學說中，約翰·密勒並沒有開闢新的道路；在他的大著「政治經濟學原理」中，他僅僅給以前的古典派經濟學說以完整的、明白的和有系統的解釋而已。他的理論基礎是採取李嘉圖底體系的。但同時他也多少採取一些李嘉圖時代及其後的各個經濟學家底學說。例如在人口論上，他採取馬爾薩斯底觀點；在工業危機論上，他採取賽依底觀點。此外，他把勞動價值論變成生產成本論

，却又很像韜倫斯（Torrens,1780—1864）。西尼歐底節欲論，也爲他所採納。對於完整的古典學派底思想體系，密勒從古典學派底論敵方面引起了一些批評的思想來加以「補充」。他做倣西斯蒙蒂底見解，主張庇護小農經濟；同時他又效法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制度，做了相當的批判。

所以經濟理論範圍內，約翰·密勒毫無一點新的創見，他只是把前人們（古典學派代表和俗流學者）底學說湊合起來而已。不但這樣，密勒同時還顯著地參加了經濟學底庸俗化過程，譬如對於商品價值和利潤的問題，他的理解就是很庸俗的。

首先，密勒把商品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數量絕對有限的物品，它的供給不能隨意增加的，例如古畫，古玩；第二類是在生產品單位上的生產成本不增加而其數量可以無限增加者，例如工業生產品；第三類是隨着商品單位上的生產成本之提高而增加其數量者，即如農產品是。

照密勒底意思，第一類商品底價值是決定於供求關係的。密勒說：「某一商品帶到任何市場上去的那個價值，不外乎在市場上使需求恰恰足夠移去現存的或所希望的供給的那一價值」。（註一）實際上，這裏密勒所說的是價格而不是價值。關於供求的法則，密勒寫道：「……對某一商品的需求，乃隨着它的價值而變化的，而商品價值是如此的適應着，它要使其需求等於其供給爲止」。（註二）這意思是說，不僅商品底「價值」決定於供給與需求的關係，而且它又能使商品底需求去與它的供給相等。即是說，不僅商品「價值」依賴着供求關係，而同時供求關係也隨商品「價值」之變化而變化。

（註）

但照密勒底意見，上述的解說只適用於第一類商品，一旦商品發生生產成本問題時，則規定價值高低的，就是另一種法則了。因為在商品可隨意生產的場合，商品「價值」却有一個以生產成本為限度的最低點了。由供求關係所引起的「價值」底變動，其最低點數生產成本；然因商品底數量可以任意增加，所以「價值」底最低點也就是它的最高點。這便是商品「價值」底正常水準。（註三）因此，生產成本相等的諸商品，它們的交換價值也相等。這樣，在第二類商品中，價值底大小，乃直接決定於生產成本底大小；講得乾脆些，價值就是生產成本。

密勒說：「商品底生產成本是生產者在商品生產中所消耗的勞動量所形成的」。所以「商品底價值，主要地是依賴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這裏看起來彷彿密勒是李嘉圖勞動價值底繼承人；可是他又繼續說：「假如我們認定資本家對於生產者有所消費的話，那麼我們很可以用工資多少來決定」（註四）這樣一來，密勒就輕輕地把勞動拿「勞動價值」或工資去代替了。這是亞丹·斯密拿「所購買的勞動」去與「所消費的勞動」相混同的老辦法；這種混同早就被李嘉圖所駁斥，可是現在又被約翰·密勒復活起來了。密勒底觀點是：以所支付的工資之大小（或生產成本之大小，這裏密勒跟斯密氏一樣地從生產成本中抽去了不變資本）決定價值這種定則，去代替以勞動量決定價值的定則。

顯然，密勒底這種價值論是很有問題的。首先，就算價值即生產成本的話，但生產成本中不祗包含工資一種，商品價值中顯然還包含着不變資本底價值，即從生產手段方面被轉移到商品上去的那部分價值。所以單單工資一項不能決定價值或生產成本底大小。再則，商品底價值還不能等於生產成本，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資本家底利潤就落了空。關於這一點，密勒有這樣的意見：「除勞

動外，另有一種生產所必需的因素，就是資本。因爲資本是節省底結果，生產品底價值不但要爲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提供報償，而且要爲一切人底節省提供報償，……這種節省底報償，便是利潤」。因此商品底價值是由在商品生產時所支付的工資總額加平均利潤之總額所決定的。這樣，勞動價值論就被庸俗的生產成本論（而非科學的生產成本論）所代替了。

關於第三類商品，密勒發表的意見很少，他只確認農產品底價值乃決定於生產必要的供給量底最大消費之水平，這裏，他的立場是站在前二種法則之間的：供求律與生產成本律共同規定農產品底價值。

最後還要指出一點，密勒底理論沒有解答關於利潤泉源的問題及利潤高度的問題。李嘉圖曾正確地確認利潤爲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底一部分，這顯然是剩餘價值底觀點：而密勒不學李嘉圖，偏偏學了俗流學者西尼歐這等人，以爲利潤是節省底報酬，是在「勞動價值」（指工資）以上的增加價值。試問這種報酬本身從何而來的呢？他始終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覆。他有時說。『利潤底來源，勞動所生產的要比節省所生產的大些』，可是事實上他卻完全站在西尼歐節欲論底立場上的。

約翰・密勒在其著作中，雖表示他的學說應當替經濟思想發展史開闢一新紀元，可是實際上他的著作卻證實了古典派學說之最後的沒落，他的著作底社會哲學部份，顯然不過是古典學派所發揮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之延續，它於社會制度底根本改造毫無裨益。至於他的著作底經濟學說部分，則不但沒有促進科學的經濟思想之發展，而且反倒證實了古典學派理論無力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底內部規律。所以他的學說是古典學派沒落底最後標誌。

第四章 「俗流」經濟學說

第一節 賽依底學說

所謂「俗流」經濟學說，就是指用一種庸俗的見解來解释經濟現象的那種不科學的經濟學說而言：這類學說底成分，實際上在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中已經有了根芽。不過在當時這種成份跟古典派經濟學中的科學成份「和平共居」着。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和相應地在政治經濟學本身發展底一定階段上，這兩種成份的「和平共居」就成爲不可能的事了。其結果，俗流成份就脫離古典學說而獨樹旗幟，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新學派就被建立起來了。這個新學派的首創者便是法國的經濟學家賽依（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

賽依，就其對斯密的關係而言，是與李嘉圖處於對立地位的：李氏發展了斯密學說中的科學成份，賽氏則繼承和發揮了它底俗流成份。斯密學說中的一切弱點，是擴大地加強地結晶在賽依底學說中了。雖然，研究和評論賽依學說，却至今仍甚重要。因爲這種俗流學說已成爲今日大部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底思想根據，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學中有許多理論——如利潤論、工資論、及其他各種理論——却是跟賽依底類似理論有密切聯系的。所以研究和批評賽依底學說，實在有很大的現實意義，這是第一。第二，俗流經濟學底發生和開展是一種很合歷史規律性的現象：它底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麽某個理論家底幻想底產物：我們知道它是爲資本主義底發展所規定的資本主義

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一個階段。

在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準備工作中，法國底經濟思想家（重農學派）是參加過的。可是一到古典派經濟學已經形成而且發展了的時候，它却不能在法國的土地裏生起根來。第一因爲一七八九年的革命雖大大地推動了法國的發展，可是跟英國比較起來它還是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國家。第二革命本身底發展和社會紛爭底強化，使得資本主義的思想家沒有進一步循科學道路去發展經濟學的可能。大革命給予法蘭西貴族階層以致命的打擊，而同時又引起了法國資產者羣極大的憂慮。由於這些原因，所以古典派經濟理論在法國就大半被利用去作爲袒護資本主義關係的工具，而經濟學底庸俗化過程也就發展起來了。

一　生產論

賽依底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從生產底分析開始的。現在我們要看一看，賽依如何解答他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什麼是生產？

我們不妨先把解答這個問題的歷史拿來回顧一下。重農學派是狹窄地，自然主義地了解着生產，說生產便是物質本身底增長，因此他們認爲只在農業中有生產，工業中根本沒有生產這一回事。亞丹·斯密在這個問題上前進了一大步，他擴大了生產這一概念。在斯密看來，一切勞動，只要是生產事物（商品）的，都是生產的勞動，而這種勞動的應用便稱爲生產。可是斯密關於生產和流通底區別問題，却尙無明確的觀念，因而對於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底區別的理解，他也一樣地缺乏明確性了，他有時往往把二者都看作生產資本。

對於這個問題，賽依底回答賦予了一些「明確性」。他宣佈一切形態的生產和流通都是同樣地

成為財富底泉源。賽依自以為這一來他把重商主義者和重農主義者底偏見都糾正過來了。

賽依底「糾正」前人們底偏見，是以他底生產觀為依據的。他在與重農學派論戰時，確定地說，『構成世界財富的那些物質材料，既不能增加，亦不能減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論綱：「生產不創造物質，但創造效用」這論綱底前半段——生產不創造物質，——是完全對的；但是它底後半段——生產創造效用，——是含義模糊了。而且後來賽依更明白地把「效用」這一概念解釋成「服役」了；因而生產也就等於「提供役務」，因而商業（也是一種「服役」）也和工業農業一樣地具有了生產性了。

賽依無限度地擴大了生產底概念，因而他的思想不但跟重農學派衝突，而且也跟亞丹・斯密不一樣。亞丹・斯密也知道生產並不創造新的物質，可是他認為只有「凝固或實現於某一事物或商品」的勞動是生產的。然在賽依看來，一切有用的勞動，說得確當些，一切提供服役的勞動，不論它是否凝固於事物或商品，都是生產的勞動。賽氏把法官、律師、醫生、學者等底勞動都看做生產的勞動了。

既然這樣，那麼生產的勞動就不只是工廠或工場工人（以及一切物質價值底生產者）底勞動，而應當承認企業家（工廠主）底「勞動」為最富於生產性的了。由於這種生產觀念，賽依又得出了「非物質的資本」這一範疇來。這是俗流經濟學者特創的範疇。但是所謂「非物質的資本」，由什麼東西可以充當這問題，俗流學派中却各人有各人底解說：有些俗流經濟學者說信貸就是「非物質的資本」，另外一批經濟學者則指知識、才幹、各種技術，總而言之「凡能促進生產或增加獲得的一切精神的和個人的要素」，（菲里波維契 Filipovich 語），都屬於這一範疇。這裏必須指出，以

工人底技巧爲資本的觀念，亞丹・斯密已有之。但是賽依把它加深起來，而定其名爲「非物質的資本」。

二　價值論

賽依底價值論跟他的生產論有密切的聯繫。他總結他自己的生產觀如下：「因此，這裏（指在生產內——沈）是有創造的，但所創造的不是物質而是效用；而當這種效用賦予事物以價值時，這就成爲財富的生產了」。

這樣，賽依是從生產中所創造的商品底效用性得出商品價值來的。生產諸要素創造了物品底效用，同時也就創造了它們底價值。這麼一來，賽依就把價值跟使用價值等同起來，同時就推翻了古典學派底勞動價值論。

賽依責備斯密道：「他（指斯密——沈）把生產價值的能力祇歸屬於人類勞動一種。經過一番精確的分析，我們就知道價值底發生仍由於勞動（或人類底辛勤），自然力量和資本三者之聯合的作用。斯密不認識這一點原理，使他不能建立起機器對於財富生產之影響的眞實理論來」。（見賽著的「政治經濟學」第四章）。李嘉圖曾引用過上面這一段文字，他接着評道：「賽依跟亞丹・斯密底見解相反，他在第四章中討論到價值問題時，認爲價值是由日光、空氣、氣壓等等自然因素賦予商品的，這些因素有時代替着人類底勞動——但是這些自然因素所賦予商品的只是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像賽依所說的一樣」。註一

賽依不但把價值跟使用價值等同起來，而且又把它跟價格等同起來。根據他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效用性）之等同觀，應當說價值也和效用性一樣地是在生產中創造出來的；那末根據他的價值和

價格底等同觀，就應當說價值是發生於交換的。所以賽氏底結論說商品底價值是它底所值和購買它時所支付的。這樣，照賽依底定義說來，問題變成異常簡單而明白了。價值是什麽？回答道：「是某事物之所值」。價格是什麽？回答道：「某事物之價值在貨幣上的表現」。那末爲什麽土地底「勞動」有價值呢？回答道：「因爲購買它時要付給一定的價格」。這樣的解釋問題當然是很簡單明瞭而且不費力的！

三　分配論

賽依認定生產底三要素，勞動、資本和土地，適應着社會底三種收入，工資、利潤和地租。這一理論和他的市場論構成了他底全部理論思想底骨幹。

假使古典學派往往把人與人的生產關係跟事物間的關係混淆起來，那末賽依底觀念中則根本沒有人與人的生產關係：政治經濟學被他解釋成研究事物的科學了。他認爲勞動本身（Labour as such）生產工資，資本本身（賽依認爲資本就是生產手段）生產利潤，土地本身生產地租。這樣，他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完全簡化（而庸俗化）爲事物固有之自然關係，因而又把政治經濟學簡化爲像物理、生物學一樣的自然科學了。

講到工資的話，賽依堅決地否定工人取得自己勞動底全部生產品的權利，他所依據的就是他底「生產三要素論」；因爲每一生產要素各有其自身的所有人，而每一要素底所有人都一樣地參加生產，因之每一所有人都有享受一定的勞動報酬（收入）之權利。既然企業主和地主都跟工人一樣地參加生產，那末工人當然只能享受生產品的底一部分，而企業主和地主所收入的，也只是他們自己「勞役」底自然報酬而已。這一來，他把資本主義之私人佔有的本質完全抹煞了。

再講到工資和利潤之關係的話，賽依跟李嘉圖底見解（註二）相反，他確定說工資下降之結果不是利潤底提高而是物品價值底降落。這一來他就否定了工資和利潤（因而亦即勞動和資本）底對立性，這是跟他的「生產三要素論」完全相適應的。同時，這又奠定了「社會和諧論」底基礎。從另一方面講，賽氏旣云工資下降促成價值下降，這無異拋棄了他自己先前的效用價值論（即以效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因爲依據這種價值論無論如何也得不出工資下降促成價值降跌的結論來的。須知工資下降並不減少物品底效用，因而也就不至於降低此物品之價值。但是這位「科學思想家」底行頭箱裏却還有另一套價值論——俗流的生產成本論：遇到頭一種理論碰壁的時候，他就把這一套拿出來「補救」。賽依說：「一切生產性的服役底價值，形成物品底生產成本」。因此假使這些服役之一，（指勞動底「服役」）底價值降低了，則全部物品價值當然隨之而相應地下降。

現在再要簡單地講一講他底利潤觀。我們知道，在這個問題上，古典學派又陷於自相矛盾的見地中：他們一方面事實上把利潤解作爲剩餘價值，而另一方面則又視利潤爲資本本身之自然的產物，是日常生活中自來就有的現象。正與在別的問題上一樣，賽依這裏又是藉消除二者之一的辦法去「克服」古典學派的矛盾的：賽氏拋棄了古典派底前一種見解，而發展了後一種觀點，他只知道現象底外表。他知道存在着平均利潤，後者可以分爲利息和企業家底收入兩部分。除此以外還有一點「新」發見，就是照賽氏底三要素論，利息只是資本「服役」底產物，而企業利潤則爲企業家經營事業、他底才幹，他冒的險等等底報酬而已。賽依始終認定資本家和企業家不是同一種人，固然他同時又承認企業家是富人。企業家是社會生產底中心人物。

古典學派視利息爲利潤之一部分，而利潤則爲與工資有極大區別的一個特殊的範疇（註三）。

可是在賽依看來，利潤這一特殊的範疇事實上是沒有的。前面已經說過，賽氏認爲利息是資本執行職能底結果，而企業家底收入（企業利潤）則被他解釋作高級熟練勞動底報酬，企業家自己的工資。拿利息去代替利潤，這是俗流經濟學者底慣技。在他們看來，資本直接生產利息，而不生產利潤。

最後賽氏對於地租的見解，也是根據一貫的「生產三要素論」。他把地主（土地所有人）也看成企業家了。在他的觀念中，土地所有人和土地經營人（農業家）是沒有分別的。這麽一來，他就替地主做了辯解，他確定地租爲土地所有者底經營和辛勤底報酬。然而賽氏旣將土地所有人看成企業家，那末地租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了，因爲地主旣變成企業家，地租也就變成企業利潤，而後者又是「高級熟練勞動者底工資」！

四　市場論

市場論（或銷售論）是賽依全部經濟學中最主要的部分，也可以說是他底獨特的「發見」。讓我們先把它簡單地介紹在下面，然後再加以評估。

賽氏底市場論底要點可歸納到以下幾點。商品底出賣，就是商品與商品相交換，或者，照賽依底見解來說，生產品與生產品相交換。這個論綱還可以這樣表述：每一出賣人同時就是購買人；每一購買人同時就是出賣人。由此就形成「出賣人和購買人之形式的均衡觀」。

從這個被賽依所視爲重要的「眞理」，他得出了四點結論來。

第一個結論：「每一國家內，生產者愈多，生產底數量愈大，則生產品底銷售愈容易，種類愈多樣和範圍愈廣大」。（註四）其後賽氏又把這一結論發展成爲一般生產過剩不可能論，即一般的工業危機不可能論。對於工業危機這一事實（在賽依底時代，曾經發生過二次工業危機——一八一

五年和一八二五年），他底解釋是：「某些生產品過多，是因爲別種生產品不足之故」。（註五）這樣，在他看來，只有生產不足而沒有生產過剩那回事。

第二個結論：「每一個人總希望一切人都幸福的，一個工業部門底繁榮常常有利於其他一切工業部門底繁榮」。（註六）賽依把城市與鄉村底關係，把省與縣底關係以及整個國家與國家底關係，都建立在這種互相關心幸福的觀念上去了。簡括地說，假如勞資間的基本矛盾被賽依底生產三要素論和服役論所消滅，則城市與鄉村底矛盾和其他各種矛盾就被他底市場論所消滅了。

第三個結論：「外國貨底輸入有利於本國貨底出售，因爲假若不是我國底工業品、農業品和資本底產品（又是生產三要素，這裏的「工業品」，作者底意思是指勞動——沈）藉貿易來出售的話，我們就不能購買外國貨物」。（註七）這一論點實際上祇是第二個結論底另一說法，其意義是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特別是反對拿破崙的貿易保護主義。

第四個結論：「僅僅以引起新物品之生產的純粹和簡單的消費，毫無助於國家底財富。它從一方面毀滅了另一方面所引起的」（註八）這一論點是用來反對那些擁護奢侈，擁護貴族階層底消費的人（如馬爾薩斯）的。照賽依底意見，生產本身替自己創造市場，它無需乎所謂「第三者」。固然賽依也擁護地租的，他不把地租看做土地服役底結果，也不把它看做土地所有者經營底結果。然而他也不能走上馬爾薩斯底立場。他底見解可以分爲兩方面的：以資產者底身份，也應當擁護一切形式的私有財產，連土地也在內；以工業資產者底身份，則他就企圖盡可能地限制土地所有者集團底只消費不生產的特權。

這四個結論，同時又含有反對過大的國家消費（特別是官僚機關底消費）之用意。

假使把賽依底這一切結論總合起來，那末我們就得到整個自由主義的和辯護派的（即替資本主義辯護的）思想體系。爲這思想體系之基礎的「重要眞理」是閣去了全部資本主義現實的抽象空談。賽氏把資本主義生產解釋成簡單的商品生產，並把商品交換解釋成生產品交換，——這就是這一「重要眞理」底方法論。

在「資本論」裏有一段話：「在這方面，經濟的辯護主義（對現制度的袒護和修飾）底方法有兩個特點。第一，藉簡單的抽去商品流通和生產品直接交換之區別，而把二者等同看待。第二，企圖否定資本主義過程所固有的矛盾；這是這樣來達到的：即將資本主義生產者之間的關係解釋成直接發生於商品流通的那些簡單關係了。然而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很多種的生產方式所有的現象，雖然範圍容有不同。既然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一切生產方式所共通的商品流通底抽象範疇，那末就等於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些生產方式，不知道它們各異的特點，我們也不能造成關於它們的任何觀念」。（註九）

生產品底直接交換，只存在於商品生產底發生時期；隨着商品流通底發展，生產品底交換就表現爲商品變形底公式：「商——貨——商」。可是賽依完全附和斯密、李嘉圖等人底見解，認爲貨幣只是流通工具，他甚至於更簡化了這一貨幣觀，把「商——貨——商」完全看成「商——商」了。在他底意見，以爲重要的只是結果——兩種使用價值底交換。賽氏從最後底結局出發，即從最後爲生產品與生產品相交換這一結局出發，他又把生產品當做貨幣了。在他看來 商品本身，在它們直接的自然形態上，已經是貨幣了。一種生產品是對別種生產品的購買手段、貨幣；而眞正的貨幣，則只是減少生產品與生產品交換時的困難的一種手段而已。

賽依既不了解商品、貨幣和商品變形底特性，他就也不了解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底特性。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祇是生產品底生產，在這一生產中，一種生產品是購買手段，是對於別種生產品的貨幣。既然是這樣（在賽依看來，正是這樣的），那末生產過剩就完全不可能了。實際上說，購買手段底生產過剩怎麼會有可能呢？只是由於某種生產品不足而形成另一種生產品過多時，才有可能；即在國民經濟底一端上購買手段底生產過剩，只是在別端上沒有充分的供給時，才有可能。簡言之，任何的生產過剩都只是生產不足而已。

（註一）李著：「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頁二〇九

（註二）前一章中講過，李嘉圖根據他的勞動價值論，得出相反的結論來：他認為工資下降只提高利潤而改變商品價值。李氏藉此證實了勞資底對立。

（註三）斯密就已確定地說過，利潤無論如何不能被解作工資的。

（註四）見賽著：「政治經濟學」頁四〇。

（註五）同上，頁四二。

（註六）同上，頁四二——四三。

（註七）同上，頁四五。

（註八）同上，頁四五。

（註九）「資本論」卷一，第一章。

第二節　西尼歐底學說

一　概論

在俗流經濟學派中佔有特殊地位的，要算英國的西尼歐(Nassau Senior 1790—1864)了。西尼歐不但參加了古典學派底解體過程，而且他還企圖發表一新的系統，創造一俗流經濟學底新類型。我們知道，俗流經濟學，在其發生之初，是與古典派經濟學說有着密切的聯繫，它僅僅對於古典學派加以修改和補充而已。西尼歐則以俗流經濟學底一種完全新的姿態出現，他變成了當時英國社會一個最負時望的經濟學者了。

歷史賦予西尼歐的社會使命，要求他從理論上去證實縮短工人勞動日(即一日內規定的勞動時數)的不可能和政府干預(採取工廠法之類的方式)勞資間「自由」合同的不適當。這位「最後一小時論」(詳後)底創作者西尼歐，恰恰很完滿地執行了這種使命。

西尼歐又「發見」了一種新的財富底泉源。我們還記得，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底泉源是流通，古典學派認定是勞動。重商主義的解說，不能為經濟自由主義底代表(西尼歐即其一人)所接受，因為重商主義的全部觀念是跟經濟自由底思想相衝突的。但是古典學派對於財富來源的解答，在社會紛爭激化的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又成為一種危險思想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西歐尼底新發見——節欲論——就成為解決一切困難和替「愛自由的」產業資本家集團開闢新道路的不二法門了。依照西氏底節欲論來說，財富底泉源是產業資本家底節欲；世界是靠資本家底節欲來支撐的；任何剩餘勞動底佔取都談不到的。

企業家底「節省」或「忍欲」這類觀念，在西尼歐以前雖然已經有過(如馬爾薩斯亦談到此)，可是只有西尼歐把「節欲」當做全部政治經濟學之基本的和中心的「範疇」，而且，他的集中注意於這一「範疇」，正當後者對於資本家集團特別需要的時候，這當然是西尼歐底重大「貢獻」。

對於西尼歐作了一番大概的估量之後，我們還得把他的經濟理論底各個部分，比較接近地考察一下。

二　西氏底「四原則」

首先要講一講西尼歐底四原則。西氏底經濟學包括四個原則，就是：（一）以最少消費獲得最大利益的原則；（二）關於人口的原則；（三）工業生產率增長的原則；（四）農業利得遞減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西尼歐的享樂論，是邊沁（Bentham,1748—1832）底功利主義底「嫡親弟兄」。依照享樂論來說，人類活動底最高標準是享受快樂，而消極地要避免一切足以招致苦痛的原因。在經濟的活動中，享樂主義的原則表現爲以最少消費獲得最大利益這一論題。消費對於經濟的主體是一種犧牲，所以從事經濟活動者總盡力要把這種消費減少到最低限度，而從這種消費吸取最大限度的利益。

這種經濟原則底意義是在抹煞各種現象底差異性，它是很適於蒙蔽現實眞相的。因爲，譬如說，工人要求縮短勞動日與增加工資，資本家則爲延長勞動日與減少工資而努力；這兩種現象在西尼歐看來完全是一樣的；都是爲希圖達到以最少消費獲得最大利益的具體表現。

以最少消費獲得最大利益的原則，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底基本原則。不過西尼歐把它跟他獨創的節欲論聯繫起來而當作經濟學底中心原理罷了。照他的意見，投資於生產，是表示企業家暫時放棄他自己的快樂（即節制欲望），因爲他若把這些資本作爲自己享樂之用，他就可以獲得很大的快樂，他既犧牲於前，當然應獲利（享樂）於後，所以利潤是企業家節欲的結果。

第二原則是關於人口論的原則，西尼歐底人口論跟馬爾薩斯的不同。西氏認爲馬爾薩斯的人口繁殖律，只適用於動植物和人類社會底最初階段，而對於文明社會（意卽資本主義社會）則絕對不適用，經濟底人類（"homo oeconomicus"）並無無限繁殖之本性，相反的，他實有節制繁殖之本性，換言之，人類底經濟的本性壓制了他底生物的本性。

西尼歐底人口論仍以享樂主義作基礎，所以他斷說，經濟的人類總要力圖增進他自己的境況或幸福，至少是要設法不使自己的境況退步；而家庭人口太多則境況必然惡化，所以人類就有不讓自己生育過多的傾向，這就是人類追求幸福的天性。

但是現在社會內存在着大量的工業後備軍，這是該怎樣解釋呢？馬爾薩斯肯定人口過剩底原因在於人類無限繁殖的天性；西尼歐雖正確地推翻了這種荒謬的解釋，但是沒有能夠給一個比較正確的解答，而僅僅盲目地否認在資本社會內有過分繁殖的可能，彷彿資本制社會諸關係本身就是避免人口多餘的保障似的。

第三個原則是說，因社會致力於以最少消費換得最大利益的原則，它就不斷地發展着勞動生產率而減少生產上的消費。這一來，工業底生產率不斷地提高，資本積累就不斷地擴大了。西尼歐說：「創造財富底勞動力和勞動工具，能夠無限地增加起來，因爲生產品是用於繼續生產的」。這便是西氏底工業生產率增長的原則。這個原則底用意在於「說明」資本主義的擴大生產是和諧地進行着的，它有利於全社會，特別有利於勞工層，因爲照西氏底見解，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補充資本都消費在工資上的。這裏他完全抄襲了古典學派底庸俗成份，而把補充資本中的不變資本丟開了。

最後第四個原則說，勞動生產率累進地增長的現象，只見於工業而不會見於農業。在農業中，

他認為只有土地肥沃遞減律。這裏他又把古典學派底庸俗成分當做俗流經濟學和辯護學說底基本原則了。西尼歐這個原則企圖「證明」現代社會只有社會對自然的矛盾而沒有社會內部的矛盾。同時，他又用土地肥沃遞減律當做他的工資論底基礎，即藉此以「證明」工資沒有增加的可能。在實際政策上，他又利用這一法則作為放任主義(Lajssez faire)底根據。

三　財富與價值

西尼歐底經濟學，是從財富底研究開始的。在他的財富底定義中，包括以下三特徵：(一)有用的，(二)數量非無限的(故空氣、日光等物被排除在財富範圍以外)，和(三)能夠被人買賣的。

參加財富生產的要素有三：即勞動、資本和自然；這是賽依底基本論綱，西尼歐也持此種見解，但在對這三個要素的估量和理解中，他和賽依却有分歧之處。第一，凡不被人所壟斷的自然事物，西尼歐認為不能歸入生產成本中去，因而從經濟上說，它就不成其為生產底要素；第二，對於勞動和資本，西尼歐又是根據享樂主義底精神去解釋的。例如，他認定勞動與資本同是一種犧牲，資本便是資本家犧牲自己享受(即他節省自己的享樂，而將資本投入產業作為資本)的結果。

西尼歐將財富底生產成本劃分為二部分：勞動和節欲。這樣，他就「解答」了價值的問題。照他的意思，價值依賴於生產成本，即依賴於勞動和節欲。但價值底高度又如何決定呢？勞動可拿時間去度量，試問節欲又如何度量呢？西尼歐根本就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來。他解釋價值是一種事物與事物的關係，他把價值與交換價值(因亦即與價格)混同起來。而價格是被競爭、被需求與供給的關係確定下來的。在市場上有各種不同的商品，它們都是勞動和節欲底產物。商品底出賣人或購買

人各抱着以最少消費換取最大代價的基本原則；於是出賣人要求較高的價格，購買人要求較低的價格。但競爭迫着兩者都不得不放棄過分的要求，而自然而然地確定了等於實在的生產成本的公道價格，即爲出賣的商品底再生產所必需的那些生產成本。可是我們知道，競爭（供求律）所能影響的，只是價格底擺動於價值底周圍，而決不能沒有價值而創造價格。事實上，西尼歐根本就沒有價值底觀念，而只有價格和生產成本底觀念。

四　資本利潤和工資

西尼歐解說資本爲財富底一部分，這是當做繼續生產用的一部分。照西氏底意思，這部分財富之消費於生產，乃表示個人消費之節省；所以資本是節省（或節欲）底結果。西氏藉這種統一的節欲論，「解決」了兩個問題：資本底發生問題及其不斷增長底問題。在很久遠的時代，節儉的人就因節省而創造了他們底積蓄；這種積蓄曾被用於生產而成爲資本了。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內，企業家實行節約，同時又由於前述第三個原則而不斷增加其資本。

由於企業家底節儉，他便該獲得節儉底報酬——利潤（實際上應該說是利息，詳後。）。「所謂節欲，意思是指跟勞動和自然力有區別的東西；它跟利潤的關係，正如勞動跟工資的關係一樣」。（註一）西氏又說：「節欲是一種拒絕資本作不生產消費的行爲……：凡是這樣做的人（即實行節欲以從事生產者——沈），就是資本家，而對於他的行動底報酬，就是利潤」（註二）但西尼歐尚不以此爲滿足，因爲企業資本家不僅節制自己的消費，而且還積極地從事各種生產的活動：組織企業、計劃事業和指揮生產等等，簡單一句話，他們也是任勞作者的。於是西尼歐便把資本家底所得劃分爲兩部分：企業利潤和利息。利息是節欲底報酬；企業利潤便是企業家勞作底報酬。

總結起來說，照西氏底理論，不論企業利潤或利息，都不是佔有他人勞動的結果。然而在日常的生活中，却不斷地見到企業家與勞工爲着勞動日底長短和工資底多寡而起糾紛的事實。事實究竟是事實，西氏如何解釋這種事實呢？這裏，西尼歐又來了一套新「發明」，但是跟前一套「發明」相衝突的。因爲這套新「發明」告訴我們，利潤實爲工人所創造，只不過並非全部勞動日中所創造而只「在最後一小時內」創造出來的。於是他認定假如從現行的勞動日中減少一小時，資本家就無利可圖了。這樣，爲什麼勞資間爲勞動日底長短而起衝突如此劇烈，就很「明白」了。但在我們看來，前一種利潤論跟這種利潤論的矛盾，也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了！

至於工資，前面已經提及，西氏認係工人犧牲（勞苦）底報酬。但是這種報酬額底大小如何決定呢？按照以最少消費換得最大利益的原則，工人當然要想以較少的勞作換得較多的報酬。然在另一方面，資本家也依據同一原則而企圖以自己的「節欲」換得最大的報酬。因而發生出兩個問題來：（一）如何決定資本家報酬底大小？（二）工人和資本家兩方面底企圖是否有衝突？

首先，西尼歐申言道：『爲維持勞工人口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之總量，很明顯地就是工資底最低限度。』（註三）這種生活資料最低限度論，就是後來被拉薩爾（Lassalle, 1825—1854）稱爲「工資鐵則」的理論。一講到工資底高度，西尼歐就連帶談到利潤底高度。因爲他既像古典學派一樣地把不變資本擱置不談，則工資或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與利潤，就成爲反比例的兩部分價值，即利潤成爲生產品價格超過工人生活必需品價格以上多餘部分了。可是這種最低限度生活資料論，不甚合於辯護派底目的，不甚適應資本家們底利益，於是西尼歐就把最低限度生活資料論跟工資基金論結合起來了：前者決定工資底最低限度，後者則決定它底最高限度。

工資基金論底要點如下：（一）在某一時期和某一國家內，預定作爲傭用工人之用的那部分資本，是一個不變的數量；（二）每個工人底工資等於工人數目除這部分資本所得的商數；（三）工資底擺動，或由於劃作僱工之用的那部份資本大小底變動，或由於工人數量底變動。這種理論底中心觀念表現於第一個論點（或命題），其餘的兩點祇是第一論點（命題）之「派生物」而已，它的意義是教工人們不要爭工資底多寡，因爲縱然去爭也是沒用的，因爲劃作支付工資之用的那部分資本是固定不變的啊。可是西尼歐在這方面又加上了一點特殊的色彩；因爲他說資本是節欲底結果，而工資又是資本底一部分，那末工資也變成資本家節欲底產物，換言之，即資本家藉節欲以創造工人底生活資料，這便是西尼歐在工資基金論上所看的色彩。

第三節　巴師夏底經濟理論

一　概論

現在我們又要回過頭來講一講法國的俗流經濟學說了。我們知道在法國，勝利的上層市民羣沒有、而且不能有他們自己的斯密和李嘉圖，他們所能推出的經濟思想代表，只能像賽依這類學者。在甲可賓黨所領導的革命壓迫之下，法國底上層市民羣只能歡迎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中的庸俗成份。亞丹・斯密，尤其李嘉圖，都不否認資本主義社會內有利害的矛盾，這種觀點是不利於辯護的。賽依則藉庸俗化的服務論和生產三要素論，根本否認這種利害矛盾。這樣他就替自己未來的繼承人巴師夏（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開闢了道路。巴師夏是有名的社會經濟利益調和論底歌頌者，同是又是極端反對社會主義的瘋狂的戰鬥者。這兩點就是巴師夏全部經濟學說底中心意義。

首先，巴氏確認現存的社會機體是自然的、又是和諧的。自然的，因為在這社會內，誰也不能強迫誰去替別人勞作或對別人服役。每一個人都被自己的自然願欲和利益所激勵，所以願為自己工作，同時亦為別人工作。和諧的，因為一個人底利益和別個人底利益是相適合的，而不衝突的。因一個人只貢獻一種服務，他就希冀別人貢獻那種服務，作為他的服務底報償的。第二，每一個人都希冀自己貢獻給人的服務能夠得到報酬，——不論在何處，也不論被誰所報償；惟有如此，才能造出一種公衆的信念：大家知道任何一次服務都不至落空的。

這種自然的與和諧的社會機構，受着內部的自然法則底指揮和調節，而那些自然法則則又決定於人類的天性。關於人類天性的見解，巴師夏所根據的，是斯密底兩部大著：「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根據「國富論」，他知道經濟的人("homo oeconomicus")是自利主義者，支配人類經濟活動的，只有個人利益；根據「道德情操論」，他却肯定人類固有着一種同情的情感，人類是利他主義者。亞丹・斯密底這兩種觀點，顯然是表現他的二元論。邊沁和他的信徒們拒絕了斯密底這種二元論，而把倫理觀建立在自然主義之上。巴師夏却無決心拿自利主義當做倫理學底基礎，因為這跟他底和諧觀不甚相合，所以他雖採取斯密底觀點，但是他企圖把自利和利他這兩種觀念調協起來。他肯定人類有兩種互相補充的特性：自利主義者底特性和利他主義者底特性。這兩種特性不但不相衝突，而且互相補充。「因為在勞動和交換的問題中，「各人為自己打算」這一原則必當不可避免地成為主要的發動力，而吾人引為驚異的，是世界底創造者利用這一原則，去在社會制度底胎胞中實現博愛的公理——「各人為一切人打算」。」(註四)

這樣看來，可知巴師夏底方法論（亦即世界觀）底中心精神是和諧、調協。他藉助於「世界底

創造者」，把不可聯合的東西聯合起來了。這也就是他底全部經濟學說底中心思想。

巴師夏所說「和諧的社會機構」，是他在交換中所「發見」的。交換便是他的「經濟和協」論所賴以維持的基本關鍵。他寫道：「我要說：依據經濟的觀點來說，社會就是交換」（註五）我們知道，亞丹·斯密亦曾將資本主義社會看做勞動和交換的組合，可是他的重心點却放在勞動分工上：在他看來，交換不過是生產領域中的勞動分工在流通領域中的另一表現而已。俗流經濟學者巴師夏，却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完全當作一種商品流通底三稜鏡看，當作一種玄幻的平等、自由和公道底領域看了。

二　交換與價值

依據巴師夏底見解，各個人在交換中互相貢獻服務；所以交換不外乎諸種服務之交換而已。「服務」這一概念，是巴氏抄襲賽依的；但是巴氏底服務觀具有一種新的意義，他把它當做「經濟和協」底認識手段看了。爲了解和估量巴師夏底這種理論見解計，我們就得拿他的價值論來考察一下。

巴師夏不滿意他的前人們底價值論。他要想找出一種合於公道底主張而可以當作「和諧論」之基礎的價值論來。不但古典派底價值論不夠這種「資格」，即賽依底理論也不適合於這種條件。因爲古典學派底理論揭露了社會階層底對立性；賽依雖然拋棄了勞動價值論，但認價值爲事物底本性，他把它置於倫理範圍以外去了。從價值爲事物效用性之表現這一定義中，就得不出關於人類社會和諧的任何結論來。

所以巴師夏既不將價值歸結於勞動，亦不將它歸結於事物底本性；他把它解作人與人互相貢獻的服務了。照賽依底見解，事物——資本、土地這些生產要素，——也貢獻服務的。巴師夏確不同

意這種觀點，因爲在他看來，事物所貢獻的服務是無償的，只有人們所貢獻的服務才有報償。而所謂報償，恰正表現於服務底交換：一種服務成爲另一種服務底報償，反之亦然。因此，巴師夏說，「價值或價格是兩種相交換的服務中間的關係」。（註六）他又說：「爲着正確地確定價值底意念，不應單憑人類的勞作；而應以被交換的或作爲交換用的那些勞作爲憑據」。「交換不但顯現和度量價值，而且又給價值以生存的可能。我並不想說，交換賦予被交換的行動與事物以生命，然而交換卻產生了價值這一概念……。」（註七）當兩人互相讓渡他們各自的勞役或勞役之結果時，這就表示他們在互相服務。

這樣，「價值是兩種相交換的服務中間的關係」。

那末服務如何度量呢？巴師夏認定有兩種尺度來度量服務，這兩種尺度是等同的：（一）對於貢獻服務的人所要求的勞苦與奮力，（二）接受服務的人所解除的勞苦與奮力。「我人每一次勞苦，不外乎我人對自己所貢獻的一種服務；假若根據自願的原則，別人——局部或全盤地——使我免除這些勞苦，這就表示我獲得了這許多服務」。

然則如何保障交換底一方底勞苦和奮力與交換底對方底勞苦和奮力相適合呢？巴師夏說保障就在自由，因爲在經濟自由的局面之下，誰也不強迫，什麼也不強迫人們做不利的買賣；而交換雙方底利益告訴吾們說，交換是成立於均等上的，均等的（或等價的）交換才是公道的交換，這是表明人類社會利益底和諧性。

這樣，巴師夏把創造價值的勞動這一概念，解作勞苦和奮力，亦卽將這一概念擴充到任何的人類行動，以至於精神活動上去了。同時，商品則被解作一切形式的服務了。他又確定說，表現一定

價值的服務，並非事物所提供，而是人所提供的。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巴師夏觀念中的價值，是與物質的事物相脫離的。在他看來，商品底生產並不是物質的勞動生產過程，而只是貢獻服務；反過來也可以說，一切服務的貢獻都是生產。價值則爲諸種服務間的關係，凡發生服務交換之處，都有價值底存在。因此，價值乃流通中所發生者。價值既是諸種相交換的服務中間的一種含混不可捉摸的關係，它當中自然沒有一點點物質的原素。人與人的經濟關係，主要的、甚至於惟一的就是互相提供服務，服務底互相交換。生產底概念，特別是物質生產底概念，人與人在社會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諸關係底概念，——這些是巴師夏頭腦裏所絕對沒有的。

根據這種庸俗的價值論，巴氏又得出了他的庸俗的政治經濟學底對象觀來。照巴師夏底意思，社會之「經濟的和諧」是靠服務底交換來實現的；因此，政治經濟學底任務就在於剖解這種「經濟的和諧」；換句話說，巴師夏把經濟學當作專門研究交換的科學看了。

三　關於利息與資本的見解

在利潤問題上，巴師夏跟別的俗流經濟學者一樣，所談的實際上不是利潤問題而是利息問題。他站在俗流經濟學底見地，現象只是照它外表上所呈現的樣子；而從外表上看，利潤呈現爲資本利息和企業家收入之和。關於企業家收入，巴氏跟別的俗流經濟學家一樣，也認爲是企業底勞動——勞力和奮力——底報酬。然而對於利息這個範疇，巴氏却須特別加以思考了；因爲依照他的見解，服務僅僅是指人的，而不是指物的；服務底報酬也僅僅指對人底服務的報酬；可是從外表上看去，利息却明明是資本服務底報酬，試問巴師夏將如何解釋它呢？

在沒有辦法中，巴師夏就只得求助於西尼歐底節欲論了。依據這個理論來解釋，問題就十分明

白：利息不是一種服務底報酬，它是資本家所提供的因節欲（或節儉）而形成資本的那種服務底報酬。簡單的說，資本家實行節欲而形成資本、資本家底積蓄行爲，便是一種服務，利息便是對這種服務的報酬。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巴氏跟西尼歐也有不同之處，就他不用「節欲」這名詞，而代之以自己特創的「延緩」（Delai）一字。他說資本家投出資本，等於他延緩了自己的消費或享受，而在他是一種犧牲，有了犧牲自然有代價——利息（報酬）。不但名詞上有不同，巴師夏對資本報酬論，在解釋上也有跟西尼歐底節欲論不同之處。西尼歐視資本家之「節欲」爲「生產成本」底一部分；巴師夏則根本沒有生產成本論，他的價值論只是「互相服務」論。所以他所要解釋的，是資本家藉「延緩享受」以提供的那種服務底實質。

照他說來，飄流孤島的魯濱遜（Robinson）也有資本的：魯濱遜在孤島上不但生產消費物品，而且也生產生產工具。既然生產生產工具，那末——照巴氏底意見，——第一，他就「延緩」了自己個人的消費（或減少這種消費）；第二，在個人消費品底生產中增加了勞動生產率。因此，資本具有兩個特點：（一）它的生產必須以取「延緩」個人消費之方式的犧牲爲前提，（二）它的任務是促進工作效率或提高勞動生產率。於是巴師夏作結論道：資本應當產生收入，但這種收入是資本家「犧牲」底報酬。

但是，照巴氏底意見，魯濱遜不可能創造許多的資本；他說：「在隔絕的經濟中，我們的需求要超過我們的力量的」。大量的資本，只有在社會內才能創造出來。由於交換底作用，一部分人所創造的資本，乃能被別部分人所享受。因此，以交換爲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和諧（或和協）與公

道的樂園！

照這樣的「理論」說起來，資本底利息當然是極公正和極合法則的。孤島上的魯濱遜，自己創造資本；又自己享用資本；這樣他就得到了「延緩」的報酬，提高了自己勞動生產率，後者也就是利息，是資本給與這位飄泊者的。在交換社會中，這種利息就應歸屬於資本底供給者。其他各種收入，巴師夏認爲只是利息底各種別名而已。「因此，在「延緩」個人消費時，總有一種特殊的報酬，否則就違背了最高的社會法則：服務交換服務的法則。這種報酬又隨不同的場合而採取各種不同的別名，僱用工錢、租金、地租等；可是它們底母名卻只有一個──利息」。（註八）

照巴師夏底見解，魯濱遜底資本僅是生產工具，而在交換社會中則資本又是貨幣，又是其他任何貴重物品。因爲貨幣和一切貴重物品，都是一定的人在一定的地方靠「延緩」個人消費而獲得的，這是第一；第二，因爲用它們（指貨幣及其他貴重物品）可獲得生產工具。但是在交換社會中，資本又是消費資料；不過不是消費本身，而是因爲它們是供給工人的，它們就提供着一種「服務」，即創造了生產的可能。簡單地說，巴師夏把勞動力底購買也看做最高社會法則──服務換服務──之表現了。在巴氏看來，企業家底服務是供給工人以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生活資料；工人底服務是替企業家做工，企業家既替工人服了務，他自然可以從工人方面取得另一種服務，因而他就得到一種報酬，──自己的資本上的利息。這樣資本和勞動底關係，是絕對和諧、絕對平等的關係，是互相服務的關係。這裏根本談不到什麽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勞資利害的衝突。

不但如此，尤其有趣的是巴氏還有自己玄想的「統計」，武斷地確定說，隨着社會底發展，不但不會發生貧富兩極化，而且勞動底份額是永遠隨之而增大，資本底份額卻反倒隨之而不斷地縮小

。巴師夏宣稱這是「偉大的、令人快慰的、必然的和嚴酷的資本法則」！他並且用下列一數字作爲說明的「例證」。

	社會全部生產品	資本底份額	勞動底份額
第一期	一、〇〇〇	五〇〇（五〇％）	五〇〇（五〇％）
第二期	二、〇〇〇	八〇〇（四〇％）	一、二〇〇（六〇％）
第三期	三、〇〇〇	一、〇五〇（三五％）	一、九五〇（六五％）
第四期	四、〇〇〇	一、二〇〇（三〇％）	二、八〇〇（七〇％）

這裏我們首先要問：這些數目字是那裏來的？它們是根據那種可靠的統計得來的？顯然這種「可靠」的統計不是別的，就是巴師夏底幾個手指頭！這裏巴氏所要證明的是利息水平底下降傾向。在巴氏想來，既然利息，——即他所指的『資本底份額』，——不斷地下降，則工資（勞動底份額）自然不斷地上升。因此勞工們就用不着憂愁和氣忿，你們靠着這『偉大的、令人快慰的……資本法則』，還怕生活不日趨富裕嗎？

（註一）見西尼歐著：「政治經濟學大綱」，頁一五五（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36年出版）

（註二）同上，頁一六六。

（註三）西尼歐著，「政治經濟學大綱」頁一八七。

（註四）見巴師夏著，「經濟和協論」（"Harmonies economiques", Paris 1860。）

（註五）同上，頁一二六。

（註六）同上，頁一二九。

（註七）同上，頁一二九。

（註八）「巴師夏文集」卷五（Oeuvr s Complates de Frederic Bastiat）頁二一四。

第五章『浪漫主義』的經濟學說

古典學派以後，差不多跟俗流經濟思潮同時發生的一種經濟學說，便是以法國經濟學者西斯蒙蒂(Jean Charles L.Simonde de Sismondi,1773——1842)爲代表，被稱爲「經濟浪漫主義」(economic romanticism)的經濟學說。這一學說底倡導者西斯蒙蒂，是李嘉圖、賽依和馬爾薩斯底同時代人。假如說賽依、馬爾薩斯等人底思想是表現古典學派內部的庸俗化和沒落的過程，那末西斯蒙蒂便是小市民層的反對派，即站在小市民層底立場(或者說小資產者急進主義的立場)向古典學派進攻的一個反對派；他，無疑地，也是古典學派沒落過程底促進者。除此以外，跟西斯蒙蒂和賽依等同時代的，還有古典學派之勞動階層的反對派；即空想社會主義的經濟學派。這裏先來檢討西斯蒙蒂底學說。

西斯蒙蒂底學說，包含着進步的和倒退的兩種原素：西斯蒙蒂主義是倒退的小市民層的浪漫主義，同時它却有某些科學的功績。這兩方面底結合，便形成了西斯蒙蒂底經濟學說。這一章底任務就在於闡明這兩方面的理論及其特殊的結合。

第一節　西斯蒙蒂學說底歷史背景

西斯蒙蒂生長於瑞士，瑞士特殊的社會經濟條件，對於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十八世紀末葉的瑞士，一方面還保存半族長制的小生產，而另一方面這種生產組織却受着先進鄰國底勝利的資本

主義之威脅，而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西斯蒙蒂首先發見了這一危險，他就想竭力防止這一危險底發生。這種願望，使他們同時成爲資本主義底批判者，同時又是小市民層的浪漫思想者。資本主義批判者的他，站在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反對派底立場；可是當他對他引以爲憂慮的那些問題作積極的主張和解答時，他却成爲浪漫主義經濟學說底倡導人了。

西斯蒙蒂跟李嘉圖、賽依和馬爾薩斯同爲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經濟學者。關於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在前幾章中已經述及。可是西斯蒙蒂的反應這些事變，跟其他幾位經濟學者並不一樣，這是因爲他所代表的是另一個社會層，他所處的是另一種環境。

在法國這樣一個國家，農民佔着全國人口之半；凡是起來反對上層市民羣而袒護赤貧者羣的那些思想家，終不免帶着農民小資產者底氣味，換句話說，終不免持着農民小資產者底觀點去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而袒護勞動大衆利益的。

但是西斯蒙蒂主義不祇是法國獨有的、不是民族性的學說，而是一種國際的思潮。雖然在西斯蒙蒂時代，英國的小生產基礎業已被毀，可是小市民羣的幻想底根基却依然存在。所以經濟浪漫主義這種思潮，不僅存在於落後的瑞士和比較後進的法國，亦且存在於典型資本主義的英國。

在十八世紀末葉，廣大的勞苦人民（工人也在內），對於賜予他們貧乏和困苦的那些經濟上的變動，仇恨到了極點。他們所仇恨的，首先是機器底採用。勞動者羣底貧乏和痛苦，激起了工人搗毀機器的運動；因爲他們誤想自己一切苦痛底來源是機器而不是資本。一般的勞動者羣，在當時還都沒有解除小市民羣的幻想，沒有忘記他們不久以前的小康生活，所以他們企圖恢復過去，以求自身的出路。於是搗毀機器的運動便浩浩蕩蕩地充滿了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西歐歷

史。

工人和一般勞苦人民要求回復過去的幻想，——縱然不能把歷史的車輪倒扳轉來，至少也得阻止它的加速前進，——這種幻想不但普遍地流行於大衆，而且也爲一般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所維護。西斯蒙蒂是把這種幻想理論化的一位經濟思想者。

這樣，西斯蒙蒂所主導的經濟思潮，在英國亦有其廣大而鞏固的根基。然而在考察這種思潮底社會經濟條件時，我們絕不可忘記西氏底誕生地瑞士。當時瑞士舊經濟形態底潰解過程業已發生，但是這種過程是病態的。瑞士社會底保守性、閉關性的氣味，本來極其濃厚；然因瑞士底地理位置處於法、德、意幾個比較先進的鄰國底包圍中，它的閉關主義就不容易保持和貫徹。

在十八世紀中，瑞士底對外貿易發展得相當地快，它輸出農產品，甚至也輸出一點工業品。那時瑞士工業底發展還只處於所謂「散漫的工場制」底階段：手工業者和家庭工業者分別地替各種商業機關做工。棉織業和鐘錶業是瑞士主要的工業部門。單單蘇黎支一州區，一七八七年有手工紡工三四、〇七五人，手工織工七六、四七九人；而日內瓦則有三分之一人口從事鐘錶生產和珠寶生產。此外絲紡織業也相當地發達，在十八世紀末，全國絲紡織工人約達十萬人之多。

瑞士劃分爲好些州區（Cantons），而各州區底工業發展程度則各不相同：在一種州區內工商業頗發達，在另一種州區內則農業佔優勢，在第三種州區內，則以畜牧業爲普遍事業。不僅經濟狀況如此，即就政治體制言，各州區也頗不一致。在那些落後的州區內，政權爲貴族們所壟斷；而在比較先進的州區內，則新興的市民層已起來爭奪政權，這種新興的市民層便是中小資產階層。

可是在法國大革命前夜，在一切州區內封建制度都還相當地鞏固。在城市中，手工業行會，商

業行會和其他同業公會，都享有很大的特權。鄉村對城市有封建的從屬關係；城市的特權階層對於四週鄰近的鄉村人民，自居於封主底地位以行使其威權。在市民階層與貴族封主的矛盾，城市與鄉村的矛盾之外，還要加上一種州區與州區間的衝突。資本制社會底生育痛苦在瑞士，因州區間的鬥爭，因它們底閉塞性和各自的獨特性而加重。在十八世紀全世紀內，各州區內部酷烈的紛爭，變爲各州區與州區間的衝突。中央政權底存在只是名義上的，每一州區差不多等於一個獨立的「國家」。

雖然，在這樣一個分裂的國度裏，資本主義却還是在開拓它自己的道路。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的大革命，把瑞士捲入漩渦中去了。瑞士在一八一四年已有七百架紡紗機；機械的紡軸已被採用，而且它的數量亦正在不斷激增起來：一八二五年有三十萬紡軸，一八四四年增加到六十六萬，達一八五〇年已近於一百萬具了。政治組織中所發生的變化也很大。各個州區內先先後後地發生革命的爆發，這些爆發到後來受了法國大革命底刺激，轉變成爲強大的革命運動了。這便是改革瑞士政治組織的原動力。日內瓦比任何一州都先進些，它在一七八一年已經完成了一次革命：州總會議底職權被擴大了，居民大多數獲得了職業底自由；對於封建制度給了很重的打擊。但是那次革命並沒有堅實的基礎，它不久就被別的許多州底聯合力量，加上革命前的法國底支助，所消滅了。只有等到法國本身革命爆發之後，瑞士全境底革命運動才開展和加速起來。

革命的戰鬥（拿破崙的法國軍隊也參加了這種戰鬥）毀滅了瑞士的封建制度，並予族長制以致命的打擊，這些激烈戰鬥底結果，使瑞士變成比前統一得多的國家了。但是跟封建制度和貴族政治進行過戰鬥的瑞士底小市民和農民，這時驚恐地見到了一種新的、更可怕的力量——資本。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一方面雖解除了舊時的封建束縛和壓迫，但同時另一方面却又給廣大的勤勞民衆帶來

了新的「賜予」——破產與貧困。因為資本主義底克服封建制度，也就是大生產底克服小生產。所以即使像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得比任何一國都前進的國家，人民間依然存在着留戀過去，幻想回復到過去的各種夢想。在後進的瑞士當然更免不了發生這樣的夢想了。瑞士廣大的人民層，在十九世紀初葉，很普遍地存在着阻止資本主義發展或不容許資本主義發生和恢復自足自給的小生產的各種幻想。此種幻想之理論化的體現，便是西斯蒙蒂底浪漫主義的經濟學說。

第二節　西斯蒙蒂底社會經濟思想

西斯蒙蒂底思想發展過程，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當他還隸屬於古典學派和遵守自由主義之「信條」的時期；第二時期是他成為古典學派和自由主義之批評者的時期。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底社會革命底完成，是促成西氏思想轉變的原因。普通經濟學說史中所論述的西斯蒙蒂主義或經濟浪漫主義，正是指他底第二時期而言（當他形成了獨立體系的時候）。

西斯蒙蒂底社會立場是小商品生產者（農民和家庭手工業者等社會羣）底立場。這一立場只容許他注意到社會經濟變革底一方面，即破壞舊組織、舊生活的一方面，而不注意到它的創造新的方面。固然，這使他特別注意於資本主義底矛盾，——這是他的一點功績；但是即這點功績和他的浪漫主義學說，也完全發源於他的社會立場，即小商品生產者底兩重性的社會立場。

小商品生產者底兩重性，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而在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代，它就表現於西斯蒙蒂主義，即表現於對資本主義和古典派政治經濟學的評判和經濟浪漫主義。工業革命把一切以小生產為經濟基礎的舊關係盡行破壞了。堅持保守的小市民層觀點的西斯蒙蒂，當然

不會瞭解這種「破壞」底意義的。他所願望、所呼籲和所要求的，主要地就是「阻止破壞」。小商品生產者（小市民羣）是勞動者同時又是生產手段所有者，他們的社會本性要求着反對資本主義而保持自足自給的小生產經濟。

西斯蒙蒂雖然嚴密地觀察着上述的破壞過程，可是他沒有根據那種觀察立即建立起特殊的理論體系來。他的浪漫主義經濟思想體系是逐漸形成起來的。在他開始著作生涯時，他還是個亞丹・斯密底信徒。他第一部經濟巨著「商業之財富」（Richesse Commerciale）係完全依據「國富論」底原理寫成的。在年輕的西斯蒙蒂頭腦中，自由主義的傾向是高於保守主義的。當西氏初次到英國去的時候，他還是古典學派生徒。小商品生產者底本性，起初以其自由主義方面支配西斯蒙蒂底意識，到後來才以其保守主義方面表達於西氏底學說。起初，西斯蒙蒂和賽依等人一樣，也是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 Principle）底主張者，可是後來他却變成這種口號底極端的反對者了。那時他認定自由競爭和自由玩弄個人利益是一切罪惡和一切禍患底根源。要跟這種禍源做鬥爭，只能靠國家政權干預經濟生活的辦法，靠調節經濟生活底整個制度，纔能奏效。

這樣，西斯蒙蒂底主張，就由經濟自由轉變到國家干預了。因而他對於國家和國家職能的見解也跟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不同。經濟自由主義者（如西尼歐、巴師夏等）竭力限制國家政權底職能，把後者祇歸結於維持秩序和保護財產。西斯蒙蒂則將關注民衆——尤其勞動民衆——福利一事，也歸入國家底職責中去。西斯蒙蒂不瞭解國家底社會本質，而直率地幻想地要求上層市民羣所把持的國家權力來關注下層勞苦民衆底福利，這種幻想，西氏自己是不曾察覺到的。

講到經濟制度方面，西氏斥責自由競爭制而提出中世紀式的手工業行會制來跟它對抗，他所要

求的就是這種手工業的行會制，手工業者佔有生產手段；他們不依賴遼遠的、他們所不知道的市場；他們爲自己定貨的主顧或鄰近的市場而生產；那裏沒有階層的劃分，學徒和從業人經過一定年限都可以升爲行東的。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作者把小生產的農民經濟理想化了。他把小農經濟跟資本主義化的大農經濟對立起來，而認定前者是理想的經濟。他說在小農經濟中，生產底三要素——勞動、土地和資本——是聯結在一塊的；在大農經濟中，它們却各自分裂。在前者，生產服從着消費；在後者，則消費有賴於商品底實現。而這却不是常常可能的事。因此，小生產（工業的也包括在內）在西斯蒙蒂看來是一種理想的生產。他這種理想顯然帶着囘復到中世紀黑暗時代的那種妄想成份；可是同時他又不能不明白，要完全恢復到舊時的經濟生活，事實上已不可能，要藉恢復舊制度來重新聯結已分裂的生產，已不可能。

但是社會主義又不是西斯蒙蒂所認爲適當。關於社會主義者，西氏曾發表過這樣的評論：「有些人以其愛人類的熱情……倡議一種完全新的社會組織，而稱之爲合作制度。這組織要用集團底利益去代替個人利益，此種集團之目的在於執行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工作。渦文便是這一派最有名的一位代表，他在英國和法國有很多的信徒」。他對於社會主義學說的本身，避免做實質上的批判，他僅僅憑空斷言道：「但是在我看來，他們所建議的方法是不適於達到那種目的的」。（註五）這裏所說的目的，西氏以爲他自己的跟社會主義者的（目的）一樣：同爲消滅現存的生產品分配不公平的制度。

這裏，小市民層底兩重性表現得最爲露骨。小市民層底思想家西斯蒙蒂，一方面替勞動的小生產者說話，主張反對資本主義及其自由競爭制；另一方面替生產手段所有者的小生產者說話，他又

主張反對「以集團利益代替個人利益」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所賴以存在的個人利益，照西氏底意見是應當保存的；但是這種個人的利益應當加以限制，應當以小生產者底個人利益爲限。

西斯蒙蒂曾氣忿地拒絕別人給他的責備，——責備他爲技術進步底反對者。實際上他的確不反對技術的進步，不過他企圖把技術進步的利益限制於小生產者底利益範圍內罷了。

假使說俗流經濟學者拚命地在宣傳現代社會底利益調協（或和諧），把資本主義社會描寫得像天國樂園一般，那末西斯蒙蒂却對於資本主義底矛盾不願有所掩飾。不過他認爲資本主義底矛盾祇由於自由競爭和生產底無限發展，而不知道這些矛盾是內在於商品生產者，因而他就有好些願望，改良現制度的種種願望。下面就是他的願望：「我希望不論工業或農業企業都分成大量的獨立工場，而不操縱在管理幾百幾千工人的一個大企業家手裏。我希望實業資本爲很多的中等資本家所分有而不爲擁資千百萬的一個人所獨佔。我希望今後工廠工人有一種希望，而且差不多有一種自信：相信他是自己業主的產業底參加者……；可是眼前的工人則期待到老，一輩子也沒有改善自己境況的希望。然而要實現這些改良，我却主張用逐漸的、間接的立法機關所採取的手段，我祇要求廠主與工人間底關係完全公平，要求廠主對於他所加於工人的損害負責任。我希望法律經常地助長遺產底分散而不促進它的集中；法律應當給廠主以獲得金錢的或政治的利益以加強他們跟工人們的聯繫之機會，給他們以在較長的時期內僱用工人，並予工人們以參預企業利潤之分配的機會。也許到那時候，較好地運用着的私人利益，自身會除去它所加於社會的禍害。到那時候，廠主將致力於工人境遇底改善，引起工人們對於所有權和蓄積的興趣，簡言之，廠主們將致力於轉變工人爲人和公民，然而在現時他却在努力於使工人轉變爲機器」。（註六）

那末怎樣實現這願望呢？西斯蒙蒂很坦白地承認道：「在我指出了如何才算公平之後，我們就自己覺得完全沒有能力指出實現願望的方法。」（註七）

西斯蒙蒂連自己所說的一些狹窄的實際辦法也不相信能夠實現；這就充分地表現了他的主張底幻想性，他所幻想的實際辦法底基本原則是要建立企業主和工人中間的族長制（Patriarchal system）的關係。他的主張就是要企業主關心工人們底生活，企業主應當在工人失業、殘廢和衰老的時候，也要對他們的生活負責。為了這樣，企業主就應該組織一個公會，共同來準備一筆必要的基金。最後，西氏又主張工人亦當參加企業利潤底分配。

這樣看來，假使把西氏當做批評家來看時，他的見解是跟「利益和諧」論者分歧的；因為他認定在現代社會內，企業主與勞動者，大財主與小生產者底利益都是衝突的，絕對不和諧的；可是把他當做改良家看時，他却跟「利益和諧」論者站在同一立場；因為他所提出的一些實際辦法，仍然以承認資本制社會內有利益和諧之可能為前提的。西斯蒙蒂和俗流經濟學者所不同的，祇在達到和諧的手段；俗流學者認為自然而然地（即通過各個社會羣底爭逐私利就會達到利益和諧的；西斯蒙蒂則主張靠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手段來實現各階層利益底調和。不論俗流學者或西斯蒙蒂都一樣地不知道：在資本主義的私人壟斷制基礎上，社會利益底調和是沒有可能的。

最後，西斯蒙蒂對於人口問題的見解，也值得提出來約略講一講。他批判馬爾薩斯時，正確地指出了人口繁殖的可能和實在的人口繁殖是完全兩件事情；實在的繁殖，總常常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發生的。西斯蒙蒂又正確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內人口過剩底不可避免性，雖然他沒有而且不能揭露出這種不可避免性底真實原因來。可是上面這一切正確的見解，都被他自己的結論一筆

勾消了。他的結論是根據上面的見解（即資本主義社會內人口過剩底不可避免）而加深和發展他的小市民羣的觀念；彷彿只有由小生產者羣所組成的社會，才是最合理的，即沒有人口過剩之危險的。只有在小生產者羣的社會內，人口底增長才跟實在收入底增長相適合。

第三節　西斯蒙蒂底研究方法與對象

西斯蒙蒂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一書中，是從經濟學對象之界說開始的，他寫道：「人類底物質幸福，就其能成爲政府之任務的，就是政治經濟學底對象」。（註八）我們已經知道，古典學派把經濟過程當作自然過程研究，即是說，當做自發的自然現象底過程來研究。西斯蒙蒂則確定政治經濟學底任務在於研究這些爲政府所調節和指揮的過程。古典學派所感興趣的是財富如何生產、如何流通和如何分配的問題。西斯蒙蒂則關心到政府如何指揮和如何領導財富底生產、流通和分配的問題。這種見解是跟西氏底總觀念——即反對「放任主義」而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那種觀念——相吻合的。

這樣解說政治經濟學底定義，證明西斯蒙蒂把政治經濟學跟經濟政策混爲一談了；很明顯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只是一種經濟政策底行爲而不是經濟活動及其法則本身。而且西斯蒙蒂對於經濟政策的瞭解又是完全主觀的和抽象的。他根本不知道一定的經濟政策不祇是主觀的東西，它同時必然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底產物，它必然適應着某一特定歷史時期之經濟組織底要求，亦即適應着這一歷史時期之經濟上（因而又是政治上）的支配者羣底要求的。所以經濟政策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同時它必須是歷史地具體的。

當他給政治經濟學底對象下「新的」定義時，他又駁斥古典學者底方法。他把古典學派底方法當作抽象的方法來反對，他常常責備古典派學者從人那裏抽出財富來（即捨去了人來談財富），可是事實上財富底目的却在滿足人底需要。同時據此又責備他們捨去消費而談生產。

但是西斯蒙蒂批判古典派學者底抽象方法時，自己的立場也是很抽象的。他所談的只是一般的人，抽象的人，而不是在具體的生產關係中佔着一定位置的人。他所說的人是一般地「領有財富和享受財富」的人。然而事實上這樣的人，祇存在於西斯蒙蒂底想像中；這種人就是理想化的小市民，亦即西氏所企慕的一種小有產者。因此，西斯蒙蒂所說的人，不只是抽象的，而且是主觀的，把主觀主義用於經濟現象的研究，就表現西氏比古典派學者退步的地方。

固然，西斯蒙蒂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採取批判態度的。這是他比古典學派進步的地方。但是他的批判是抽象的批判，是依靠某種理想的批判。同時這種理想又被他抽象化了，猶如他的論敵們把資本主義現實存在抽象化一樣。假如古典派學者認定資本主義現實是正常的、自然的，那末西斯蒙蒂却咀咒這種現實，因爲資本主義制度跟他所認爲正常和自然的制度不相適合。

西斯蒙蒂是一位大歷史家；可是這位大歷史家却跟非歷史家的李嘉圖一樣地不理解眞實的歷史主義（Historism）——即依據客觀的歷史發展法則底觀點去解釋現象，依據一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去考察現象。不論西氏也罷，李氏也罷，他們的研究俱以各自所認爲正常和自然的抽象概念爲出發點。二人之區別僅僅在此種概念之不同的應用。李嘉圖應用此種概念於所存在的，西斯蒙蒂則應用此種概念於應存在的。前者認定現實的就是正常的、自然的；後者却認爲按照一定的理想（即是他的小市民層的理想），靠國家政權底力量來創造的，纔是正常的、自然的。所以我們應當明白，

當西氏責備古典派學者沉醉於抽象思惟時，實際上他是在責備他們的客觀主義，即責備他們只知堅執實在的現實，而不顧及主觀的願望。

西斯蒙蒂底主觀主義不僅表現於他對客觀事實和事件的估量，而且又表現於他對它的說明。古典派學者用種種方法說明經濟現象底發生和發展是自發的（Spontaneously），是被各自利益所指揮的許許多多人底行動之自然的結果。西斯蒙蒂卻把決定的作用歸之於政策——在一定的主義領導之下施行着的政策。「人意統馭世界」，——這便是西斯蒙蒂底方法論所根據的一個唯心論的原則。他主張根據這一原則去解釋一切現實。假如遇到惡劣的現實，遇到被西氏所唾罵的現實時，那在西氏看來只是人意錯誤底結果；要改變現實，就必須改變這種不正確的人意。因此，西氏認爲估量事實和事件，對它們作道德的斥責或贊助，便是改變或鞏固這些事實和事件（意即客觀的經濟現實）的唯一手段。

這麼一來，倫理就處於對政治經濟學之主導地位了；政治經濟學應當遵從倫理底「令諭」而建立起來。他的責備古典學派，說後者研究財富時捨去了人，實際上這是在責備他們不把倫理放在政治經濟學之上，不認倫理對於政治經濟學之主導作用。西氏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所說經濟現象應當跟一切社會現象密切聯繫起來研究，這句話底實際意思也不外乎經濟學應當服從倫理。

總之，西斯蒙蒂底方法上的根本缺點是他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他並不站到時代前面去推進社會經濟底發展，而是相反地企圖把社會拉往後退——重新再造出一個自足自給的小生產者底甜蜜之鄉來。

但同時西斯蒙蒂也有他的長處。小商品生產者底兩重性促使代表小商品生產者意識的思想家底

方法，也帶有兩重性。他對於大的資本主義所有權持嫉恨態度，他把這種所有權底集中和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諸矛盾，明白而顯著地描述出來了。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採取這樣批判的和戰鬥的態度，這在當時確是一大進步。可是他既擁護小市民小私有者底所有權，並且把這種所有權理想化了，他就看不到，而且不能看到資本主義的矛盾在單純小商品生產中已有其萌芽這一事實；他不知道小商品生產是每分鐘每秒鐘都在那裏大量地產生出資本主義的成分來的。西氏在發達的資本主義關係和不發達的資本主義關係之間築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萬里長城，這樣他就自己阻塞了正確認識兩者的道路。西斯蒙蒂不瞭解資本主義跟小商品生產之不可分裂的自然的聯繫；他不瞭解這是同一商品經濟底兩種形式或兩個不同的階段。他却把它們看做完全不同而且相反的東西；所以他一隻手高舉起反對大資本的生產——商品經濟底一種形式——的旗幟，另一隻手則又舉着擁護小商品生產（特別是小農業）——商品經濟底另一形式——的旗幟，並且把它描寫成為最高的理想制度。

由於西氏是小市民層底思想家，所以他具有兩種「資格」：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底批判家，所以站在同情一般勞動者底立場，向資本主義攻擊；同時他又是小商品生產底擁護者，所以他完全站在小私有者底立場，做他回到黃金的過去時代去的美夢。

好些經濟思想史學者，如季特(Charles Gide)、英格蘭姆(Ingram)等人，把西斯蒙蒂當做歷史學派或社會倫理學派底先驅者，實際上這是重表面而不重實際的看法。從表面上看去，因為他是個歷史家，他常常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經濟，彷彿是個歷史學派底首創人。同時，因為他主張政治經濟學受倫理學底指揮，所以又彷彿是社會倫理學派底首創人，然而這只是表面上的類似而已。在這種類似的外表之下，却隱藏着不同的社會立場。西斯蒙蒂（前面已屢經指出）深切地同情於勞動

人民；固然他是站在小市民層底立場去同情勞動者的，可是他站在勞動者方面去進攻資本主義，這一點總是事實。而建立歷史學派或社會倫理學派（註九）的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學者，都是替資本主義辯護的經濟學者。在歷史學派底時代，即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病態業已嚴重的時代，社會的動盪已在不斷強化和普遍起來，歷史學派（連社會倫理學派在內）的經濟思想者，則不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所以從本質上講（不從外表上講），西斯蒙蒂絕對不能歸入歷史學派或社會倫理學派。稱他所謂經濟浪漫主義（或浪漫主義的經濟學派）底建樹者，是比較恰當的。

第四節　論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

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開始就寫着：「生產是人類財富底泉源，它是人類底願望和需要所引起的」。又說：「……人類天性中被賦予諸種需要和痛苦，刺激着我們去活動，並且推動着我們去發展；假如能從世界上驅除需要的話，那末我們同時就連一切生產活動都給驅除了」。從這幾句話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底一點基本思想，就是需要和消費駕於生產之上的主導性。

假使說斯密及其學派底研究中心是「經濟的人」（"homo oeconomicus"），即從事生產和貿易的人，那末在西斯蒙蒂看來，人首先就是消費的主體。在西氏底觀察中，人底從事生產，祇是就他的需要所指揮的限度內的生產而言。依據這個基本論綱，西氏做出了對於他的整個觀念有重要意義的一些結論來。第一，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內，生產是不能無限度的，因爲那裏根本沒有無限度生產的刺激。他拿人類底需要按照它們的急迫性底程度來分類，從而他就發見，並非一切需要都是對於勞動（特別是繁重的勞動）的刺激力。第二，他認爲只有在階層社會內，可能發生無限度的生

產，這種無限度的生產本身又是社會不平等底不斷發展和加深的原因。在這種社會內，生產被那些不勞動的人們的需要所決定；這些人不費絲毫勞力而能隨心所欲地滿足自己的一切欲望。西斯蒙蒂說：「只有當奢侈品被他人的勞動所購買時，它才有存在的可能」。接着又說：「勞動生產力底無窮的增加，其結果祇能是有閒的富人們底奢侈和享樂底增進」。（註十）第三，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爲廣大的市場而生產底階級社會內，無限的生產引起了極大的困難，因爲這種無限度的生產是靠縮小消費來達到的，其結果必然是供給超過需求。

從這三點結論中所得出來的總結論，只有一個：各個人底幸福和整個社會底幸福都不在於生產和生產力底發展，而在於確當底利用所創造的財富和公平的分配這些財富。固然，西斯蒙蒂並不一般地反對技術底進步，相反的，他常常熱烈地主張技術底發展而怨恨技術底落後。可是因爲他把注意底重心從生產轉移到消費上去，而對於生產和消費間的相互關係也瞭解得太過簡單，所以他把技術進步底意義限制得那麼小，事實上與否定技術進步之意義無異了。

西氏底研究出發點是一種完全無內容的「眞理」，他說「人一生下來就把各種需要帶到這世界上來」，而這些需要便是迫着他去從事生產的刺激力。而且他的觀察需要也是抽象的，又是純生理觀的，因爲他說「人一生下來就把各種需要帶到這世界上來的」；那末這裏所談的是一般的人，沒有社會的差別性，也沒有一定的具體的歷史性的人；這裏所談的需要是「一生下來就有的」需要。雖然表面上西斯蒙蒂竭力提倡具體，主張「歷史主義」，他還指出了原始人和現代人底需要底不同，可是生產與消費之複雜的互相關係，對於他是茫然的。假如西氏眞能依據科學底歷史主義去觀察需要的話，即是說，假如他能從人類底需要如何發展的觀點去觀察問題的話，那末他一定能夠明白

，需要底發展是有賴於生產和生產力之發展的。須知生產底發展不但完全能滿足現有的需要，而且還能生產新的需要。

關於這個問題，近代經濟學名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導言中有以下的一段話：「生產不僅供給需要以材料，而且它也供給對材料的需要。當消費脫離了它的原始的自然的粗野狀態和直接狀態時，……它本身，即當做生產之刺激看的它，就成為被事物所決定的了。例如藝術作品，——其他任何物品都如是，——本身創造着理解藝術的和能夠玩賞美的歡衆。因此，生產所創造的不祇是為主體的事物，而且也創造着為事物的主體」。

西斯蒙蒂也沒有忘掉歷史，然而他的歷史是從魯濱遜式的生活開始的。在他的「新原理」中有一整章專門討論到「孤獨之人底財富」（即該章之題目）。在這一章裏面，他詳細地敍述孤獨者如何滿足他自己的各種需要，首先是最迫切的，然後漸次及於比較不甚迫切的需要。一句話說，西氏在該章中「證明了」需要如何推動生產的情形。

西斯蒙蒂說：「這個人（按即孤獨的人）底歷史就是全人類底歷史」。接着又說：「諸凡對於單獨的個人是對的一切話，對於全社會也一定是對的，反過來說亦然」。（註十一）但是他却也不得不承認：一個孤獨生活的人底富或貧，是很容易明白的，可是在交換社會內，物品底交換使財富帶有某種混亂性，使財富從一種肯定的事物（在魯濱遜式的生活情況之下）轉變為一種『差不多形而上的』東西了。西斯蒙蒂之所以感覺交換社會底財富是「差不多形而上的」（意即玄奧的，捉摸不住的），這是他以孤獨者（魯濱遜）之財富觀為出發點的緣故。他腦子裏底財富觀既然以孤獨之人底財富為根據，那末對於商品交換社會底財富自然完全沒法分析了。

正因他以魯濱遜式的經濟生活爲出發點，於是他把生產和消費這兩個範疇等同於供給和需求，把生產與消費底關係解作供給與需求底關係了。在魯濱遜式的生活場合之下，消費總在生產之前，因而西氏確定，在商品交換社會內，需求應當在供給之前。這就是他的消費（需要）主位論。實際上，很明顯的，魯濱遜式的孤獨生活場合上的生產與消費及其互相關係，跟商品社會內通過交換而實現的供給和需求及其相互關係，是大不相同的。

西斯蒙蒂底觀點既是如此，所以他反對賽依和李嘉圖底見解。照李、賽兩人底意見，先有了某種商品底供給，然後才發生對別種商品的需求；換言之，一商品底供給就等於另一商品提出了需求；因此供給也就是需求。西氏底見解則反是，他以爲先有了需求，才引起供給；消費是生產之母。

第五節　論生產與分配，資本與收入

前面已經指出，西斯蒙蒂係以孤獨之人底生產與消費爲其研究底出發點。對於現代私人資本制社會底生產和分配的看法，亦復如是。在這裏西氏底基本觀點，仍然是消費駕馭生產和决定生產。同時，在西斯蒙蒂看來，分配問題是理論的和倫理的問題。他認爲不是在一切分配場合之下，經濟都能發展，都能有條理地很順利地發展起來的。這是關於這問題之理論的實質。至於這問題之倫理的實質，則在於分配應當按照每人底情形供給他以幸福。

西斯蒙蒂把批判的刀鋒對準着資本主義的分配，認爲　種分配是最不公平的，是一切社會糾紛與禍患之原因。他深深地感到資本主義底矛盾，然而他所瞭解的矛盾，僅僅是就資本主義分配領域內所表現的那種形式而言；「殊不知分配諸關係祇是生產諸關係之另一形式而已」。

西斯蒙蒂因不瞭解這一點，所以他把分配問題當做政治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底基石了。在考察分配的時候，他企圖揭露資本主義體系不穩固的原因，特別是想說明經濟危機底原因。他並主張以國家調節分配的手段，來醫治資本主義社會底疾病。但因他持看不正確的立場，結果是兩種企圖都未能實現。他確當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底諸矛盾，可是他不瞭解這些矛盾，因而也就不瞭解它們的解決過程。所以他往往從過去中尋找救濟之道；他變成了過去底頌揚者；而且他想藉收入和資本、或分配和生產之正確關係底建立以削弱這些矛盾。

西斯蒙蒂既視分配問題有決定的意義，他就集中注意於收入這一範疇，特別注意到精確劃分資本與收入之區別的必要性。那末他怎樣地確定資本和收入底界說呢？

關於這個問題，他實際上沒有對斯密所說的意見加以重大的改變。他仿傚看斯密底說法，解說資本第一是作為繼續生產之用的一部分財富；第二是生產利潤的那部分財富。我們以前已曾說明，這兩個定義遠非等同的。在西斯蒙蒂自己所舉的例子而言，就充分地證實了它們的不等同。一方面他發見那孤獨者手中的資本，是完全跟他的第一個定義相符合的；但跟第二個定義却絕對不適合，因為在荒島上孤居的魯濱遜是什麼利潤也無從取得的。在另一方面，他又認資本家所購買的工人底勞動為資本。這就跟資本底第一個定義不相適合了，——因為不論勞動，或用於購買勞動（西氏認為所購的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的貨幣，都是怎樣也不能歸入生產手段中去的；但被購買的勞動，却得根據第二個定義而當作資本看，因為它是生產利潤的。

在對收入的解說中，西斯蒙蒂也沒有明確的觀念。有時他把它解說為財富領有底結果，有時他又把它解說為當作消費用的那部分財富。前一定義是指資本主義性質的收入而言，然而它太狹窄了

；對於工資就不適用這個定義。後一定義則完全抹煞了收入底資本主義性，因為在任何社會形態之下，總有一部份財富是用於消費的。

從社會底觀點去劃分資本和收入底區別時，西斯蒙蒂底見解更含混不清了。有好些地方他重複了斯密底意見；說從社會的觀點來看，資本是生產手段，收入則是消費資料。然而他又不能貫澈這種見解到底，因為他後來把工人底消費資料歸入資本中去了（也是根據社會的觀點的）。到最後他索性就不劃分資本和收入底區別了。

然而西斯蒙蒂在這個問題上却也有一些功績。他因為要想嚴格地區別資本和收入，並想駁斥一種流行的見解——彷彿對於一種人是資本，對於另一種人就是收入的那種見解；因此他就發揮了這樣一種思想：說資本和收入不應當跟他們的物的負持者（Material bearers）混淆起來。資本和收入之物的負持者（即其物體底形態），在買賣行為底交替中不斷地變化着，而它們本身却始終留在它們的所有者（即資本和收入底所有者）手裏。西氏寫道：「然而這種價值是跟商品分離的；它變成了抽象的、非物體的一個量，後者永遠是土地所有者底所有物，但他却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最初代表這一價值的是麵包，後來變成同價值的勞動，以後又變成同價值的這種勞動底生產品，其後又變成以信用出賣生產品的一種債權（亦是同等價值），最後乃變成同等價值的貨幣；然後再由貨幣轉變為麵包或勞動。這種順次進行的交換完全沒有改變資本本身，後者始終保留在原先把它積蓄起來的那雙手裏」。（註十二）

可是因為他缺乏正確的資本觀，使他不能發展這種思想，亦不能把資本看做採取循環形式的一種運動。此外，他還被自然的資本觀綁住着，以為資本是「靜止着的一種事物」。這也就由於剛才

我們所述及的西氏兩重性的資本界說。

在其對於各種收入形式所下的定義中，也表現了西氏觀念底兩重性。西氏重複了斯密底利潤論之一，並寫道：「企業家底利潤往往不外乎對他所用的工人們的掠奪。他的獲利，不是因為他的企業所產生的，大於他在企業上所消費的；而是因為他沒有支付它全部所值，因為他不給工人們底勞動以充分的報酬」。(註十三)

在這段文字中，西斯蒙蒂又給了兩種不相符合的說法。起初說利潤是「對工人們……的掠奪」；後來却說資本家「不給工人們底勞動以充分的報酬」。這裏顯然是兩個不同的解說。我們看了西氏底解說很可以發生這樣的疑問；那末所謂剝削勞動，其實質究竟何在？是資本家佔有工人底全部剩餘勞動呢，還是他支付工人們以低劣工資？

這些西斯蒙蒂自己都不明瞭，因為他像亞丹・斯密一樣，提供了不止一個利潤論。當他視財富僅僅為勞動之產物時，他就得出結論說：利潤是「掠奪工人」底結果。可是當他視資本為生產底要素時（這裏西氏接近於賽依底「生產三要素論」），把資本跟生產手段等同起來，並且把價值和使用價值混同為一，這時他就提供了別的利潤論。他一會兒把利潤解作資生產性底產物，一會兒又把它解作資本家節儉底報償。

對於社會收入底其他範疇的解說，西斯蒙蒂也表現了類似的糊塗觀念。他的地租論即其顯例。上面已經說過，他的財富觀之一是認定財富祇是勞動底產物；根據這一觀點，所以他把地租也看做勞動生產品中的一部分。但是他同時又根據他的「土地生產性」觀來下定義，於是他就陷於俗流派和辯護派底地租論立場上去了。

就陷於俗流派和辯護派底地租論立場上去了。

至於講到工資，西氏認爲它總是停留在低水平上的；而且隨着機械底採用，技術底改進和資本底集中，工資水平將愈來愈往下降。在這個問題上，他跟斯密底見解迥異，因爲後者以爲工資是隨着社會財富之增長而提高的。其次，西氏還有一點功績，就是他十分尖利地駁斥了當時流行的一種辯護派底理論——「補償論」；依照這種理論來說，工人一方面雖被機器所排擠，但另一方面卻可因生產之一般的擴大和新生產部門之出現而很快地找到工作。換言之，工人一面遭到損失，一面卻可得到補償。這種理論是西氏所極端反對的。同時他又反對「和諧論」者底見解，彷彿工人可以因採用機器而獲得利益似的。西斯蒙蒂很公允地指出，對於一個被機器剝奪了工作或因降低工資而失去一部分收入的工人來說，生產品底跌價（由於採用機器之結果），僅僅是很微細的一點撫慰而已。然而西斯蒙蒂雖指出了勞工羣貧乏化底擴大是資本積累之必然的隨伴，可是因爲始終被狹隘的小市民層底眼界所限制，沒有看到資本積累過程底另一方面：生產力底增長，勞動底社會化，資本主義底反對力量底強大。

第六節　論價值實現與經濟危機

前面已經說過，照西斯蒙蒂底意見，生產品是拿收入去購買的。這一見解就成爲西氏底實現論（Theory of realization）底核心，同時它又是他的危機論（Theory of Crisis）之最接近的基礎。這兩個理論形成一個整體，西斯蒙蒂就把商品價值底實現問題和經濟危機問題合併起來加以解釋。可是這裏我們卻要把它們分別地考察一下。

先講實現論吧。在沒有講到實現論本身以前，我們首先要提一提西斯蒙蒂底價值論，因爲這是跟他的實現論有密切關係的。西氏也認定價值由勞動所決定。可是他跟整個古典學派一樣，也不懂得包含於商品中的勞動底兩重性。他跟古典派學者的不同點祇在他比較銳利地提到那創造價值的勞動底社會性。「在與李嘉圖進行論戰時，西斯蒙蒂特別着重地說到那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底社會性，並且指出：……價值底大小歸結於必要的勞動時間，歸結於一全社會底需要和足夠滿足這種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關係」。（「政治經濟學批判」）。

因爲西斯蒙蒂不瞭解包含於商品中的勞動底兩重性，所以他，和亞丹·斯密一樣，也只把商品價值劃分爲幾種收入。由此就產生我們已經知道的幾點結論：（一）一切收入都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底一部分；（二）在資本社會內，即在商品價值分解爲幾種收入的社會內，商品與商品的交換就等於商品與收入的交換。

後面這一論點，可以說是西氏底實現論底實質；這一點他重複了無數次。例如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他寫道：「一年的生產……由兩部分組合而成：一部分是發生於財富的利潤；另一部分則爲勞動力，後者等於它所交換到的生活資料……。這樣看來，國民收入和一年的生產是互相等衡，成爲兩個相等的量」（註十四）

商品只與收入相交換的這種論調，是亞丹·斯密將商品價值只劃分幾種收入的那個「教條」底擴充。在亞丹·斯密底論綱中，略去了不變資本；在西斯蒙蒂底論綱中，則變爲略去生產手段底購買，而把市場祇看做消費的市場了（即看做祇買賣生活消費品的市場了）。這裏就表明了他的消費和生產的學說，即消費爲主，生產爲屬的學說。在西斯蒙蒂看來，消費底意義是主導的，是駕於生

產之上的。這種以消費為主的觀點，阻止他瞭解：（一）生產只在最後的歸宿點上是以消費為目的；（二）生產分為生產手段底生產和消費資料底生產；（三）因此，在商品生產者社會內，商品底供給與需求不僅應當包括消費資料，亦且應當包括生產手段。

西斯蒙蒂當然也知道有生產手段，有不變資本（他隨亞丹・斯密之後而分資本為固定、流動兩種）；可是正由於他的消費為主的觀點，使他沒有可能重視和正確地估量到這些東西。由於他把收入與「生產」（即所生產的一切）相等同，就產生了實現與個人消費底等同。

這一種消費觀點，迫使他把資本制下所存在的為生產而生產的現象當做不可解決的矛盾。他在這種現象中看出了矛盾，並且集中注意於這種矛盾，可是他又曲解了這一矛盾。這種矛盾底實質何在，他是不知道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而沒有相適應的消費底發展，這當然是矛盾。但是現實中的這種矛盾是發生於資本主義本質的矛盾，它不容與資本主義的本質隔離開來的。

假如拿西斯蒙蒂底論綱（即商品祇靠收入去購買）為根據，則結論必然是積累沒有可能。須知所謂資本積累，不外乎一部分剩餘價值之轉變為追加資本（新增資本）。但是這部分剩餘價值如何實現呢？誰來購買體現這部分剩餘價值的商品呢？站在西氏底消費觀底觀點上是不能解答的。

然而事實上資本積累是發生了。它怎樣地發生的呢？對於這個問題，西氏並未給予明確直白的答覆。可是從他的一切見解和判斷中，可以看出他所認定的「正常」積累底條件有二：（一）小生產者底存在；（二）國外市場底存在。

西斯蒙蒂根據頭一個條件所做的結論是：隨着小生產者底消滅，使實現日益困難，市場日益縮小。他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寫道：「由於財富集中在少數人之手，國內市場就愈益縮小，因

而工業就得愈益在國外市場上尋找銷路了」。

至於講到國外市場，則隨着資本主義生產底普遍化，西斯蒙蒂認爲就得把它拋棄於計算範圍之外。因爲等到全世界都變成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時候，它就彷彿形成爲一整個的市場，即時要獲得新的購買者已不可能了。那時全世界市場底需求是等於一定的生產量，所有的工業國家都要互爭這個市場了。假如一個國家多售出了一些生產品，即它在這個市場中所佔的份額比別國大了一點，那末這是由於別個國家損失了一部份銷路的結果。（註十五）

但是實際上國外市場是跟西斯蒙蒂所提出的實現問題毫無關係的。因爲假如剩餘價值在國內市場上依據西斯蒙蒂所指出的理由而不能實現的話，那末它在國外市場上也一樣地無從實現，因爲既有剩餘生產品輸出國外，就有別種商品輸入進來，那末誰來購買這種輸入的商品呢？

以上講的是西氏底實現論，現在要講與實現論有密切關聯的危機論了。

假如生產品只是用收入來購買的，那末生產對於收入的超過，就等於生產對於消費的超過，結果就一定是工業危機。西斯蒙蒂力圖證實以下的見解：自由競爭迫着每一個企業家盡量擴大生產，結果是使後者超過了收入和消費，於是危機就發生了。

西斯蒙蒂底危機論結束了他的全部經濟學說，後者底基本假設爲生產與消費之均衡和消費對於生產的主導性。而所謂消費，在他的理解中又只是收入所限的個人生活上的消費。

他從資本主義的現實中注意到以下的一些事實。首先是由工業革命所產生的一些悲慘結果：機器排擠工人，工資下降，城市和鄉村的小生產者宣告破產。在這些事實中西斯蒙蒂又首先看到：隨着大生產底發展，生產和收入間的均衡被破壞了。其次，商店和貨棧中堆集着商品賣不出去，這是

大發生產和民衆飢寒貧乏的結果；工業危機的眞相就是如此。這樣，危機正是表明生產和收入間的「均衡」底破壞。

危機怎樣促成的呢？西斯蒙蒂回答道：由於生產超過了收入。換言之，危機是生產和消費間的矛盾底表現。這裏有着一點方法論的缺陷，就是西氏底危機論是抽象的：他把一定的生產方式抽去了。根據西氏關於生產和消費的一般論斷——卽前者超過後者的結果，總要引起危機的，那怕在孤獨生活的魯濱遜底場合中亦如此。當然在別種社會形態（非資本主義的）內，工業危機更有可能了。他認爲只要一發生生產超過消費，就一定要發生危機。他不瞭解，在某種社會形態內（例如在合理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社會內），生產品底多餘不會引起任何危機的；因爲這多餘的部分，將變成社會的積蓄財富，在計劃中規定作爲繼續生產之用了。同樣，在原始的自然經濟社會內，縱有大量生產品多餘，但是也決不會引起任何的經濟危機。因此，問題不在生產超過消費這一事實本身，而是在這事實發生在何種經濟體系之中。

同樣的，民衆消費不足這一事實的本身，也不能成爲危機底原因。消費不足的現象，在奴隸主社會和封建社會內部有過的，但是在那些社會內，却並沒有經濟危機。這又是事實。

西斯蒙蒂既從生產與消費底矛盾抽去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他就不能瞭解這種矛盾在他所研究的經濟形態內的特殊性。他不能了解在資本主義之下，它只是固有於資本主義的那個基本矛盾底形式之一。這個基本矛盾便是生產社會性與私人壟斷之矛盾。

生產與消費底矛盾不能作爲經濟危機底解釋，因爲這樣的解釋是違背事實的。事實告訴我們，危機常發生於市況繁榮之後，卽發生於工人工資和其他階層底收入最高（因而消費也最多）的那個

消除之後。那末怎麼能說危機底原因在於消費不足呢？

西斯蒙蒂似乎也察覺到這一點，似乎察覺到這種解釋的不充分，所以他又用另一解釋來補充；他說因為市場擴大而複雜，企業家不明白市況底究竟，——這也是經濟危機底一個原因。這裏西斯蒙蒂所說的，彷彿是指資本主義生產底無政府性。但是生產底無政府性決不能簡化為不明白市況，因為縱然資本家明白了市況，要是資本主義還存在的話，生產底無政府性依然不會消滅的。要知道無政府性祇是上述基本矛盾之另一表現形式啊。個別的企業家經常地擴大他的生產，不是因為他知道市場能夠銷納全部的生產品，而是因為他企圖——而且不得不企圖——把他的競敵從市場上排擠出去；不然的話，他自己就會被排擠出市場來。但這並非由於不熟悉市場的情形，乃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強迫法則使然的啊。

現在我們可以把西斯蒙蒂底危機論做出幾點結論來了。西氏底危機論是他的全部經濟學說底結論。他的危機和他的全部經濟學說，一樣地建立在現實跟理想的對立上的。西斯蒙蒂不在現實本身中去尋找客觀的和主觀的諸因素，而企圖藉對現實之道德的作用（或影響），去修改現實。他的整個理論，連危機論在內，根本上是唯心的和主觀的；它的基礎原則是生產和消費底均衡與消費對於生產的主導作用。

同時，他的危機論是抽象的，並且自相矛盾的。他不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特殊性中去尋找危機底解釋，但同時卻又承認危機是純粹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底現象。這麼一來，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就被這矛盾底諸表形式之一所代替了。

然而西斯蒙蒂底危機論，卻也有一些長處，是我們所不可不注意的。第一，它第一次不視危機

為偶然的現象，而視之為資本主義之必然之隨件：第二，這危機論乃以最集中的形式給了一個對資本主義這種矛盾體系的批判；第三，它是對「和諧論」的一個猛烈的反抗，特別是對發依底俗流的實現論的一個激烈的反抗；第四，西氏底危機論和他的全部經濟思想，始終貫徹着對勞動民衆之深刻的同情，因而引起了俗流派和資本主義辯護派底憤恨。

（註一）約翰、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卷三，第三章，或參閱韓納著，「經濟思想史」（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MCMillan, N. York）頁四一〇

（註二）同上，第九章

（註三）同上，第三章，或韓納著「經濟思想史」頁四二〇

（註四）參閱盧賓，俄文版「經濟思想史」。

（註五）西斯蒙蒂著，「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俄譯本頁二四〇——二四一

（註六）同上，頁二四一——二四二

（註七）同上，頁二三九——二四〇

（註八）同上，頁一七〇

（註九）歷史學派是現代（十九世紀後半與廿世紀之初）德意志主要的資本主義經濟學派之一。其代表有羅歇（Roscher），希德勃倫特（Hildebrand）克尼斯（Knies）等人。社會倫理學派祗是歷史學派底一支派，亦被稱為新歷史學派，如希莫勒（Schmoller）瓦格納（Wagner）諸人即其代表。

（註十）同註八，頁二九〇

（註十一）同上，頁一三

（註十二）同上，頁三八

（註十三）同上，頁四〇

（註十四）同上，頁五二——五三

（註十五）同上，卷二

第六章　社會主義學派底經濟學說

甲　烏托邦社會主義學派

引論

在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代，完成了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奠定了俗流經濟學底基礎，發生了經濟學上的浪漫主義（浪漫派的經濟學說）；這些都是在各個歷史階段上代表資本主義要求的經濟學說。可是在同一時代，又出現了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說。首先是偉大的烏托邦或空想社會主義者（Utopian Socialists）給予資本制社會以無情的批判，并拿自己的理想去跟資本制度對立起來。但是他們的理想却又跟西斯蒙蒂底理想極端相反。假如西斯蒙蒂底批判資本主義，其目的在企圖將歷史的輪子往後拉轉去，——從資本主義拉回到自足自給的小生產時代去，那末烏托邦或空想社會主義者底批判資本主義，却是從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的；換句話說，他們要把歷史推向前進，從資本主義推進到社會主義（固然他們跳越了必經的階段）。

西斯蒙蒂是個空想家，他把自己的願望建立在抽象的觀念上，而不建立在實在的利益上，而空想社會主義者，雖也一樣地是空想家，他們也把自己的計劃建立在抽象的觀念上，可是他們（即西氏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底計劃底性質却完全不同，因爲對於最近經濟的發展——他們是從極端相反的觀點去觀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預示了將來社會底情況，天才地窺破了過去機器工業在他們眼

目中所做到的「破壞」底傾向。他們所着眼的方向，正是現實發展底客觀傾向；他們實在追過了這種發展。西斯蒙蒂則與這一發展背道而馳；他的空想不是預示將來，而是恢復過去；他不向前瞻望，而只是往後回顧。他夢想停止資本主義底發展，希望他回復到小生產經濟去。

在這一章中，我們將不詳論那些大空想家底計劃本身；吾人所欲論述者只是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因爲他們猜想着這種制度底發展傾向，并把自己的眼光注射到將來，這樣他們就賦予一切社會科學以各種新的觀念，當然政治經濟學也被包括在內。弗里德列赫・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曾說：「德國的理論的社會主義，從來不會忘記他是站在聖西門、傅利埃和渦文這三位思想家底肩膀上的；這三位底學說儘管十分玄幻和空想，可是他們終究不失爲當代偉大的賢人；他們天才地預言了無數的論綱，這些論綱底正確性現在我們都從科學上得到證明了。」（註）

這些空想社會主義底創造人，雖然正確地說中了他們親眼看到的那種經濟制度底發展傾向，可是資本主義底眞實本性，他們却不能了解。既不了解這點，他們就不能將政治經濟學從資本家的科學轉變爲眞實而澈底的大衆的科學。政治經濟學之澈底的革命，是卡爾馬克思所完成的。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底資本主義批判和政治經濟學底批判，并不建立在抽象觀念之上，而是以資本主義之具體的研究，以資本主義發展底經濟法則之揭露爲根據的。因此卡爾批判資本主義的學說，是社會主義底科學的經濟理論根據。不過上述幾位大空想社會主義者底批判，因爲他們說破了業已完成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底傾向，因爲他們把自己的眼光遠投到將來，所以

（註）見「德國農民戰爭」一書序言。

它（空想社會主義學者底批判）畢竟是經濟科學發展中的重要毋酵。在這種觀點之下，我們才把空想社會主義看做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中的一派學說。

正像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一樣，跟古典學派對立的空想社會主義也適應着資本制社會發展底某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勞資兩大社會羣底齟齬尚未充分發展，僱用的產業勞動者還只能被看做勞動人民中很可憐的一部份，他們只能有自發的騷動，而還不能從事社會改造的運動。這使某部份最有遠見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者把政治經濟學抬高到相當的科學水平；同時，這又使社會主義一方面具有革命批判的性質，而另一方面具有空想的性質。因此，政治經濟學底科學性和社會主義底空想色彩，是有其同一社會經濟背境的。

古典派經濟學底科學成份和空想社會主義底批判的革命成份，到後來俱被科學社會主義底創建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改造并綜合爲一個整體了。關於科學社會主義學派底經濟學說，我們留待本章後半部分（乙）中來介紹，這裏先要論述到烏托邦社會主義諸大思想家底經濟思想。

第一節　聖西門

一　聖西門底研究方法和理論

首先應當着重指出，聖西門是用歷史的觀點去考察社會現象的。這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底決定性特點之一。古典學派和俗流經濟學者視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關係爲錯誤的邪路。他們研究的出發點是自然秩序底觀念；而這種自然秩序，只有在資本制社會中才得實現。明白地說，他們以爲只有資本制社會才是唯一的自然秩序。然在聖西門看來，奴隸制、封建制、資本制（資本主義）

都是世界人類歷史中發展中一定的必經階段。

固然，聖西門還不能說出上述諸社會形態之歷史的決定性何在。他有時宣稱知識（科學）底發展爲歷史過程底動力，有時則稱經濟底發展爲此種動力。在解釋社會現象的時候，這位空想家是個二元論者。可是事實終究是事實：聖西門把歷史主義帶進社會科學中去，這確實給予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底發展以極大的影響。

西斯蒙蒂也曾注意到歷史過，但是他往往把過去看得太理想化了，特別對當時尚殘留着的手工業小生產和族長制的農業看得太理想化了。聖西門却不作如是觀：他更明白地闡明封建體制底積極方面，但同時他了解它的歷史的決定性（卽決定於歷史條件的那種性質），並揭示了它的崩潰底不可避免性底諸原因。他認定這些原因一方面在於財富和產業家經濟力量底增加，另一方面則在於科學底發展。產業家（包括商人和銀行家在內）起來代替了封建軍閥，科學家則起而代替僧侶教士。

聖西門底歷史主義，跟政治經濟學中的歷史學派底「歷史主義」完全不同。歷史學派底代表們，不知道歷史方法是認識各個社會形態底特殊性和由一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形態之轉變的認識工具。他們竭力企圖拿自己的「歷史主義」去肯定舊制度底「萬古長存」；照這一派人底意見，彷彿舊制度依然留存於新制度中，而新制度只是逐漸地由舊制度生長而成的。聖西門則不然。他，第一，指出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矛盾和衝突；第二，他指示了「有機」時期和「批判」時期間的區別。所謂「批判時期」不是別的，卽是由一個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形態的轉形期（用聖西門底口吻來說，則爲由一個有機時期到另一有機時期的過渡期）。

聖西門底二元論，大大地貶低了他的歷史主義底價值；同樣的，他的畏懼革命，也降低了他的

割分有機時期和批判時期之區別底價值。然而我們終究不能否認聖西門氏有一個重大的企圖或嘗試，即一方面他想把理論跟歷史聯繫起來，另一方面則把歷史看做通過諸種矛盾和衝突而發展的一種過程。

聖西門底歷史主義自身包含着社會紛爭底成份。不過他只看見產業家和封建份子間的紛爭；他並且常常把這種紛爭或衝突解作私有者和勞動者之間的衝突。他把工廠主、商人、銀行家和工人，都歸入勞動者這一範疇中去。在這位大思想家底觀念中，資本企業家和雇傭勞工底關係是找不着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僅比西斯蒙蒂落後，而且比斯密和李嘉圖還不如，因為斯密和李嘉圖究竟還把近代社會看成三個社會集團所構成的社會啊。而聖西門在崇揚產業家底作用時，却把他們看做國民經濟底領袖和指導者了。這是賽依底庸俗見解底重複。

聖西門底忽略勞資間利害相背這一點，一半亦由於當時法國資本主義關係不發達。到後來，隨着資本主義底發展，聖西門對於實際的勞動者的見解，就改變了。在他最後一部著作「新基督教義」（作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之初）中，因為當時法國的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聖西門就以「勞工集團代表」底姿態出現了。

可是即在他以「勞工集團代表」底姿態出現，並且宣佈勞工集團解放為其最終目的時，這位大空想家依然是勞資關係底反對者。這裏他所發表的觀點是和一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的；他們都認為勞工集團底解放不是工人們自己的事情，而是社會全體底責任；工人們底奮鬥，有時甚至還會妨害他們自身底解放的。

聖西門拿發展觀去對抗自然秩序觀；他認定自由競爭底制度是一時的制度，它屬於他所處的批

制時期。各種不同利益底競爭和衝突，應爲生產底有組織化和每個人爲一切人底幸福而工作的情況所代替。這是理想中的「勤勞者底社會」，在這種社會內，將不再有靠他人勞動而生活的坐食者。

聖西門把一切從事有益社會的工作的人，都列入「勤勞者」行伍中去；不論是勞力的也罷，勞心的也罷，在生產領域、流通領域或分配領域中做工作的也罷，——凡是從事有益社會的工作者，聖西門都認爲勤勞之人。一切有用的工作，都是社會實業底一部份。只有在「新基督教義」一書中，關於勞動者的問題，才解釋比較明確。然而卽在那裏，他也只把勞動者解作最困苦和最不幸的社會層而已。可是他對歷史過程及其發展趨勢的理解，他對於社會現象了解底深切和廣博，却表明他是一位眞正的天才。

當發展觀跟自然秩序觀對抗起來時，聖西門確比自然秩序觀底信徒們更深切地了解國家和社會底關係。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把國家底任務歸結於保衛自然秩序，因而他們認爲沒有國家，社會卽無存在之可能。聖西門天才地預見到未來國家底實質；他常常說，將來國家將變成單純的生產管理和指揮機構。所以他有一句聞名的格言，說「對人的管理將爲對物的管理所代替。」而對物的管理將以科學爲根據，以事物性質與關係底認識爲根據。因此，聖西門又極端重視科學和學術底重大意義。

聖西門理想中的產業制度底領導者，就是學術家和產業家。學術家根據現實之精確研究，擬定和創制出一些原則來，而工業家則從事實現這些原則。這樣，政治變成科學的，科學又變成實踐的了。兩者都解除了玄學的色彩而變成實證的東西。它們共同一致，爲着社會全體底幸福而領導社會。

政治和學術兩者平行地發展着；關於這種發展，聖西門指出了三個階段。最初，政治直接操在軍人手裏，它是毫無遮蔽的暴力。以後它變成了法律家和政治家底專門事務，這時已減輕了暴力底作用，把暴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以內。到第三時期，政治將變成產業家底事情，同時它就由對人的統治轉變爲對事物的統治了。根據這種見解，聖西門認爲法國革命底未完成處和革命後的危機底意思，在於法國革命沒有解決它自身的基本任務：政權和國家社會底領導權沒有轉入產業家之手。

跟政治發展底三階段相平行的，是學術（科學知識）發展底三階段。聖西門指出，在學術發展底第一階段上，學術底壟斷者是牧師和教門底代表；到後來是玄學家，後者用推理去代替信仰；到最後（第三階段）才出現眞正的科學——實證的知識。聖西門是著名的人類理性發展三階段論底眞實肖創人。這三階段是：（一）神學的，（二）玄學的（卽形而上的），和（三）實證的。

這整個的歷史觀念，都是二元論的，而且是偏於唯心論的二元論傾向。就事實方面說，他的歷史觀念犯着過分簡化和公式主義的弊病。這裏我們不想對這一觀念作精密的檢討；我們只預備把那些對於社會科學的發展有積極影響的，因而亦卽對政治經濟學底發展有積極影響的諸種肯定的契機（moments），加以指出。

聖西門把知識（學術）政治和經濟底發展描寫成一個統一的過程——通過矛盾而發展的過程。這個統一過程底發展法則；他幷未予以揭露；因爲他的發展三階段論，只不過是外表現象底描寫而已——而且還是公式主義的描寫。可是他却以極大的力量堅持這一過程底統一性，始終如一地貫澈這種統一觀。

聖西門不僅指出了國家和社會底區別，而且甚至離開國家而作思考社會的嘗試。他發揮了國家

泯滅的觀念；說得確當些，國家融解於社會的觀念。他確定地說，在他所理想的未來的「產業體制」中，「行政權是極其微弱，或差不多等於零的」。(註一)在別處，他又把社會跟遊牧隊伍做起比較來。他說在舊制度之下，遊牧社會完全由少數領袖隨心所欲地指揮着：「領袖們有無限威權，遊牧隊員則毫無勢力」；然在新社會制度之下，「領袖並不是主腦，而且是管事」(註)。這種國家和社會底相互關係觀，就是他的政治進化論底基礎。他認定政治的進化，必將達到以組織與指揮生產爲專務的科學政治之地步。雖然在他的產業體制中還存在着君主之權，但君主事實上祇爲一國之元首，而並不掌理行政之權，實際的行政權(或管理權)那時已轉入實業家和學術家掌握中去了。

聖西門雖是按照賽依底精神去解釋實業和生產，把物品生產解作效用底生產或提供服役——在這點上，他比古典學派落後了一步，但同時他却也表現了一個重大的前進步驟：他不視科學、藝術和其他各種意識形態爲獨立自在的價值，而祇是一些鞏固和膠結產業體制的因素。他把學者、伶人、音樂家等等都包括到產業軍裏去；這麼一來，他就把這些人降爲跟其他勞動大衆同等級的人了。他根本不承認爲科學的科學，爲藝術的藝術；不論科學或藝術，在他看來都是產業底不同類型，都應當服從產業，爲產業所役使，受產業底任務和目的之支配。依照聖西門底產業制度觀，事實上的社會指揮權應當操在產業家手裏，學者祇是產業家底顧問和報酬優厚的僱員而已。

最後尚須指出一點，即聖西門估量了政治經濟學底重大意義。他寫道：「在斯密以前，政治經濟學尚處於幼年時代底狀態，它曾被視爲輔助政府的工具，且與政治相混合的；到後來它日益強大

（註一）聖西門文選集俄文版頁一〇。

（註二）同上，頁九〇。

，它就具有較為明白和確定的性質，自己宣佈脫離政治而獨立。再加以不多的勇氣，再加以不多的哲學的陶冶，政治經濟學就馬上要取得它自己的真實地位了：最初，它依靠着政治，以後政治將依靠於它，說得確實些，它本身將包括全部政治了。這個時期已不遠了。」（註）

二　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聖西門

根據科學的社會思想做出發點，我們應當肯定聖西門是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但是現在要問：究竟他的社會主義表現在何處呢？從前面所述及的聖西門底理想「產業制度」（或「產業體制」）看來，他只把實業家——工廠主、商人、銀行家、農業家等人底意義估計得首屈一指的重要，試問有什麼社會主義可言呢？在聖西門底論述中，祇講到資本底利潤；他認定每一個人底收入是與所消費的勞動和所投入的資本相適應的。此外，聖西門又往往把利潤和工資混為一談。在他的「產業體制」中，並不要求私有財產制底消滅，他明明特別重視產業家（資本家）而且主張將國家社會底管理權交給產業家執掌。那麼試問還談得到什麼社會主義呢？

現代好些社會主義的學者，如華爾根（V.P.Wolgin），費列德亮（T.Fridlyand）等，便是堅定否認聖西門為社會主義者的。華爾根說聖西門底產業制度可以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底理想；弗列德亮則謂聖西門是「科學資本主義」體制底創建人。弗氏說：「他不是改造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想組織它」（註一）。至於社會民主派理論家，如愛克斯坦．古諾夫等人，則簡直把聖西門看做孟却

（註）聖西門文選集，頁二〇三。

（註一）見弗氏著，「實業主義的理想家——聖西門」一文，原文刊載一九二五年「卡爾主義旗下」雜誌第十期。

斯德的實業家了！（註二）。

但是我們要反過來問：為什麽聖西門被近代世界進步學術界公認為空想派社會主義者之一大代表呢？「在聖西門最後的一部著作「新基督教義」（Nouveau Christianisme）中，他坦白地以勞工集團代表底資格出來講話，並宣佈自己志趨底最後目的在於謀勞工集團底解放」（註三）。而謀勞工集團底解放却是社會主義者底任務。聖西門所主張和擁護的，不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也不是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而是有組織的勞動。他反對社會勞動之分散為各個別的單位（即如商品社會中的狀況）。他的產業體制實際上是勞動組織底體制；而領導這一體制的，他認為就是會組織勞動的人，即大企業家。關於後一點，他的見解是錯誤了；因為他不了解企業家只會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組織勞動，而他不把他們看做資本家，而把他們看做單純的生產組織者了。

聖西門沒有正確地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實質。我們知道，「資本家之成為資本家，不是因為他能管理工業企業；相反的，因為他是資本家，他才成為工業生產底管理者或領導者。」（註）聖西門底看法却不然，在他以為資本家之成為資本家，正因為他會管理企業并且是在管理企業，所以資本家底利得是他的高級熟練勞動之自然的報酬。

的確，在聖西門時代的法國，資本主義還沒有達到這樣高度的發展：即沒有達到管理企業的職

（註二）參閱古諾夫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史與國家論」（Cunow: Die Marxische Geschichte Der Gesell chaft und Staatstheorie）

（註三）參閱異森貝著，「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一二八。

（註）見「資本論」卷一，第十一章「論協作」。

能與佔取剩餘價值的「職能」二者分立成為極普遍的現象的那種高度；相反的，當時法國的普遍情形還是企業所有者同時就是企業管理者。當時現實的情形確是如此：資本家和企業底管理者是分不開的。因此就發生出這樣一種幻想來：彷彿資本家也是勞動者，而且是最熟練的勞動者。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就是聖西門把空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連結在一塊：他一方面因為是暴力革命底反對者，所以信賴富有者羣底理性和善良行為，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為要吸引這些富有者羣到社會主義方面來，就需要別種誘餌——物質的利益。因此他不主張消滅私產權；在他的產業體制中，企業家不僅得受與他的勞動相適應的報償，而且也可得到與他所投的資本相適應的報償。不過有一點應當特別指出的，即聖西門認為不論勞動或資本，那是由一個社團，（以社團中所挑選出來的委員會為代表）來指揮的。他認為不是一切人都能指揮生產的，只是最有才幹最有經驗的實業家，才能担負這種工作；因而他認定只有在大企業家中間，可以找到這樣的人才。

但是我們要問：在生產手段、社會領導權和國家政權都被少數資本家私人所操縱的社會裏，有不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可能的。假如聖西門理想中的產業體制真被實現的話，那時實際上必然變成資本主義而決非社會主義，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問題並不在此；我們不能把一件事跟另一件事混同起來。這裏所探討的是聖西門學說之思想的內容，即他所企圖達到的理想；他想調整資本主義呢，抑或空想地為社會主義而奮鬥。

聖西門不但把他的社會主義披上一件資本制的外衣，正如重農學派把他們的資本主義體制披上一件封建外衣的情形一樣；而且在他的社會主義理想中，還包含着不少資本主義的原素。然而這些原素並不成為他的思想體系底實質；他的中心觀念，除社會主義外，實不能給予別的稱呼。但是這

種觀念，第一，時常被寄生着許多的雜草；第二，它經常地跟別種觀念交編而存；這別種觀念，我們不妨稱之爲反封建的，它們不常掩蔽了他的社會主義觀念。

一般地說，聖西門底思想是彎彎曲曲地進行着的。可是他向着一定的方向進行着：向着社會主義的方向進行着。他的創作經過了多次的改變，可是他的創作活動從頭到尾始終是社會主義的。他的創作，始於以不確定的、含混籠統的人類底名義出面，而終於以「勞工集團底名義」出面而發表言論。但是他的志向底最終目的，却愈到後來愈見明確，比他頭幾次的社會主義體制底描述，更爲明確。這一最終目的，終於以解放勞工集團之主張底形式表現出來了。

第二節　聖西門學派

前面已經說過，當聖西門在世的時候，他的周圍曾經有過許多的學者，他們都是他的信徒。他死了之後，他的信徒日漸增加起來，並爲宣傳新學說和吸收新信徒起見，他們發行了一種雜誌，定名爲「生產者」("Le Producteur")。雜誌雖因經濟支拙、定戶稀少而不久停刊，但新學說底宣傳，却仍繼續進行不止：起初，每個聖西門派努力單獨地吸收信徒；以後則從事公開的講演；在那些講演中，他們不但有系統地闡明他們先生底學說，而且還發展了這種學說。後來把許多次講演彙集起來（均係一八二九年所發表之演詞）刊印一冊，定名爲「聖西門學說解釋」，全書包括十七篇演講稿。

這部演講集是十九世紀初葉一部優良的社會主義論集，它表現着聖西門學說發展中的一大進步，有些人對這一點加以誇大，而在聖西門和他的學生們之間，開闢了一條鴻溝：以爲該演講集中

的社會主義成份，都只屬於聖西門底學生們的。這樣的看法，當然是不對的。倒是聖西門主義者自身底見解正確，他們稱自己的集體作品為「聖西門學說解釋」，這并非無因的；因為他們自認並未創造新的學說，祇是完成和加深他們先生底學說而已。

確然，學生們底社會主義觀念，要比先生的原則上更堅定些，這是沒有問題的。他們主張廢除遺產的辦法以消滅私有財產權。我們當然不能夠輕視這一主張底嚴正意義，可是這種主張祇是聖西門觀念底繼續發展，尤其是他的社會勞動組織觀底繼續發展。正因這種觀念底繼續發展，使聖西門學派自然而然地得出上述的主張來：他們了解，在私有財產制的情形之下，有計劃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無政府性底消滅是不可能的。這種了解當然是他們的一大功績。

可是學生們和先生底主導原則，却是一致的：即社會組織——社會之經濟的、知識的和道德的生活之組織——底原則。這也正是聖西門本人底基本原則。但是我們可以說，聖西門師生們所共同的基本觀念，在其發展過程中發生了相當的變遷：在聖西門初次的計劃中，只是組織社會，反對現存的生產無政府性，力圖儘快地結束批判時期。到後來，直到他晚年的時候，解放勞工的思想却特別顯著起來，並且在他的觀念體系中佔了重大的地位。然而在聖西門學派底觀念中（固然大體上是跟他們的先生一致的），組織社會底理想一開始就明白而確定地包含着勞工解放底思想。這是因為他們是從他們先生底結束處開始的緣故。

他們比較堅定和自信地站在社會主義底立場，并且堅定地領悟聖西門底歷史主義；他們——「聖西門學說解釋」底作者們，給予私有財產制以精彩的批判。他們已不祇攻擊封建的私有權（他們的先生却主要地祇攻擊這一種），而且也攻擊到資本主義的私有權。該論文集中寫道：「財產（即

私有權——沈），從這個名詞底最平常的意念上講，乃由不作爲直接消費之用而在現時給吾人以取得收入之權利的那些財富所構成的。照這點意思來說，它就應包括土地和資本，用經濟學者底口吻來講，即生產基金。」（註）在如此給私有權以解說之後，他們就開始全面地攻擊私有權。在他們看來，私有者，就是「生產基金」底分配者。但是，第一，這些分配者對於他們自己所盡的職務，取得太多的報酬。第二，他們把這種「生產基金」分配得太不妥當：在各個區域間，各個生產部門間和各個企業家間，都分配得極不妥當。照聖西門派底意見，「生產基金」底分配，應當適應以下的幾個需要：（一）勞動工具（照他們的意見，土地和資本是屬於勞動工具的——沈）應按照每一地方和每一工業部門底要求，作有比例的分配；（二）應按個人的能力來分配這些勞動工具；（三）應把生產組織得這樣：使得它的任何部門永不感覺到不足或過多。他們認爲只有在未來社會中，有確當地分配勞動工具之可能，因爲在那種社會中，分配底職務係由社會機關來執行；這種社會機關是一切生產工具底保存者；它領導着全部的物質生產。

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指出的，即聖西門派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財產。當時有些經濟學者肯定「財產爲社會秩序底基礎」，而聖西門主義者寫道：「我們也認爲財產是社會秩序底物質基礎，然而我們對於政治組織的見解是完全跟當今流行的學說相反的……問題是在「財產」這個偉大的字在每一歷史時期是各不相同的事物，它在人類底思想中引起了不同的概念……」（註）。聖西門派接着就舉出古代社會底財產（以奴隸爲其主要形式）和封建社會底財產（表現於封主底權利）之區別爲例，以說明之。

（註）參閱華爾根編「現代社會主義之前驅」，一九二三年俄文版，頁一一九。

（註）同前，頁一四二——一四三。

聖西門學派在財產分析中所持的歷史主義，尙不限於指出各個時代底各種私產形式；更重要的是他們認定各種不同的私產形式是歷史地必然的，因爲它們都適應着社會底需要的。這樣他們就說明了爲何像亞里斯多德這樣的大思想家曾那麼熱烈地擁護奴隸制。在未來社會中，私產是應當消滅的，因爲它不祇是多餘的，而且成爲生產解體和生產無政府性底根本原因。

但是在聖西門主義者底觀念中，却也有不少的漏洞。他們認爲奴隸制，諸侯的封土制，是從掠奪和戰爭中產生的；那時的社會沒有戰爭便不能存在。「聖西門學說解釋」底作者們不了解：「私有財產底制度必存在於掠奪者有可能佔有他人財產以前，因爲暴力祇能將財產從一個人底手轉移到別個人底手，而決不能產生私有財產本身。」（「反杜林論」）

假使說，在解釋古代的和封建的私有權時，聖西門主義者不曾超過暴力論一步，那末對於資本主義私有權，他們簡直完全不予解釋。在他們的意念中，資本主義私有權祇是過去各種私產形式底「後裔」。對於資本家的財產，他們不復用歷史的眼光去解釋了。同樣的，他們也就不用歷史的觀點去解釋由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社會生產諸關係。他們因不了解資本主義底歷史使命，所以他們只看見資本主義私有權底否定方面；而這種私有權他們認爲是應當消滅的。消滅私產以後，社會便由他們所處的批判時期走入組織時期了。聖西門主義者旣不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特性（它在歷史上跟古代和封建的生產方式一樣地有根據的），因爲他們不能正確地批判當時的經濟學者，縱然他們對於政治經濟學底問題理解得比聖西門本人淸楚些。聖西門學派只知駁斥當時經濟學者底理論，只關心某種經濟理論之社會政治的結論，而對於經濟理論本身他們却不感覺興趣。講到馬爾薩斯和李嘉圖底級差地租論（Theory of differential rent），他們就憤慨起來，指斥這是鞏固

貴顯有閑階級之政權的理論；在那種爲貴顯有閑階級所支配的社會政治組織內，一部份人是靠另一部份人底血汗來生活的。這種地租論，他們認爲就是那種社會政治組織底理論根據。

聖西門學派也沒有略過經濟危機問題不談。他們認爲危機是無限制的競爭之結果。這裏，他們的觀點與西斯蒙蒂一樣：以爲在無限制競爭的局面之下，工業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們對於無限制競爭如何促成危機的問題，却不加深究，不作進一步的分析；他們離開了理論探討底道路，而即行開始駁斥那種袒護無限制競爭的理論了。該論文集中寫道：「一切由這一教義（即主張無限制競爭之論綱——說）所發生的理論，必然地建立於敵視感覺之上。然而人類却不應當永遠地互相戰鬥，而應當和平地生活着；不應當互相傷害，而應當互相幫助。」（註）

聖西門學派視資本家的私產爲過去的私產形式底「後裔」；同樣的，他們又視資本主義的競爭爲過去的掠奪和戰爭底「後裔」。但是在聖西門學派關於工業危機和產生他們的競爭的論斷中，有一點是極重要的，就是他們把這些現象歸根結蒂地都歸結於私有財產。不論是危機或是競爭，其根本原因均在私有財產制。這一觀點却比西斯蒙蒂前進了一步，因爲後者並不主張消滅私有財產而只主張限制競爭而已。

再要講到「聖西門學說解釋」底作者們關於信用和銀行的論斷。對於這個問題他們特別感到興趣，因爲他們看出信用和銀行已經是某種新的事物：未來的實業體系組織底萌芽。該論文集中有這麼一句話：「建立這一實業部門（指銀行——沈）顯然是走向秩序的第一步。」確定銀行底組織作用和銀行在未來社會中的領導地位—這種觀念是由聖西門創始的。聖西門寫道：「產業底組織乃藉

（註）參閱羅森貝著「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一三四。

銀行底建立而完成：銀行把一切產業部門連繫起來，給予產業資本以這種或那種政治的應用。」（註）科學社會主義者的列寧（V.I.Lenin 1887—1924）亦特別重視聖西門關於銀行在社會主義社會組織中的作用的見解；他認爲這種見解是一種「天才的預測」。

聖西門底信徒們把聖西門底這一觀念發揮成爲整個的理論。說銀行在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中應起着重大的作用，——這種觀念絕對地是特創的獨具隻眼的觀念。但同時也不能忽略了它的相反方面：即這種見解過份估計了信用和銀行底意義，彷彿有點近乎恩格斯所稱的「信用幻想」派。

現在讓我們把聖西門學派本身的情形及其學術活動，做出一個簡括的總結來吧。聖西門學派不僅研究和宣揚他們先生底學說，而且還力圖實現這種學說。可是在理論領域內，他們固然獲得了相當的成績，繼續發展了聖西門底學說，而在實際的行動上，他們却只顯露了聖西門主義底弱的和有害的方面。隨着該學派之轉變爲一教門，甚至轉變爲一新的教會，聖西門主義之神祕的和宗教的原素，就被提到首要的地位上來了。該學派底領袖有安仿頓（Anfanten,1796—1864）和巴沙爾（Bazar, 1791—1832）。這兩位堪稱爲這個新教會底「兩位一體的」神父。

在該學派組織上起重大作用者，還有一位叫羅德利哈特（Rodrihard）的，是聖西門底最忠實的信徒之一。羅氏底專長本是數學，可是關於信用和銀行底各種問題他寫了很多東西。話雖如此，該學派之理論主腦却是安仿頓和巴沙爾。安仿頓留給我們不少的作品，其中有一種叫做「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可是安氏大半迷惑於聖西門主義底神祕方面和宗教方面，而他的行動則特別表現得像一個教會底神父，因而每被人呼爲「安仿頓神父」。另一位聖西門學派底領袖是巴沙爾。巴氏之加

（註）參閱一九二三年「聖西門選集」，頁一四六。

入該學派，已在聖西門死了之後；他過去有過很大的革命功績，是法國卡蓬那里社（French Society of Carbonari 一八二〇年）底首創人之一，該社之任務在於推翻路易十八。巴沙爾在這一時期的活動，結束於他的參加科爾摩（Colmort）和培爾福（Belfort）的暴動（一八二五年），他就因此而被判處死刑。自巴沙爾成爲聖西門主義者時起，他就由一政治的陰謀家和貧產制共和國的奮鬥者轉變爲和平的社會主義者了。在聖西門學說底理論部分底探討和發展中，主要的功績便屬於他。同時他又是聖西門學會底主要講師。他將聖西門底見解和觀點整理成爲一個嚴密的體系。在被他所發展和加深的聖西門主義中，他找到了下列一問題底解答：法蘭西革命底口號——平等、博愛和自由——如何跟現存的私有的財產制相調和？巴沙爾對這個問題的答復是否定的，因而他就成爲廢除私有財產制底積極主張者了。

第三節　傅利埃

一　概述

傅利埃主義和聖西門主義是兩個「嫡親兄弟」。它們產生於同一時代，同一國家和同一社會政治與經濟條件之下；可以說是同一樹幹底兩條枝椏，這個樹幹便是烏托邦主義或空想社會主義。然而這條枝椏却也有不少的區別；每一枝各有其特殊的徵質。它們對於社會和經濟思想底發展，對於社會主義底發展；亦各有其不同的影響。關於聖傅二人學說底比較，科學社會主義底建樹人之一恩格斯曾作如下的估計：

「假如說聖西門見解底英明廣大，容許他抓住差不多一切晚近社會主義觀念底萌芽……，那

末，傅利埃却給吾人以深刻的現存社會制度之批判，而且這種批判還是用純法國式的智才表現着的。他抓住了革命前資產者羣之鼓勵的預言家和現時資產者羣所買收的奴才們底說話。他無情地揭露了資本主義世界之全部物質的和精神的貧乏，並把它跟光明燦爛的諾言——說理性、文明和人人幸福底世界，以及人類無窮的進化行將到來的那種諾言，——作一比較；他指示出何等渺小的現實配合着當時資產者思想家之誇大的贊揚的演說，並表達出他對於這種言論底最後失敗的全部諷刺。（註）

傅利埃（Francois Fourier，1772-1837）底批判，不祇具有社會政治的性質，亦且具有經濟的性質。雖然嚴格地說，傅利埃也不是一個經濟學者，雖然他的觀念裏充滿着各種的空想，可是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注意集中於未來社會底經濟組織，並將它跟現代社會對立起來。他明確而冷酷地揭露了現代社會之經濟的不穩固性。傅氏對現存經濟關係之更深刻的和全面的批判，促使他實證主義地去探討許多的經濟問題——技術專門化和分工的問題，城市與鄉村對立的問題，生產和分配的問題等等。

傅利埃主義中包括着幾種成份，主要地是對現制度的批判和對關於未來社會的幻想。對於政治經濟學史有直接意義的是傅利埃學說中的批判部分。不過其他的部分我們也得加以探討，因為不然就無以了解他的學說底全部價值。而且對於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包括社會主義經濟之理論研究在內的政治經濟學，詳細探討未來社會之經濟結構的那部分傅利埃學說，亦是有重大意義的。

傅利埃學說中的空想主義成份（甚至玄幻的成份）跟現實主義的成份交織着。這些成份及其批

（註）參閱恩氏「神聖之家族」。

判的估量，對於社會主義底政治經濟學有重大的意義。固然社會主義底政治經濟學只能在社會主義的現實（如今日之蘇聯）中，在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底基礎上，才能暢順地發展起來，但是爲要明瞭科學社會主義實現底原因，則考察傅利埃的空想社會主義底現實主義成份，是頗有必要的。

傅利埃底空想主義，跟別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不祇在於他幻想靠「良善的」資本家或慈善的有產者來實現他所理想的社團或協會（association）那一點；空想主義底基本實質在於他企圖循和平的途徑以達到社會底根本改造，而且以爲只有循和平的途徑可以達到。

還要指出一點，卽傅利埃底社團底結構本身和它的經濟基礎，跟科學社會主義毫無相同之點。他的社團由許許多多小規模獨立的經濟單位（稱爲「集隊」）（Phalanx）組合而成。社團底組織原則是完全的分權制，幾乎與無政府主義相彷：它的經濟基礎是農業；工業僅被視爲輔助農業的行業。在這點上講，傅利埃主義還比聖西門主義落後一大步，因爲聖西門主義是以進步的、高度有組織的工業（或實業）爲出發點的。

雖然如此，傅利埃底未來社團說，直到眼前卻仍未失去它的意義。例如分若干集團或隊伍的勞動組織，按照工作人員底心向或性情的勞動組織；各個集隊中供給公共伙食和日常生活需要的組織；按照社團基本原則之精神以實施兒童敎育與訓練；實行婦女底徹底解放；將勞動由困苦的重擔變爲人人願幹愛幹的愉快的事業；最後是實行競賽制。所有這一切理想的原則，直到今日仍一一保留它們的實際意義。它們已在社會主義的蘇聯，一一實現出來了。

二　方法

在方法論上，傅利埃底立場跟被他嚴厲批判的經濟學者（主要的是指古典學派）一樣，他和他

們都以人類底本性為出發點，並認定這種本性是永遠如此的。

這種固定不變的人類底本性，是傅氏底情慾論(Theory of passion)底基礎，而後者又是他的全部思想「建築物」之基礎（指方法論方面）。傅利埃歷述人類底情慾有十三種，都是人類本性之自然的、永久的屬性或品質（attribute）。在他寫述某種情慾的時候，他常常懷着情慾為上帝所賦予的那種思想；這就是說，他認為情慾不是歷史發展底產物。

傅氏曾竭力攻擊道學先生們主張壓制情慾的思想。他寫道：「一切被稱為義務或責任的哲學幻想，跟人類本性毫無相似之點；義務發生於人類，慾望發生於上帝；因此，誰想知道上帝底意願，必須研究慾望——本性自身而完全撇開它跟義務的一切關係；因為義務觀念是一世紀與一世紀都不相同的，而情慾底本性則任何民族永遠不變。」（註）

這樣，傅利埃認定義務觀念是每世紀不同的；他認為義務和道德是人工的現象，它跟自然現象情慾相對立。因此，他的歷史主義只應用於人工的、痛苦的現象，只應用於否定的因素。照傅利埃底意見，歷史過程底意思在於使自然的和正常的免除非自然的和非正常的影響。可以說，傅利埃歷史主義是否定性的、消極的；它不應用於積極原理（他認為那些原理是不發展的）而只用於否定的消極的原理：各種制度和各種道德形式在不斷地改變着。依照這種觀點，歷史主義並非別的，祇是自然現象為解除人工現象影響的奮鬥過程觀。這樣的歷史主義也是重農學派，亞丹・斯密等人所承認的。在所有這些思想家看來，自然秩序（即人類本性說底另一表述）跟人工創造的制度和人工施行的不正確的政策、危害自然秩序的政策，進行着不斷的鬥爭。這就是說，自然秩序不變性底肯定

（註）見傅利埃文選集，頁三四。

者，承認人工創作的東西是有歷史性的。

照傅利埃底意思，人類底本性向來就被歪曲着的；它被人工的條件阻止着，不能按照它內在的情慾自由地表現出來，因而就採取歪曲的形式。只有在未來的理想的「社團」內，情慾纔能獲得充分的自由表現的機會。傅氏確認「社團」是人類唯一的社會組織。人類一產生就和諧的，而且是為和諧而產生的（上帝所創造）。人之情慾相互間有一定的適應關係，處於一定和諧狀況中；它們是分着許多組或系列而發生作用的。

在文明社會中，這類系列並無一定的秩序與形式，因此情慾所能賜予這一社會的，只是混亂。假如說當時的經濟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發生於人類本性的秩序，那末傅利埃却相反，他雖稱資本主義社會為文明，却認為這種秩序是不自然的。照他的意見，只有當現代的文明被新的傅利埃主義的和諧組織所代替時，自然秩序纔算實現。

由上所述，可知傅利埃跟他所批判的經濟學者雖有許多見解分歧之點，他們的方法論還是有共同點的。必須揭發人類本性並適應此本性之要求以改造社會關係。依照那些經濟學者底解說，人類底本性要求各個生產者之間生產底分散和自由競爭；而依照傅利埃底解說，則相反的，它要求組織成為生產的社團而消滅自由競爭，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組織中，情慾不僅自由地正當地表現出來，而且又變成凝固和調節全部社會生活的力量了。

那末歷史底作用何在呢？它是否替新的社會組織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傅氏底形而上的人性觀跟他的辯證法的人類歷史觀交織着。「傅利埃對人類社會歷史的見解，是高於一切的。他把歷史底全部過程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野蠻狀況，半開化狀況，族長社會和文明社會……。他指出了不可克

服的和永遠新生着的諸種矛盾底「迷魂陣」；文明就在迷魂陣中運動着；所以它常常達到跟它所企圖達到的相反的結果。例如他說，「在文明社會中，貧乏是過剩本身所產生的。」很明顯的，傅利埃也和他的同時代人黑格爾一樣地精通辯證法。依據同一辯證法的觀點，他確定說，那怕當時流行着人類有不斷進步之無限能力的理論，不但每一個歷史階段各有其發達和衰落的時期，而且人類全體歸根結蒂亦必趨於消亡。傅利埃底這一觀念，在歷史科學中所佔的地位，是跟康德底地球必歸毀滅的觀念在自然科學中所佔的地位一樣的。」

思想家的傅利埃，以天才的眼光觀察人類所經過的歷史道路，實堪稱為一位辯證法家；但是空想家的傅利埃，不從矛盾本身底發展中，不從社會運動中，而從偉人底發見中去尋找文明社會矛盾底解決途徑，——這裏他又變成一個形而上學者了。其所以如是，根本原因還在於那時資本主義社會底社會矛盾尚未充分發展。他以天才的眼光指出：「文明」祇是過渡到其高無匹的社會形態的一個歷史階段。這是辯證法指示他這樣說的。可是因為他看不見那種能夠實現這種變革的實在力量，於是他又陷於烏托邦，這是使他走入形而上的道路的原因。

在傅利埃底理論體系中，不僅形而上跟辯證法的觀點「和平共居」着，而且還有唯物論跟唯心論的成分一樣地「和平共居」着。傅氏寫道「從我們走進文明底第三階段以來，總共祇過去一世紀；可是在這短時期內，由於實業底巨大進步，這一階段進行得異常地快，現在這個第三階段已經達到了它的自然的界限了。我們有太多的物質材料，而經濟的發展水平則未達到充分發展的高度；這些材料因找不着自然的應用之途，致使社會機體担負過重而形成了此機體失調的原因。由此也就發生了根本動搖全部社會機體的騷亂；發現了衰疲之有害的徵兆，而此種衰疲底徵兆是由於實業資料

和應用這些實業資料的太低的發展水平二者不相適應的結果。對於我們落後的第三階段而言，實業發展得太弱了；它需要一第四階段了。」

看了這段文字，可知傅利埃底觀念尙未明確；例如他用這樣的表述方式，如「這些材料……，使社會機體負擔過重」或「實業資料和應用這些資料的發展水平二者不相適應」等。但在上面一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傅利埃已接近於唯物論的社會歷史觀；因爲第一，他拿產業發展作爲决定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第二，他已能認識生產力（「實業資料」）跟生產關係或生產條件底發展階段的衝突（「跟應用這些實業資料的那種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然而傅氏這種本能的（不知不覺的）唯物觀點，却被淹沒在唯心論底大海中去了。傅氏寫道：「文明是人類特有的病痛，好像小孩出牙一樣；這種病痛已延長了二千五百年之久，這都是疏忽的和傲慢的詭辯學者底過失，因爲那些詭辯學者不願意研究聯合和吸引；野蠻、族長制、半開化，和文明這四個時期，只是達到那種成爲人類之眞實意向的社會制度的途程上的幾個階段；而且在這種制度以外，那怕最賢良的執政者也醫治不了人民底痛苦。」（註一）

這一段話底腔調已經是另一種了。第一，在他看來；文明只是一種病痛；第二，這種病痛之所以如此久長，是「疏忽的和傲慢的詭辯學者不願意研究聯合和吸引」的緣故。第三，是前一點底產物，社團制度底到臨，乃因它適應有人類的本性，即趨向健全的本性。

這樣，在傅利埃底學說中，唯物論的幼芽是跟極端的唯心論交織着的。

三　文明底批判

（註一）「傅利埃文選第一」或羅森貝著，「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一四九。

傅利埃對於文明底第三階段——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在一個廣大的歷史基礎上進行着，開展着的，而且它又跟他的天才的歷史觀念密切地連繫着。在他看來，資本制社會只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他完全駁斥了當時經濟學者所肯定的資本主義關係底自然性和永久性的假設。他根據自己關於上帝的習慣見解，證明這樣的假設是跟那種習見相抵觸的。

這樣，他認定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是歷史地暫時的——這一認識，在方法論上有很重大的意義。固然，他是根據資本制關係與上帝所創造的人類本性不相適應這一點，演繹出它的暫時性來的；正因如此，所以傅利埃把人類底本性看做出發點和最高原則了。

可是第一，傅利埃底人類本性觀要比當代的經濟學者（主要的指古典學派）底同一人性觀，內容豐富得多，充實得多。當代的經濟學者把資產者底本性絕對化了；他們提出了自己特創的「經濟的人」（homo economicus），把它看做人種底理想範型了。傅利埃則了解資產者和資產社會關係底全部限制性（狹窄性），把這種社會關係跟理想的社團關係對立起來。

第二，我們已經說過，傅利埃把形而上和辯證法的觀點結合在一塊。他形而上地解釋人的本性，同時又辯證地理解歷史過程，把後者解做不斷轉變的許多階段和由一個時期或階段到另一時期或階段的許多次轉變底過程。

傅氏認爲他那時代的社會狀態，便是這許多階段之一；他稱之爲「文明底第三階段」。那末這個階段底特點何在呢？他寫道：「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是最後的科學妄想，他是狂熱於

（註二）傅利埃發揮這樣一種思想，說牛頓的萬有引力說應用於社會時，就採取情慾吸引律底形式。傅氏和聖西門同以牛頓底引力法則爲出發點，可是往後他們二人底見解却分道揚鑣了。

不用任何方法，沒有勞動報酬底一定比率，對於生產者或工人沒有任何保障以生產一切的一種妄想……；我們知道，工業國家底窮人，並不少於、也許還多於沒有工業的國家。」（註一）

對於資本主義底這些缺點，西斯蒙蒂已曾予以指出。西氏曾將資本主義底矛盾歸結於生產和消費底矛盾。傅利埃不同意這種見解。他發問道：「難道說，機體（指現代社會之機體——沈）底缺點只限於消費不足一端嗎？」（註二）

那末傅利埃底結論如何呢？他說：「工業主義促成了更昭著的現象——個人和集體利益底衝突。每一工作都是羣衆底仇敵，因爲後者底利益跟他個人底利益相衝突。醫生希望生病的人愈多愈好：檢察官則希望家家戶戶都有訟案。建築家在那裏夢想焚毀半個城市的大火災；配玻璃匠盼望下一陣大冰雹把屋上的玻璃都打得粉粹。假如大家都得到了惡劣的衣料和不結實的皮革，這樣他們的衣履就加倍快地破壞，——於是成衣匠和皮匠就高興極了。……由此可知，在文明社會內，每一個人都對集體處於經常的戰鬥狀態中；在反社會的、工業主義的社會組織內，我們也期望不到別的結果。」（註）

在這一段關於所謂「最昭著的現象」之尖利的描寫中，傅利埃已經提供了文明社會（即資本主義）矛盾底總結。這些矛盾就發生於「反社會的工業主義組織」，而後者自身則又被生產底零散性（或散漫性）所決定。這裏證明傅利埃比西斯蒙蒂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底特點；因爲比較和估量資本主義所需的標度，他不像西斯蒙蒂那樣地求之於過去，而求之於將來，傅利埃底理想，也不像

（註一）與（註二）羅著「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一五三。

（註）同上，頁一五四。

經濟浪漫主義者那樣地寄託於小生產，而寄託於有組織的、聯合成爲一個社團的大規模生產。

傅利埃從工業底零散性又得出缺乏之比率、工業危機、商人底統治和工人境況底惡化等結論來；實際上他們中間是不相調協的，須知工業底零散性在文明底頭兩個階段上也存得着的，可是當時却沒有危機和其他傅利埃所描述的諸現象。因此，問題底要點不在工業底零散性本身，而在這種零散性在文明底第三階段上所具的特殊性，簡言之，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特殊性。傅利埃尙未了解到這一點，所以他的批判有時深入到現象底本質，有時又脫離現象底本質，而僅就社會表面所呈現的現象加以描述——即就流通領域內，商業領域內的表面現象，加以描寫。

在他對文明社會的描寫中，不僅精確而奇特地指明了這種社會底疾病（或禍害罪惡），而且還揭露到這種疾病底根源。照傅利埃底意見，一切疾病或禍患底淵源，是工業底零散性，後者又決定了個人和集體利益底矛盾。從這一觀點出發，他乃以新的方式提出了生產勞動和不生產勞動底問題。把資本制社會關係看做絕對化的經濟學者，只能從這些關係底觀點出發來談這個問題。一派經濟學者——古典學派——認爲生產資本制社會財富的勞動是生產勞動；另一派——俗流經濟學者——則認爲一切勞動，這樣或那樣，直接或間接地鞏固資本主義體系的，均當歸入生產勞動之例。傅利埃底見解則相反：他寫道「若將文明人底勞動跟未來和諧社會中的勞動作一比較的話，我們就會知道，三分之二人民底勞作是完全不生產的或帶着否定性的。」於是傅利埃就歷述幾種不生產的分子。這種不生產的分子，他分爲三大類如下：家庭寄生者——婦女、兒童、僕人；社會寄生者——海陸空軍、征稅官、工廠主、商人、運輸人；其他的寄生者——訟師、詭辯家、有閒者、社會叛徒、積極的破壞者、破壞工具底生產者等。

照傅利埃底意見，只有在他所理想的社團內也需要的那種勞動，才算是生產的勞動；反之，只存在於文明社會內的那種勞動，是不生產的勞動。大多數婦女羣和一切從事家庭事務的僕役們底勞動，都是不生產的，因爲在未來的社團中，由於公共伙食公共生活文化的供應制度底實施，那些人底勞動已成爲不需要了。依據同一理由：上文所說的「社會寄生者」底勞動，也是不生產的。至於上述的「其他寄生者」中，有些屬於不從事任何勞動的人（如訟師和有閒者），有些則屬於從事有害工作的分子，如詭辯家和社會叛徒之流。

復次，傅利埃又發揮了在當時堪稱難得的資財集積和集中底理論。他確定地指出，文明底第三階段是向着大企業排擠中小企業這一方向發展，同時也向着藉助於股份公司底組織將許多個別的資本融合成爲一個大資本這一方向發展的。傅利埃稱大企業排擠中小企業的過程爲集積（Concentration）過程；稱股份公司底形成爲集中（Centralization）過程。這樣的解說，在今天我們看來，顯然是一種模糊觀念；因爲這裏傅氏沒有正確地了解資本集積，他把資本集中底一種方式當着資本集積看了。不過這裏重要的不是集積和集中底定義，重要的是在他正確地指示了資本主義發展底趨勢。

傅利埃根據他所預見的集積和集中底趨勢，指出他必然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他稱這階段爲實業的或「商業的封建主義」。這該是資本主義發展底第四階段；他說：「當然，自由競爭底將來的結果是商業的封建主義。它產生於一些特權的（按卽壟斷的——沈）商業公司體系之形成；那些商業公司跟執政當局相協同；它們貢獻自己的一部份利潤給執政當局，作爲取得壟斷的代價；從此它們就可對一切不在它們卵翼之下的商業實施壓迫了。它們巨大的資本容許它們能夠毫無阻礙他在

一般的商品市場上建立起自己的法則來。一切中等的產業家都該遵從它們所規定的價格。……這是文明底最後階段，而按照極端相接觸的法則，這種制度底結束正跟它的開始一樣——倒轉來實施的封建主義。」（註）

可是傅利埃底不理解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大大地貶低了他的這種理論（集積和集中底理論）底價值。在資本集積和集中底發展中，在它們轉變到所謂「商業封建主義」的趨勢中，傅氏看不見勞動和生產底社會化是在矛盾的基礎上增長起來的；因此他自己所發見的集積和集中的事實及其發展趨勢，他自己又不能予以科學的解釋：他認定集積和集中只是商人們底有害活動底結果；商人們拚命地追逐利潤，拚命地進行酷烈的競爭，並且由於競爭過程中不斷地紛紛破產，其結果是最強大的排擠和併吞了弱小的和不甚強大的企業。簡單地說，傅利埃是從流通現象中推演出集積和集中來的。

再則，因為傅氏不了解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並且將一切都諉之於資本主義商業底缺陷，因之他就忽略了「文明第三階段」底基本的社會矛盾——勞動和資本在生產領域內的矛盾。

講到關於資本意義底估量的話，傅利埃特別重視商業資本底重要性，這是已在前面指明了的。他根本忽視產業資本（工業資本）底意義，自然更想不到工業資本是主要的基本的資本形式了。殊不知工業資本是基本的資本形式；開拓文明的正是這種資本；商業資本和放款資本只是它所派生的資本形式。因為不了解這一點，所以他的批判底槍鋒老是準對着商人和銀行家，而對產業家始終盡衛護之力。

（註）見「傅利埃文集」頁六〇。

傅利埃單方面的批判「文明底第三階段」，決定了他單方面的批判經濟學者。傅氏正確地斥責當時經濟學者替現制度辯護的行爲，但是他的批判實際上却歸結於斥責經濟學者袒護商人和商業。這裏又證明了他一貫的偏重商業意義的觀點。

四　政治經濟學批判

傅利埃把政治經濟學底錯誤分割爲二種：一種是「神祕的」(cabalistic)，另一種是「教條式的」(dogmatic)，前一種錯誤他認爲由於經濟學者無力對付商業資本底權威，後者強迫他們替自己鼓吹。後一種錯誤則在經濟學者做了自由競爭底戰鬥員，並提出了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的口號；他們根據這種教條來建立他們的理論體系。傅氏——這位激烈的反重商主義者——把當代的一切經濟學者都看做重商主義者，祇有奎奈是例外。他說：『應當承認奎奈底公正思想只有他很勇敢地擁護眞理而不放棄自己的信念：商業應當服從農業底利益。可是已經出賣給商人的英國人(指英國的經濟學者——沈)却很隨便地把實現這種見解的企圖都拋棄了』。(註)

由於不確當地了解資本主義生產底特質，傅氏就不確當地解釋古典學派底思想，連奎奈在內。我們姑且不談他歪曲事實：因爲奎奈及其門徒底擁護放任主義，並不遜於英國經濟學者(主要地指古典學派)啊！但更嚴重的是另外一點。第一，奎奈所主張的不是商業服從農業底利益，而是服從資本主義生產底利益(奎奈舉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爲其說明對象)。第二，英國的古典學派原則上完全持着跟奎奈一樣的觀點；他們祇是反對狹窄的——重農主義的——資本主義生產觀；在他們看來，農業不過是生產部門之一而已。第三，傅氏把擁護自由貿易跟擁擁商人利益混爲一談了。擁護

(註)見「傅利埃文集」頁六九。

自由貿易（其口號即爲「放任主義」）是表示主張經濟的自由，即主張使資本主義生產從商業資本統治時期（中世紀末期）底一切束縛和桎梏中解放出來；而擁護商人利益却是指重商政策了。

然而我們却也不應輕視傅利埃所做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在正式經濟學底意義上講，傅利埃底見解是不對的，可是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講，他的見解却是正確的。因爲他預測到文明發展底趨勢，他就特別有力地强調政治經濟學（指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底無能，它的狹窄性，同時又指出了他的辯護性。

這樣，傅利埃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第一點是指謫他的眼界狹窄，不提出根本問題來；所謂根本問題當然是指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問題了。照傅利埃底意見，這就是如何過渡到「社團」的問題。他的第二點批判是指謫政治經濟學底無能——無能跟文明底主要禍害——跟商業底罪惡做鬥爭。傅氏曾譏評經濟學者說：「政治經濟學底作用是完全消極的，他的任務只限於分析現有的罪惡。這正好像醫生對病人說：『我的任務是分析君之疾病，而不是示君以消滅此疾病的藥物。』對於這種醫生我們只有一笑置之……」（註）

五　社團說

從社會科學發展（連政治經濟學包括在內）底見地上講，傅利埃主義中最有價值的當然是它的批判部分和歷史部分。可是傅氏本人和傅利埃主義者却不這樣觀察；在他們看來，全部體系從頭到尾底中心理論就是傅氏底社團說。在他們的眼睛裏，不論是文明底批判或是歷史哲學，都只是社團制底理論根據。

（註）見「傅利埃文集」頁五一。

在他對於社團的理論根據中，經濟的理論根據當然對於經濟科學，尤其對於社會主義經濟之研究，爲最有價值。關於社團底經濟，傅利埃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於勞動及其組織。他主張在社團內一切團員均須從事勞動，連兒童也包括在內。但他們的參加勞作，並非按照需要而是依憑個人底熱忱。勞動底條件應當要這樣：能夠使每一個人都不願意站在勞動過程之外，袖手旁觀。

在社團制之下，工資是被廢止了的：那裏根本沒有僱用勞動，有的祇是社會生產底參加人，他們都得按照他們的勞動、資本和才幹，領取自己在社會生產品中應得的一份。

社會全年的利得，傅氏劃分爲不等的三部分如下：（一）5/12歸給積極的工作參加者；（二）4/12歸屬於股份資本底利得；（三）3/12對理論的和實踐的知識的報酬。

傅利埃相信，勞動收入之豐厚，將使勞動者亦能從事積蓄和購買股票。因此，貧窮者亦將參加紅利底分配，而他們對於產業之經濟的合理化的經營，也就很關心了。同時，社團底每一成員，都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之保障的，而這一最低限度，較之文明社會內從事生產的工人底生活水準都要高得多。

在傅氏所列舉的各種勞動組織條件中，他指出自由和勞動底誘致性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底重要因素。關於這一點，我們應當特別重視傅氏提及集體競賽之觀念。他的了解「比賽」和「競爭」，並不是個人利益互相競爭而貽害及社會；相反的，他說的是個人利益跟集體利益相結合。在理想的社團中，比賽和競爭是受下列諸條件之約束的：一、勞動是自由的，吸引人心的；二、人人參加勞動結果之分配；三、因而每人替社會勞作，亦即替自己勞作。

在社團內，私有財產仍然保存着；因而同時也保存着不平等狀態。但是財產已起不了資本制社

會內所起的那種作用；它不支配着生產和勞動。簡言之，傅利埃認為在社團中，財產已非資產者底財產了。生產和勞動都已被一個集體組織起來，調節起來和管理起來了。資本和土地將為社團所掌理；一切動產和不動產底所有者，可從社團方面換得股票，後者按期給予他們一定的收入——紅利。資本家和地主變成了食利者羣（或有閒者羣），但是他們跟文明社會的食利者羣不同，因為他們也要做工作的。他們為什麼也要做工作呢？因為前面已經指明，在傅利埃的社團內，工作不是由於需要而是由於愛好勞動（為勞動所誘致）。而這種愛好心窮人也有的，

這裏，傅利埃不了解：第一，將土地和資本變為股票——取得收入之權，——就等於保存勞動底剝削；因而在他的社團中不僅保存着不平等，而且還保存着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第二，他錯誤地臆測，以為千百年來支配着他人勞動的那些剝削者，會不受絲毫強迫而突然自願轉入社會一般的勞動輪子中去。這裏他完全迷於情慾的勞動觀。而把勞動和遊戲之間的任何界線都擦去了。他以為股票所有人對於勞作也像對於游戲那樣地愛好。

傅利埃雖然尖銳地批判文明，他却沒有確當地了解它的社會本質，這就表現在他的社團說上。傅氏主張拿集中的社團生產代替分散的私人生產，並解除商人對於生產的控制權力（在他看來這是文明社會最大禍害之負持者），——這當然對的；可是他沒有主張從社會內剷除剝削者羣。

第四節　渦文

渦文（Robert Owen, 1771–1858）是空想社會主義底第三支派底代表。渦文主義是在比較發展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政治條件之下發生的。它的「故鄉」是首先完成工業革命和業已成為「世界之

工廠」的英吉利。那裏的商業、工業、農村經濟，都已具有大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社會底貧富對立，那裏也比任何地方顯著些。

渦文主義底空想性並不減於聖西門主義和傅利埃主義，可是它却不像聖西門主義的崇拜產業家，也沒有傅利埃主義的偏面的反重商主義。它比它們更急進，同時又比它們更散漫（Prosaic）些。渦文主義是以一種社會主義的思潮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可是它絕少在空洞的幻想中飛舞不停地兜大圈子，它內部包括着很多實踐的成份。固然渦文跟聖西門和傅利埃一樣，他的學說也是對富有的上等階級陳訴的；他跟他們一樣，都是政治鬥爭底反對者。然而渦文却比聖傅二位更接近地站在勞工集團方面；而且在某一時期，客觀的事變形勢且將他推上了勞工運動底領導地位。他的思想加於勞工運動的影響，是表現在他的反對工廠立法，爲兒童底工廠勞動和學校教育底聯結而奮鬥，組織勞工合作社等等活動上。

一　實踐家兼理論家

渦文自幼就極頂聰敏，短短的二年半（四歲半到七歲）就習完了小學校底全部課程；以後並且做了教師底助理。從九歲起，他已進了一家商店裏做學徒；從此他就開始認識經濟底力量。不過商業對於渦文並不像對於傅利埃那樣發生重大的影響，因而他並沒有把商人看作文明社會一切禍患底淵源。比較發展的英國資本主義經濟，指示渦文認識商業資本底統治時期業已過去，這時的領導勢力已經屬於工業資本了。

渦文在商業機關服務了足足九年。在這九年中間，他服務過好多不同的店舖，並且跑過許多碼頭。他從這九年商界服務和奔跑碼頭的經歷中，獲得了豐富的、多方面的經驗：他知道了如何識事

和看人。自他從倫敦跑到曼却斯特——棉紡織業底中心之後，他就得到了接近棉紡織工業的機會。這是當時工業生產中惟一的領導部門。最後，他結束了商業生活而轉入工業裏去了。

跑入工業界後，他藉告借所得自行開辦小規模的紡織工場。直到一八〇〇年，當他僅僅二十九歲時，他已轉轍一躍而成爲紐倫拿克（New Lanark）地方的實業領袖了。

渦文在紐倫拿克的活動，經過了二十五年之久。在這二十五年活動底前期，一半用在實業底組織上面，一半則用在勞工大衆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準底提高方面。但這兩方面都是屬於實踐方面的。在這兩方面，渦文有了很大的成就。但他絕不以此爲滿足；相反的，他拿這點成就不僅當作他以後更廣大的活動底起點，而且還把它當作以後廣泛的理論發揮底根據了。所以到後來一個時期，實踐家的渦文，纔跟理論家的渦文打成一片了。

渦文一方面把實踐跟空想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在理論上）乃把唯物論跟唯理論也結合起來。不僅如此，他還把法國的唯物論跟邊沁（Bentham）的哲學思想——功利主義融合起來。在「人性之培養」（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一書中，渦文寫道：「就自然法則論，人類是由迷盲進步到較高的知識程度；這種發展程度底界限，決不能由人類自己來決定的。在這條道路上人類發見：只有在行動上促進周圍環境幸福之增進和擴充，才能增進個人的幸福。」（註）

然而在實踐的結論上，渦文却跟邊沁和資產階層急進派有極大的紛歧：後者是經濟自由底主張者，而渦文卻主張國家政權干預經濟活動以扶持經濟力量較弱的生產者。他又是工廠法底最徹底的奮鬥者。在這方面他的具體主張，大約有下列幾點：（一）禁止僱用不滿十歲之童工（這在紐倫拿

（註）見渦文著，「人性之培養」。

克的工業區中，他巳經實行）；（二）規定自十歲至十八歲的未成年工人每日工作時間以十小時半爲限，幷禁止此等工人做夜工；（三）指定監察員若干人，組織專門的機關，其職務在監督上述條款之執行。

其次，他還提出了一個消滅失業的計劃書，就是著名的「渦文計劃書」(Plan of Mr. Owen)。這一計劃底主旨，在於爲失業者組織一些「合作的村落」。依照這個計劃，每一合作村落應購得或長期租得一方土地；土地面積之大小，須視土質與農工業之相互關係等條件來決定。但每一村落底基礎必須是農業，工業只應盡輔助之作用。每個村落均應成爲一獨立的經濟單位；它的生產，首先是爲着自己的消費；祇有剩餘的物品可以售與別的村落。合作村落底建設經費，一方面應由政府、州郡和各種收入來供給；另一方面則由私人捐助。渦文幷說明，這類村落底建立，使得有惠貧民的捐稅變成不必要了；因而對於政府和對於收入而言，這是一件絕對有利的事業。其次，資本有年利五厘，而借務則將逐漸償清。

渦文底計劃是有理論根據的。由於化學和農業科學底發達，工業和農業便獲得了極大的成績；渦文根據這種成績而跟馬爾薩斯做堅決的鬥爭。他確定地說：「當全部土地尙未變成深耕的園地的時候，那種恐由人口過多而招致某種禍患的恐懼心理，在細察之下就變成幻覺了。此種幻覺由這樣一種想像和企圖所造成：卽想使社會滯留於幷非不可避免的迷盲、惡習和罪惡中的企圖。根據個人利益而反對社會幸福的原則所產生的人工杜撰的供求律，向來在逼迫着人們進行爲生存的鬥爭。」（註）

（註）同上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渦文已有了這樣的思想，——縱然還不完全明確，——認為貧苦底原因不產生於自然而存在於社會關係中，即存在於「根據個人利益……的原則」之支配中。此外，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則，這原則在十九世紀前半的社會主義運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就是關於「勞動權利」的原則。渦文同意馬爾薩斯的一點是說當時關於貧民的法律是毫無用處的；但是他反對讓貧民自己去處理他們的命運的觀點；他主張社會應予貧民以勞作的機會。他說假如社會不實行一定的改革，使一切能夠和願意做工的人有工作做的話，那末體力勞動大概很難重新得到真實的和必要的價值。

但是對於渦文底計劃，牧師們、守舊派，自由主義者、甚而至於急進派，都表示反對態度的。偉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李嘉圖（當時曾任國會議員），也是渦文所提的計劃草案底反對者。李氏完全明白，渦文底草案跟自己的「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不能共容。李嘉圖曾寫道：「像渦文所草擬的那種社會，說它會比某時候用同樣數量的人更生產多些和更繁榮些，假如人們底努力是靠社會的利益連同他們私人的利益來刺激的話，——試問凡是稍具常識的人，有誰能相信呢？千百年來的經驗豈不與此相背反嗎？」

二　渦文底經濟思想

渦文關於政治經濟學沒有專門的著作，可是關於一切重要的經濟問題，他都曾發表過意見。他的經濟思想表白得最充分的，要算他在倫拿克的那篇報告了。

渦文稍稍改變了斯密氏底論調底說法，他宣稱道：「使用適當的體力勞動，是國民財富和國民繁榮的泉源。」因此他得出結論道，勞動該是價值之內部的尺度。他解釋道：「人類底平均體力是

可以度量的；平均的人類勞動也可以確定的；而因人類勞動是一切財富底基礎，所以它在每一生產品中的價值，亦能加以確定，同時並能按此以决定它對於其他一切價值的交換價值；這些標準，在一個特定的時期以內是不會變動的。」

看了這一段引文可以知道，渦文認爲價值底尺度，不是個人的、也不是具體的勞動，而是「人類底平均體力」，那一般的勞動，指一般平均勞動而言的人類勞動；這並不是說，渦文已了解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底兩重性。他並沒有比古典學派更進步些，後者也知道價值不决定於個人的和具體的勞動，可是抽象勞動這一範疇，他們却不知道。

看了上面的引文我們還可以知道，渦文雖然也知道區別價值和交換價值，但是對於這個問題他却不曾加以研究。他只注意到另外一方面——注意到由這些論點所產生的諸結論；而依照渦文底意見，以爲從那些論點產生出來的結論是：價值和交換價值應由勞動來决定。他根據倫理的觀點去解釋價值問題。

我們知道，斯密確定說，勞動决定價值只是原始狀態之下的情形，自從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權發生以來，勞動生產品就被分配於社會底三個階級，因而價值就由收入來决定了。渦文反對這樣的分配，他認定不確當的分配是他那個時代的社會底一切禍患之根源，經濟危機也是這些禍患之一。他就想恢復勞動應享的權利，勞動應該成爲價值底尺度。

渦文沒有斯密那種關於所購買的勞動和所消費的勞動的糊塗觀念；他是依照李嘉圖的觀點，肯定價值是由勞動决定的：卽由所消費的勞動决定的。但他亦有一點與斯密共同的見解：卽價值律到資本主義時代就被破壞了。可是他不以爲這種破壞是自然的（斯密則認爲收入所决定的價格是自然

價格）。那末要怎樣做才能使價值律不至遭受破壞呢？

過文底意見以為必須按照新原則來改組社會。過文想依據李嘉圖底由所消費的勞動決定價值的那個定義，來造成這樣的條件——即使這一價值定義得以遵守實現的那些條件。他認為必要的條件就是創造一「國民生產大聯盟」和「國民公平交易市場」底組織。這兩種組織照過文底設想是整個的一體；它能保證依據價值律的交換。

按照勞動的交換之結果，過文有下列一段文字的描寫：「這樣，人類的勞動就得到了自然的，內部的價值；後者就將科學底前進運動而增長起來。對於人類勞動的需求，將不復依賴偶然性；人類的生活資料將不復像現在這樣的成為經常變動其價格的商業對象；勞動者諸階層亦不復成為人為的工資制度底奴隸，此種奴隸制實比半開化社會所通行過的奴隸制更殘酷些。價值尺度這樣的改變，立即會造成一高度有利的國內市場，當全社會底需要尚未完全滿足的時候。」（註）

寫到這裏疑問就來了：既然將來交換和市場關係仍然保存着，那末「人類的生活資料不復……成為經常變動其價格的商業對象」的保障何在呢？這是第一。第二，過文以後又聲明說：「誰能夠創造新的財富，他當然應得他所創造的那麼多的財富，」由此可知，依照他的意見，工資應與全部勞動生產品相等。在另一方面，他又接着寫道：「生產者應該得到他所創造的全部財富之公正的和確當規定的一份。」這意思彷彿是說，生產者不應享有他的勞動生產品底全部。這裏顯然存在着一種矛盾。

這種矛盾的主張，一半是由於過文同時把現社會所必趨的最終目的和由現社會過渡到未來社會

（註）見過文在倫敦克的報告詞，譯文轉錄羅森貝著的「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二二六——七。

的準備時期併爲一談了。在未來社會中，全部財富將屬於生產者；而在過渡時期中，生產者只能取得所創造的財富中之公正的一份。我們不要忘記，渦文所計擬的合作公社以及他的「國民公平交易的市場」，都要求救於借款的，即都要利用他人資本的，因而對於這類資本就有支付利息的必要。

渦文又認爲新的價值尺度將「有利於地主和資本家，同時亦有利於工人」，因爲在施行這種價值尺度之後，由商業的變動所引起的冒險就除去了。在過渡時期中，資本家和地主還存在着，可是他們將如何被除去的問題，渦文却不予說明。從他的意思上推測，彷彿他們是會自行消滅的，因爲他們的理性迫使他們自覺到新制度底優越！

渦文是根據李嘉圖底價值論以得出社會主義結論來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所以他的理論思想是這樣：既然價值是勞動所決定的，那末工人就應保證得到他的勞動生產品全部；可是渦文跟小市民集團的社會主義者有別，他明白在商品生產底基礎上，這樣的要求是不會實現的，只有在另一種勞動組織之下它才能實現出來。不過他始終未曾明瞭價值是商品經濟（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亦在內）底範疇，價值律只適用於這種經濟體系的。渦文却用倫理的觀點去解釋勞動價值底原則。他提出這樣一個主張來：勞動應當成爲價值底尺度。他不了解勞動實際上正是這一尺度，不過只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下存在着而已。

渦文底功績在於他不僅指出，機器底採用惡化了工人們底境況；而且說明，由於機器底採用，勞動貶了價了。他說：「真實的貧乏是勞動者人手貶價之自然的結局，這種結局是歐、美各國工廠普遍使用機器、特別是英國工廠中使用機器所促成的……。」渦文則想藉「新的」價值尺度之採用，以提高「勞動價格」，因爲這麼一來，我們已在前面說過，工人在自己創造的財富中所取得的份

額就增大了。

渦文又根據機器底採用降低了勞動價格這一論綱，企圖揭露危機底原因。他認爲危機底原因，在於「勞動價格」底降低，降低了工人們底購買力，因而縮小了商品銷售底市場。由此便發生供給與需求底不相適應。他在致倫拿克的報告詞中寫道：「……但是現存的社會制度不給勞動者以其應得的勞動報酬，其結果是一切市場都感覺得不夠了。」可以看得出，在經濟危機底解释中，渦文是跟西斯蒙蒂底觀點一致的。而然他的結論却跟西氏的不同。瑞士的經濟學者西斯蒙蒂看到了「生產方式反抗交換方式」，企圖把時代向後拉回去；英國的偉大的空想家則勇氣勃勃地向前推進。根據產業革命所創造的新式技術底認識，他深深地相信可以創造這樣一種生產和分配底組織，在這種組織中不會發生任何危機的。

根據這些論點，他就予馬爾薩斯——拿自己的「人口律」去恐嚇社會的馬爾薩斯——以堅決的打擊。渦文提出了一個相反的論綱來，即肯定生產力底增長大大地超過了人口底增長。按照他的估計，大約在一七九二年，英國的人民祇有四分之一（約三百七十五萬人）從事生產的勞動。同時他估量那時機械和化學的力量等於一千一百二十五萬人底力量。兩項相加，則英國全社會底生產力等於一千五百萬人底力量。換句話說，生產力和人口底比例，適爲一：一。可是到一八一七年，照渦文估計，英國人口由一千五百萬增加到一千八百萬。而生產力底總額則由一千五百萬增加到二萬一千七百二十五萬人力了。換句話說，人口與生產力底比例變成一：一七（當然約數）。生產力大量增長底結果是：在一極端上表現財富大量的增加，在另一極端上則表現貧乏也大量的增加。而這一切現象底禍源，渦文認爲在於不確當的分配。由此而得出結論道：只要把英國所有的生產力拿來公

正地分配起來，它就能完全滿足英國全體人民底需要了。所以照渦文底意見，社會貧乏和經濟危機底原因是在於不確當的分配。

乙 科學社會主義學派

引論

假使說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學說是反映西歐資本主義正在加速發展而尙未達到爛熟時期的那個歷史階段上的社會經濟狀況，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雖已充分暴露而產業勞動者尙未能演其獨立的奮鬥作用的時期的革命小資產者羣底意識形態，那末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却是資本主義爛熟時期代表產業勞動者羣利益的一種思想武器。科學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說是社會主義的，因爲它對資本主義經濟作了澈底的革命的批判，它指示了廢除資本主義而代之以一切生產手段公有制爲基礎的無階級無剝削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途徑。同時它又是科學的，因爲它的資本主義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幷不建立在抽象觀念之上，亦幷不以預先設定的一種永久不變的固定公式爲根據，而是以資本主義之具體的研究，以資本主義發展底客觀法則之揭露爲根據的。這一學派底首創人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對於他以前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社會主義底科學的經濟理論基礎。

科學社會主義學派底主要代表是馬克思、恩格斯、列甯和斯大林。他們的學說代表着兩個不同的歷史時代：馬、恩代表着以自由競爭爲特徵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以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半個世紀底歷史時代，列、斯代表着以金融寡頭底獨佔爲特徵的帝國主義時代和社會主義變革時代。細分起來，則兩個時代又各自分爲兩個階段：馬克思的階段還是比較純粹的工業資本主義

底階段，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爛熟階段；恩格斯底晚年則已經由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開始過渡到獨佔資本主義，這是由爛熟的開始走向衰老的資本主義階段。列甯階段主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和大戰直後的帝國主義階段，而斯大林階段則主要的是一次大戰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和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建設底階段。

關於前一時代的主要代表作，有馬克思著的「哲學底貧困」（"Poverty of Phylosophy"）「僱用勞動與資本」（"Wage Labour and Capital"），「工資價格與利潤」（"Wage, Price and Profit"），「政治經濟學批判」（"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資本論」（"Capital"）等；後一時代的代表著作則有列甯著的「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論經濟浪漫主義」，「帝國主義——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等，

然而堪稱為科學社會主義之劃時代的「經典著作」的，實在只有馬克思底「資本論」和列甯底「帝國主義——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兩書。而為了把握科學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說底精髓，首先尤應對「資本論」有一個大概的輪廓認識。

第一節　「資本論」評價

在這一節裏，作者底意思主要的不是介紹「資本論」或馬克思派經濟學說底內容，而是對這部經濟學聖典底重要特點，作一番扼要的評述。

首先，馬克思底「資本論」是運用最進步的科學方法論底一個傑出的典型。所以它不祇是一部經濟巨著，而且是一部偉大的哲學作品。正如後來列甯所評述，「在「資本論」中，邏輯、辯證法

和唯物的認識論（其實是同一事物，無需三個名詞）統一地被應用於一門科學，吸收了黑格爾底全部寶貴的思想，而把這種寶貴思想向前推進」（見「哲學筆記」）。

「資本論」是發揚和應用唯物辯證法——這一論自然、社會與思維之運動法則的學說——之不可超越的範本。馬克思將唯物辯證法應用於社會的研究，同時就揭露了決定人類歷史之運動與發展的基本法則。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揭開了當作自然歷史過程看的社會經濟形態底發展進程。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底研究中，深入到事物底本質中去，揭露了事物發展之最隱秘的內部動力。他從渾渾沌沌的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底總堆積（這是從現象表面映到觀察者眼簾裏去的資本主義底現象形態）中，首先揀出了最單純的關係；這種最單純的關係，最簡單而普通的事物，就是爲生產無政府性所支配的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細胞」，就是商品。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抓住了這一最簡單、最平常、最基本、最普遍、以及每日遇到無數次的資本社會底關係——商品交換關係——而予以深入的科學的剖析。他在這一最單純的現象中，在這一資本社會底「細胞」中，揭露了現代社會底一切矛盾及其萌芽。從這一最單純的關係出發，爲克思一步一步地走向複雜的具體：這是經濟範疇發展底邏輯過程，同時也是社會生產諸關係發展底客觀歷史過程。所以在「資本論」中，邏輯和歷史底統一，有着典型的表現。「資本論」中所揭示的發展底邏輯，只是社會發展底實際歷史進程之重視與總結。

正因這樣，所以「資本論」裏所揭發的諸法則，就是資本主義之客觀歷史的發生、發展和崩潰之諸法則，這種深刻而遠大的見解，是馬克思底前人們，特別是古典或正統學派底代表們亞丹·斯密和達徵·李嘉圖，所望塵莫及的。古典學派和其他許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都把資本主義看做

自古就有，永久不變的制度，如斯密和李嘉圖所說的「自然秩序」，就是指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他們認爲這種秩序是天經地義永久不變的「絕對體」。因之，他們所談的法則，不是客觀歷史底發展法則，而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主觀的抽象法則。在斯密、李嘉圖及一切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底觀念中，邏輯和歷史底統一是不存在的；他們是用各自所設想的固定的邏輯，去代替了變動不居的客觀歷史。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另一重要的理論貢獻，這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決定意義的一個理論貢獻，那就是他徹底地說明了資本和勞動底眞實關係；明白地說，那就是他的盈餘價値說。這一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底理論基石，從一切資本主義經濟學者所着眼的物與物的關係（商品與商品底交換關係）中，馬克思却發見了人與人的關係——生產諸關係。從一切資本主義經濟學者所視爲永久不變的自然關係（指資本主義）中，馬克思揭露了建立在人對人的剝削制度上的歷史地過渡的諸生產關係形式之一。

馬克思第一次指明了資本是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底體現。在「資本論」中，十分充分而明確地揭露了勞動者和資產者之間的矛盾底根源。資本增殖底祕密被馬克思全部發見了：「資本是一種死的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專靠吮吸活的勞動而生活」（註一）。那就是盈餘勞動底佔取，工錢勞動底榨取。

「資本論」又分析了資本主義底歷史前提底創造過程，這就是所謂原始資本積累底過程，亦即生產者與生產手段相分離的歷史過程。直接生產者底被剝奪（意即他們的生產手段，他們的小私有

（註一）「資本論」卷一

產業底被剝奪）是經過長期的殘酷的刼掠與壓榨而完成的；它的動機是最卑鄙的、最令人憎惡的貪慾，正如「資本論」裏所說的，新產生的資本是從它自己的一切時代中從頭到腳地吸盡了一切的血和土。

對於全部社會資本底再生產的分析（「資本論」卷三）是十分必要的；而這又是馬克思「資本論」底一個重大的特點。這種分析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底商品實現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并且指明這種過程底複雜性，就是它的非正常的進程底原因。揭露了盈餘價值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不勞動的收入底泉源後，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詳細地考察了各個剝削集團間分配盈餘價值的複雜關係。平均利潤率底法則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馬克思語），實現了盈餘價值直接佔取者（資本家）間的互相分贓。不同部門的工業資本家，都各自獲得他應得的平均的一份——工業利潤。商業資本家也獲得他自己應得的一份——商業利潤。放款或信貸資本家可獲得自己的一份——借貸利息。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國家亦通過賦稅底形式，佔有了全體勞工所生產的盈餘價值總量中的一份。「資本論」中所做的前資本主義的地租形式底分析，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底分析，揭明了前資本主義諸社會形態底歷史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起源。

資本主義之勝利的進行，它的普遍於全球，不可避免引起內在於它的諸矛盾底增長與尖銳，而這些矛盾底基礎，就是日趨深刻化的生產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的私人佔有方式間的矛盾。從資本主義諸矛盾底發展中去精密地分析這些矛盾，這是「資本論」所首次做到的。資本底集積（Concentration）與集中（Centralization），大生產壓倒小生產的勝利，資本榨取農民的強化——所有這一切，把社會劃分成了兩個極端對立的營壘：資本積累底總法則，判定了勞工集團絕對貧乏化的命

運，擴大和加深了兩個極端間的鴻溝。利潤率下降底法則，是那種靠犧牲生產者利益來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社會機構底致命傷。

最後，資本主義一切矛盾集中底焦點是經濟危機（或工業恐慌），是世界商品市場上的災禍。這種危機和災禍，是很明顯地證明着「資本主義生產底全部機構，在它自己所創造的生產力底打擊之下被毀壞了」（註一）。「資本論」從理論上證明了資本主義下經濟危機之鐵一般的必然性。所以「要消滅經濟危機，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在「資本論」中明確而顯赫地描繪了資本主義底歷史使命。在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最後一節（註二）中，馬克思以不可磨滅的明確的筆調描寫了資本主義崩潰和更高的新組織在它的廢址上產生之必然性。「資本壟斷變成了這一生產方式底鐐銬，而這一生產方式却是隨伴着它和倚靠着它而達到繁榮。生產手段底集中與勞動底社會化達到了一定水準時，它們就跟自己資本主義的外殼不能共存了。後者就要破裂。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就要擂起喪鐘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註三）。

第二節　馬克思底經濟學方法論

一　科學的抽象法

前一節裏已經說到，馬克思在他的資本主義底研究中，深入到了事物底本質中去：從渾渾沌沌

（註一）恩格斯著：「反杜林論」。
（註二）即論「資本積累底歷史傾向」一節。
（註三）「資本論」卷一，最後一節。

的總堆積中，首先揀出了最單純、最基本，而最普遍的關係云云。他如何能深入到事物底本質中去呢？他如何能從渾渾沌沌的總堆積中揀出那最單純最基本……的關係呢？這就是要靠他的科學的（因而辯證的）抽象法底幫助。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具體的客觀現實，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一種複合體；它內在的規律，它的本質，遠非直接呈現於吾人之前，而是採取歪曲的形態表現着的。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不能夠用直接的觀察來發見事物底定律或本質。正因為在實際中，定律底外表形象要比定律或規律底純粹形式（本來面目）複雜得多，所以以發見內在定律為任務的科學，就不能單靠觀察，而主要地應該利用特殊的科學方法。這在自然科學中，除用觀察的方法外，主要地就要靠試驗或實驗的方法。單靠觀察一張紙和一塊鐵底下墜，並不能發見物體下降底定律；因為從現象上看，鐵塊下墜底速度要比紙片快得多，可是科學家把同一紙片和鐵塊放到抽盡了空氣的玻璃筒子裏去而觀察它們的下墜時，我們就發見二者下降底速率是一樣的。

在社會經濟現象底範圍，也可以舉出類似的實例來。而且，經濟現象底複雜性，也許比自然現象更大些。我們能不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出價值律底純粹形式呢？當然不可能。實際上我們反倒常常見到違反價值律的事實：例如生產時消費同量勞動的兩件商品，可以有不同的價格；甚至消費較少勞動的商品，價格反而大於消費較多勞動的商品。這是因為除價值律底作用外，商品價格還須受供給與需求法則底影響。同樣，盈餘價值也不是取純粹的直接的形式，表現在實際生活上的；因為盈餘價值是採取各種各類利潤或所得底形式，具體地呈現於吾人之前的。而各種利潤又須受競爭法則底影響而趨向於平均化等等。因此，對於經濟現象，更沒法用直接的觀察去發見它們的內在規

律。

在經濟學裏，代替自然科學裏的試驗或實驗以發見定律的方法，就是馬克思所第一次採用而最著成效的科學的抽象法。馬氏說：「在分析經濟形象時，既不能用顯微鏡，又不能用化學的反應法，只有用抽象法來代替它。」（註）馬克思採用科學的抽象法來剖析資本主義這一龐大複雜的經濟機體，其成效之著，其對經濟科學和一般社會科學的貢獻之大，是較之物理學界的牛頓，生物學界的達爾文，實在是有過之無不及的。只有偉大的天才，纔能這種偉大的成就。

馬克思如何使用他的抽象法呢？

前面已經指出，他首先抓住了最單純最基本的東西——商品，而加以剖析，發見資本社會一切矛盾底萌芽形態。「資本論」開卷第一句就說：「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支配的諸社會底財富，呈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因此我們的分析就從商品開始。」馬克思就從這最單純的抽象觀念出發，逐漸一步步地上昇到複雜的具體的資本主義現實的總機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追蹤了資本制社會底發展途徑：從商品經濟底最初萌芽起，到資本主義的最高生產形態的大機器生產為止。這樣研究底結果，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複雜的機體，已不成其為一個渾沌體，而是以種種關係之井井有條的體系，連同它的全部規律或本質，原原本本地反映在我們的意識中。

這樣，馬克思雖以認識資本主義底經濟法則（定律，規律）為政治經濟學底中心任務，但是他並不以資本主義本身底研究開始，而是從研究單純商品經濟開始。

分別地說，他開始研究時，是抽去了勞動力底買賣，抽去了資本和利潤而進行其對單純商品交

（註）「資本論」卷一，序言。

換關係的研究。在研究價值時，他抽去了供給與需求底擺動，以研究爲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價值底「純粹形態」。在研究資本與盈餘價值時，他抽去了利潤平均化的實際傾向，抽去了工業家、商業家和放款家或金融家底存在等等。此外，在研究資本主義底基本定律時，他時常以所謂純粹的資本主義爲研究底對象，而抽去了各種前資本主義的經濟樣式。

總之，馬克思底抽象法是首先從複雜的具體的總合體中，捨去了種種繁複的派生的現象而抽取其單純的基本的東西，如此就形成了抽象的基本觀念，然後從這單純的基本事物底分析出發，一步步地追蹤着歷史發展底客觀過程，循着上昇的路綫，重新回到複雜的具體：從價值上昇到價值底形式，從價值底共通形式上昇到貨幣，再由貨幣上昇到資本等等。在另一方面，他從單純的商品交換底分析出發，上昇到資本與勞動底交換，即勞動力底買賣；從價值底分析出發，上昇到勞動力價值底構成，上昇到工資，上昇到盈餘價值，又由盈餘價值上昇到利潤、利息、地租等等。所以馬克思底抽象法是以客觀的具體的現實爲基礎，而又以同一客觀的具體的現實爲歸宿的；他的抽象並不是懸空的、主觀主義的抽象，如一部分資本主義學者所使用的，而是發自具體和歸向具體的客觀的抽象。這樣的抽象底基本特質，是抽象和具體底統一。同時，這樣的抽象思維是和客觀歷史底發展過程相統一的，這就是所謂邏輯和歷史底統一；因而它是唯物的，科學的抽象思維。

二　科學的歷史主義

馬克思在經濟學方法論上另一個傑出的貢獻是他的科學的歷史主義（historism）。什麽是科學的歷史主義？這就是把任何一種制度，任何一個社會經濟形態，都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去考察它，把它看作歷史地過渡的東西來加以研究，并且以諸種客觀的歷史條件中去考察和估量這一制度或

社會形態。「資本論」裏所揭發的諸法則，就是資本主義之歷史的發生、發展和崩潰底諸法則；而「資本論」這一偉大的歷史研究，火炬一般地照明了資本主義底自始至終的歷史途徑。

人們自己創造歷史，但他們是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創造歷史；這種環境歸根結蒂被生產力底發展所決定的。馬克思在自己的經濟著作中，從「哲學底貧困」到「資本論」，詳細地研究了物質生產力發展底基本路線。「資本論」貢獻了關於工藝批判史的極豐富的材料；對於這種歷史的研究底必要，是馬克思所主張的。在「資本論」中，生產諸關係被視爲與生產力處於矛盾之統一中的東西。從資本制度底運動中去分析這一制度的結果，揭示出這種生產關係底體系如何從生產力發展底條件變爲它們繼續增長底障礙與鐐銬。

馬克思把社會發展底最重要的問題置於歷史的地基上；這不單是指他的說明過去，而且是指他無畏地預見將來和實現這一預見的勇敢的實際行動。全部「資本論」中，馬克思底全部經濟學說中，貫徹着科學的歷史主義。因此，馬克思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實質上是一種歷史的科學。

在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底陣營裏，或者是完全沒有歷史主義（如古典學派、俗流學派等），或者是割斷歷史，倒背歷史，歪曲歷史（如歷史學派）。古典學派把資本看作永久的範疇，把資本主義看作與宇宙共久遠的「自然秩序」。這樣，把歷史上諸過渡的社會經濟形態之一（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看成惟一固定的絕對制度了。當然這裏是沒有一點點歷史主義底影子的。歷史學派雖主張研究歷史，肯認政治經濟學是歷史的科學，可是第一，他們把德國底歷史完全從全世界人類的一般歷史過程中割裂開來，而看成完全超特的歷史了；第二，他們是瑣瑣碎碎枝枝節節地研究歷史，是捨棄本質、專務表象地研究歷史，把歷史看成了各種各樣歷史材料底總堆積，而始終發見不出客

觀歷史底發展法則；第三，他們觀念中的歷史，只是指的過去，而對於未來歷史的預見是他們所沒有和不能有的；在這一點上，他們也和古典學派等一樣地不明白資本主義之歷史的過渡性。

科學的歷史主義祇存在於馬克思派底經濟學體系中。

三 『商品拜物主義』論

馬克思派經濟學方法論中又一個偉大的有決定意義的貢獻，也可說是他的全部經濟學說底方法論基石的，這就是他的『商品拜物主義』論（Theory of the Commodity Fetishism）。前面說過，馬克思派經濟學底中心任務是要從資本主義經濟現象，深入到它們的本質中去。商品拜物主義底理論，就是馬克思揭露商品資本主義之本質的最高典型。

一切資本主義學派底政治經濟學，都只知研究物與物的關係，只知研究現象與現象的關係，而對於這種物的關係背後所隱藏的人與人的關係，對於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本質，是向來不在其注意範圍之內的。實際上關於那些，他們根本連夢想也沒有夢想到。資產者底立場根本不容許他們看到那些。

馬克思從物與物的關係中窺見了人與人的關係；從商品交換關係中，看出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勞動關係。馬氏指示出，在商品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是採取——而且不能不採取——物與物的關係底形式；這種外表形式遮蓋着眞實的人與人的關係。這種人與人的關係，正是經濟現象底本質。馬克思派的政治經濟學，正是以揭露和研究這些被物的關係所遮蓋的人與人的生產關係爲其根本任務的。

假使說，庸俗的經濟學者把價值底實質歸結於一般商品——特別是金子——底自然性，把資本

底實質歸結於生產工具底自然性，把利息歸結於貨幣底本性，把地租歸結於土地底天性等等，那麼馬克思及其學派則認爲所有這些都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自然性，而是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的人與人的關係底產物。生產品只有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之下才是商品，才具有價値或交換價値，在原始公社或共產社會內，它只具有使用價値而無價値。生產工具只有在它被私人佔有來作爲榨取剩餘價値之手段的條件之下才成爲資本。其他一切經濟範疇，情形亦復相同。簡單一句話，馬克思及其學派不是從事物底表面上，不是從物與物的現象關係上去研究經濟，而是透過事物底表面，去揭發事物底實質；透過物與物的關係，去揭發人與人的眞實關係。所以在研究價値時，馬克思首先就指出，「在物的皮殼之下掩蓋着商品生產者們底關係」。他指出金子之成爲貨幣不是它的天性使然，而只是當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由價値底共通形態轉化成的。資本只是「通過物（例如生產工具、金錢……——沈）而表現出來的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利潤只是取盈餘價値與全部資本的比例之形式而表現出來的資本家與勞工的關係。平均利潤率則表現各個不同部門的產業資本家之間的瓜分社會總盈餘價値。利息則主要地表現放款資本家與產業資本家瓜分盈餘的關係。地租則表現土地所有者與土地使用者之間的關係等等。

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內，人與人的關係是不能不通過物與物的關係而表現的。所以馬克思派底經濟學不以研究物與物的關係爲滿足；它要揭發事物底實質，就得從物的關係背後揭發出人的關係來。這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經濟學底特點。

第三節　列寧以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說

從「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後的大半個世紀中，人類歷史經歷着巨大的轉變：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過渡到了獨佔的階段，從它的壯年過渡到了衰老腐潰的階段——帝國主義底階段；同時，在佔世界陸地六分之一的舊俄領土上，更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制度。這些巨大的歷史變動，自然不能不反映在經濟學的理論領域上。從恩格斯逝世以來，適應着新的歷史條件以發展經濟學理論的，首先就是列甯。

列甯堪稱爲他那時代的革命馬克思學派底惟一繼承者。他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新的貢獻是很多的。這裏不克一一列舉，只能就其犖犖大者，提出來約略解釋一下。

首先，列甯繼續發展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 或作生產樣式）及其矛盾的學說。這首先就表現在他關於商品市場的理論上。當時俄國的民粹派認爲盈餘價值在俄國國內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爲（據他們看來）俄國底國內市場日趨縮小，倘無國外市場作爲俄國商品底出路，俄國的資本主義是沒有發展的前途的。可是列甯却依據馬克思底實現論（Theory of realization），有力地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底發展本身能夠創造國內市場的事實。固然，由於資本積累底一般法則，資本主義底發達超過了一定的程度（即超過了所謂爛熟的程度）時，國內和世界的市場均不可避免地要趨於萎縮，但是這一事實的趨向並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在一定階段上自身有創造國內市場的可能性。關於這一點，列甯周密地說明了馬克思底社會兩大生產門類底擴大再生產的理論。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和消費，積累和消費底相互關係的學說，列甯與以盡量的發揮。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和消費，積累和消費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照列甯底意見，這些

矛盾並不表示一國內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底不可能，而只是說明它的歷史的限制性。國內市場底發展，依賴於生產手段底增加比消費資料爲大。因此生產底發展在某種程度內與個人的消費無關；但也只是在某種程度內如此；生產底發展歸根結蒂還是要依靠消費的。

列甯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國內的市場的理論，他根據俄國經濟發展底極豐富的資料，全面地證明國內市場底形成是國內社會分工發展底結果：不同的原料種植底獨立，各國新的工業部門底形成，社會工業生產底發展及其分裂爲不斷增加的許多的生產部門。一個生產部門爲別個生產部門創造市場；國內市場爲小私有者底剝奪過程（即失去生產手段的過程）所擴充；農民破產並非意味着國內市場底縮小，如民粹派所論斷，而是表示國內市場底擴展。因爲小生產者農民失去生產手段（破產）的結果，他們生活所需的一切，都不能靠先前的自足自給經濟來滿足，而須求之於商品市場；這樣他們就由自足自給者轉變爲資本主義工業品底購買者了。當然，這只是指資本主義曙光時期和開始發展的時期底情形來說的。如像目前世界各國——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農村崩潰，農民大衆赤貧化，而都市又充斥着失業羣的場合，則農民小生產大衆底破產，是決不會有利於市場底擴展的。依據列甯底意思，是說在資本主義時期，農民底分化是意味着新的階層底形成——資本家和工人，而這兩種人正是商品底需求者。因此，創造或擴展國內市場的問題是和農民分化的問題有不可分裂的聯系。

列甯從資本主義方式能替自身創造市場的理論出發，又充實並發展了馬克思底經濟危機論。民粹派爲想證明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之不適於俄國，斷定經濟危機底基本原因是在生產與消費矛盾。列甯駁斥了這種看法。他詳盡地說明經濟危機底基本原因是在資本主義這一生產方式底內在基本矛

盾：生產底社會性和私人佔有方式間的矛盾。依馬克思、列甯底意見，經濟危機底根本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底條件中，而依民粹派底意見，原因却在生產以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矛盾是決定性的，而生產和消費的矛盾却只有從屬的意義，它是被基本矛盾所規定的。

列甯對於民粹派底危機原因觀的批評，是具有鞏固馬克思學說之積極意義的。實際上他不但駁斥了民粹派底理論，而且也打擊了以後各式各樣背叛馬克思學派的一些人：如培恩斯坦、考茨基、希弗亭和其他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乃至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等；他們都拒絕了馬克思底危機原因觀，而用他們的消費不足論，不均衡性論，不相配稱論等等「理論」來代替。他們荒謬地論斷，彷彿在資本主義之下，經濟危機是能夠緩和，甚至於能夠消除的！

但是列甯底發展馬克思派經濟理論的最大的功績，却是他的帝國主義論。

十九世紀末，世界經濟中發生了一些新的現象。自由競爭被獨佔所代替；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所謂財政資本（即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之融合，亦作獨佔的金融資本）底時代。雖然在馬克思底「哲學底貧困」中已有着關於競爭和獨佔的天才的預言，在恩格斯底著述中也曾提到過托辣斯和新迪卡的問題，然而因為他們的時代還是前獨佔的資本主義時代，他們未曾能建立起帝國主義的學說。即在帝國主義時代，好些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希弗亭、普列漢諾夫等人，也不能堅持遵循馬克思學說底嚴正路綫而建立革命的帝國主義論：他們或是把帝國主義曲解作僅僅財政資本底一種政策，要取落後農業國家的一種政策。甚至當時社會民主黨底左派，也不能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論。例如羅莎・盧森堡創立了完全錯誤的帝國主義論；她從西斯蒙蒂底民粹派式的實現論出發，提出了資本主義自動崩潰的觀念。只有列甯建樹了眞正馬克思主義論。他拿對資本主義獨佔階段之

天才的分析，補充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列甯底帝國主義論構成了馬克思學說底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列甯與資產集團裏的經濟學者和各色各樣的修正主義者不同，後者們以爲帝國主義僅僅是一種侵略的或向外擴張勢力的政策，列甯則根據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上的一些新的特徵去揭發帝國主義底實質。列甯認爲帝國主義主要的不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底政策，它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它的最高階段。新的政策是被經濟中新的變化所規定的。這一新階段中經濟上新的變化，照列甯底意見，就是自由競爭被獨佔所代替，這是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實質。列甯說：「自由競爭被獨佔所代替就是帝國主義底實質，它的根本的經濟特徵」（註一），這一代替，決定了帝國主義底其他一切特徵，決定了它的發展規律。列甯和一切修正主義者不同，他不從流通中或信用事業和股份公司底發展中（如希弗亭所爲），而從生產本身底法則中，得出形成獨佔資本的結論來。他說獨佔是十九世紀末異常強化的生產和資本底集積集中底必然結果。

我們不可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起來，把它看做一種完全新的特殊的生產方式，——列甯指示說；但同時也不能把它和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同等看待。列甯寫道：「帝國主義底產生是一般資本主義底基本特質底發展和直接的繼續」（註二）。同時帝國主義又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的更高階段。

列甯又評定帝國主義是腐潰的垂亡的資本主義，這意思是說，資本主義底發展到了獨佔的現階

（註一）列甯全集卷十九。

（註二）同前書。

段，資本主義和私人壟斷（全社會生產手段爲極少數獨佔大王或金融貴族所壟斷）底制度，頑強地阻撓着束縛着社會生產力底發展：本身有無限發展之可能性的社會生產力，被私人佔有制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這層硬殼頑強地束縛住不能發展：不但不能發展，甚且停滯、荒廢或倒退。由於一般大衆底赤貧化，由於慢性失業軍底經常存在，資本主義的市場日趨萎縮，因而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蕭條經常光降，獨佔資本家們爲着保障自己的利潤，爲了維持一定高度的價格水準，就不但不願採取提高生產率的新發明技術，而且還要人工地阻撓生產技術底發展（製造武器的技術當然除外）；不但阻止新技術底採用，而且連現有的一大部分生產力故意把它擱置起來，任其荒廢而不予利用，藉以緩和經濟危機或生產過剩底到來，這就是列甯所指出的資本主義腐潰性底表現。

正因爲這種腐潰性底加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越來越顯其爲社會生產力發展底桎梏，最後這一種桎梏終於要被生產力底發展所衝破，而被一切生產手段社會公有制的那種生產方式所代替。列甯看出，在帝國主義時代，這一人類歷史底大轉變是一天天地接近了。因此，他說帝國主義是垂亡的資本主義；換句話說是社會變革底前夜。

列甯分析帝國主義的結果，認爲帝國主義底基本特徵有五個，這五個特徵綜合起來就構成帝國主義底定義。「（一）生產和資本底集中，達到了那麼高的程度，以至造成經濟生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獨佔；（二）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底結合，形成「金融資本」，並在這種「金融資本」底基礎上，產生了金融的寡頭政治；（三）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四）資本家底國際獨佔集團瓜分了全世界市場；（五）最大的幾個資本主義列強完成了地球上領土底瓜分」（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

這裏，獨佔底統治是最主要的。

除上面所述的幾點外，列甯對於馬克思經濟學的補充和發揚之處尙甚多，如對於小商品生產的分析，對於農民兩重性的剖解，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底發見，過渡時期經濟特徵之把握，以及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之闡揚等。

至於繼列甯而發揚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斯大林，其貢獻大都與眼前這歷史階段上的客觀事實有關的。例如斯氏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底基本矛盾的分析，對於那次大戰以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剖解，對於現階段世界經濟危機的分析，以及蘇維埃經濟底理論方針底確定等等。不過在斯氏底經濟思想中，最重要的恐怕只是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及現代經濟危機底剖析和關於蘇維埃經濟諸理論問題底闡揚。

斯大林全面地闡明了整個資本主義底總危機，建立了關於這一危機底本質的理論。斯氏論證從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以來，世界走進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俄國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和這革命所造成的整個世界體系之分裂爲二，是決定當前世界資本主義之狀況與前途的基本事實。當一般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爲戰後資本主義局部穩定所迷惑而高唱「永久繁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等等論調時，斯大林則着重地指出這種穩定底局部性暫時性和相對性；他指出資本主義穩定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和新的革命危機底必然性。這當中，他無情地打擊了一切「永久繁榮」，「有組織資本主義」等等的論調。

一九二九年秋所爆發的空前世界經濟危機，完全證實了斯氏底論見。他揭發了那次經濟危機底種種特點：它的空前的尖銳性，深刻性，普遍性和漫長性。他論斷戰後資本主義——尤其是世界經

濟危機以來的資本主義——底主要經濟特徵，在於工業長期的生產不足，產業後備軍底變爲大批慢性失業軍，經濟危機和蕭條底長期持續等等。他又說明了現階段的蕭條之爲特種蕭條底意義。

關於蘇維埃經濟的理論，斯大林所闡揚的有如新經濟政策理論底發展，關於蘇聯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理論，關於蘇維埃商業和貨幣的理論，以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底建立等。

斯大林說明了蘇聯工業化底必要，指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工業化；他說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是要保證社會主義成份壓倒小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成份，要保證社會主義生產形式比重之不斷的增高，乃至達到完全的勝利。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也完全不同：後者不可避免地要促成千百萬勤勞大衆底赤貧化，而且必須通過這樣的赤貧化而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則要促成國家工業化底利益和一般人民大衆底利益的一致。

關於新經濟政策理論底闡揚，有下面一段話可資證明：「這是勞工國家底特殊政策；這種政策估計到在各種經濟命脈爲勞工國家所掌握的情形之下來允許資本主義底存在，估計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成份底鬥爭，……估計到社會主義底戰勝資本主義，估計到階級底消滅，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底建立」。

關於農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斯大林根據馬克斯、列甯底通過合作經營以改造小商品生產的原則立場，確定了農業集體化和蘇維埃農場底道路。斯氏認爲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決不能長期地建立在兩個本質不同的經濟基礎上：一個是農民的小商品生產，另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大工業生產。斯氏繼承馬列論小商品生產者底兩重性（又是勞動者又是有產者）的學說；他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農民小生產者是自流地跟着都市資本主義跑；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居統治地位的蘇維埃

之下，則「應當把小農的鄉村引導着跟自己（指社會主義的都市——沈）走，在鄉村中建立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而把鄉村改造成爲新的社會主義型的鄉村」（見「列甯主義問題」）。

建立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亦是斯大林底理論功績之一。他論社會主義底經濟和政治的學說，是馬、恩、列底理論底繼續發展。他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在蘇聯已經見諸事實了的。在斯氏底著作中，對於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底性質，社會主義勞動合作底性質，給了深入的理論根據。斯氏指出，在蘇聯「人與人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就是脫離了剝削的自由勞動者底同志合作和社會主義的互相幫助底關係」；可說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生產關係跟生產力處於完全適應的狀態中，因爲生產過程的社會性，已爲生產手段底社會公有制所固定」。

在分析蘇聯社會主義之社會結構時，斯氏揭露了殘存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羣之不同的經濟本性，指出了消除勞工和農民之區別的道路。蘇聯工人和農民跟生產手段的關係，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內所處的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他們跟蘇維埃知識份子的關係，都和資本主義之下的情形不同；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業已逐漸趨於同化，逐漸失去他們中間的區別了。關於計劃經濟，斯氏復力說國民經濟的計劃化只有在蘇維埃制度下才有可能。他確認計劃是蘇維埃國家所憑藉以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的強有力的槓桿。

在分配問題上，馬克斯、恩格斯曾經反對過小私有者階層所慣有的「平均主義」的思想；他們所主張的分配原則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內是按勞分配，在共產主義社會內是按需要分配（各取所需）。列甯和斯大林底平等觀，認定平等卽是階級消滅。

總之，科學社會主義的經濟學，不是一個死的固定不變的敎條體系，而是不斷發展着豐富着的

第七章　普魯東主義底經濟學說

第一節　概說

前一章中所討論的鳥托邦社會主義的經濟思想，可以說是經濟自由主義（包括俗流經濟學說）底反面。一切小資產者社會主義底代表們，都反對生產和流通領域內的自由競爭和無政府狀態，而他們的積極理想是根據社會主義原則的勞動組織。普魯東主義（Proudhonism）則旣與經濟自由主義相反，又與社會主義對立。至於從它的方法論和一般的「原則」上說，它和經濟自由主義要比它和社會主義接近得多。

普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批判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同時也批判社會主義者；他企圖找出兩種相反思潮底綜合來。普氏利用黑格爾哲學底公式，確定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底學說爲正題，社會主義者底學說爲反題，而他自己的學說則爲合題。

在跟資本主義經濟學者作論戰時，普魯東排斥私有財產，在跟社會主義作論戰時，他推翻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可是他所提出的主張，却不外乎保存和鞏固小私有財產；後者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是時時受着大私有財產之威脅和摧殘的。他稱小私產爲個人的領有物，並作如下的描寫：「個人的領有是社會生活底必要條件；私有權殺害着生命，這已被五千年來私有權生存底歷史所證明了。領有是合乎公理的，私有權則反乎公理。消滅私有權和保持領有權：只要單單靠這種原則上的改變

，你就根本改變了法律、政治經濟和一切制度，你就消滅了人間的罪惡。」

接着又寫道：「旣然領有權是平等地屬於一切人的，那末領有底多寡，就得隨領有者數目之大小而變動，因而私有權也就不會發生了。」（註）

普魯東費了很久的時間，企圖解決他自己所提出的任務，卽企圖找到一些能夠實現他的主張——「消滅私有權和保存領有權」——的條件。到後來他猛然醒悟起來，認爲達到上述目的的方法是異常簡單的：只要予勞動者以無償的（不給利息的）貸款，兩件任務就可迎刃而解了！

普魯東底寫作生活可以分爲兩個時期：在第一時期內，他出現爲一個批評家，出現爲兩條陣線上（反經濟自由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戰鬥者」和所謂「合題」底尋求者；在第二時期內，他已提出了自己的社會改良方案，而且他表示跟聖西門主義者、傅利埃主義者、魯易・勃蘭等不同，因爲他們在旗幟上都寫着「改組生產」的字樣，而普魯東則以「改組流通」爲其任務。一切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連湯普遜在內，都主張勞動底組織，普魯東則拿交換底組織的主張去和他們對立。

較之所有法國的小有產集團的社會主義者，普魯東最完滿地表露了小有產集團底矛盾意向和希望。小有產集團一方面咒罵私有財產，一方面又崇拜「領有」財產（實際上仍是私有財產，只是數量較小罷了），在他們的意識中，私有財產分裂爲兩種根源：善的和惡的。私有財產促成了貧富底不平等和貧者被富者所奴役，這是它的惡根源；私有財產予人以獨立和自由，這是善的根源。

不僅就形式論，亦且就內容論，普魯東底觀念是十足的小有產者底觀念。小有產的生產者，感覺自己在流通領域內完全無能爲力，因爲流通領域內被市場的盲目性、無政府性統治着，物價常有

（註）見普魯東著：「何謂財產」？（Qu'est-ce Que la Propriete?）

劇變之際，他就時時有破產的危險。反之，在生產領域內，則他自居爲獨立的產業主，並自誇其獨立與自由。因此，一種理想的交換組織，足以使生產脫離市場盲目性底支配，脫離高利貸和商業資本這類最能危害小生產者利益的流通代理人底榨取的，——這樣的交換組織便是小有產的生產者所渴望的唯一救星。普魯東的信貸觀和交換觀正適合着這一理想的：他不想從生產中覓取社會問題底解決之道，而只想從流通中覓取這種道路。

爲小有產者羣之最顯著而獨特的代表的普魯東，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中都佔有一定的地位。別的小有產集團的經濟學者和社會主義者都只表達了小有產集團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底某幾方面。普魯東則表達了它的生活底一切方面，在這點意義上講，他才成爲它的「科學的說明者」。

第二節　普魯東底研究方法和前提

以英國的自由貿易主義，特別是以巴師夏及其信徒們爲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完全否定國家爲經濟活動領域中的極積因素底作用。他們對國家要求一件：不干涉那「自由地」形成起來的諸經濟關係，這些關係底基礎是分工。普魯東也持着同樣的立場：成爲他的全部經濟理論底基礎之基礎的交換論，亦正以同一立場爲其出發點。他幷從同一立場出發，以批判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固然，普魯東也批判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但是後者底基本前提，他幷未加以駁斥；相反的、他反而進一步地發展了這些前提，而對於資產者營壘裏的反對者，則斥之爲不澈底。普魯東跟經濟自由主義底代表們一樣地認爲分工和交換是正常的、自然的和必需的經濟關係發展之必需的和充

足的基礎。不過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對於勞動和資本底關係亦作同樣的觀察，完全沒有一點不正常和不公道的因素；普魯東則認爲供人吸取非勞動的收入的資本主義財產制，是表示正常的交換法則之破壞，因而亦卽公道的社會關係之破壞。換言之，勞動跟資本的交換，照普魯東底意見，是和那產生於交換法則的公道底理想，不相適應的。因爲這樣，所以他主張保存商品關係而只消滅資本主義的關係。

普魯東和自由貿易主義者一樣，所研究的不是現實的商品生產及其規律性，而只是後者在資本制社會底法章上的反映；在這種法章上，商品生產是被視爲永久的和公正的。從商品中抽去了矛盾而把商品關係看成和諧的關係，這樣他就不能了解商品與商品的交換如何發展到勞動與資本的交換。自由貿易主義者也不了解這點，但是他們連上述兩種交換底矛盾都看不見，普魯東則看見了這種矛盾而不去研究它，只是幻想把它剷除掉。

普魯東不去研究現實，而以現實在一面凹凸鏡——資本制社會底法章——上的反映底研究，去代替現實本身底研究；他夢想在資本主義關係底基礎上，來改造這種關係。可是普魯東和經濟自由主義者一樣，他也竭力擁護商品生產底全面發展；他跟經濟自由主義者不同的一點，祗在他斷定一保用勞動底出現歪曲了商品生產底眞實性。——

普魯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底區別，從社會性上講，是大有產者和小有產者底立場上的區別。大有產者譏笑小有產者底烏托邦，指斥它背反分工和交換底自然發展過程，卽是說，背反由單純商品經濟轉變爲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反之，小有產集團則憎恨大有產集團底自私和等價交換法則底破壞。

「正如商品生產按照它自身的法則而發展，然後轉變爲資本主義的生產；爲商品生產所有的財產法則，亦以同樣的程度，轉變爲資本主義的佔有法則。因此，我們不能不驚奇普魯東底機智，他想消滅資本主義的財產，而拿商品生產之永久的財產法則去對抗它！」（「資本論」卷一）。

依照小有產者急進主義底精神發展着，普魯東卒至走到無政府主義底立場；他否定國家，批判資本主義并依照他的理想去「解決社會問題」等。

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從賽依底時代起，往往按照下列的標題去研究和劃分經濟的材料：（一）生產，（二）流通，（三）分配（亦有人將消費列爲一項者）。這種研究程序實不能反映社會底經濟史；自然，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亦並不作此企圖。他們肯定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是自然的和永久的，他們却根本不提出研究這一體系底運動法則的任務來；他們最好也只知道研究它的外部表現，它的各方面的連繫——依照他們（卽經濟體系底各方面）在現象表面上所呈現的去研究它們。

普魯東則想從經濟體系底運動中，從一個發展階段到另一階段的轉變中，去研究經濟體系。這是他的功績。可是他所給的，並非運動着的物質底歷史，而是理性運動底歷史。普氏在其主要的經濟著作「經濟矛盾之體系」（或「貧困之哲學」，原名：（"Systeme des contradictions e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 1846)中闡述這一「運動」道：「這裏我們所說的不是適應時間程序的那種歷史，而是適應觀念程序的那種歷史。各個經濟的階段或範疇，有時在他們的表現上是同時的，有時又是互相背馳的。雖然，經濟的範疇却有它自己邏輯的程序和它在理性中的連繫；正是這種連繫和程序，我們相信是能夠被我們發見的。」

那末所謂理性中諸範疇之邏輯的程序和連繫，究竟是什麽呢？

在每一範疇中，普魯東區別出來兩個對立的和互相抗衡的觀念。而觀念對一個範疇的抗爭，產生出另一個範疇來，後者在其對觀念的關係上說，是一個綜合（或合題）。而綜合自身又成爲觀念底新抗爭，後者又在新的綜合中得到解決；如此不斷繼續，以至無窮。這樣看來，範疇底運動是由一批複雜性較小的矛盾到另一批更複雜的矛盾之不斷的轉變。換句話說，我們看到不斷地過渡到愈來愈複雜的綜合，而範疇之運動是按着向上的路綫進行的。

這一運動，普魯東稱之爲經濟的進化（evolutions economiques），而每一範疇則稱之爲經濟的階段或時期。在「經濟矛盾之體系」一書中，普氏計算這樣的階段或時期有十，其程序如下：第一期——分工，第二期——機器，第三期——競爭，第四期——壟斷，第五期——國家或賦稅，第六期——商品均衡，第七期——信貸，第八期——財產，第九期——共產主義，第十期——人口。

這些範疇底程序跟現實發展底程序絕對不相符合，這是無待證明的了。試問誰不知道，信貸、競爭、賦稅等等在機器未採用前就已存在的，祇不過在工業革命之後，它們更發達罷了。然而創造新時代的却不是它們，而是工業革命。同時我們也不能把分工和機器底採用看做兩個接連着的時代，因爲分工在任何經濟形態中都存在的；從分工最初的萌芽狀態到機器底採用，中間隔着一個極大的距離。直接存在於採用機器之前的分工，是工場的分工：工場和機器實在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兩個階段。可是普魯東所講的不是工場的分工，而是分工一般。

不錯，普魯東自己承認：「這裏所說的不是適應時間程序的那種歷史，而是適應觀念程序的那種歷史；」對於這種觀念程序，普氏這樣解釋道：人類逐漸確定他自己的原則，一個又一個地順次確定起來，同時每一後起的原則，都是前一原則底否定。最初，人類（普氏亦用以下的名詞：如「

集體的理性」，「人類的才智」等等）確定分工底原則，然後它被繼之而起的機器底原則所否定。機器底原則自身又被競爭底原則所接替，而競爭原則則被壟斷原則所代替，這樣不斷地繼續交替，直到人口爲止。

假如人類所建立的原則眞如普魯東所描寫那樣的程序的話，那末這種程序必須在現實歷史上找到反映；社會經濟的發展路綫，必須與普魯東所設想的程序相吻合。可是因爲普魯東完全忽略了時間上的程序性，這一來他就無異承認人類是在時間以外建立自己的原則的。

這樣，普魯東就完全分裂了「邏輯的」和「歷史的」。

普魯東的觀念程序底邏輯基礎是什麼呢？譬如說，機器底觀念是在分工底觀念之後，並否定分工底觀念。這是由於什麼緣故呢？普魯東解答道，這是由於分工打散了勞動，將它分散爲各個單獨的部分；而機器則將打散了的勞動重新聯合起來。首先出現的，是分工底觀念：後者在其實現底進程中，一方面促使職業底形成和以職業爲基礎的各個社會階層和等級底形成；另一方面則促使各個生產部門底形成和各個工場內部狹窄的專門化。分工底觀念行盡了它自己的路程時，這一觀念就轉變爲（何以會轉變呢？如何轉變呢？——這些問題普魯東並未加以說明）它的反對方，轉變爲機器底觀念了。照普氏底見解，機器底原則是聯結底原則：機器將打散了的勞動聯合成爲一綜合的整體。

但是第一，普魯東沒有正確地了解機器底原則。須知「機器是勞動工具底聯合，而並不是對於工人自身各種工作底結合。」「生產工具底集中和勞動底分工兩者互相不可分裂，正如政治領域內

國家政權底集中和私人利益底分散兩者之不可分開是一樣的。」（註）

第二，機器不但不消滅勞動底分工，而且還替分工之充分徹底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基礎。「勞動分工之巨大的成就，在英國正開始於機器發明之後，這是無待贅述的。……機器底發明完成了製造工業和農業底分立。從前聯合在一個家庭內的織工和紡工，後來卻被機器分散了……因爲應用了機器和蒸汽，分工就達到了這樣的規模，致使跟國家疆土相分離的大工業，已惟一地依賴世界市場，依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前書）

機器底應用當以某程度內分工底發展爲前提，這當然是不容否認的。假如社會分工沒有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那末連商品生產、商業、世界市場都不會有，因而也就不會有發明和應用機器的條件與刺激。但是普魯東所要說的不是這個；他是要肯定以下兩點：（一）分工和機器是兩個相反的（卽對立的）原則；（二）前者藉自身之轉變爲反對物而產生後者。

這兩點論斷，既不合於歷史，又不合於邏輯。

直接先於機器而存在的，不是一般的分工，而是工場的分工。而且卽使工場的分工，也只爲機器底發明創造了技術的前提，而絕對不是它的經濟條件；這些經濟條件，可以說，是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底發展所造成的。假使說，手工工場生產和機器生產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兩個階段，——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前一種觀念產生後一種觀念。不論是手工工場或機器生產，都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底產物而已。

其次，正如機器之不成爲分工底反對一樣，競爭也不是機器底反對物。「放任主義」（"Laissez

（註）卡爾著，「哲學之貧困」。（Poverty of Pehilosophy）

faire*）底口號，是自由競爭觀念之最顯著的表現，可是它在工業革命以前很久就出現了。因此，應該倒轉來說才對：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底發展，因而亦即大規模的競爭底發展，競爭底觀念，爲對機器的需要和機器本身底發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至於講到競爭和壟斷的話，那當然可以說由前者產生後者；但是第一，也不能像普魯東那樣地了解，彷彿競爭底觀念產生了壟斷底觀念；第二，反過來說也是對的；先有封建的壟斷——在資本主義曙光時代尚盛行着，在隨資本主義之發展而消亡的封建壟斷之後，乃有自由競爭。幷非重商主義跟隨於自由貿易主義之後；相反的，是自由貿易主義跟隨重商主義。這裏顯然證實了「由壟斷產生競爭」這種說法也是對的。資本主義的壟斷是資本主義競爭之否定，而資本主義的競爭本身又是封建壟斷之否定。因此，資本主義的壟斷便是封建壟斷之否定底否定。

實在普魯東似乎也應當這樣設想，因爲他原來就把壟斷解作特權，那末封建的特權（或壟斷）當然也不該置而不談。況且他又像傅利埃一樣地稱資本主義的壟斷爲商業的或工業的封建主義，那末他就更該承認封建的壟斷在自由競爭之先，而資本主義的壟斷則爲封建壟斷之否定底否定。但是普魯東不作如是觀，事實上他也不能作如是觀，因爲如果他承認這種說法，那末他的全部「觀念秩序」就要被推翻了．要知道他是以競爭當作機器之對立體的啊。競爭既是機器底對立體（反對物），自然不能同時又是封建壟斷底對立體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普魯東不僅沒有說破「跟時間程序相適應的」歷史，亦即沒有說破「跟觀念程序相適應的」歷史。縱使從唯心論底觀點（唯心論認定歷史底創造者是觀念、意識或精神）看來，普魯東不但把「邏輯的」跟「歷史的」分裂開來，而且還完全歪曲了歷史。

第三節　普魯東底中心理論

普魯東在其「經濟矛盾之體系」（卽貧困之哲學」）中，首先提出價值底分析來，肯定它是全部經濟建築之「柱石」，這也確是普魯東經濟學說中的中心理論。他認爲一切經濟範疇底矛盾，均爲價值底矛盾所規定，因此價值底矛盾底解決，也就是一切矛盾底解決。簡單地說：不論是社會問題底本質或這本質底確定，普魯東都認爲就是價值問題底本質及其解決。

價值並不像其他經濟矛盾一樣地形成經濟進化底特殊時代，可是照普魯東底意見，這種經濟的進化也不外乎價值矛盾之進化而已。只是當價值底正題和反題找到了它們的合題時，經濟的進化才根本地改變過來——它由矛盾的轉變爲和諧的。

一　價值底矛盾

普魯東責備當時的經濟學者，說他們雖亦劃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區別，但是沒有看出它們中間的矛盾來，沒有看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同時互相依賴又互相排斥。

照普氏底意見，使用價值是正題、肯定，交換價值是反題、否定。前者產生後者。怎樣產生呢？這便是普氏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他的答復可歸結於下列數點：（一）人類底需要超過他們在自然中所能現成獲得的；（二）這迫使人類不得不從事生產，以彌補自然之「缺陷」；（三）但這件事不是個人能力所及的，誰也不能生產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四）因此每一個人就都需要別個人，需要在各個勞動部門中工作的同事們，需要拿自己的生產品去交換一部份別人所生產的生產品。這樣，就從需要中——從對於使

用價值的需要中——發生出交換和交換價值來了。

這樣的解釋交換之發生，是依據十八世紀唯理主義(rationalism)底精神的：交換被解釋成自覺的協同底產物了。十八世紀的唯理主義，不從客觀現實的歷史中，而從理性中去找尋經濟現象底解釋。可是到了十九世紀，這樣的解釋只有像巴師夏這類俗流經濟學者會應用它；而不幸普魯東却附和了巴師夏這類人。

需要和生產一樣，都是不斷地在發展的。「需要一般」正和「生產一般」一樣地是抽象概念。普魯東却依據這些抽象概念，因而他不但忽視需要底歷史性，亦且也忽略了它們的社會性：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底需要是完全不同的。

假如從歷史的發展中去觀察需要，我們就會立即明白，需要底發展並不在生產發展之前，而是相反，生產底發展却產生了新的需要并改變了原有需要底性質。譬如說對於皮鞋的需要，實際上只發生於人們會製造皮鞋之後；可是要使人們能夠學會製造皮鞋，則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底一定階段上。卽如食物這一種最基本的需要，亦是在人類底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地改變着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差不多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新的生產部門創造新的需要的事實。

然而我們却也不能忽略相反的作用——卽已造成的需要對於以後的生產發展的重大影響。「生產使消費成為可能，生產替消費創造了物質，沒有後者消費就失去了對象。然而同時消費也使生產成為可能，因為只有它替生產品創造了主體，對於後者，生產品才成為生產品……不行車的，不被使用的，不被消耗的鐵路，只是可能性的鐵路，而不是現實的鐵路。苟無生產，固無消費，然而苟

無消費，亦無生產，因爲在這樣的場合下面，生產就變成無目的了。」（註）

普魯東底錯誤不在他指出生產與消費底連繫，而在他認消費（需要）爲主導的根本要素，他純粹唯理主義地思考問題：人們沒有生產底刺激就不會去生產，而這種刺激就是需要，因此生產和流通都是需要（消費）所產生的。這樣的說法不但在方法論上錯誤，而且假如把它應用到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上去，還曲解了資本主義性質本身。因爲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底刺激是利潤，而一家新工廠底開始生產，不是因爲在先已經有了利潤，相反的，資本家底開設這一新工廠，爲的是要掙到新的利潤。

普魯東不曾明示，而且也不能明示使用價值如何產生它自身的反題——交換價值。而且，價值底矛盾本身也是懸想的。普魯東認定使用價值底增大引起交換價值底下降；反之，使用價值底減少引起交換價值底增大，——他認定這便是價值底矛盾。他舉出下面的例子來：豐收常常招致生產者虧損，歉收倒反使他們獲得贏餘。

但是我們要問：這能不能稱爲價值底矛盾呢？當然不能。這裏普魯東把價值跟價格混爲一談了。在豐收的時候，即供給大大地超過需求的時候，出賣者中間的相互競爭，促使價格降到價值以下（普氏拿交換價值代替了價格或將兩者等同起來）。反之，不歉收的時候，即需求超過供給的時候，購買者中間的競爭把價格抬高到價值以上。這樣看來，由供求關係之變化所促成的市價擺動，被普魯東視爲價值底矛盾了。

競爭是商品生產之矛盾底表現形式，而絕不是什麼「永久的」價值觀念，像普魯東所想像的。

（註）「政治經濟學批評」，導言第二節。

而價值「割分爲」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種的見解也是不對的；因爲交換價値只是商品底基本因素之一，是跟另一因素——使用價值——對立的。爲互相依賴和互相排斥的兩因素之統一體的商品，其矛盾被普魯東看成價值底矛盾，即看成商品兩因素之一底矛盾了。這樣一來，普魯東把現實的矛盾變成虛構的矛盾了。

二　綜合的價值

照普魯東底意見，價值可「分裂」爲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前者是正題，後者是反題。那末它們的綜合是什麼呢？它們的綜合，普氏稱之爲組合的或綜合的價值。其方式如下：

價值 ⟨ 使用價值 / 交換價值 ⟩ 綜合價值

但是這一綜合，這一矛盾底調和究竟怎樣的呢？

普魯東把社會的財富比作化學上的化合物了！正如諸種化學原素只有按照一定的比率互相配合起來時，才形成一新的物質元素，社會財富也一樣地基於各種組成原素之比例性。假如，比方說，所生產的紡織物，超過了一定的比例性所要求的那個數量時，多餘的一部分紡織物就不成其爲社會的財富。

把各個財富原素聯合成爲一個整體的，便是交換。而當它們成爲社會財富之原素時，它們便成爲組合的或綜合的價值了。

交換完成了某種的選擇：一部分財富底原素被它（交換）吸取去了，就變成了價值；另一部分

財富底原素被它排擠掉了，就轉變爲「非價值」。但是被交換「認可」的價值，已經不是使用價值，亦不是交換價值；它是這兩個對立體底互相滲透，形成了所謂綜合價值。後者普氏亦稱之爲有比例的價值，因爲它表現着交換所規定的比例。

「綜合的」和「有比例的」這兩個形容詞，各自表現過程底一方面。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個對立體底調和，表現於「綜合的」這個形容詞；各個財富原素之溶合成爲一整體，表現於「組合的」這一形容詞；而這種溶合中所包含的量的比率，則表現於第三個形容詞「有比例的」。

這全部「多方面的」過程，都發生於交換，可是它的原因和創造力却在交換範圍以外。這種力量（或原因）便是勞動。普氏認爲只有勞動，生產一切的財富原素，它把這些原素結合起來。只有勞動，才使社會的財富運動起來。正如精神把物質激動起來的情形一樣。社會，集體的人羣，生產着無窮多的生產品，這許多生產品底享用，形成了社會底福利。社會福利底增進，不僅有賴於生產品底數量，亦且有賴於它們的種類（質地）和比例。根據這一基本事實，我們可以明白，社會無時不在企圖達到生產品底一定的比例；依照這種比例，在現存的生產條件之下，使社會底福利能夠達到最大限度。生產品底豐富，種類複雜和有一定比例——這便是財富底三個基本條件。（註）

現在我們要把普魯東底觀念來分別地考察一下。

說交換規定了財富原素底比例，這句話對不對呢？當然不對。因爲在交換中祇表現出來需求與供給底狀況。所以說交換中一部分財富原素變爲價值，另一部分變爲「非價值」，還是錯誤的。在交換中規定着市場的價格，這種價格有高於、有時低於價值或生產價格，只是在個別的場合中，它

（註）參閱普氏著，「經濟矛盾之體系」。

們才互相符合。

在交換的觀念方面，普氏又拿價值去代替市場價格。市場價格在警告生產者，有時候他們生產得太多，有時候他們生產得不足。但是這種警告之作用，幷不在促成所謂比例性，而是促成新的供求關係，亦即促成新的價格脫離價值的局面。「供給與需求之比例性的關係，亦即某一生產品跟全部生產總體之有比例的關係，絕不是藉這生產品之按照等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而出賣這一行爲來確定的。只有供給與需求底擺動，指示生產者以某商品所應生產的數量，使得他在交換時至少可以獲得生產成本。而因爲這些擺動是不間斷的，所以資本之流出與流進各個工業部門的運動，也是不間斷的。」（註）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領域內，也一樣地沒有比例性的。正因爲這樣，所以在流通領域內也沒有比例性；不斷變動着的供求關係，是生產的無政府性所造成的。個別的生產者在自己的工場或製造廠內部愈使生產合理化，則他們就愈加強了整個社會全部生產和再生產底混亂狀態。弗里德列赫郞重指出這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間的矛盾——底表現形式之一。

固然「經濟矛盾之體系」底作者也知道有競爭、無政府性、經濟危機這類事實存在着。但這幷未阻止他視社會爲有目的的統一體，其運動底歸趨在於達到一定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社會力圖以最少量的勞動消耗，生產最大量的種類極複雜的價值（指使用價值）。這樣的目的論觀點，當然是非科學的。

（註）卡爾著「哲學之貧困」。

三　貨幣觀

照普魯東底理論，假如說商品之轉變爲價值（指所設組合的價值）祇是就它們爲交換所「吸收」而被包括到社會財富中去的那種比例範圍而言，那末對於貨幣就不存在這樣的限制了。在普魯東看來，貨幣和它的數量多寡無關，它永遠是組合的價值。爲證實這一論點計，普氏提供了兩點理由：第一，對貨幣的需求是無限的，因此它們永遠被包括在社會財富中；第二，貨幣底價值係固定於鑄貨中的：譬如說，一個金鎊永遠是一個金鎊。

讓我們對這兩點理由分別加以檢討吧。

首先要指出一筆：第一和第二點理由都並不能證明所要證明之點。所要證明的是貨幣價值組合的；而組合的價值，則依據普魯東本人底解說，是一切勞動種類及其相適應的一切財富原素之比例性底表現。可是普魯東所證明的則爲貨幣永遠按照他們的價值而實現，而其原因却跟勞動分配底有比例性和跟財富原素底有比例性均毫無相同之點。普氏要想證明一種商品——貨幣——底價值業已按照比例性底法則而成爲「組合的」價值，可是實際上他却在證明這一商品由於特殊的原因而不受比例性法則底支配。

但是所要證明的和實際上在證明的二者之不一致，一到我們個別他去考察每一上述的理由時，則表露得更加明顯了。

對於貨幣存在着無限制的需求，或者說，就貨幣論，供給永遠不超過需求的。但是由於什麼呢？爲供應商品流通之用，貨幣底需求完全不是無限的。大家知道，爲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決定於流通界中的商品底價格，它們的量和同一單位的鑄貨底流轉速度。因此，在每一固定的時間內，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是有一定的（當然這裏把信用和貨幣當作支付工具的職能暫行擱置不談，因爲這

些因素只能使情形複雜化，而不會改變「流通所必需的貨幣數量有一定的」這個原則），貨幣之無限的需求，發生於它的當作積蓄工具、當作寶藏的那種職能。而在這一職能中，貨幣跟別種社會財富底原素並無一定的比例。當然，隨着一國的工商業和財富底發展，貨幣底積儲——當作寶藏的那部分貨幣——也不斷地增長起來。但這並不是表示貨幣積儲之隨全部財富之增長而增長，係按照一定比例的。

普魯東所提供的第二點理由就更壞了。

須知鑄貨所凝固（即固定不變）的不是製幣金屬底價值，而是它的重量，它的成色。鑄貨上所標出的某一貨幣單位（例如一鎊或一先令）並不決定它的價值，而祇是向人們證明：鑄造這一貨幣單位所需要的實在的重量和成色。在公開鑄貨制之下，鑄貨的價值保持着造幣金屬底塊條底價值水平；這顯然地表明：在鑄貨中任何價值底凝固是不可能的。固然，在專利的鑄貨制之下，鑄貨跟塊條（金銀等）底連繫是斷裂了；但是當鑄貨失去它自己的實在價值時，它們就不成其爲滿價的貨幣而祇執行流通工具之職能了。到那時候，對於貨幣的需求就極有限制，因爲它們祇能代替流通所必需的真實貨幣底數量。

普魯東既堅持貨幣底價值凝固於鑄貨，他就陷於這一種幻想中：陷於作爲所謂「國家的」貨幣論之根基的幻想中去了。依據「國家的」貨幣論來說，貨幣是國家創造的，不論製造貨幣的材料是金銀或是紙張，它的價值——國家所規定的價值——始終如一，凝固在鑄貨中。但是這裏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假如貨幣是國家創造的，那末他們就完全跟商品不一樣，因而就不能成爲商品組合價值之實了。然而普魯東却又表示貨幣應當等於一切商品，而後者則將成爲組合價值，像貨幣已經成

爲這價值一樣。

普氏底思維路程如下：（一）金和銀起初都是普通的商品；（二）後來它們才變成貨幣幷獲得組合的價值；（三）一切商品也像金銀一樣地變成貨幣並獲得組合價值；（四）可是當一切商品都變成貨幣的時候，對於特殊的貨幣的需要，就失去了；（五）社會解脫了貨幣底權力和資本的權力，因爲那時凡有商品的人，同時也就是有貨幣的人。在這全部思維底鏈條中，決定的一環是「金和銀起初都是普通的商品，後來才變成貨幣幷獲得組合價值」這一論斷；根據這種論斷，我們就有理由去設想，其他一切商品也都能獲得這種價值。但是普氏對於貨幣價值底組合原因的解釋和他按照國家的貨幣論（亦稱名目論）的精神去解釋貨幣，又無異自己消滅了上述的一環，因而整個鏈條就都解體了。

普魯東底見解之所以站不住，不是由於某些邏輯上的錯誤，或駁論上的失敗，而是第一因爲它建立在一種虛幻的設想上——在所謂組合價值底觀念上；第二因爲普氏完全不了解貨幣底社會性。依據新經濟學底觀點，貨幣是生產關係底體現者：一種商品之變成貨幣，祇是因爲其他商品在它身上表現它們的價值。既然這樣，那末很明顯的，不能一切商品都變成貨幣了。妄想把一切商品都變成貨幣，無異於妄想使商品在自己身上表現自己的價值。在以私有財產制爲基礎的商品經濟中，商品世界之分解爲商品和貨幣是不可避免的。

四　交換實現和分配

前面已經說過，照普魯東的意思，以爲交換將一部分財富底原素變成價值，將另一部分變爲「非價值」。因此，交換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壞的一方面。交換將一部分商品變成了價值，這樣就把

它們歸入社會底財富中去，這是它的好的方面。可是它把一部分商品棄置於社會財富範圍之外而使之成爲無用之物，這樣就暴露了它的壞的方面。由此而產生吾人之任務：堅持交換之好的方面而消除它的壞的方面。而這意思就是要把交換組織得這樣：使一切商品能夠實現和因而變成財富原素（價值）。

爲要實現這一任務，普魯東建議創辦一國民交換銀行，其所依據之諸條件如下：（一）銀行接受一切交付給它的商品；（二）確定這一切商品底價值並發給一紙標明這許多價值的證書；（三）證書所有人，得用證書去向同一銀行購買他所需要的商品。

照普魯東的意思，國民銀行在商品關係上應起之作用，正應和鈔票發行銀行在金或銀的關係上所起的作用一樣。發行銀行收受了金或銀，就發出鈔票去代替它們：國民交換銀行則於收受商品之後發給一證書。但是這裏普氏顯然忘記了他自己所說的基本論綱之一：對於金銀的需求是無限制的那末發行銀行任何數量都可以接受它們；反之，對於商品的需求是有限制的，銀行也不能創造這種需求，因之它就不能無限制地收受。

普魯東企圖藉助於賽依底實現論以逃出這一難關。照賽依底見解，生產品是跟生產品相交換的，因而一般的生產過剩不可能。普氏認定這一理論是一個偉大的眞理，但是他斥責賽依不了解下面一點：由於市場底無組織，這一眞理是不會實現的。只有組織國民銀行，由此銀行來組織市場，創造各種條件以達到生產品與生產品底無限制交換，可是普魯東沒有說明，即國民銀行收受了一切商品和將它們轉變爲「貨幣」之後，如何去組織市場呢？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市場是指示企業家們的唯一南針（固然是很不可靠的指南針）——指示他

們在何處與如何運用勞動和資本，須縮小抑廣大自己的生產。這是因爲市場所收受的不是一切商品而祇是購買力的需求所及的那部份商品；它的規定商品價格，並不按照它們的價值，而是按照供求關係來決定的。假如消滅了這一指南針，則定期的生產過剩之危機，就將變成永久的生產過剩之危機了。

也許有人要說，國民銀行把需求和供給集中在自己手裏，就可以製定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而給每一生產者以一定的任務：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但是這樣就不祇是交換底組織而是生產底組織了：銀行業已變成指揮和計劃生產的機關了。而在商品資本主義的關係之下，組織一個統一的銀行以指揮、調節和計劃生產，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現今社會改良派底「統一托辣斯」或「有組織資本主義」之終於成爲夢想，也就是這個道理。

復次，普魯東之提出統一的國民銀行之計劃，其目的，又在藉此改變分配——消滅一切不勞動的收入。一切商品既均將變爲貨幣，則一種特殊貨幣之存在，就變成多餘的了。這樣一來，從勞動者身上榨取不勞動的收入的那種力量，就隨之而消滅。

照普魯東底見解，一切罪惡底根源在於貨幣，而貨幣底消滅只有在一切商品變成貨幣的時候。由一種空想產生另一種空想：一方面是無政府生產基礎上的有組織之交換，另一方面是消滅貨幣底威權而保持商品的生產和流通——保持那種產生貨幣和賦予貨幣以特殊威權的制度。這是何等的矛盾呢！

普魯東對貨幣底意義同時作過低的估計，又作過高的估計。他一方面容許沒有貨幣的資本主義財富之存在，這樣他無異廢除了貨幣固有的權威而把它簡化爲單純的流通工具了。在另一方面，他

又視貨幣爲不平等底原因，爲勞動者貧困底原因。這樣，普魯東實際上，已將資本底威權看作貨幣底威權了。貨幣底所有者剝削那些沒有貨幣的人，此種情形表現於貸款和抽取利息底方式。放款資本家不斷地把自己的貨幣變成收入底泉源，這樣就減少了勞動底收入。

普魯東視利息爲資本剝削勞動的基本形式，因而他從利息中抽出利潤來（而不是相反）；他認爲工商業資本家底所得，是他們所投出的資本上的利息。由於這樣的情形，工人就不能取回他們自己的勞動生產品。

但是我們知道，利潤可劃分爲企業家底收入和放款家底利息兩部分；前者呈現爲企業家底「勞動」報酬，後者則呈現爲「資本自身」底產物。執迷於事物表面現象的俗流經濟學者，把這些當做眞理看了，他們不知道從這些不同的外表形象後面，看出它們統一的內容——剩餘價值——來。而普魯東也看不出企業家底收入和利息只是同一剩餘價值之不同的特殊形式。他承認企業家底收入是企業家底「勞動」報酬（是（工資」），它包括於商品底價值中，而利息則他認爲是附加於價值以上的東西。

照普魯東底意見，工人們不因其爲勞動力底出賣者和剩餘價值底生產者而被剝削，而因其爲商品底購買者而被剝削的。他說，由於利息這一種價值以上的附加額底存在，工人們就無法取回自己的勞動生產品了。因此，資本與勞動底對立，不表現於產業資本家與產業工人們底對立，而表現於放款資本家與勞動者底對立了。

第八章　歷史學派

第一節　時代・概說

十九世紀後半的西歐，除表達勞工集團意識的科學社會主義經濟學說外，德國工商企業家集團，又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歷史學派作爲他們自己的思想代表。假如說科學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說是反映西歐——尤其英法諸國——資本主義經濟底發達和勞工運動底抬頭，那末歷史學派底思想恰恰相反，它不是反映資本主義底發達，而是反映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底相對的落後。從三四十年代起，德國固已開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但是由於國內封建的割據，政治的不統一，它的障礙重重，發展頗爲遲緩。就時間論，德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遠較英法爲晚；就發展底水準論，則當英國早已成爲「世界工場」的時候，德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工業經濟方面則家庭手工業佔着很大的優勢。

在十九世紀前半期，英國顯然是世界資本主義的霸主：它的商品已經征服了全世界的市場。法國底經濟地位雖稍遜於英國，但是它的商品（包括日用品和奢侈品）底出口貿易，也已相當發達。德國因爲技術經濟落後，社會生產力不發達，除極小部分靠加強對小生產者的榨取以降低成本而達到輸出目的的手工業品外，德國底商品是完全談不到對外競爭的。不但談不到對外競爭，而且連國內市場都受着英國商品底嚴重威脅而緊緊地壓制着本國資本主義工業底發展。爲了避免這種外來的

壓制而促進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計，運用國家權力，以克服經濟落後，助長產業發展的一種政策體系，對於德國工商企業家就成爲絕對的必要了。這種政策體系就是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底政策體系。

這種保護政策，亦卽國家干涉的政策，是和英國資產者所提倡的自由主義政策（特別是自由貿易政策）針鋒相對的。英國因爲近代工業發達最早，它的生產力壓倒任何國家，它可能而且必須用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政策，來發展它的資本主義經濟。德國就不能如此。經濟落後，生產力低微的德國，如果也跟着人家採取自由貿易政策，那就無異任自國底經濟（因而國家底命脈）永遠受先進英國和法國底支配，自身就永遠沒有獨立富強的一天。適應着德國現實底這種特殊的客觀要求，保護主義的學說就在國家主義（亦作民族主義）的經濟學家李士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倡導之下，很快地盛行於德國底經濟學界了。

以李士特底國家干涉主義和保護政策底理論爲根據的德國歷史學派，從批判英國古典學派（或正統學派）所主張的自由主義政策（包括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等，亦稱自由放任政策）起，連帶地批判到了和自由放任政策分不開的古典學派底理論體系——特別是它的方法論和出發點。歷史學派諸學者，如羅秀（Wilhelm Roscher, 1817-1894），克尼斯（Karl Knies, 1821-1898），希爾德布蘭（Bruno Hildebrand, 1812-1878）等人，反對古典學派所惟一憑藉的抽象演繹法；他們反對古典學派以個人利己心爲出發點的那種理論，反對古典學派所建立的一切時代一切國民都適用的普遍妥當的法則，反對基於「經濟人」底自然要求和人類「利己心」的經濟自然協調的學說，以及反對古典學派和一切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底自由貿易國際分工等主張。因此，歷史學派是帶着濃厚

的國家主義色彩的經濟學派。

歷史學派雖以批判古典學派開始而產生並在這種批判過程中發展起來，「但是我們不要看掉了還有一個使其成長起來的原因存在。那就是由保護政策而發育起來了的德國資本主義，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半世紀中，有了迅速的發展，同時勞動者問題也發生了。」(註)在這個問題上，歷史學派底批判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古典或正統學派，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學派，而他們的批判行動，則比較集中於對付後一方面。古典學派從自由主義和自由放任的立場提出了勞動問題；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即在他們所視為「自然秩序」的社會內）勞動問題底發生是必然的。但是他們只在理論上提出這個問題，成為資本市民層意識底表達者的他們，却不能把這問題大膽而澈底地發揮到邏輯的終點，因而也就不能提出解決這問題的方策。反之，社會主義者——特別是科學社會主義者，則不但比古典學派更明確、更澈底、更大膽地提出了勞動者解放的問題，而且還指出了如何解放的道路：通過資本制度之根本改造與生產手段之社會化以達到勞動者澈底解放的道路。

六十年代以來，歷史學派面對着這日趨嚴重的勞動問題在德國，不得不集中注意於想解決之道。於是他們一方面反對古典學派底勞資對立必然性和任其自然發展的理論，另一方面則主張採取國家干涉的辦法，採取一定的社會政策，來調解勞資衝突，作為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方針。為着這個目的，該派經濟學者乃於一八七三年創立了「德國社會政策學會」。他們利用這個學會，把自己的活動進展到了實際政治的領域。這就是說，通過這個學會，歷史學派充當了完成國家統一的俾斯麥強力政權底一翼，變成了執行這一強力政權底社會政策的指導機關。同時，他們也就因而變成社會主

(註)日人波多野鼎著，彭迪先譯「現代經濟學論」（商務印書館版本）頁四——五。

義者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Lassalle）、培貝爾（Bebel）李卜克內西（Liebknecht）等所領導的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黨底敵人了。

這樣，造成歷史學派盛勢機會的重大原因之一，是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的德國勞工運動底開展。歷史學派（主要的是新歷史學派）底代表們，爲了要論證藉社會政策有可能解決勞工問題，就不能不否認古典學派和社會主義學派所宣揚的支配社會經濟的必然性法則：因而他們反對客觀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觀，而主張把倫理的要素滲入經濟（特別對於分配問題）中去，并且把它特別強調起來。這樣，他們實際上把經濟學變作了倫理學。

歷史學派有新舊兩派：舊歷史學派主要地因批判古典學派底方法和理論而聞名，其代表卽前面所舉之羅秀、希爾德布蘭、克尼斯諸人。新歷史學派則主要地因反對自由放任主義，主張用社會政策以解決勞工問題而聞名，其代表學者有舒摩勒（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勃倫泰諾（Lujo Bretano, 1844-1921）、克那泊（Friedrich Knapp, 1842-1926）和布秀（Karl Bücher, 1847-1930）等人，講到歷史學派底著作，則著名的有羅秀底「國民經濟底體系」（"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分五卷，1854-1894），希爾德布蘭底「今日與未來之國民經濟學」（"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1848）與克尼斯底「歷史方法的政治經濟學」（"Politische Okonomie Vom Standpunkt der Geschichtlichen Methode", 1853）及舒摩勒底「國民經濟學大綱」（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alkswirtschaftslehre" 1900-1904）等。

第二節　歷史學派底方法論

一　概說

歷史學派既以批判古典學派開始，而他們對古典學派的批判又主要地集中於經濟學底方法論（方法和對象），所以他們——尤其舊歷史學派——的聲名和影響，也是因批判古典學派底方法論而擴大起來的。不但如此，歷史學派之得名及此派研究之重心，也正在他們的研究方法和對象上。因此我們可以說，檢討歷史學派底方法和對象，就等於檢討了這派學說底主要的決定部分。

在這方面，歷史學派底基本立場是：（一）根本反對古典學派所採用的抽象演繹法而主張集中力量於長期的多方面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等方面的——蒐集和考察歷史上種種具體的經驗事實；認爲經濟學研究之基礎，應建立在多方面的歷史事實底研究上，簡單地說，他們完全拋棄抽象的理論思維而採取描述歷史具體事實的「歸納法」；（二）他們否認古典學派所倡導的抽象的普遍妥當的法則而只承認某一國民某一社會所固有的具體的特殊事象；否認經濟法則在一切時代一切地域的普遍共同性和一般性而強調各個國民社會底差異性特殊性；（三）否認古典學派經濟學底根本原理——「以最小勞力獲得最大效果」，換言之，即否認「經濟人」底利己心爲人類經濟行爲底根本原動力，而認爲人類經濟行爲除利己之動機外，尙有其他各種原動力存在，如名譽心、活動慾、義務感、同情心、及友愛、憐恤等等，也都可以成爲經濟行爲底動機的；因之，假使說古典學派研究對象是單純的人類經濟活動本身，是把它（經濟活動或經濟關係）當作純客觀的自然的東西來處理的，那麼歷史學派除把研究對象從經濟本身擴展到國家制度、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等領域外，他們尤其注重倫理的要素，他們特別強調經濟活動底主觀的倫理動機，並且把經濟學當做倫理的科學看待。

現在讓我們就以上諸點，分別予以論述吧。

二　方法

關於第一點，已如前面所述，歷史學派反對用抽象的演繹法，以建立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而得出普遍妥當的一般法則，他們主張搜集和考察各個方面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道德的、情感的……種種方面的具體的歷史事實，卽搜集一切經濟相關聯的現象，注意到時代和地域的特徵而一一加以歷史的考察，然後根據這種各方面的歷史的長期考察，來建立國民經濟底法則（然而決不是普遍適用於全世界一切國民和一切時代的一般法則——歷史學派說）。

照此派創建人羅秀底意見，「一個民族（卽國民）底各方面生活，如語言、宗教、藝術、科學、法律、國家及經濟可以成爲許多不同的科學研究對象，但實際上祇是一個整個的單位，凡欲了解其中之一面者，必須懂得全體才行。這尤以法律、國家及政治經濟爲更確，因爲這幾門科學組成一系，關係極爲密切」（註一）。所以羅秀自己說他所計劃的各種課題研究底成功，全賴「我們與研究國家生活底的其他科學，與法律、政治及文化史多多接觸」（註二）。

該派底另一代表希爾德布蘭說，「依照我的確信，國民的經濟學和它的語言、文學、法律及藝術等一樣，也是文明底一個分枝。它們又和其他文明諸分枝一樣，也是在特定的自然法則限界以內活動着的，但是……它們却都是人類自由精神和勞動底產物。所以那種科學，決不一切全和自然科

（註一）威廉・斯考特（William Scott）著：「經濟學發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第十三章第二節。

（註二）見基德和李斯特（Gide and Rist）合著之「經濟學史」英譯本頁三八一・

學一樣，對於一切時間空間都能以同樣法則去說明，以同樣尺度去計算的那種抽象的東西。……國民經濟學的文化史，其惟一確實的基礎，是在於使它和國民之綜合的、政治的、法律的發展史與統計相聯繫這一點上。而且只有站在這個基礎上面，那比較成功的國民經濟學底廣大結構，才有出現的可能」（註三）。

在克尼斯所著「歷史方法的政治經濟學」一書底國民經濟篇（第二編）中，克氏陳述一國民（或民族）底經濟對於它所居的領土，它的種族及其他物質與精神方面的特性，對於資本底數量，土壤底消耗程度，國家、宗教，以及它的顯著的觀念與感情等等的密切關係（參閱威廉．斯旁特著前揭書同章第四節或李炳煥等譯本頁二五六）。

舒摩勒在評論克尼斯底勞績時，有下列一段評語：「依他（指克氏——沈）的觀點，以爲主要的工作是攻擊抽象，攻擊過早的和錯誤的綜合，這是古典派經濟學家中所常見的情形。……他主張實際的具體觀念；他深感到連結各種現象的心理力量。他對於決定各國民底整個歷史的精神，有深刻的觀察。……在他的心目中，主要的事項是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其他部分的連絡，經濟制度之依賴於其所產生的各時期中的智力的及物質的要素，以及一切社會現象底集合性底重要」。（參閱前揭書中譯本頁二五九）。

總而言之，歷史學派諸代表推翻了古典學派依據抽象演繹法所進行的理論研究，而代之以對某一國民或民族國家（主要地指德國）底生活各部分作具體事實的歷史的敍述；他們雖企圖用這樣的

（註三）希氏著，「今日及未來之國民經濟學」序文，參照劉及辰編「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思潮批判」頁一九七—一九八。

一「歸納法」來建立自己的理論，但事實上却並沒有「歸納」出任何的理論體系來，實際上他們是根本取消了經濟學的理論。這正如反對他們的奧大利學派著名代表貴巴衛（Böhm-Bawerk, 1851-1914）所指摘，他說「歷史學派給與我們的預約是一到他們認爲必要的經驗基礎奠定了以後，他們卽可把理論體系建立起來。但是這一預約一直使我們失望到現在，他們至今仍然是一個「理論的不生產」。他們爲什麼還是一個理論的不生產呢？依我們看來，實在不是由於他們所搜得的材料底不夠，而是由於他們處理這些材料的方法底缺如。……假如歷史學派仍繼續堅持現在這種態度，則他們卽再做二十年或五十年的歷史研究工作，也還是談不到一般理論底建立的」（註一）。這一批判是很恰當的。

這樣，歷史學派以批判古典學派「起家」，終於如波多野鼎所說，「不但否認古典學派底理論，而且否認了凡是稱爲理論的一切東西」，他們「集中努力於具體的經驗的歷史事實之蒐集及其敍述，而拋棄了理論的構成」。既是沒有理論，當然根本談不到「歷史的」和「邏輯的」（亦卽理論的）之統一（The unity of the historical and the logical）了。他們雖然畢生埋首於種種方面的具體歷史資料底蒐集和描述，但是他們並沒有從這大批的包羅萬象的歷史資料上發見出歷史發展底「邏輯綫索」來，卽是說，沒有建立起歷史發展底經濟理論來。他們的「國民經濟學」實際上不過是「國民經濟史」，甚至於是「國民文化史」或「國民生活通史」。說得嚴格些，簡直連什麼什麼「史」也談不到，因爲科學的歷史也應該是發見規律，表達理論的，而歷史學派底歷史却未曾做到這步，他們的歷史不過是一部龐大的包羅萬象的歷史資料集而已。

（註一）見劉及辰編，「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思潮批判」頁二〇二。

同時，他們主張把政治、法律、宗教……及文化各部門和經濟聯繫起來考察，這粗聽起來似乎是很對的，但細按一下就知道他們的「聯繫觀」是不分主從地把各方面各部門的現象作等量齊觀的考察，甚至於到了新歷史學派手裏竟反客爲主，特別重視倫理要素（主觀要素）對經濟行爲的「價值」，而乾脆把經濟學變成倫理學了！這樣的不分主從，不講條理的「綜合的」聯繫研究，當然建立不起理論來的。

三　關於一般與特殊

如前所述，歷史學派根本否認普遍妥當的法則，否認各個國族（即他們所說的「國民」（Nation））各個時代的經濟發展法則底一般性，而強調每一國族每一社會發展底特殊性、具體性。他們反對古典學派底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地域的世界性的一般法則，而特別強調「國民生活」、「國民精神」底特殊性、差異性，以與古典派學說相對抗。他們認爲只有爲各國民所特有的國民經濟生活及其特殊的發展法則，而根本沒有世界性的一般法則的。

依據他們的見解，普遍的法則，即超時空的普遍妥當的法則，是自然科學所研究的法則。然而經濟學不是自然科學，所以不能想探求普遍的法則。關於這點，希爾德布蘭說：「依據正統學派底主張，一切的經濟法則是在人與財貨的關係中成立的，因此這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但是我們不能不說，這種見解忘却了人是社會底主體，是文明和歷史底子孫，因此人們底欲望、教養、及其對於財貨的關係，決不是同樣的。這不但因國家底不同而發生差異，而且也因歷史底變遷而隨人類一般文化底演變而演變的」（見「今日與未來之國民經濟學」）。他同時批評古典派學者說：「廬梭和康德曾忽視了人類底天賦差異、國民底特質、及社會發展階段底不同等，而以絕對的國家爲目標。

和此恰恰相同，斯密和他的學派，也忽視了各個國民底特殊事情及發達條件，尋去追求普遍妥當的法則而企圖建設世界的或人類的經濟學。……」（同上）

新歷史學派在這點上和舊派大體相同，不過他們更澈底地採用了「歷史方法」，更加強了經濟學中的倫理要素底「意義」（這點下段詳論），因而比之舊派是更強調了國民生活底特殊性，更與抽象性的理論絕緣，所以是比較更退步的。

這裏正和前段中所述歷史學派對於抽象演繹和具體的事實考察底關係，對於理論和歷史底關係完全缺乏認識的情形一樣，與這相適應的，他們同樣地完全沒有關于一般和特殊底關係的任何概念。這是無足奇的，他們既然根本否認普遍性的理論，否認一般的經濟法則（或經濟發展之史的一般性），那麼自然就談不到一般和特殊底關係了。

從基本上講，歷史學派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毛病，實質上是和古典學派一樣的。不過古典學派走的是一個極端，歷史學派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前者只看見一般而忽略了特殊，只知道從事抽象的理論思維而丟開了隨時間地點而變異的具體的事實研究，後者則恰恰相反，他們只看見特殊而忽略了一般，只知道埋首於具體的歷史事實底蒐集和敘述而根本拋棄了抽象理論的演繹和普遍法則底建立。兩派都缺乏科學的一般與特殊底統一觀。古典學派底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切時代都妥當的絕對法則和固定理論，固有問題，但是斯密、李嘉圖諸家，能用抽象的方法建立起整套的經濟科學底理論體系，道破了——縱然帶着若干階級的偏見——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底某些基本法則；這却不能不算是他們的偉大功績（參閱本書第三四兩章），因為那些基本法則恰正是（違背了歷史學派底意志）適用於一切商品資本主義社會而偏偏不是某一「國民」底特有法則啊。

歷史學派則根本無理論可說，他們並未把自己的「國民經濟學」變成眞正的原理之學；而他們雖強調特殊和具體，却並未能眞正科學地把握歷史的特殊性和具體性。他們雖強調歷史的研究方法，可是他們的歷史方法却與科學的歷史主義（Historism）毫無相同之點。他們心目中的特殊和具體，是割斷了歷史的聯系性和統一性，脫離了任何普遍法則的純主觀的特殊和具體。歷史學派底「特殊」，一直發展到了把經濟學變成倫理學的地步！

四　倫理觀經濟學底對象

如上所述，歷史學派強烈地反對古典學派底「利己心」說，而認爲人類具有種種「高貴的」動機如名譽心、活動慾、義務感、同情、友愛等等，也都是影響人類經濟生活的。這樣，他們就把經濟學看成了倫理的學問。這種觀點開始爲舊歷史學派（尤其是克尼斯）所強調，到了新派首腦舒摩勒底著作中，則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和上述這種事實（即指名譽心……等等爲決定人類經濟行爲之動機——沈）相關聯的，他們主張經濟學是倫理的科學」。關於這點，克尼斯說：經濟行動「沒有本身的目標的，這可以認爲是完成人類及民族的最高使命時是有用的。換言之，經濟行動決不是自己目的，却是附屬於倫理的目的；並且個人應當是由經濟行動而對全體生活底目的有用的。這樣，經濟學底對象，既是有倫理的性質，所以把它來做對象的經濟學，也不能不是倫理的」（註一）。

舒摩勒把這種倫理化的傾向，更發展到了頂點。他說：「在經濟生活中，人類雖然因爲要以外

（註一）克尼斯著，「歷史方法的政治經濟學」頁三三一與三一八，轉錄彭迪先譯，「現代經濟學論」頁七——八。

界財物來滿足自然的欲望而行動，然而誰也不會僅僅止於這種自然的技術關係上，而且更要爲了滿足高尙的完美的欲望或倫理的意志而努力。故此，經濟組織不得不是爲經濟的規律和倫理所制約的一種生活秩序。例如市場的關係，勞動者的問題，工資的問題等，只有和所謂人類的生活欲望之向上的、倫理的、道德的問題相關聯起來，才會被說明，才會被解決」（註二）。舒摩勒不但批判他的敵派——古典學派——底「利己心」學說，而且還指摘他自己的先人們底「不徹底」。他說：「舊歷史學派的人們，把各國的經濟組織專由氣候、人口數量及國富等之物質的技術的側面去觀察，而忽視了由倫理的、道德的方面之觀察。當論一國之經濟生活及其組織的時候，不僅必要考慮這種自然條件底差異，而且必要考慮國民底特性、倫理思想、勞動心理狀態、勤儉與努力之程度，義務觀念之厚薄，以及家族生活之良善與否等等之精神的心理的方面」（註同前）。

上面的引證很充分地告訴我們，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底主觀主義色彩是何等地濃厚；這些大學教授們底道學臭味是何等地沉重；他們公然地把研究客觀經濟生活及其法則的科學當作主觀主義的倫理學了。在舒摩勒領導之下的新歷史學派，卽依據這種倫理觀的經濟學爲張本，在實際政策上主張社會改良，以對抗和排斥社會主義；主張依據道德觀念以改善工人權利地位。同時，他們又擁護國家干涉而反對自由放任，認爲經濟不能任其盲目的放任，國家應負很多的責任，對於國家收入之分配應予關心，使其「合理地」分配於各階級，而對於弱者應負保護之責。這派也被稱爲「講壇社會主義者」（Katheder Socialisten），因爲他們是在大學講壇上宣傳他們道德觀的「社會主義」的。

（註二）舒摩勒著，「社會政策與經濟學之根本問題」（Einige Grundfragen der Socialpolitik und Volkswirtschaftslehre）

第九章　奧大利學派

第一節　概說

奧大利學派亦稱心理學派，又名界限效用學派（School of Marginal Utility）；因其創始人與代表學者均係奧大利人，故名。而其所以被稱爲心理學派者，乃因該派底理論基石——界限效用說（亦譯邊際效用說）——係以心理的主觀評價做出發點，同時他們又用心理學的方法，以心理學的眼光去研究那被古典學派所輕視的使用價值。至於界限效用學說本身，我們要留到後面幾節中去詳細論述了。

奧大利學派底形成要比舊歷史學派晚小半個世紀，而跟新歷史學派則差不多處於同一時期。在講歷史學派底時代背景時，我們已曾指出產生歷史學派底歷史條件，一方面是比較落後的德國資本主義與德國工商業家集團爭取本國產業獨立生存與自由發展以抗禦英國資本之壓迫的要求，另一方面則爲在保護政策之下加速發達起來的德國資本主義及隨之而興起的德國勞工運動底「攪擾」，亦即所謂「潑羅列塔里亞的瘟疫」底開始蔓延。與前一方面的現實形勢相應的，是該派高唱每一國家（在他們心目中，主要是指德國）底特殊性，強調它的特殊的要求，以對抗古典學派或正統學派底「世界主義」的超時空的一般法則和以個人利益爲出發點的普遍妥當的抽象理論。與後一方面的事實相應的，是該派（特別是它的新派）主張從倫理的立場去觀察經濟活動，依倫理的見地去確定社

會經濟政策，以圖解決社會勞動問題而與社會主義學派相抗衡。

奧大利學派也同樣地有它的歷史根據的。

這一派底全盛時期是在十九世紀之末和二十世紀之初，亦卽資本主義正發展到它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的時期。這對於奧國學派底興起是有重大意義的。西歐從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起，以個別的產業爲中心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已經開始走進以獨佔性金融資本（非普通所說的單純金融資本，而是指銀行資本與工商業資本之融合而形成的獨佔性資本，亦有稱之爲財政資本者，因而獨佔的金融集團亦卽被稱爲「財閥」）爲中心的獨佔資本主義。促成一轉變的，是股份公司（諸凡工商業、銀行金融業、交通運輸業等一切企業都紛紛採取股份公司底形式）底普遍成立。股份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底特點是它可以吸收龐大的社會游資而爲少數大股東或創業人（founder）所支配。但因股份公司股款底募集常以銀行爲媒介，或竟以銀行爲最大的股票承購人，或甚至由銀行斥資自做公司底創業人，這一來，那公司就落入了它的掌握之內，而那龐大的社會游資也就被銀行所支配了。但這些銀行大亨，同時必然兼做產業股份公司底大股東——操縱人，他們往往是銀行家、工業家和大商人三位一體的資本巨頭。這些在全國人口中佔不到百萬千萬分之一的資本巨頭，雖支配着全國財富底最大部分，但是他們卻不必像前一歷史階段中的工業家那樣地親自去組織生產，指揮生產，爲着利潤而兢兢業業煞費辛苦地去改良技術，提高生產效率等等，——他們可以不經絲毫心血地住在高樓巨廈裏，過着淫靡豪華的生活而坐收整千萬整萬萬的利潤。

社會經濟中的這一新的局面，必然伴隨着兩種顯著的趨勢：一方面造成社會財富集中於極少數與生產過程絕緣的資本貴族，他們及其周圍的一羣（卽某系財團所屬的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及其所豢

養的一羣）便形成了專事消費不事生產的寄生階級或有閑階級（Leisure class）；同時，資本主義底「爛消性」（生產力發展底遲滯化）也隨之而日益顯著；於是講究奢華消費就成了這一時代底風氣特點。另一方面勤勞的生產的平民大衆則日益普遍地走向破產與赤貧，以致造成勞資尖銳對立的病態現象；由於這一病態，社會的衝突和騷擾就成爲必然之趨勢。

這兩種現實的形勢，反映在經濟學這種意識形態上，就變成一方面把研究底重心放在消費問題上，另一方面則牟從心理出發的主觀主義的價值論來對抗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用同樣主觀的「時差利息」說來對抗科學的盈餘價值說。總起來說，以貪巴衛爲中心的奧大利學派底由個人消費和主觀需求做出發點的界限效用說，正是反映資本主義發展底這一階段底現實情況的。

奧大利學派底創始人是卡爾·門革（Karl Menger 1840-1921）。集大成者是貪巴衛（Eugen Von Bohm-Bawerk，1851-1914）；其中堅人物則有魏沙（Friedrich Von Wieser），朱克堪德爾（Zuckerkandl）熊彼特（Schumpeter）等。

第二節　卡爾·門革底方法論

如前章中所述，經濟學的理論被歷史學派拋棄得一乾二淨；他們只知埋首於「歷史」的考察和瑣碎事實的描述，而完全放棄了理論的研究和經濟學體系的建立。奧大利學派則起而反對歷史學派底這種做法（關於門革的批判歷史學派底「理論的不生產」，已詳前章），推翻歷史學派底瑣碎的「歷史方法」而重新恢復了被該派所鄙棄的抽象演繹法，重新恢復了理論的研究，建立了理論的體系。這首先當歸功於卡爾·門革。奧國學派首創人門革，認爲具體事實（即經驗現象）的搜集和研

究固亦有必要，但是經濟法則的發見和理論的建立，却必須依賴抽象的演繹法。

那麼門革用什麼形式來拯救被歷史學派所蹂躪的理論經濟學呢？他如何確定理論經濟學底任務呢？

門革認爲在觀察實在世界底各種現象時，我們雖見到五花八門的種種姿態，然而它們是可以還元於某些較基本的現象形態的。且認爲事物雖有變化，而各種具體現象間的一定的關係却是不變的。這就是說，照門革底意見，我們能夠發見一定的類型(typus)及類型的關係(typische relation)。在國民經濟底領域內，譬如在價格、資本、利息、貨幣、購買、供給、需求等等各種現象中，都能發見種種類型，並且能夠發見：資本積累愈增大，則利率愈降低，供給增加則商品價格跌落等等的類型關係。

既然照門革底見解，理論經濟學底任務是在發見各種經濟現象中的類型及類型的關係（卽經驗的法則），那末要問用什麼方法來發見這些東西呢？錄以下幾段文字來答復這問題吧。

「門革認爲理論科學的任務，是在提供超出直接經驗以上的認識。……因此他（卡爾·門革——沈）排斥實在的、經驗的方法，卽排斥歸納的方法。這個方法的目標，雖是也想發見一般的類型及類型的關係，因此在理論經濟學上也有被採用的可能性，然而這方法所矚目的類型，不外乎是經驗的事實，……不值得稱爲嚴密的類型。並且用這個方法所能發見的類型的關係，是實在的各種具體現象間的關係，這不過只能確定所謂經驗的法則。超出經驗以上的科學的任務，是這個方法所不能勝任的」（註一）

（註一）彭閱波多野鼎著「現代經濟學論」頁一六。

這樣，奧大利學派底創始人是排斥所謂實在的經驗的方法，而主張採取所謂「嚴密的」（exakt）方法或演繹法的。這「嚴密的」方法如何使用呢？照門革底意見，這個方法應先探求一切實在而最簡單的要素。在這個時候用不着顧慮這個要素是否獨立存在的現象。用這個方法所探索到的嚴密的現象類型，是用不着和現實現象完全一致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有提一提該派另一著名代表魏沙底意見之必要。他說理論家應從孤立化的理想化的抽象出發，由這個抽象而把握現實底純粹要素。但理論家為徹底完成這個使命，是不能夠停頓在這種理想化的極端抽象上的，因為如果停頓在那裏，他就無法理解現實了。因此，理論家不能不一步一步地用「漸減的抽象」（abnehmende abotraktion）底方法，去接近具體的事物（註二）。

無疑的，門革及其學派用這種抽象的演繹法來建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用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來剖視經濟現實，這無論如何要比歷史學派進步得多。儘管該派學說距離眞正科學底標準還遙遠得很，而且還比在它以前一百多年的斯密和李嘉圖底學說要落後些，即缺乏科學性些，然而他們的方法論却至少要比歷史學派接近科學得多；他們用這樣的方法，把經濟學從歷史學派踐踏之下重新恢復了它的理論科學底地位。

然而奧國學派底抽象方法，却仍犯着非常嚴重的錯誤；它不但距離科學的方法論標準遠得很，而且嚴格說來簡直還是反科學方法論立場的。何以見得？

第一，像門革和魏沙（賁巴衛及其他代表也如此）所用的抽象思維，可以說是思維的抽象或抽

（註二）魏沙著，「社會經濟論」。

象的抽象，而不是從歷史地具體的現實中所進行的抽象（即科學的抽象）。他們沒有能夠以客觀的態度，從商品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底混沌體中，抓住它的最最單純、最最基本、每天千百次遇見的現象形態，從而再由此單純的基本形態底剖析，一步一步地增添比較具體的因素上去，這樣由單純的上昇到複合的，由個別的上昇到全體的，以至於最後達到全面性的具體爲止。這就叫作由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而歸復（上昇的歸復）到具體的科學研究法。先從所謂混沌的具體，用捨象的工夫得到抽象概念，這是科學的抽象法；然後從這種抽象又一步步地上昇到具體（已非混沌的具體而是「透明的」具體），這是科學的綜合法。因此，科學的抽象法是以具體的現實爲對象，以具體的現實爲基礎的。奧國學派所使用的抽象法，却並不能抓住混沌的客觀現實中的最基本最單純的東西——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基本細胞；他們所抓住的「抽象化理想化的純粹要素」，如孤立的個人，如欲望，都是失去了任何歷史的具體性的空洞概念。原因就在他們是主觀主義地處理着問題，主觀唯心地進行着抽象的緣故。因此他們不能科學地由抽象而歸回到現實的具體；同時，他們也因而不能正確地把握具體的現實。他們的抽象，是抽象的抽象而從具體和向具體的抽象。

第二，他們也和歷史學派一樣地缺乏理論的和歷史的之統一觀，所不同的，只是歷史學派是取消了理論而專談「歷史」（實際只是史料而不是歷史），奧國學派則主觀唯心地高談理論而完全忽視了歷史。由於這樣，所以他們又和古典學派一樣地缺乏科學的歷史主義。作爲他們的研究對象的「個人」，作爲他們理論體系之出發點的欲望，都是完全沒有歷史的具體性的空洞概念：是處於何種歷史條件下的「個人」？是處於何種歷史地特定社會形態中的何種社會地位（就其對生產手段的關係而言）的「個人」？屬於那一社會羣的個人底欲望——凡此種種，奧國學派均不能予以明確規定。

第三，由於唯心的主觀主義的抽象所得到的「個人」是空洞的失去歷史具體性的個人，連帶地以這樣的個人觀爲根據的社會觀，自然也必然是沒有任何歷史具體性的抽象概念。

不僅如此，奧國學派底社會觀基本上也和正統學派共同的：卽作爲許多個人之算術的總和的機械論社會觀。很明白的，社會固由許多個人所組成，但是社會底質，却決不能還元於個人底質。因此，從抽象的孤立的個人出發去研究具體的社會，其徒勞無功，正與以個人經濟活動底法則爲範本去研究社會經濟法則是一樣的（註）。奧大利學派方法論上的致命錯誤之一，除從主觀欲望出發這一點外，卽在把社會經濟底法則等同於個人經濟活動底法則了。

講到研究對象，該派把個人底欲望擺在第一位，只研究個人與財貨的關係，而且還只從心理的着眼點去分析這種關係，它的背反科學的大道，更是顯而易見，無須揭露的了。

第三節　貢巴衛底價值論

一　主觀主義的價值觀

和大多數經濟學派一樣，價值問題底研究也居於奧大利學派經濟研究底中心。假如在這點上他們和別的學派有所區別的話，都末區別就在他們所創建的價值論，「界限效用」的價值論，不但是他們的經濟學說底中心；不但是他們的理論體系底基礎，而且它幾乎包括了他們的全部經濟學說，幾乎體現了他們的全部理論體系。假如說，跟他們同時代的科學社會主義學派底經濟學說底基礎儘管是勞動價值論，可是它的最大特點和中心骨幹却是盈餘價值論（Theory of surplus value），

（註）門革卽認爲魯濱遜式的孤立的個人經濟就是社會經濟或國民經濟底縮圖。

那麼奧國學派底經濟學體系底基礎則是界限效用說的價值論，它的主要特點和中心骨幹也是這一價值論。惟其如此，所以奧國學派也被稱爲界限效用學派（School of Marginal Utility）；而界限效用說又是以欲望或主觀的心理要素爲出發點的，所以該派又被稱爲心理學派。

在貧巴衛的價值論中，他首先把價值分爲兩個範疇：主觀的價值和客觀的價值。據貧氏自己的界說，「主觀意義上的價值，是財貨對於經濟主體底幸福所具的意義」（註一）。因此主觀價值不是財貨本身所固有的性能，而是「經濟主體」（卽享用財貨的人）對於財貨性能的一種主觀的評價。反之，客觀的價值却是客觀地附着於財貨本身的性能。貧氏說，「客觀意義上的價值，是具有某種客觀效果的財貨底性能。譬如飲食底營養價值，木材和煤炭底暖熱價值，各種肥料底肥田價值，以及爆炸物底破壞價值等等」（註二）但在貧氏看來，在經濟學中當作問題來檢討的不是這種客觀價值，而是「在交換時的財貨底客觀價值」，卽客觀的交換價值。所謂「客觀的交換價值」，就是指在交換的時候，當作報酬（等值）而受領一定量的別種財貨的某一財貨底能力」（前揭書）。而且這種客觀的交換價值，嚴格說來却和價格不同的，因爲照貧氏底意見，客觀的交換價值是獲得別種財貨底一定量的能力，價格却是這別種財貨底一定量本身。然而兩者底法則結局是同一的，因而貧氏常把它們混爲一談。

那麼，作爲主體對財貨之評價的主觀價值和作爲財貨所固有的性能的客觀價值之間，有着甚麼樣的關係呢？貧巴衛認爲這種關係是表現於前者是後者底原因，客觀價值是主觀評價底產物。而主

（註一）貧氏著，「資本及資本利息論」第二卷。

（註二）同前書

觀價值是所謂經濟主體對於財貨的評價，它是以主體底欲望，以主體需要它的程度爲根據而被確定的，那末這種主觀的心理的東西，如果是客觀的東西（客觀價值）底原因的話，那就無異取消了客觀價值之爲客觀的東西：客觀價值也變成了主觀的東西。惟其如此；所以貢巴衞底（和奧大利學派底）價值論，是徹頭徹尾地主觀主義的價值論。惟其如此，所以我們要明瞭貢氏底價值論，首先（而且幾乎惟一地）必須進一步來研究他的主觀價值底本質。

那末貢巴衞怎樣解釋這一本質呢？他說一切財貨都是無例外地具有對於人類幸福的一定關係。可是在這個幸福關係上，有兩個本質不同的階段：低度的階段和高度的階段。低度的階段（或低度的關係）是在凡是一個財貨對於人類幸福有貢獻能力時成立的。高度的階段（或高度的關係）是在一個財貨不但是幸福底有效的原因，同時也是幸福底不可缺少的條件時纔成立的。在前一階段上，我們認識財貨底效用性，在後一階段上，我們纔能認識價值（參閱彭譯「現代經濟學論」頁四〇）。

貢巴衞用以說明主觀價值底這兩個階段底界說的例證如下。他說譬如有兩個人，一個是站在水量豐富的泉水旁邊的人，另外一個是在乾燥得一滴水也沒有的沙漠中旅行的人。他說對於前者，一杯水只有滿足他欲望的能力，這是水底效用性，但這決不是他的幸福底不可缺的條件，因爲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取得無論多少的水來喝。可是對於後者——旅行沙漠的人，一杯水却成爲他的幸福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因爲喪失了一杯水，將使他感受到極大的痛苦。這樣，對於前者，這杯水只有效用性而無價值，對於後者那杯水是有價值的。貢巴衞底結論是：價值之所以成立，必須以效用性（utility）和稀罕性（Scarcity）爲條件。他又說，「價值是以不足爲前提的」（前書）。

這樣看來，賁巴衛（和該派其他代表）所了解的效用性和價值，說來說去沒有超越科學的經濟學上所說的使用價值。關於眞正的價值，他從未提及過的。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他所謂效用性是使用價值底潛在，而他所謂價值，則是使用價值底實現。並且，即對於使用價值底潛在，他也是作着主觀主義的了解，而不是從商品卽他所說的財貨本身之客觀物質的自然性上去把握的。由此，就連帶地產生了同樣主觀主義的，以所謂稀罕性或主體需要程度爲決定條件的「價值」觀。

由此，也就產生了他關於價值大小的「理論」，卽有名的界限效用底「法則」（Law of Marginal Utility，德文爲Das Gesetz der Grenzautzens）。

二　界限效用底「法則」

由上所述，可知賁氏認爲財貨底價值乃由它的效用性和稀罕性所決定的。那末財貨價值底大小由什麼來決定的呢？如前所述，效用性是財貨滿足吾人欲望的能力，所以財貨評價之高低，是決定於吾人對此財貨的欲望之大小。可是講到欲望，賁巴衛認爲有兩個問題要闡明的：第一是欲望底種類，第二是對於某種事物的欲望之重要程度。關於前者，卽如飲食的欲望，吸煙的欲望等。欲望底對象不同，欲望底種類亦不同。這叫做種類欲望。關於後者的例子，卽如對於水的欲望、第一杯水底重要程度顯然大於第二第三杯水；隨着對水的欲望（解渴的欲望）一步一步地滿足，此種欲望底重要程度就一步一步地遞減。賁氏認爲決定財貨價值的欲望，不是前一種——種類欲望，而是後一種——他名之爲具體欲望。

賁巴衛爲解釋財貨價值由欲望重要程度來決定這一點，用了下列的一個數字表：

I　10　9　8　7　6　5　4　3　2　1　0

Ⅱ	…………	9	8	7	6	5	4	3	2	1	0
Ⅲ	…………		8	7	6	5	4	3	2	1	0
Ⅳ	…………			7	6	5	4	3	2	1	0
Ⅴ	…………				6	5	4	3	2	1	0
Ⅵ	…………					5	4	3	2	1	0
Ⅶ	…………						4	3	2	1	0
Ⅷ	…………							3	2	1	0
Ⅸ	…………								2	1	0
Ⅹ	…………									1	0

表中的Ⅰ Ⅱ Ⅲ等等是表示種類欲望底重要程度，假如Ⅰ是表示飲食欲望，Ⅶ是表示吸煙欲望，那麼Ⅰ當然比Ⅶ重要得多。表中的10 9 8等等則表示具體欲望底重要程度。飲食欲望本身雖較吸煙欲望爲大，但前者底第八級具體欲望是3，而後者底第一級具體欲望是4，則後者底重要程度就較前者爲大了。在肚子吃飽的時候，對於一碗蹄胖的欲望程度就比不上飯後的一枝煙了。

因此，資氏認爲決定財貨價值的，不是該財貨所能產生的最大效用或平均效用，而是它的最小效用（即由意義最小的具體欲望所決定）。這種最小的效用，他稱之爲界限效用。所以界限效用底法則是說，財貨底價值，是由該財貨底界限效用底大小來決定的。

這種「理論」底缺乏科學的嚴密性是顯而易見的。資巴衛及其學派既將商品底價值等同於以個人消費爲出發點的使用價值，而復將使用價值完全曲解爲純主觀的東西——決定於欲望的東西；這

樣就形成了他的以消費爲立場而不以生產爲立場的主觀主義的價值「理論」。這種「理論」底庸俗、淺薄和不合事實，只須隨便舉出此事實來，就可以把它根本推翻。假如商品底價值果如貢氏等人所說，是決定於效用性底大小和人們對於它的欲望程度的話，那末它得隨需要它的人底欲望程度而參差不一：同樣的一斗米對於不同的顧客可有大不相同的價值，對於不同時候不同場合的顧客，又有完全不等的價值；然而事實上在同一時間與同一地點一斗米底價值卻總是對於任何顧客大致相同的。即使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地點，相差程度也是很小的。奧大利學派底價值論底根本癥結，是他們根本沒有真正的價值論，而只有主觀主義的使用價值論；他們根本不知道有價值或交換價值，而只知道使用價值。他們所說的「交換價值」，實際上仍是依據「主體」們各自對其所有物的具體欲望之強度而成立的一種交換比率，因此，它仍是基於欲望與效用的使用價值。

對於貢巴衛和整個奧大利學派，效用性和欲望是形成價值量之大小的兩個因素。但是這兩個因素都是心理上的東西（註）；這種主觀的心理評價能不能表現在量底大小上，那是很成問題的。物理的東西可以法碼來度它們的重量；人類的勞動可以用時數來度它們的多寡；心理的欲望，試問用什麼來度量它們的大小呢？這樣的依據欲望的心理評價（即商品底主觀價值）依據這種心理評價的界限效用「法則」，顯然沒有絲毫的科學價值。

其次，照貢巴衛及其學派底見解說來，判定價值的主體是各個人、決定財貨價值大小的，是個人的（而非社會的）心理評價——對某一財貨的欲望底強度。這樣，界限效用學說是離開了現實社

（註）財貨底效用性，如上所述，是滿足欲望的能力，這一界說顯然意味着事物效用性底存在當以人們底欲望爲前提，它不是客觀上固着於事物本身的東西。所以照奧國學派底見解，效用性也變成心理的主觀的範疇了。

會而以個人心理爲中心的一種虛構。然而實際上我們任何人底經濟生活，都不是（而且不可能是）魯濱遜式的孤立生活；沒有一個人能夠脫離社會的生產諸關係而單獨生活的。就算價值是由人來評定的，那末這也決不會是個人而是一般社會；而且一般社會底評價，也必以商品生產上所消耗的成本和一般的利潤爲根據，而決不能依主觀需要底程度而隨便予以評定。個人底經濟行爲，總是嚴格受着社會經濟生活底法則所約制。例如我們評定一種商品底價值，乃係依據此商品在市場上的既成價格來做標準的；而這一既成價格則係依據客觀的生產情況和市場情況來決定。這樣，經濟主體對商品的評價，事實上必須以客觀的價值爲基礎。離開了這種客觀基礎而作主觀欲望、作所謂稀罕性，來估定一種財貨底價值，那只有在極少數的例外場合或非常場合才有可能。例如百萬富翁對於一件名貴稀有的古玩，可以給與極高的評價，戰爭期間，摩登貴婦對於一經來源斷絕、市上絕跡的超等舶來香粉，也可以給與極高的評價。然而前者是永遠不能再生產的珍物，它是在受一般市場法則（價值法則，供求法則）支配的一切能不斷再生產的普通商品之外的珍奇古玩，這是例外場合。在戰爭時期由於海口被鎖或禁絕生產以致市場絕跡的奢侈品，其評價之所以脫離客觀價值（指生產時所消耗的勞動量），乃是一種非常場合。兩者都不是普遍存在於正常的商品經濟中的正常現象。因此，依主體底欲望，依所謂稀罕性而對事物作完全脫離客觀實際的主觀評價，並以此主觀評價而爲出發基礎而建立的「理論」體系，當然絕對不能說明客觀現實，因而它不能成爲科學眞理。

經濟科學是研究社會的生產諸關係底運動法則的科學。商品底價值也不外是人與人的社會生產關係底一種物的體現，因而它是十足的社會性的範疇：離開了社會，離開了社會的生產關係，是根本談不到價值的。以龐巴衛爲代表的心理學派底價值論，恰正和上述的科學立場相背馳。他們的基

本立場是個人的而非社會的。他們認爲社會經濟生活是各個人的經濟生活底複合，反之，個人的經濟生活則是社會經濟生活底範本。他們所確定的經濟學底任務是由個人經濟諸現象及其法則，演繹出社會經濟諸現象及其法則來。其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前面已經述及，而其在理論上的顛倒是非，也是完全明白的。

至於界限效用學說所依爲出發點的欲望，它的缺乏歷史性，缺乏社會階層的具體性，更屬顯而易見。心理學派所談的是籠統的個人底欲望，這種個人和這種欲望，是脫離了任何的歷史具體性和社會具體性的空洞的抽象概念。須知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底一個封建主底欲望，是不會同於二十世紀美國華爾街的一個金融巨頭底欲望的。住在高樓大廈裏的富商巨官的欲望，更不會同於一個住在狗窠似的破茅屋裏的赤貧者底欲望，像界限效用學派這樣的缺乏絲毫社會歷史具體性的抽象理論，當然不能說明現實社會底具體事實。

第十章　英美學派

第一節　概說

經濟學史上的所謂英美學派，就是指的克拉克(John B.Clark, 1847)和馬夏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兩大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學權威所創造的學派。所以在這一章裏面，因爲受着篇幅底限制，只準備扼要地介紹兩位權威底中心學說或基礎理論。

就時代背景論，無疑地，這兩位經濟學權威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爛熟時期，生活在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底歷史條件之下。這一時代，由於資本主義積累底一般法則之作用，貧富的懸殊，階級的矛盾，已達到很劇烈的程度。這種由資本主義自身所必然產生的病態，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家是有着很大的影響的。他們企圖緩和這種病態或救治這種病態；他們從而企圖維持資本主義底長期繁榮，相信資本主義能夠永久生存。他們所建議的救治方法，是從人道的立場去實行社會改良，對一般貧困和生活艱苦的大衆，主張設法減輕他們的痛苦。

既是資產者的經濟學家，那末他們自然和前面各章所討論過的一切資產者的經濟學家一樣，也根本看不見資本主義這一經濟制度底歷史的過渡性，他們信任這種制度是一種絕對的永恆的制度，是天經地義不可動搖的制度。這當然不足爲奇的。

自然，現代美國學派底創始者克拉克，和英國劍橋學派底建樹人馬夏爾，理論上也各有各的特

獻的。克拉克對研究和對經濟學的偉大貢獻，主要的是在從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九年這一期間。這正是美國工業很劇烈發達努力向外發展、及其資本初露頭角於世界市場的時期。克拉克底經濟學說，也是適應於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這一階段底現實的。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經濟學界中有相當地位的經濟學者，很多是從德國留學回來的。克拉克便是其中的一人。克拉克在德國雖受業於歷史學派底學者，但他却能擺脫歷史學派底支配而獨自建立起理論經濟學底體系來。

當時美國多數從德國留學歸來的經濟學者，都帶了歷史學派底影響回來的。因此他們研究和討論底中心是具體的歷史的材料和問題。他雖然儘重過去經濟學者底業績，却不耽溺於抽象的思維，而重視關於經濟生活底各種實際狀況之歷史的統計的研究。顯然的，他們是和德國歷史學派底社會政策學會基本上取同一立場的。然而克拉克則不然，他是以歷史學派底陣營內的異端者底姿態，出現於美國的經濟學界。他努力於建設純粹的理論經濟學。他的研究成果，最初是連續發表於雜誌上；後來到一八九九年才集其大成，著成「財富之分配」（Distribution of Wealth）一書，而聞名於世。這部著作就成為美國學派底基石。

克拉克對理論經濟學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有關於靜態經濟與動態經濟底研究，曾試過綜合價值及價格問題上的主觀見解和客觀見解的企圖，擴展了界限生產力說，並且把他的工資論和利息論建立在這一學說上面。

馬夏爾是成為現代英國經濟學主潮的劍橋學派底建樹人。他的研究是由物理學而哲學而倫理學，最後才由倫理學而經濟學。所以他的學說，帶着相當濃厚的倫理學色彩。這一點或許是受了一點歷史學派影響的緣故。但主要地是由於他的人道主義的思想所發生的作用。馬夏爾認為社會倫理學

和經濟學，是改良人類生活狀況的手段。「馬夏爾底人道主義思想，不但是使他舍數理和哲學而研究倫理經濟的主因，並且也決定了他所倡導的經濟學底性質。他對於經濟的一切著述及研究興味，無非要使經濟學成爲社會改良及進步的一個有用的工具。據他看來，經濟理論及原則，是達到實際目標的手段，而本身並非最後的目標」。（註）

馬夏爾想把經濟學建設成爲「福祉」（Welfare）之學。他曾說過：「至少要貢獻其最高能力的一部而與周圍的社會苦難奮鬥」（一八八五年他就任劍橋大學教授時的演說結尾一語）。在他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底開首也說：「所謂下層階級，是否眞有存在的必要？把一切的人們從貧乏的苦痛中解放出來，使他們不因過度的機械的痛苦工作而發生志氣衰頹，使他們有享受文化生活底公正機會，這眞是不可能的嗎？這個問題，正是提供最重大的興趣與經濟學研究的」。

這樣，馬夏爾底人道主義色彩是很顯明的。他的經濟學所以帶有人道主義的倫理色彩，正是反映他那時代——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和整個西歐社會兩極化趨勢底加強。由於資本主義底高度發展，資本和生產底高度集中，勞工階層生活境況底不斷惡化，以及一般勤勞人民貧困化底加劇和普遍，迫使資產階層裏的經濟思想家不能不注意到解救此種社會病態的途徑。但是正因爲他是資產階層裏的學者，他意識中認定資本主義這種社會經濟制度是絕對的不可被代替的，所以他只能站在上者底立場，以慈善家人道家底態度來考慮爲諸勞動階層謀福祉的辦法。

馬夏爾論及經濟學底根本方針時說，我們不能把經濟學當作「知的遊戲」看，也不能把它當作

（註）威廉・斯考特著，「經濟學發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第二十六章導言。

是爲眞理而追求眞理的手段，而應把它當作倫理學底輔助者，當作實際生活底僕役，當作剷除貧困的手段時纔有價值。這種對經濟學價值的評估，把學問當作解決實際問題的手段，無疑地是馬夏爾底一個重大特點。他之所以被評定爲資產者經濟學界裏的開明的進步的權威學者，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因。不僅如此，在實際行動上，據馬夏爾自己所記述，他曾努力想和實際工作及勞動階級底生活，保持密切的接觸。他一方面想努力多知道一切產業的技術方面，一面又願和工會主義者合作主義者及其他勞動集團指導者相交際。從這一點上更可以看出馬夏爾底現實主義精神。

第二節　克拉克底學說

一　基本見地

首先要提出克拉克底一些基本見地來，作一個大體的說明。在方法論上，克拉克基本上繼承了斯密和李嘉圖底見解。克氏對於斯、李二人底出發點「利己心」，對於抽象的演繹法，抽象的追逐私利的「經濟人」，以及對於他們的超時空的「自然法則」觀等，都表示很明顯的同情。

可以舉分配論爲例證，克拉克底和斯密氏底基本見解頗相類似。斯密曾說：「……由於相異的事業，在勞動底工資和資本底利潤上，雖然會引起顯著的不平等，但是在全體的利益與不利益上，不問實際或想像如何，卻決不會引起任何不平等的」。爲什麼呢？斯氏答道，「因爲如果在同一地方，發生某些事業利益較多或較少的情形，則多數人就要趨向於利益較多的事業，許多人就要拋棄利益較少的事業；這樣一來，事業底利益就立卽會保持其一般事業底利益標準」（「國富論」）。斯密底這一段話，意思是說不論資本家或勞動者底報酬，由於事業不同而有大小高低的差異，但是

只要完全實行自由競爭，則這些差異即會消滅而自然達到平等地步。同樣，克拉克也有過類似的說法，他說：「社會所得底分配，受制於自然法則，……這個法則如果不遇到任何阻力，則可使每個生產分子所得的財富，均等於其自身所創造的」。又說：「自然法則如果任其自由發揮，則屬於任何生產功能的一分子之所得，可以其實際的生產額度量之」（註）。

由此可知，克拉克底「自然法則」觀，自由放任的主張，抽象的「生產分子」等等，都和斯密及其古典學派底見解，大致相同的。克氏在研究方法上，也傾向於古典學派底演繹法。所以他的研究底出發點有下列五點：（一）承認私人佔有制為絕對的經濟制度，（二）認為個人底活動自由，不應受任何的牽制或束縛，並主張以自動競爭為原則，任人經營有利可圖之事業，（三）政府在經濟範圍內之干涉，應僅以對物質財產之保障，各種契約之執行及競爭之維護等為限，（四）認為勞動與資本構成社會底流動基金；其各個單位，一遇刺激即能迅速轉移到別處的，（五）認經濟活動為人類欲滿足其主觀欲望的動機所激發。克拉克底這些見解，均以抽象的——超時空超社會層的——個人利益為出發點，其與古典學派相類同，是極為明顯的。

克拉克學說中的一個特點是他把社會經濟事實區別為靜態的和動態的：靜態的具有永久性，動態的則是不斷處於變動中的。關於研究靜態的靜態經濟學和研究動態的動態經濟學之解釋，留到下一節中去論述。這裏還要繼續評述他的方法論的基本見解。

無疑地，克拉克和他同時代的（如新歷史學派等）和比他前些時代的（如古典學派等）學者們比較起來，是有他進步的地方的。克氏能夠應用抽象法，能夠看到抽象與具體的關係，這是他比歷

（註）見克拉克著，「財富之分配」序言，頁一。

史學派，甚至比奧國學派進步的地方。他能部分地從動的方面研究經濟現象，並注意到靜止與運動的關係，這又是他比古典學派進步的地方。

雖然如此，克拉克底研究方法，基本上還是形而上的。因爲他雖然注意到抽象和具體的關係，但是他的抽象，並非如眞正科學的抽象法那樣地依據於具體的現實，而是離開了具體的現實社會諸關係的一種全憑個人思惟（心理）的抽象。換句話說，他實際上還是不瞭解抽象與具體之實在的科學的關係，還是沒有打破一般形而上學者在二者間所設立的「壁壘」。

其次，講到所謂靜態和動態的關係，克氏雖亦指二者間應有關係，但實際上他所瞭解的關係也不是合乎科學方法的，因而是不正確的。克拉克底研究行程，並非由靜態（抽象）一步步地上昇到動態（具體），而把具體的繁複的動態現象完整地呈現出來，而是主觀主義地自外地硬把動態的具體的東西（事實）和靜態的抽象的東西（法則）聯繫起來。這有下面的一段話可資證明：「我們肯認欲望變化，隨伴欲望而生產的財富種類也變化，從而發生新機器底使用，人口底增加，大產業之排擠小產業等等的變化。隨這種動態研究底前進，我們的理論也趨於完成；理論上的動的世界變爲和現實的世界相等同」（註）很明顯地，這裏克氏是主觀地自外地把動的現象去與靜的固定的原則結合起來，而遠非客觀地循着歷史發展的路綫，從動的現實內部抽出它的基本的運動法則來的。

二　所謂靜態的和動態的經濟學

前面已經約略說到了克拉克關於靜態經濟和動態經濟的觀念。所謂靜態經濟，就是指經濟現象或經濟生活中的本質性的、抽象性的、固定性的東西；反之，所謂動態經濟則是指現象性的、具體

（註）見「財富之分配」頁三一一。

性的經濟活動中的東西。克拉克認為古典學派所說的自然價值、自然價格、自然工資、自然利息等等，就是他所說的靜的範疇。研究這些範疇及其相互關係之法則，是靜態經濟學底事情。他說古典學派既建立了這種靜態經濟學。但是現實的社會常常是動的，尤其是社會經濟底變動是很快很大的。例如目前的工資和利息底水準和若干年後的工資和利息底水準必不相同。但是克氏認為不論這些現實的經濟現象如何變動，靜的、正常的（或「自然的」）準則總是存在的。據他的意見，在一切的變化中，不論在任何一瞬間也好，總有一種決定靜的準則的力量在作用；工資和利息，有和這種靜的準則趨於一致的傾向，恰像不論海面底波浪如何洶湧，起落萬丈，但總存在着一個可想像的靜的水準；怒濤洶湧的海水表面，就在這水準底周圍擺動不已。（前書）。

克拉克認為要在動態的經濟現象中發見這靜態的準則，（仍以工資與利息為例），必須假設一定的勞動量和一定的資本量底存在；假設生產的方法停止不變；消費者底欲望也不變動。在這種假設之下所發見的價值、工資、利息等等，便是科學所應追求的「自然的」、靜的準則。克氏在「經濟學說綱要」中也說，在人口（勞力）沒有增減，資本量固定，生產方法不變，生產組織底樣式也不變，消費者欲望底大小不變，種類和強度也不變等等的假設之下，靜態的準則是可以確定的。研究上述種種假設之下所想像的種種靜態經濟法則（即靜的準則）的科學，克氏稱它為靜態經濟學或社會經濟靜學（Social economic statics）。

然而現實社會是動的，社會經濟底現實狀態是變動不居的。在靜態的準則之上加以運動和擾亂的力量時，就形成動態的現實現象。研究這種動態的具體經濟現象的學問，便是動態經濟學，或社會經濟動學（Social economic dynamics）。因而他說：「我們肯認欲望變化，隨伴欲望而生產的

財富種類也變化，從而發生新機器底使用，人口底增加，大產業之排擠小產業等等的變化。隨這種動態研究底前進，我們的理論也趨於完成，理論上的動的世界變爲和現實的世界相等同」。

三　克拉克底價值論

克拉克底價值論雖比心理學派稍微客觀一點，但基本上仍是主觀主義的，因爲他大體上接受了界限效用說底觀點。克氏認爲價值底源泉是財貨對於消費者需求的適度調節，而它的大小則決定於效用遞減和限界效用。關於效用或主觀價值底測定問題，他提出了所謂「非效用」說或犧牲說。克拉克認爲生產者用繼續的勞動所製造的生產品之效用性，是隨着該生產物底數量增加而遞減的。反之，他支出勞動時所受的「犧牲感」，「痛苦」或「非效用」，則隨勞動時間之增加而遞增。因此，在經過一定的勞動時間後，從生產物上所獲得的效用和生產它時所受的犧牲底大小趨於相等。所以「犧牲感」底大小，就是該生產物底價值底尺度。這裏很明顯的，克拉克底觀點比較純粹從主觀欲望出發的心理學派底主觀評價的價值觀稍微客觀了一些，因爲他似乎着眼於財貨生產時所支出的勞動（「犧牲感」）以度量價值；然而基本上他的觀點仍不外是主觀的心理的，因爲他說的是「犧牲感」，是「痛苦」，是「非效用」這些主觀的心理範疇，而不是生產時所消耗的勞動時間。

固然，克拉克提是也提到勞動時間之長短的，但是他觀念中的勞動時間之長短，並不意味着一定量的筋肉體力底消耗，從而又間接地意味着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底消耗（恢復勞動力所必需的），不是的，他所謂勞動時間之長短，仍然是以「犧牲感」底大小爲基礎的，所以仍逃不出心理價值觀底圈子。請讀他說的話吧：「……各個特定的勞動時間底有效負担、犧牲、或非效用等等，如果互相均等，那末那個相等的非效用，在測定勞動時間所生產的財貨價值時是可以丟開的；各個財貨只

要按照生產時所需的勞動時間底單純的長短就可測定其價值了。就是說，兩點鐘的勞動生產物，常常恰好等於一點鐘勞動物之二倍的主觀價值」（註）。

這裏，從表面上看來，好像他是站在客觀價值論底立場的。但是照他的意想却顯然是說由勞動時間所直接決定的，並非財貨底價值而是所謂「非效用」或「犧牲感」；後者又直接決定價值底大小。換句話說，勞動時間所決定的是心理的東西——心理上的大小。他的心理主義、主觀主義是再明顯也沒有的。

以上所論述的是克拉克底個人尺度的價值理論，即價值底源泉及其大小，乃依據個人的尺度（個人的主觀效用性，或「犧牲感」、「非效用性」等）來決定的。但克氏底價值論尙不以此爲限，他還把個人尺度的理論擴展而成爲社會尺度的理論。他認爲財貨價值是社會的而非個人的。這是他和心理學派的一個顯著的分別點。

克拉克關於價值底社會尺度的見解是這樣的：他認爲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社會是當做一個單位而行動的；他說「我們關於一個孤立的人所能說的情形，對於一個整體的社會也是妥當的。……社會內勞動所與的犧牲，是由社會集體的勞動之單純的長短所測定的。因此，在當做有機體的社會之主觀評價上，兩點鐘勞動底生產物，常常比一點鐘勞動底生產物有兩倍的價值。」（註）

這樣，克拉克把社會當做個人之擴大來考察了。他根本不知道個人和社會是有質的區別的：社會並不是許許多多個人之機械的總和啊。把個人的評價法則直接轉化爲社會的評價法則，把社會還

（註）見「財富之分配」，頁三八八——三八九。

（註）見「財富之分配」頁三九〇。

元於個人，這樣的方法顯然機械的；因而是錯誤的。

四　克拉克底分配論

在克拉克底國民所得分配論中，所注意到的只是勞動所得的工資和資本所得的利息，這當然也是不合客觀事實的。在他的分配論中根本沒有談到產業底利潤而只有資本底利息。克氏認爲產業家底所得，不過是他的組織生產的一種酬勞，而不含有任何盈餘底性質，所以它不外是產業家從事生產組織的一種工資而已。據此，則作爲勞動僱主的產業家，也是勞動者了。不但如此，克氏底勞動概念，是非常廣泛的：這是包含在財貨生產中的一切勞動，如工場監督、帳目登記、債務徵收、和一切事業進行中所需的勞動都包括在內的。

這樣，照克拉克底意見就認爲靜態價格或自然價格是沒有利潤的價格。在這點上，他顯然比古典學派退步多了。然而我們知道，實際上利潤却構成生產價格之必然的一部分。因爲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內，任何一個產業資本家都必須有利潤，而且必須有平均利潤底保障；假如他僅僅有很微薄的低於社會一般平均利潤的利潤，他就要放棄該部門的產業，而將資本轉投到別的部門裏去，你也如此，我也如此，大家如此，這其結果，該部門的生產品價格必將因生產品對市場供給的減少而上漲起來，一直漲到使這部門資本家也可獲得和其他各部門資本家一樣的平均利潤爲止。所以產業家是必須有利潤的，而且必須有不低於平均利潤的利潤。克拉克既抹煞了利潤存在的事實，因而也就抹煞了成爲利潤源泉的盈餘價值之存在；勞動和資本間的眞實關係，當然也被連帶地抹煞了。其根本原因是在他的方法論上：克拉克考察只停留在現象底表面上，而沒有深入到事物底本質中去。

其次，我們要來考察一下克拉克分配論中所強調的工資和利息的問題如何處理。

依克拉克底見解，勞動者底工資是由勞動底特殊生產力所決定的。換句話說，它是由特別歸屬於勞動的某單位的生產物數量所決定的。因此，每個勞動者所得的工資，適等於他所生產的生產物數量。他做了一個比喻來闡明這一點。他說假定有一定量的資本本需要十個工人來運轉的，現在只用一個工人來運轉，則此工人所做的成績（生產率）必將是最大的。假如工人底數目依次遞增，由一個增加到十個，那時每個工人所分攤到的生產品增加份額，必將是最小的。由於新追加勞動而遞減的生產物增加部份，便是各追加勞動底特殊生產力。這種特殊生產力就是決定工資的東西。這也就是界限生產力決定工資的意思。所謂界限生產力決定工資，就是說一切勞動單位底工資，均以從事重要性最小的工作（即界限生產力）的勞動者底工資爲標準的。而這個從事重要性最小的工作的勞動者，即是所謂界限勞動者；這種人對於企業上既無損害又無利益。所以克氏稱這種勞動者爲一「無關得失地帶」（Zoon of indifferences）底勞動者。勞動底界限生產力和工資，就由這一「地帶」來測定的。

[illegible]

[illegible]一個基本觀點必須加以指摘的，即克氏說，工資是和界限勞動者所生產的生產物數量相等的。[illegible]說，[illegible]勞動價值，一變而爲勞動底價值了。然而事實上工資祇[illegible]價值，[illegible]勞動時間內的勞動價值，而並不代表全部時間（假定以一天——十小時——勞動爲單位，則全部即指十小時言）底勞動價值。果真是這樣的話，當然根本談不到盈餘價値了；資本和勞動的交換變成和普通的商品交換一樣的平等交換了。這是抹煞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關

係的典型的資產者理論。克氏說得妙：「依照自然法則，如無其他影響，絕無任何剝奪的」(註)。

講到克拉克底利息論，那是很簡單的；他只把作爲他的工資法則之基礎的那個界限生產力法則，顚倒過來使用能了。

克拉克認爲，第一，假定勞動量是一定的，當繼續追求資本量時，則資本各單位底生產力，是隨資本之增加而遞減；第二，資本各單位，在其有效的生產力上是相同的；第三，因而資本底最終單位底有效生產力（資本底「界限生產力」），就成爲決定資本利息的東西。但是克氏認爲資本最終單位底有效生產力是等同於它的「特殊生產力」的，因此，決定利息的情形和決定工資的情形相同：利息是資本最終單位之特殊生產力所決定的。

這種利息論，是以前述的企業主亦是勞動者（因而他的勞動亦是生產的勞動）這一命題爲根據的，因而它的產生情形就和工資底產生情形完全一樣了。他把「適用」於工資的「法則」，移殖到利息問題上去，把工資「法則」當作了利息「法則」底前提。我們既已指斥了他的工資法則（工資論）底不妥當，他的利息法則自然也站不住了。

其次，克氏所以把利息法則等同於工資法則，乃由於他把所謂死的勞動（即資本：資本本身爲勞動之產物，而這種勞動已凝固於死的資本財物上，故名）和活的勞動（即工人底勞動）看作一樣東西的緣故。照克氏底意見，活的勞動底工作報酬是工資，死的勞動（資本）底報酬就是利息。照這樣說來，則資本本身也和勞動一樣地固有着一種生產報酬（利得）的「性能」了。換句話說，利息是資本底自然產物，而不是資本所有人佔取盈餘勞動（即超過必要勞動以上的那部分勞動）的結果

（註）見「財富之分配」，頁三一四。

•資本和勞動的眞實關係就被完全抹煞。這正是一切資本主義經濟學者所共同的見解，但絕非客觀的科學的正確見解。

最後，要約略地講一講克拉克底地租觀。

照克氏底意見，地租是和利息同一性質的所得；地租也不外是生產工具底產物。在克氏看來，土地是和機器等物一樣的生產工具，它也就是資本底一種形態，因此，怎樣產生利息，也就怎樣產生地租。

地租如何決定的呢？在「財富之分配」中說：『土地各塊之積極的財富創造力決定土地底地租；這一事實，恰正和資本各單位之財富創造力決定資本利息是一樣的』。又說：『地租祇是資本財底一般使用費底一個分歧形態；而資本財底一般使用費，在本質上也好，在大小上也好，都等於資本底利息。』

克拉克把土地和其他資本財——如生產工具——一樣看待了。但事實上兩者是絕非相同的：土地（指未曾加過工的土地）是自然底賦與物，而工具是勞動底產物；前者本身雖有價格但無價值，因爲它是和陽光空氣海水等等一樣的自然物而非勞動生產物；後者則因爲是勞動生產物所以具有一定的價值。土地之所以無價值而有價格，乃因自然賦與的土地底量的有限而它又爲私人所壟斷的緣故。土地底價格，是資本化的地租（註），它是依據地租和平均利率這兩個因素來決定的。但人爲的生產工具則不然，它的價格是依存於它的價值的。

（註）所謂「資本化的地租」，就是把地租假想成一定的資本額底所得，知道了地租要求地價，就好比知道了利息要求資本額一樣，只要令地租夫被除於利率，所求得之商數，即爲土地價格。

土地和工具既是這種區別，因而二者在生產物價值底構成中所起的作用亦不相同。生產工具底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被轉移到生產物中去，因而它構成生產物價值底一份子。土地本身既無價值，它僅僅是生產勞動之自然的前提，使生產過程成為可能的一種自然條件，它使價值底生產成為可能而已。因而土地在物品價值底構成中並不起直接的作用。不過二者有一點相同的，那就是它們都不創造剩餘的價值。

由此可知，克拉克所確定的土地有積極的財富創造力這一命題，根本是皮相之談，與事實不符的。

第三節　馬夏爾底學說

一　關於經濟學底對象和任務

首先，談到經濟學底對象時，馬夏爾和正統學派底代表如約翰·密勒底定義大不相同；密勒確定經濟學底研究對象是財富一般，馬夏爾則認為經濟學所研究的是為經濟環境和經濟動機所影響的社會中的人類行為。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中，他寫道：「經濟學是一種關於人類通常生活事務的研究，是考察與吾人必需物質福利之獲得與使用有密切關係的那部分個人和社會的行為」。這樣，馬夏爾觀念中的經濟學對象，已不同於他的前人們所確定的籠統的財富一般，也不限於單純的「物」（財富），而是比較具體比較複雜的人類行為。這不能不說是馬氏底一個進步。

其次，講到經濟學底任務時，馬夏爾底立場，更有比較顯著的進步。他認為經濟活動（即日常謀生的工作），在形成一時的制度和思想行動底方式上，是極為重要的；所以經濟學者底基本工作

，是要就關係吾人實際生活的制度範圍以內，研究人類之行爲。接着，馬氏就提出了社會問題之解決，作爲研究經濟學底最高目的，亦卽經濟學本身底中心任務。他說：「當經濟學底最高目的却爲對於社會問題之解決，有所貢獻」（註）。具體地說，馬氏認爲經濟學底研究，應當着眼於消滅社會底貧困，解除下層貧民底痛苦。這裏，我們可把本章第一節中所引用過的一段話再提出來讀一讀：「所謂下層階級是否眞有存在的必要？把一切的人們從貧乏的苦痛中解放出來，使他們不因過度的機械的痛苦工作而發生志氣衰頹，使他們有享受文化生活底公正機會，這眞是不可能的嗎？這個問題，正是提供最重大的興趣與經濟學研究的」（見前揭重）。同時，前面也曾述及，馬夏爾以爲經濟學不是「知的遊戲」，也不是爲眞理而追求眞理的手段，而應把它視爲倫理學底輔助者，視爲實際生活底僕奴，視爲剷除貧困的手段。所有這些觀點無疑地是馬夏爾底特點，也是他比他本國的古典派前人們進步的地方。

但是因爲馬夏爾受了歷史學派底某些影響，他在對經濟學任務底理解上是把經濟學倫理化了；而在研究底方法上則亦着重於「搜集事實」和「記述材料」。由於他並不眞正瞭解歷史法則，所以他的所謂「社會問題之解決」，並不從客觀的歷史發展法則出發，當然更不是站在所謂下層階級底立場，而是從教士式的熱情和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的。因此，馬氏對於社會大衆福利之不能實現，未曾從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中去尋找原因，而只是籠統地歸罪於人。依據這種觀點，馬氏所確定的「經濟學之最高目的爲社會問題之解決」，充其量也只能對於現社會的某種程度的改良，而決非現存社會制度之澈底改革。

（註）馬夏爾著：「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頁四二。

一般地說，馬夏爾雖然反對古典學派首創人所主張的「經濟人」說，但是因爲他受了李嘉圖和約翰·密勒底影響較深，所以正如凱因斯（Keynes）所說，馬夏爾底論理經濟學，在實質上是站在古典學派底方針上的。不過同時他也採取主觀學派或界限效用學派底理論觀點；至於受歷史學派底影響，如前面所指述，也是相當明顯的。

二　馬夏爾底價值論

成爲一切經濟學理論之中心問題的價值論，在馬夏爾底學說中，實際上只是價格論。他關於價格的理論，只是李嘉圖和傑逢斯（Jevons）底理論之折中的綜合。李嘉圖認定價值係由生產費用（或成本）所決定，傑逢斯則認爲價值完全依靠於效用。這在馬夏爾看來，認爲李嘉圖和傑逢斯二人底見解，是同樣地犯着偏面性的毛病。

這種偏面性底原因在那裏呢？依馬夏爾底見解，原因是在他們的立場，都不從相互關係上，而從呆板的因果關係上去認識經濟諸要素。在他看來，以李嘉圖而言，他論及正常價值(Normal Value）時，只說種種分子是互相支配的，却沒有明言種種分子在很長的因果關係底連鎖中，決不是順次地支配其他的」（註一）馬夏爾認爲這是李氏底缺點；而傑逢斯也同樣地不能避免這種缺點。馬氏從互相決定的關係或從互相依存的關係來看，認爲費用學說和效用學說並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的。他卽據此而建立了他的「均衡價格」（equibrium price）底理論。他的論見，表達於下面的一段文字：「論究價值是受效用底支配，抑係受生產費用底支配的議論，等於論究剪刀底上刃

（註一）轉錄波多野鼎著（彭譯本）：「現代經濟學論」頁一七二，或馬氏著：「經濟學原理」頁八一六。

截紙呢，抑係下刃截紙的議論。誠然，使剪刀底一刃不動時，也可使他刃動而截紙，……但是嚴格地說來，這是不正確的」（註二）。又說，「生產費原理與界限效用原理，無疑的，是支配一切的需求供給法則之構成部分。各原理是可以與剪刀之刃相比的」（註三）

從上面的敘述，可知馬夏爾底價格理論是以需求與供給的法則（即供求法則或供求律）為基礎的。然而這不是李嘉圖等所駁斥的需要供給法則而是另一種；因為李氏等所指斥的需供法則不過是商品市場價格底變動法則，這決不能構成所謂變動之中心點或歸趨點的「自然價格」底法則。但是馬夏爾把自己的根本思想求之於需要供給說，是想另創一種比較深刻而沒有上述缺點的需供說，藉此以闡明古典學派所謂的自然價格，或馬夏爾所謂的均衡價格。

馬夏爾怎樣解釋他的均衡價格呢？

他從所謂需求價格（demand price）和供給價格（supply price）底設想出發來解釋均衡價格的，需求價格是需求者（買主）所勉能支付的當作一定量的商品代價的價格。供給價格是供給者（賣主）對於自己所供給的一定量商品所甘於接受的價格。在特定時期內，生產若干數量的商品，其需求價格若大於供給價格，則賣主因供給此項商品於市場而獲得利益，因而企圖增加商品底供給量。反之，當需求價格小於供給價格時，則賣主勢必因供應市場而遭受損失，因而企圖減少商品供給量。在第三種場合，假使需求價格與供給價格相等的話，則生產量既不增加也不減少，這就是均衡狀態。在這種場合，這一時期內所生產和販賣的貨物量，就可以稱為「均衡量」，其買賣價格，可

（註二）前書頁一七三，或「經濟學原理」一頁三八四。

（註三）前書頁一七三，或「經濟學原理」頁八二〇。

以稱爲「均衡價格」（參閱「經濟學原理」，頁三四五）。簡單地說，均衡價格就是需求價格和供給價格相一致的價格。

說明了馬氏底均衡價格觀之後，我們要進一步來說一說什麼是馬氏所說的需求價格，它怎樣被決定？什麼是供給價格，它又怎麼被決定？

馬夏爾把需求價格專門作爲消費者所甘願支付的需求價格來考察的。他說：「商人或工業家，當作某物底代價而能支付的價格，結局是繫於消費者當作該物底代價……而能支付的價格。所以一切需求之結局的調節者是消費者底需求」（前書，頁九二）。

在馬氏說明需求價格時，他援用了效用遞減的法則和界限效用的法則。但是誰也知道，效用是主觀上的大小，而用主觀上的尺度來測量客觀上的大小價格，那是不可能的；效用的直接測量是不可能的。馬夏爾雖亦承認主觀效用沒有直接測量的可能，但却認爲有間接測量的可能。所謂間接的測量就是拿當作自己欲望滿足底代價而準備支付的價格來測量。在這裏，馬氏立即把效用遞減法則轉化爲價格遞減法則。他說某人底某物所有量愈多，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如貨幣購買力，這人所支配的貨幣量等），那末對於該物底增加量，他甘願支付的價格也愈低廉；換言之，即對該物的界限需求價格逐漸減低。

這樣，馬夏爾就把界限效用遞減法則轉化爲界限需求價格遞減法則了。馬氏從某人底某物所有量愈多，他對該物底增加量所願支付的價格愈低，這一法則出發，又導出了下列的需求法則：「某物底價格愈低則愈想多買」。他說：「個人對於某貨物的需求，不只依靠他想購買的數量，……同時還依靠他用怎樣大的價格來購買那個數量。那個人底需求，也是依靠價格的」。（前書，頁九七

）。這樣，照馬氏底意思，需求與價格二者底相互關係，簡單地就可用下列的圖式表達了：需求—↓價格；價格↓需求（這裏，「↓」是表示決定之意），而這種需求與價格歸根還是決定於消費者所估定的效用的。

而且照馬氏底意見，這種事實不只適用於對個人底需求，亦且適用於對社會全體底需求。在一定的地區內，全體底需求，是所有個人對某種財貨的需求底總計。這樣，馬夏爾就創立了以下一個普遍的需求法則：販賣量愈多，則購買此量的買主所定的價格不能不愈低；換言之，需求量隨價格底低落而增加，隨價格的騰貴而減少」（頁九九）。

這就是關於馬夏爾底均衡價格底決定因素之一——需求價格——底情形。

以下要簡單地敘述一下，關於均衡價格底另一決定因素——供給價格——底大意。

如前所述，供給價格就是賣主對自己所提供的貨物量所甘願接受的價格。那末決定這個價格是甚麼呢？克拉克說這是「生產費」。那末「生產費」又是甚麼呢？

關於「生產費」（Cost of Production），馬夏爾創造了兩個範疇：一個是「實質生產費」，又一個是「貨幣生產費」。所謂實質生產費是：（一）種種的直接勞動，（二）種種形態的資本（間接勞動），（三）蓄積資本時所必需的節慾，或者是「期待」（"waiting"）以及製造財貨時所必需的一切努力與犧牲底總和。所謂貨幣生產費，就是為此等努力與犧牲而支付的貨幣額（即此等努力與犧牲底價格）。

馬氏在這裏所說的直接勞動與間接勞動，顯然抹煞了勞動底質地，他沒有指出勞動底熟練程度底高低要產生完全不同的價值這一點，他把不同質的勞動都一律還元於同質同等的勞動了。這是一

點。更成問題的一點是實質生產費底構成因素中的「節慾」或「期待」（或「延緩」(delay)）這類範疇底估價問題。這一點是顯然從俗流學者那裏繼承過來的。它的荒謬當然不言而喻。不過值得追究的是當作直接生產費用之一的「期待」，其大小如何決定的問題。

照馬氏底意見，所謂期待（馬氏忌避「節慾」而用「期待」以爲代替），是爲將來而犧牲現在的意思，亦卽爲將來的滿足而犧牲眼前的滿足的意思。犧牲（卽「期待」）底期限愈長，則應得的報酬（卽「期待」底價格）愈大。企業家底蓄積資本，就是犧牲眼前享受（福利）以期待將來獲得福利的行爲。他因這種動機而支出的財貨（資本），就是投資。馬氏認爲：期待某種支出之收穫成果的期限愈長，則作爲報酬他的這個成果，就不能不愈大。無疑的，企業家期待着他的支出底成果，是要超過他的支出的；這個超過額是和期待的期間相應而成複利的增加的。因此，期待底大小是由期待期間底長短而決定的。

以上所述，就是關於實質生產費的大致情形。但是這裏我們很容易看出這一理論底重大缺點。須知要確定所謂實質生產費底量的大小，只有把種種要素還元到一個共通尺度時才有可能。然而要把勞動和期待還元到一個共同尺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爲勞動是客觀的範疇，它可用時間的長短來度量的。期待或節慾或犧牲等等都是主觀的範疇，它的度量尺度是絕不可能人人一致的。兩者決不能化爲同單位的量而加以計算的。所以馬夏爾雖似正統學派地以實質生產費爲問題，却並不以此來說明供給價格。他因而採取只藉貨幣生產費來說明供給價格的方針。

但是所謂貨幣生產費，不過是當作製造貨物時的一切「努力」和「期待」的犧牲代價而支付的貨幣額，亦卽是這些「犧牲」底價格；而這種貨幣額仍不外是那一切「努力」與「期待」底價格之

貨幣的表現而已。這樣，馬夏爾雖想避免用不可能求得共通尺度的勞動和期待等所構成的實質生產費來說明供給價格，而實際上則仍不能不回到勞動和期待等上面去，因而永遠陷於絕境。

至於整個地來說，則馬夏底價格論是始終脫離了價值的價格論，而他的全部理論中則實際上用價格代替價值的範疇。充其量，馬氏觀念中只有以需求供給關係為基礎的市場價格，而絲毫沒有以價值（因而亦即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生產價格。馬夏爾理論底主觀主義色彩是非常濃厚的；同時，也顯然帶着一些俗流學派的臭味。

三　馬夏爾底分配論

現在我們來研討一下馬夏爾底分配論。

馬氏底分配論是和他的均衡價格底理論有着密切關係的。

在馬氏底均衡價格理論中，需求價格被認為歸根結蒂是消費者底需求價格；供給價格則被認為是消費資料生產者底供給價格。所以被視為供給價格之決定者的生產費，也是站在把生產財價格當作一定的大小之前提下來研討的，尤其是以「勞動」與「期待」這兩大生產財底價格——工資與利息——之一定的大小為前提來研討的。這樣，馬夏爾把關於工資、利息等等的理論，當作生產財（即生產資本或生產要素）價格底理論而展開出來。

但是當作生產財價格的工資、利息等，從各個獲得者看來，却無疑地是所得或收入。因此，關於這些所謂生產財價格的理論，同時也就是所得底分配論。在馬夏爾底體系中，分配論實際呈現為一般價格理論底一部分。也可以說，馬夏爾是在一般的價格論中說明了他的分配論。

因此，談到工資的話，我們只須研究馬氏底勞動價格論就行。

照馬夏爾底意見，就正常的情形說，工資就是勞動（這裏，他說的是勞動，而不是勞動力；關於勞動力的概念是一般資本主義經濟學者所缺乏的）底均衡價格：而勞動底均衡價格則是勞動底需求價格和供給價格相一致（均衡）的那個價格。

那末勞動底需求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呢？

這裏，馬夏爾採取了「勞動底需求價格是由界限勞動者底「純生產物」所決定」的界限生產力說。但同時馬氏卻也沒有否認這種界限生產力說底缺陷。所以他反對完完全全用這個學說來說明工資。他說：有人以爲勞動者底收入有等於該工作底純生產物的傾向，這種說法本身，毫無實質的意義。他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內，纔承認界限生產力說底妥當性，即只認爲用此說以闡明工資支配諸因中之一因，是確當的。

那末支配工資的其他原因是什麼呢？這就是所謂勞動底供給價格。馬夏爾確定勞動底供給價格爲招募生產某貨物之一定量的必要勞動所需要的價格。這是站在僱主方面的規定。假如站在勞動供給者方面來加以規定，則可說勞動底供給價格即是克服勞動底「非貨物」（"discommodity"）或「非效用」（"disutility"）（註）所必需的報酬。

然而實際上，勞動（應當是勞動力）底供給是和一般商品底供給一樣的，是應該從勞動（力）底生產費，即從勞動者底生活的觀點來加以考察的。換句話說，不是在勞動者提供勞動時所受的痛苦、犧牲等等（即「非貨物」），而是在勞動者之生活上，來把握勞動供給之事象。所以馬夏爾式的勞動底供給價格，若依李嘉圖所說，即不外乎勞動者底生活費。馬夏爾把勞動者底生活費用分爲

（註）所謂非貨物或非效用，就是與勞動相伴而起的肉體和精神的痛苦。

二部分：（一）勞動底養育養成費，（二）勞動精力維持費。馬氏斷言前者不影響於勞動底供給價格；而對於後者和供給價格的關係。馬氏却未予詳論。然而實際上勞動力底維持（或恢復，或再生產）——勞動者底生活費——卻正是和勞動底供給價格有密切關係的。可是馬夏爾對於這點却沒有加以充分的注意。忽視了這個工資底決定要因，就等於對工資底實質毫無所知。我們知道，依據科學的解說，依據客觀的事實，勞動者替企業家做一定時間單位（一天、一週或一月）的工作，就是出賣給他這一時間單位的勞動力。勞動者在一天工作之餘，已精疲力竭；為要在下一天仍能繼續勞作，就必須恢復他在上一天已消耗的勞動力；而恢復的惟一方法就是生活——食、住、衣……。生活必須有物質資料，任何物質資料必有一定的價值。因而勞動者為恢復或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之價值或價格，就是勞動力底價值或價格，也就是工資。馬夏爾不從這些地方着眼去把握工資底實質，而主觀主義地，從現象表面地，以什麼「界限生產力」，「克服勞動底『非貨物』」等說法來求所謂均衡價格，和在價格論中一樣，完全脫離了客觀價值而專在主觀價格底圈子中做奧妙的文章，當然不能發見之眞相。

那麼馬夏爾對於利息抱着怎樣的見解呢？

馬夏爾關於利息的界說，是很多的。在同一部「經濟學原理」中，他最初說利息是使用資本時所支付的價格（五三四頁），同時又說利息是蓄積底需求價格（同頁）；後來又說它是資本在生產上所作的貢獻底代價（五八四頁），又說它是期待底報酬。

從這些利息底界說中，可以看出馬氏實從不同的立場出發來下不同的定義的。如我們所知，利息是表現資本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關係的。前者是資本底所有者而非使用者，後者是資本底使用者而

非所有者。前者是資本底供給方面，後者是資本底需求方面。所以說利息是期待底報酬，乃是從資本底所有者供給者方面的立場出發的。反之，說利息是對資本使用所支付的價格，則是從資本使用者需求者方面的立場出發的。

關於決定利息高下的法則，馬夏爾仍是根據他的均衡價格論來說明的。簡單地說，作為資本使用之代價的利息，其水準也和物價底水準一樣，是由市場上資本底需供關係來決定的。說得確當些，照馬氏底意見，是由資本底需求價格與供給價格底均衡點所決定的。至於資本底需求，他認為是因資本底生產性，因資本底「貢獻」而發生；資本底供給則由於人們為了蓄積資本不能不期待，換言之，即不能不為將來而犧牲現在。

但是由資本底生產性決定資本需求，因而決定利息底高度，這一「法則」是不合事實的。我們知道在好景氣的時候，資本底生產性很大，但是社會對資本的需求遠不如市況蕭條或不景氣時期那麼迫切，那時利息也往往是很低的，因為資金周轉甚為靈活的緣故。反之，在不景氣時期，資本底生產性退縮到極小限度，但一般工商業界對資金的需求却極迫切，為數亦極大，那時的利息水準是很高的。至於「期待」、「犧牲」等理論底不科學性，前面已經指出，似無再加評述的必要。

最後，我們要來講一講馬夏爾底利潤觀。這是馬夏爾學說中最弱的一環。

首先，馬夏爾根本就沒有把利潤當作一個獨立的範疇來考察，他確定利潤底意念為資本利息和總經營收入（指由組織企業，指揮生產，監督工作等而產生的收入）之和。一般地說，馬夏爾對於所謂利潤本質及其構成的說明是非常曖昧的。不過有一點却是非常明確的：不論利潤也吧，利息也吧，馬夏爾都沒有從生產過程中，從價值增殖過程中去追求它們的根源，因而正和他對價值的理解

一樣，他一方面始終只停留在事物底現象上，沒有深入到它的本質中去；又一方面他始終是主觀主義地處理問題，而沒有採取嚴格科學的客觀的立場，去研究利息和利潤底客觀源泉（客觀基礎），永遠在『效用』，『需求』，『期待』，『犧牲』等等法寶周圍繞着圈子，盡了他掩飾資本主義榨取本質之能事。自然，這也是一切資產集團裏的經濟學者所難免的。

其次，關於平均利潤的問題和決定利潤率高低的原因，馬夏爾底見解是很特別的。特別的地方就在它的更加表面化而無視事情底實質。關於平均利潤，馬氏就根本否認其存在。他首先舉小企業和大企業底利潤不能平均一事為例，以證明他自己的論斷。理由是大企業中出薪給僱用的管理人員和工頭等所做的工作，在小企業中是企業主自己担任的。因此，小企業主底利潤就比大企業所得的利潤大，因為裏面包含有小企業主底勞動收入在內。他又說，一般地講，利潤率總是隨着企業規模底擴大而下降的。這裏，馬夏爾無意中道破了利潤率隨着資本主義之發展而下降的一般傾向（法則）；但是為什麼利潤率會隨企業規模底擴大而下降，這種利潤率下降的傾向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有些什麼樣的意義，馬夏爾未加絲毫說明，事實上他也不能說明。

此外，馬夏爾又指出經營比較困難而危險的生產事業，利潤率要比困難危險較少的企業高些。這裏，他從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底比例大小上，尋求經營困難與危險底標準。他認為流動資本所佔比率愈大，則事業底困難危險程度愈大，而利潤率就愈高。反之，固定資本比率愈大，則其結果相反。馬氏這一論綱，就對於現象的判斷論是很對的。但是第一，實質上企業利潤率底高低，卻並不由於固定與流動這兩部分資本底比例底大小，而是由於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的比例（卽所謂資本底有機構成）底高低，卽不變資本對於可變資本的比率愈大（資本有機構成愈高），則利潤率愈低，

反之則愈高。第二，這種利潤率高低不同的情形，在資本主義的現實社會內，由於自由競爭底作用，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只能成爲暫時的偶然的場合，而不可能是經常的普遍的情形；然而馬夏爾是根本否認利潤平均化之法則的。最後還有一點應得指出的，即馬夏爾從事業經營上的「困難」，「危險」等考慮出發，來判斷利潤率之高低，這顯然又是和「犧牲」、「痛苦」、「期待」等等的一套，帶着同樣濃厚的主觀主義的臭味。